

刘鉴强 著

一段真实记录神秘圣地的震世文字
当代藏族人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
波澜壮阔又深沉感人的史诗
认识西藏的第一选择

藏人传奇



— 李连杰壹基金奖励书中人物创建的机构一百万元 —

这本书没有想象,只有现实!

以罕见的深度,惊心动魄的力量,记录了当今世界最高、最偏远地方人们的真实生活!

邱立本、隆藏法师、杨瑞春、芮中校等
名人学者联袂推荐!



天 珠

藏人传奇

刘鉴强

西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刘鉴强，山东寿光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北京大学自然与社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前《南方周末》调查记者。（jq.liu54@gmail.com）

《天珠》简介

《天珠——藏人传奇》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通过几位现代藏人的人生故事，真切刻画了当代藏族同胞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憨厚的乡村小子嘎玛历经波折，成为操纵世界天珠价格的“天珠王”，他娶了藏王松赞干布的后裔，后来又转向保护青藏高原的环境与文化。他的传奇人生堪比《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他的朋友扎多跟随环保英雄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最后成为藏区最著名的环保人士；嘎玛的哥哥仁青和朋友耿登都曾是喇嘛，都因为爱情而还俗，但两人对脱下袈裟的态度完全不同：一个痛苦一生，一个庆幸一生；本书还第一次详细披露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最后被盗猎者杀害的故事，读者盛赞“比电影《可可西里》更真实、更震撼、更动人。”

《天珠》将真实性与高度文学性结合，既是对青藏高原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又是非虚构文学的杰作。读者评论此书说：“这本书惊心动魄，又生动感人。”

读者评论

隆藏法师（中国佛学院）：

这本书惊心动魄！不仅因为书中人物的传奇经历，更重要的是，我们得以因此走进一个敬畏自然、快乐自信、慈悲众生的伟大民族的心灵秘境，知悉人类共同命运的希望所在。从未如此冲动地想一见书中的真实人物，也从未如此为他们所代表的藏人的丰盈精神世界而感动得泪流满面。

杨瑞春（《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作者发现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像“天珠王”发现了上品天珠，心中一定怀着暗喜前行。书中人物背后有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是一部藏族当代史，也是藏族人寻找自我的心灵史。

李欧梵（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

以非虚构文学真实展现当代藏人生活、心灵和历史的书，这是第一本。尽管西藏是全世界的重要议题，书中人物所代表的中国境内六百万藏人却曾被忽略。本书第一次将他们作为主角，让人们看到西藏的未来所在。

龙莹（北京读者）：

“《天珠》中，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突然对扎多露出兄弟般的关怀，那些词句，让我看见这个男人冷峻的脸忽然绽放出柔和的光，可以融化所有冰川。然而这是最后的告别。我想着他的脸，眼泪就滚下来。我哭了三次。好在书中令我哭泣的美，层出不穷。”

郝利琼（读《天珠》后写给书中人物扎多的信）：

从西宁回上海的火车上，我用两天一夜把《天珠》读完，精神陷入高度亢奋之中，感到自己有个强大、喜悦的灵魂——对于我们多年的精神困扰，书中信仰者的回应，给了我醍醐灌顶的光！感谢刘鉴强，他用真心书写藏人的心灵史，也书写一个汉人的心灵史；更感谢用生命书写了本书故事的藏人，这才是混合着血和肉的历史——个人史和时代史、物质史和精神史。还有什么比把自己汇入本民族历史浪潮中更激动人心的事呢！

耿登丹巴（藏族学者、画家）：

没见过汉族人写藏人的书，写得这么生动、深入、准确。我好几位藏族朋友读《天珠》时哭了。它不是小说，但比小说更好看、更打动人心；将历史、文化和地理背景巧妙揉进现代藏人的精彩故事，如一部藏族百科全书；更可贵的是，虽不是学术著作，但资料运用比很多学术著作更严谨。

吾坚才仁（青海藏人）：

《天珠》写得太棒了！虽然完全真实，不是小说，但比小说更好看。书里人物的执著追求给人力量，年轻藏人会为这样一批藏族人感到骄傲。感谢一个汉族人写出真实的藏族人。

邵璐莉（北京读者）：

《天珠》是我所看过最好最好的纪实作品，大量的采访和出色的写作，让它像小说一样好看。但它又不止是好看，它所给予我的思考和震撼已经多年未遇。

萤火虫（豆瓣网读者）：

《天珠》写得扎实、生动、包容——我甚至无法概括出此书所涉及的是藏民或藏文化的哪些方面，因为不论是藏族的历史、政教体系的变迁，还是藏民面对现代化浪潮的姿态和行动，简直方方面面无所不包，都被作者融化在寥寥几个家族的沿袭演化之中，当真有平民史诗的气魄。

书中所描写的家族成员，每一个都被写出了鲜明的个性，同时又代表了当今藏民各有差异的现实选择和人生道路。每个人身上都充满了激烈的冲突，小到私人的爱情，大到整个民族和大自然的繁衍生息，其中每一个人都在未知中努力向前，他们必须和内心的欲望、体制的束缚与非难、金钱的诱惑和侵蚀、甚至是传统文化中的陋习不断地搏斗，而这些克服一道又一道难题的过程，最终都会归结到个人修行上来，他们所有的选择，最后都将落在寻找、发现和坚持自我的意义上。从这个层面说，《天珠》里纷繁复杂的丰富人生，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以藏传佛教的思考方式来进行，但无一不是实践和证悟交替进行的艰苦跋涉。

媒体书评

吕中校(香港《亚洲周刊》书评)：

如果要我推荐一本认识西藏的书，以前我会推荐三本：一本是美国学者戈尔斯坦的《雪狮与龙》，一本是王力雄的《天葬》，再一本是美籍华人徐明旭的《阴谋与虔诚》。但是看了刘鉴强的《天珠》之后，我会毫不犹豫把这本书作为第一推荐。这是本让你客观、平实了解西藏的难得好书。

冯永锋（《南方都市报》书评）：

读完《天珠》之后，我才真正明白，我只初尝“从里向外写”的肤浅，刘鉴强才真正掌握最高境界。《天珠》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以坚忍不拔的采访，把几个藏族人的故事写得出神入化。作为一个山东人，刘鉴强去写藏族人的生活，但他好像写自己的生活那样轻车熟路，那样自信坦然，那样的内生和自发。这时候，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写作的技巧，需要的也不仅仅是采访的深入，而需要你的心，能够和你的写作者站在一起——这是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优秀作者的必然前提，有时候，我把这种能力称之为“灵魂附体”。

阳敏（《新民周刊》书评）：

作者刘鉴强是位杰出的调查记者，2006年离开《南方周末》，花了几年时间去藏区游历、采访、写作，完成了这本《天珠》，他不仅用生花之笔为仁青、耿登和木梭这些真实的人物画了素描，也试图以他自己，一个汉人的心灵为镜，照西藏传统宗教生活的轮廓。

《天珠》将传奇藏人的生命轨迹，汇合成一部当代藏族精英的心灵史。我想，任何一种优秀的文明，最终都是要解人类心灵之“惑”，不过是殊途而同归罢了。然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本身，如同一个契机，可以让我们以藏文明为镜，观我们自己的教育、信仰和彷徨。

罗四翎（《时代周报》书评）：

刘鉴强的《天珠：藏人传奇》为如何走进西藏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从走进西藏人的内心世界开始。

在作者不虚美不隐恶的笔下，我们看到一个日渐现代化也日渐失去传统的西

藏，一个渐渐富裕也渐渐躁动的西藏，一个有了科学知识却又陷入焦虑的西藏。

相对于书中所叙述的独特的藏族历史文化、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严酷壮丽的自然景观，书中几位有着丰盈内心世界的当代藏人无疑更具有吸引力：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的内心如此丰富强大与喜悦？

康慨（《中国新闻周刊》书评）：

我对（与西藏）相关的绝大多数汉语出版物，都难免失望乃至厌恶。其作者或如显贵般飞临，或遮蔽，或曲解，或猎奇，或自恋，或以文化殖民者的心态，而后炫耀。但刘鉴强的《天珠》非常不同。发现这样一个“从下面来的汉人”，足以使我既惊且喜。他以内地作者几乎不可能达成的贴近，重述其主人公——一位成功的藏族商人，一个还俗的喇嘛，一个殉难的环保官员及其事业继承者的人生故事，并结合民主改革与改革开放这两次历史大变动，难得地再现了藏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信仰、社会和文化方面所受的剧烈冲击。

我以前读梅尔文·戈德斯坦的现代西藏史著，总因自己的无知而不安，久积成隐隐的罪感。刘鉴强的作品再度唤起同样的感受，唯一不同的，是我读完后反倒生出些许释然，因为总算有人以汉语，讲出了此前不曾有人提及的许多故事。

冯永锋（《外滩画报》书评：）

刘鉴强 30 多万字的《天珠》，写的是几个藏人的传奇故事，其中每一个人都内心丰富、信仰坚定，都有充满戏剧性的生命历程。今后一段时间，《天珠》估计会成为了解藏族人的必读书，它写得如此易感和易认，以至于读者很容易“从里向外读”。

目 录

自 序	11
人物表	18
引子：迷失在北京	27
第一章 求佛	31
一 求佛	12
二 白马骑士	37
三 感谢毛主席	41
四 孤儿	46
五 流浪	50
第二章 出道	54
六 阿达拉姆虹化	55
七 1980 年	59
八 出家	63
九 牵白山羊的喇嘛	67
十 少年商人	72
十一 我要去拉萨	78
十二 带亡灵回家	82
第三章 荒原	87
十三 长江源的年轻人	88
十四 索南达杰	92
十五 可可西里	96
十六 最后一次巡山	101
十七 英雄之死	108
第四章 爱情	113
十八 我要去远方	114
十九 仁青桑珠还俗	119

二十 耿登丹巴还俗	125
二十一 送我一束玫瑰花	1259
二十二 天珠为媒	140
二十三 藏王后裔	148
二十四 爷爷订的婚事	153
第五章 求道	158
二十五 辩经	159
二十六 哪里找到我的灵魂?	164
二十七 用母语写你的名字	169
二十八 弦子	174
二十九 红尘	180
三十 乌鸦和孔雀	186
第六章 出走	191
三十一 出走的少年	192
三十二 街头小霸王	198
三十三 失意的成都	204
三十四 我的护身符呢?	211
三十五 告别可可西里	218
三十六 索加“胡子帮”	222
三十七 我的草原我的家	226
七 回归	234
三十八 康巴汉子	235
三十九 佛像	240
四十 “楼兰大盗”	246
四十一 牢狱之灾	253
四十二 天珠王	265
四十三 神山圣湖	270
四十四 爷爷奶奶的转世	276
四十五 什么是天堂	280
四十六 佛啊，给我力量	286
尾声：回到拉萨	292

附录：本书采访时间地点	305
-------------------	-----

后记

再后记

自序

“好吧，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故事——由白羊毛和黑羊毛织成的、有好也有坏的故事。”

——仁青桑珠

这是本内容真实的书，书中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是真的。与关于西藏的小说不同，这本书没有想象，只有事实；与一些关于西藏的纪实作品不同，这本书的主角是藏人，不是作者。书中这些来自不同藏区的主人公不能代表全体藏人，但我希望笔下的他们像一扇扇明亮的窗子，透过这些窗子，真实的西藏扑面而来。

这本书孕育于我三年前的藏区之行。

2005年7月30日，我作为《南方周末》记者，应北大吕植教授之邀去青海藏区采访。我们走唐蕃古道，从西宁去澜沧江源头，路况很差，江边悬崖上的一段段V形路坡陡弯急。面包车爬一个高坡时，像一头疲累的老牛低吼着，抽搐着，冲到半截突然力尽，忽悠一下滑下来，“刹不住了！”司机王师傅失声低叫。后面就是悬崖，汽车不情愿却无奈地向悬崖滑去，恐惧像寒冬一样将我冻僵，我不知如何是好。

坐我边上的扎西多杰纹丝不动，他的助理志加打开车门跳出去，搬起一块石头扔到车轮下，我也跳出去搬石头塞车轮。汽车终于停下，后轮离悬崖只有一米。从悬崖往下看，澜沧江缓缓而流，令人头晕。

我几乎不相信离死亡只有一米，也许自己夸大了恐惧？我偷偷问王师傅：“刚才真的刹不住了？”

他脸上僵硬，点点头说：“是。”

再看扎西多杰，照样口若悬河，浑若无事。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藏族人，矮矮粗粗，长头发，嘴边留一圈胡子，健谈风趣，一次次引爆我们的笑声。对我来说，他似乎代表着那个遥远陌生的群体。我仔细观察他，发现他比大部分汉人更粗犷、豁达、快乐。但只有这些吗？

说笑间，一辆卡车逆行而来，车厢上用铁栏杆关着几匹马。那骏马应驰骋在草原上，现在却被粗暴地栓上铁链。扎西多杰沉默下来，眼光随马远去，低声骂道：“这些人应该下地狱！”我第一次看到他严肃的表情。

十几年前，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扎西多杰是他的秘书。他们前后十二次进可可西里，抓获数百盗猎者。1994年1月18日夜，索南达杰被盗猎者伏击，在枪战中牺牲。此前索南达杰派扎西多杰带伤病的盗猎者先行离开去治疗，扎西多杰因此得以生还。他们及其后继者“野牦牛队”的故事被报道后，全国关注，国家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藏羚羊得到了较好保护。几年前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就是以他们的故事为原型。老领导索南达杰牺牲后，扎西多杰追随他的事业，成立了藏区第一个民间环境组织。我这次来就是采访他和当地藏民的环保活动。

我们到了杂多县地青村附近的喇嘛闹拉神山，这里是澜沧江的源头，从神山脚下走到有电灯的地方，骑马要好几天。到了一个高坡，几十个藏民“啊啊”欢叫着跑上来，几十只手按到车上，呐喊声中，我们连车带人被推上陡坡。刚下车，一群人手捧哈达拥上，将我们没头没脑地挂满。

我们钻进一顶大帐篷，拜见55岁的珠尔活佛。他坐于卡垫上，手持念珠，茶色眼镜后面的眼睛笑咪咪的。每年春天，他骑马三天去澜沧江源头做佛事，祈祷保护这里的野生动物、草地和澜沧江。“你看，这里是三江源，长江和黄河的上

游生态破坏那么严重，只有澜沧江源还是好的，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他对我说。

邀我来的吕植教授十几年来一直在西部野外工作，对藏区非常熟悉，她后来建立的 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活跃在西部山区，做了很多好项目。她对我说：“因为藏传佛教的传统理念，藏民保护神山圣湖，所以这里大多生态良好，可见文化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大作用。”藏区的神山圣湖是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恒河和印度河的发源地，下游养育了近 30 亿亚洲人。

这令我意识到，全中国的生态屏障，被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藏民保护着，但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扎西多杰这次来，是帮助地青村举办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赛马会。在赛马会上，我见到后来出现在本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扎西多杰、嘎玛桑珠、仁青桑珠、珍嘎和耿登，我看见三十七八岁的嘎玛桑珠与妻子珍嘎站在一起，两人身穿华美藏装，男的高大，女的俊美，真是天生一对。我听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可以操控藏族珠宝——天珠的价格，人称“天珠王”；他笃信佛教，后来投身公益事业，扎西多杰所在的“三江源保护协会”就是他创办的；他很传奇，二十年前带六百元去拉萨，从此白手起家干出一番大事业；据说他的漂亮妻子珍嘎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后裔。

一位朋友对我指着另一个四十来岁的农民说：“他很了不起，在西藏老家领着村民们种树，种了四十多万棵。”

她说的是嘎玛桑珠的哥哥仁青桑珠。他曾是喇嘛，后来因爱情还俗，是家乡有名的学者、修行者和藏医。他后来对我说：“我们藏族人保护环境是遵从传统文化，很快乐地去做，没有其他目的，而外面的人做环境保护——”他两手伸出，做了一个拧湿衣服的姿势，“是被法律和钱挤出来的。”

几天后我回到北京，与这些人擦肩而过。我不知道他们会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但我心里已点起探索的火苗。我一直关注西藏问题，但像大部分人一样——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没有藏族朋友，不知道真实的藏区。在书店，大部分西藏书籍放在“旅游和探险”架上，西藏只是休闲娱乐之地，书里充斥着旅游者“雪山啊，蓝天啊，梦境啊，自由啊”之类不着边际的感叹。对人们来说，西藏只是想像中的西藏，六百万藏族人被忽略，你看不到他们的脸，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不知道他们真实的生活。

我想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心灵。我想知道这个高原民族的过去，更想知道他们如何创造青藏高原的现在和未来。

与扎西多杰的另一次谈话坚定了我探索的决心。两个月后他来北京，我请他吃晚饭，他滔滔不绝谈索南达杰牺牲在可可西里的故事，尽管那是十几年前的旧事，他谈起来仍很激动，那件事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我看过电影《可可西里》，与电影相比，真实的故事更震撼人心。

藏族文化在青藏高原撒下神奇的种子，长出神奇的人生。我在《南方周末》写了两篇藏人的报道，但几千字的文章太短了，我决定写一本书，写出那些神奇的人生，探究他们的心灵，或者说通过他们，探究我自己的心灵。我和大部分汉族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否定一切宗教，以为用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心灵方面。但我发现，这些受“迷信”的佛教影响的藏族人，心胸宽广，精神健康，无私快乐，他们的信仰也许能给我一些启示？

2006年4月，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开始了这本书的采访，在其后的两年里多次去藏区。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最棒的采访对象，他们做着相似的事业，保护青藏高原的环境与传统文化，但他们之间并不雷同，来自不同的藏区——西

藏、青海、四川和云南，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分别是商人、官员、农民、还俗的喇嘛、居士和大学生。我就是要找这样的藏人——他们是普通人，身上体现着藏民族最宝贵的文化价值，同时在彷徨中寻找着未来的路。他们身上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同时在创造历史。

我在《南方周末》的老同事杨瑞春看过初稿后说：“我想，你在发现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像天珠王发现了上品天珠，心中一定怀着暗喜前行。当初你对我讲这个题目，我还不以为意，没想到人物背后有那么波澜壮阔的历史。你写的是一部藏族当代史，也是藏族人寻找自我的心灵史。”

令我感激的是，书中人物用宽广无私的胸怀接纳我。仁青接受我采访时说：“好吧，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故事——由白羊毛和黑羊毛织成的、有好也有坏的故事。”这意味着他不但让我分享他的光荣，也向我袒露他的耻辱。无一例外，我书中的藏族人没有把不光彩的历史藏在身后。我感佩他们的光明磊落。

这是一本非虚构作品，非虚构文学的力量在于其真实性，西方有言道：“历史比小说更有趣。”我也认为，真实的生活比虚构更有戏剧性，更能打动人心。对这本书来说，最重要的是获得正确而深入的信息。但非虚构文学有天生的缺陷——作者既要处理比新闻报道更复杂更微妙的人物、事件、情感和思想，又无法像写小说一样随心所欲安排人物命运和故事的叙述，作者无法决定故事何时铺展，何时高潮。不管写作中怎样不方便，作者都不能改变事实的原貌。

我的采访很细致，感谢书中主人公容忍我的“纠缠”。2006年6月，我在成都采访嘎玛，每天交谈十二到十六个小时，他从早到晚坐在沙发上对我讲了七天，七天后，他感谢我没给他机会乱动，对治疗他的腰伤大有好处。一个月后，我们又用十四天在西藏和川西旅行，仍然每天交谈十几个小时。后来在拉萨、北京，

这样一天接一天的采访又进行多次，最有趣的一次是在拉萨，他的腰病犯了，我的腰病也犯了，两人躺在拉萨人民医院理疗床上，一边治疗一边交谈。如果按一天工作八小时算，我对他的采访超过六十天，后来我对他的笔记有三十万字。但他从未表现出一点点的不耐烦。

对扎西多杰的采访时间差不多同样长，两年里，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交谈：北京我的家，从云南去拉萨的路上，青海他的家乡，从青海至西藏的路上，昆明……我把他的前半生翻了个底朝天，有时候说得太累了，他谈话间就打起呼噜。后来他一见我就做出逃命的架势，因为我无休止的提问实在太折磨人。感谢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

2007 - 2008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时，日复一日的写作持续了五个月，我融入了主人公们的人生，他们笑时我笑，他们哭时我哭，他们愁闷时，我也彷徨无计。写到后来，我甚至不想那么快写完，不想跟这些人物的说再见。令我欣慰的是：书写完了，他们的故事只是告一段落，我仍有幸与他们为友，我们仍然一起旅行、喝茶、吃糌粑；当读者放下书时也不必觉得遗憾，因为这些人真实的，如果你去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的藏区，甚至在成都和北京，说不定迎面碰到他们。这就是真实故事的魅力。

2008年3月，我在修改本书时，拉萨传来骚乱的消息，令我悲伤难过：最不希望发生的还是发生了。这让我更相信本书的价值：书中人物所代表的群体曾被忽略，但他们像历史的河床，表面看不见，却决定着历史的方向。这些人物经历艰难时世却不沮丧，不愤怒，不绝望，保持内心平静，永远乐观，追求和谐。他们的自信和慈悲，是藏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用中央党校靳薇教授的话说：“这些藏人中的有识之士，都从不同的路径经历了‘文化迷惘’‘文化自觉’，并用自己大智大

勇的行动重塑‘文化自信’。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是民族的根，民族的希望，民族的未来。”

2008 年 5 月 5 日草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2009 年 5 月 24 日修改于北京龙背村

人物表

嘎玛



全名如凯·嘎玛桑珠，商人，慈善家。1968 年生于西藏贡觉县农村，后到拉萨、西宁等地经商，同时收藏藏族古董。上世纪 90 年代经营天珠，戏剧性地提高了天珠价格，保障了藏民利益，人称“天珠王”。在青海玉树成立“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目前在建立个人藏族民俗文化博物馆，研究以天珠为代表的藏族文化。他是全世界收藏藏族文物最多的私人收藏家。

扎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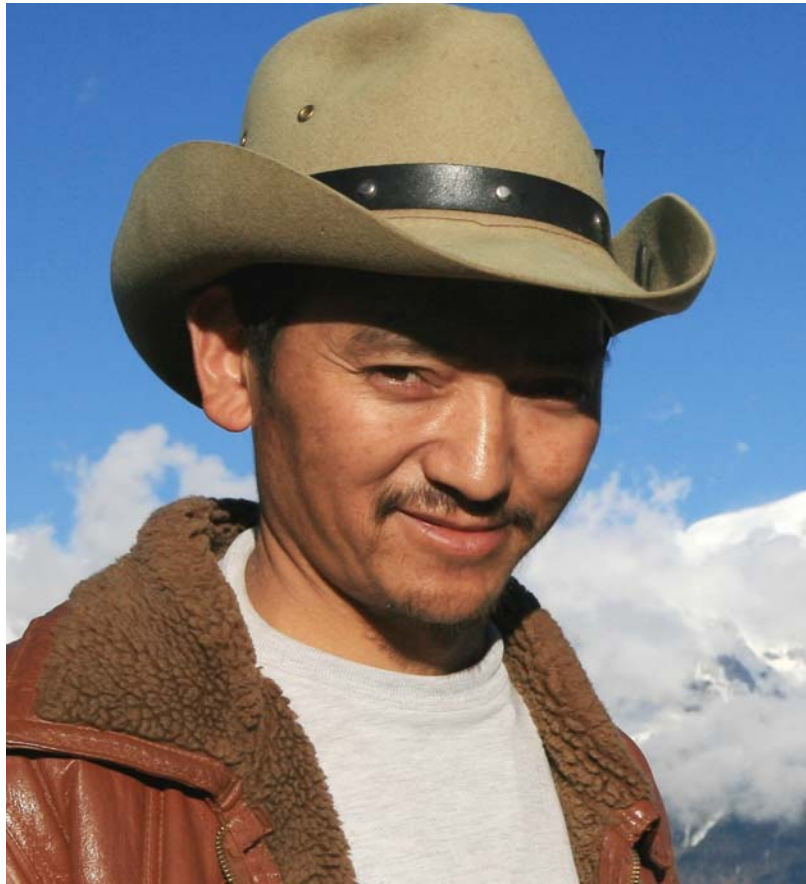
全名扎西多杰，嘎玛的合作伙伴。1962 年生于青海治多牧区，著名的藏族环境保护者，前政府官员。随索南达杰进可可西里保护矿产和藏羚羊，索南达杰被盗猎者枪杀后，他继承索南达杰的事业，任索加乡党委书记，为牧民办诊所，建学校，救灾。与“胡子帮”朋友创立藏区第一个本土环境非政府组织，后跳出体制外，主持“三江源协会”。

仁青



全名仁青桑珠，嘎玛的哥哥，扎多的朋友。1965 年生于西藏贡觉县农村，农民、修行者。从小爱好藏文、画画与佛经，后成为喇嘛，但因爱情而还俗。十几年中，他整理大成就者香曲多杰的经书，并带领村民保护孜荣部落环境。当地山村缺医少药，他是唯一的医生。

木梭



全名木梭·罗桑尊追，又称海木梭，他与扎多有同一位上师。1968年生于云南藏区德钦，修行者、司机、音乐人。自学藏文、音乐、易经、中功和佛教，不迷信权威，挑战大喇嘛，追求真理，后皈依佛教。他是文化保护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发起者之一。

索南达杰



青海治多人，无神论者，中共青海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1994年在可可西里保护矿产和藏羚羊时，被盗猎者枪杀。他是当代藏人中最有号召力的环保英雄，影响了扎多的人生选择。

尼玛



1978 年生于四川藏区康定，木雅人，与嘎玛、仁青和扎多有工作上的联系，国际环保组织职员。从小性格叛逆，幼时为去香港离家流浪。中学时沉溺于打架，后因爱情发愤读书，考上大学，因失恋再次自暴自弃，在汉族恋人和同事的帮助下重树自信。

耿登



全名苍王·耿登丹巴，嘎玛的合作者。1969 年生于青海安多藏区，画家、历史学家、天珠研究者。少年时出家学习绘画与哲学，在北京因爱情而还俗。还俗后爱情波折。他的历史研究摆脱了宗教束缚，经常得罪喇嘛，认为他不敬佛教。他倾心研究天珠，第一个提出“天珠之路”概念，认为远古时期喜马拉雅地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香曲多杰



四川新龙人，嘎玛和仁青家乡娘拉寺的创立者，1962 年圆寂。他弘扬佛法，是当时藏区著名的大喇嘛之一。他对嘎玛一家影响极深。

珍嘎



青海玉树，人，嘎玛妻子。当过兵，复员后在玉树州邮电局工作，后辞职。据说她是藏王松赞干布后裔。

白玛旺姆



四川康定木雅人，与尼玛是新都桥藏文中学同学。

斯郎伦布



云南德钦县图书馆馆长，“卡瓦格博文化社”创立人，木梭同事。

文扎



青海治多人，“胡子帮”成员，治多县志办主任，扎多的朋友，曾任治多中学教师、县委组织部干部、索加乡党委书记。

扎西



青海治多人，“胡子帮”成员，治多民族中学校长，扎多的朋友。扎多、文扎和扎西成立了藏区第一个本土环境非政府组织“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

中华



前警察，德钦德新客栈老板，“卡瓦格博文化社”成员，木梭同事。

博雷



扎多妻子。扎多在索加小学的同学。

引子

迷失在北京

2006年8月22日晚上9点，我接到嘎玛桑珠的电话，他声音低沉地说：“鉴强，我在机场，我的行李丢了！”

我急忙问：“里面什么东西？”

“古董，天珠。”

完了！他的古董，绝不是一般的古董；他的天珠，也不是寻常的天珠。

他从成都飞来，因为要接一个美国来的朋友，便到国际出口的星巴克咖啡厅等着，一个电话打来，他接了两分钟后回头一看：三个包没了！

他报警，警察说：“这事与星巴克没关系，你不要在这里吵，影响人家生意。”

看来不妙。我放下电话，拿上记者证和信用卡匆匆下楼。出租车飞速行驶在北五环上，我拼命拨着电话，终于找到一位律师朋友，但她说：“你怎么证明包里是珠宝？”

我无法证明，嘎玛也无法证明。在北京这个所谓的文明城市，没有几个人能相信这个留着大辫子、汉语说不利落的西藏人，正如站在他高大威猛的身躯前，异族人可能会感到紧张与敬畏，甚至怪异，但没人能透过他貌似坚硬强大的外壳，看到那善良而柔软的心。

也许他威猛的外貌增加了星巴克的敌意，星巴克不给他看监控录像。

我又拨通嘎玛电话：“我马上就到，你在那里等我。”

“我在星巴克对面的肯德基吃饭，等你到了，我也就吃完了。”他说。

好家伙，还有心情吃饭呢。这就是嘎玛，天塌下来，他也浑不在乎。

后来证明，肯德基在星巴克的隔壁，而不是对面。嘎玛的汉语再次出错，他搞不清“对面”和“隔壁”。

我赶到机场，嘎玛巨大的身躯矗立在肯德基门前，茫然望着机场大厅来来往往的人。他没有穿藏装，米黄色的西裤加T恤，脑后粗大长长的辫子令人侧目。他的脸盘硕大，如果你的脸长得略小一点，在他面前也许会感到沮丧——你的脸要乘以2，才能有和他一样大的“面子”。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奇怪的胡子——据说那是格萨尔式的——唇上两侧蓄着两撇胡须，形成一个长长的“八”字，而下唇和下巴之间又有一撮胡须，与上面的“八”形成一个“公”字，他的嘴巴就被包围在“公”字之中。这倒有些象征意义，他与我闲聊的时候，嘴巴里说的永远与“公”有关：家乡老人的养老，部落间的草场纠纷，县里破落的小学教育，大德高僧的经书整理。

其实他跟“公家”没有任何关系，在过去的38年，他没有从官方拿过一分钱薪水。他为乡民和寺庙所花的钱，都从他自己的腰包里掏。川西亚青寺一个尼姑对我说过：“嘎玛是那种要帮助全世界的人。”

与人初次见面，他可能递给你一张名片，上有两个头衔：“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和“天珠王”。

“王”？在北京，一位广东人低头看着名片，小心翼翼地问：“你这个‘王’，跟宗教有关吗？”

他可能联想到了“藏王”、“大宝法王”、“格萨尔王”，甚至金庸小说中的“金轮法王”。

我很想听嘎玛如何把至高无上的“王”解释给人听，但他总是笑嘻嘻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嘛。”所以人们仍然没搞明白，这个怪异的人，到底有什么怪异的身份。

嘎玛从机场的人流中看到我，庞大的脸露出笑容：“哎哟，鉴强，不好意思啊，麻烦你来一趟。”

我来不及寒暄，急急问：“行李值多少钱？”

他笑着说：“有个明朝永乐时期的古董，是我给别人捎的……”

“值多少钱？”我打断他。

“要是拍卖的话，没有上千万买不下来……”

我差点晕过去。

“还有帮朋友带的明朝丝绸，50万港币从香港买的，另外还有一些天珠。”

我的脑袋被“上千万”震得嗡嗡响。他今夜的损失，比我估计的大10倍！

我看他颈上——很好，两串天珠和护身符还在。其中一串有三个不起眼的小天珠，还有一个铜制护身盒；另外一串是十来个名贵天珠，市价约二百万元。

一个警察来了，把嘎玛和我带到机场派出所。他站在一个小房间门前犹豫了一会儿——那里开着门，露出一把椅子，椅子上挂着一个物件，发着明晃晃的光。手铐。

警察回头说：“换一间吧，这里不合适。”

他将我们带到隔壁一个房间，这里像是客厅，一圈沙发围着一个茶几，我和嘎玛分坐警察两边。

警察拿出纸笔，问嘎玛：“你是哪里人？”

“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东巴村。”

“现住址？”

“成都肖家河。”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成都到北京，然后再到拉萨。”

“职业？”

“商人。”

警察很有耐心地记录着。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我替嘎玛焦躁，不知怎么度过这个漫长的夜。

现在你知道了，嘎玛是个商人。如果警察疑惑于嘎玛名片上的“天珠王”，我会为他解释：“他做天珠生意，做得非常好，几乎可以操纵全世界天珠市场，所以人称‘天珠王’。”

嘎玛做过许多生意，买卖羊皮、羊绒、虫草、松茸和天珠，后来又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但他没成立一家公司来承担这些业务。在那个高原上，人们做生意看重的是个人信誉，而不是“公司”。他是一个独行侠，20岁离家到拉萨，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近20年后，他得到的头衔不是“董事长”和“总经理”，而是一个“王”。这个“王”被藏族人承认，不需认定，不需加冕，不需政府文件。

我有点担心警察继续问下去：“你来北京做什么？”

那么嘎玛该怎样回答，才能让人相信那传奇？他是一个商人，但如今他大部

分活动与赚钱无关。这位没上过一天学校的农民，要用他所有的力量——他的心力、金钱与信仰，建一个史无前例的私人藏族民俗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建成后，也许将震惊世界。

好在警察没来得及问，另一个警察走进来，两个人交头接耳嘀咕着什么，然后收拾起记录本，说：“你的行李找到了。”

啊！我们像弹簧一样蹦起来。那个带来好消息的警察把一个纸条给我，上面记着一位樊先生的电话，是他拿错了行李。

樊先生是赛车队的，当时与几个队友在星巴克喝咖啡，因为队友太多，搞不清行李是谁的，连嘎玛的行李车一起推走了，到了北京站旁边的宝辰饭店，才发现多了三个包。

嘎玛兴奋地往星巴克走，“去给人家道歉一下，唉呀，今晚发大财了，一下子赚 1000 万！”说完仰头哈哈大笑。

嘎玛走进星巴克对一个服务生说：“请你们领导出来一下。”

服务生警惕地看着他，不知这个倒霉而难缠的西藏人又搞什么花样。一个男人过来，充满敌意地盯着嘎玛：“我就是领导。”

嘎玛笑嘻嘻地说：“我的行李找到了，是被别人拿错了，对不起啊。”

离开机场的车上，嘎玛说：“看来命中注定丢不了。”一切都是果报，嘎玛不为找回珠宝感到不可思议，那不是巧合，也不是侥幸，一切都有因果，既然行李回来，必有回来的理由。他的名字“嘎玛”即是“因果”之意。在嘎玛的人生中，对因果从未失去信心。

一个多月后，嘎玛的哥哥仁青桑珠对我说：“你得到的果，源于你所种下的因，因果相连，”他指着地下他的影子说，“就像这影子，总是跟着我们。”

说这话时，我、仁青和扎西多杰晃悠着从海淀桥走向北大西门。仁青身穿咖啡色藏服，眼睛不住扫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是一群没有戒律、没有信仰的人，在此之前的 40 年，仁青桑珠对这群人深怀恐惧，用“坏人”形容他们。但来北京几天后，他忽然对我说：“原来这里也有好人，有些比我们那儿的喇嘛还好。”

而他第二次提到“影子”时，意义完全不同：“但我们藏人也在变，也有很多人不再有戒律，为所欲为。他们原来真实的人不见了，只剩下一个个影子。”

扎西多杰为我翻译着，这时插上自己的话：“我多想和仁青、嘎玛那样坚定地相信因果。相信因果，我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

扎西多杰两个月后获得央视“2006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他去机场，在电视上见过他的安检员都要跟他搭讪。这个前政府官员、可可西里保护者，熟悉现代文明，但越来越为自己遵循的现代文明逻辑所困。他把两个女儿送到北京读书，自己却时时盼望着，回到可可西里边缘海拔 4600 米的老家，建一个牧场，念经诵佛，终老于此。

嘎玛也希望赶快回到雪域。他摸了一下颈上的天珠与护身盒，在小小的铜盒里，有一根女活佛阿达拉姆的头发。三个小天珠在市场上不值多少钱，但那是阿达拉姆家族的活佛们当作念珠念了 1 亿遍经文的，象征着他的信仰，是他的生命之所在，总是牢牢挂在胸前，他甚至对我说：“我有了这些，刀枪不入，绝对！”令我错愕。但在 2007 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他时，他没有再戴这些曾经须臾不离身的宝物，“这里不安全。”他说。这些护身物曾引导他经历艰难时世，令他在高山峡谷与荒漠中，一次次找到光明。但现在，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他感到惶惑，他怕护身符和自己一起迷失在异乡。

嘎玛加快了他一贯散漫的脚步。他要把存放在这里的收藏品运回拉萨，只有在那个处处佛光的高原上，他才感到安全和自在。他要在那里，用他 20 年来收集的 8000 件藏族民间器物，建一个反映藏族几千年文明史的博物馆，让人们——不仅仅是藏人——尊重这个雪域上的民族，尊重高原上的信仰。

我追随着嘎玛和其他藏族朋友的脚步，来到通天河、澜沧江和拉萨河哗哗的水流旁，看卡瓦格博和贡嘎山顶上的白雪，钻进横断山脉深处或玉树草原上某户人家。我进入藏人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中，也跟我的朋友回顾他们的成长岁月。我是一个汉人，但我到藏区所做的与这些藏族朋友没什么两样：先找到信仰，再寻找未来。

第一章 求佛

贤人虽遭危难，
行为光明磊落；
火把下垂的时候，
火舌仍熊熊向上。

——《萨迦格言》

一 求佛

一年后的2007年8月，我跟嘎玛来到拉萨罗布林卡路甲热村62号。这是胡同里一栋“口”字形四层民宅，筹备中的“西藏天珠之路文化研究中心”租借了第三层，嘎玛数千件宝贝暂收藏于此。

刚巧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博士来访，藏学研究中心的主管单位是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藏研中心计划举办藏族文化展，格勒博士来与嘎玛商量，借他的藏品参展。

我跟随他们参观藏品，尽管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惊叹于藏品的丰富：除了各大寺庙和布达拉宫，从来没有哪个人有如此丰富的藏族物品收藏——甚至超过了西藏博物馆。藏品包括珠宝、家具、马具、丝织品、地毯、生活用具、陶器、石器、木刻、宗教用品、服饰、钱币、文房用具和古文字，不少藏品是西藏的孤品和绝品。除了藏研中心，西藏博物馆也将与嘎玛合作，选择1000多件精品，进行“西藏民俗文化珍藏展”，为期四年。

走到一个古色古香的木制佛龕前，嘎玛停住脚步，佛龕上层有几尊黄铜佛像，或坐或立，都有几百年历史。佛龕下层有一尊崭新的黄铜镀金佛像，约40公分高。嘎玛端详佛像，微笑着赞叹：“太好看了！”

“这和别的佛像不一样。”我说。

那释迦牟尼站立，垂首阖目，左掌垂下，右掌竖立向前，最奇特的是穿一袭金黄斗篷，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佛祖像有一些勇武侠气。

“是，很少见，这是我从尼泊尔定做的，我设计的式样。”嘎玛说着，又弯下腰用手抚摸着佛祖的手，“啊呀，太好了，太好了！”微笑在他的大脸上绽放，简直像旁边水缸里的莲花。那笑容我很熟悉，是他对佛教发自内心的欣喜赞美，30多年前，这欣喜赞美就在他心中播下了种子。

1975年8月的一天上午，七岁的嘎玛站在自家碉楼的二层张望。他长长的头发披到肩上，脸胖胖的，总是挂着憨憨的笑。在他旁边，十岁的哥哥仁青桑珠坐在卡垫上扭着身子读书，愁眉苦脸。

嘎玛家的三层碉楼方方正正坐落在山坡上，一条小溪从碉楼右侧流下，那水不深，只是淹过人的脚背，一刻不停地流入横过房前的大河，那大河急流滚滚，名为热曲。

嘎玛从窗口望出去，热曲河在门前约二百米的木桥那里左拐，弯弯绕绕往东南流去。他呼吸着混合了薰衣草、茉莉和金银花香味的空气，热曲两岸的山坡铺满青草和五彩绚烂的野花，坡度和缓，像一个大V字。

嘎玛盯着天边，想象着外面的世界。他七岁了，从未走出那个V字。他后来才知道，V字之外，热曲折向东去，在西藏东部的峡谷间奔流40公里后汇入金沙江。作为川藏界河的金沙江再往南流，经云南德钦、丽江，突然来了两个大拐弯，然后一头扎向东去，流过四川宜宾后便是长江了。

一阵风刮进来，有什么东西迷了眼睛，嘎玛一揉眼睛，左眼剧痛，“啊”地大哭起来。仁青桑珠急忙“噔噔噔”跑到楼顶，大人们正在楼顶收拾青稞。楼梯一阵乱响，“嘎央，怎么了？”奶奶先跑过来抱着嘎玛，要他睁开眼睛，看是不是有什么小虫子。嘎玛眼睛一眨，又是一阵剧痛，在地上打起滚来。奶奶嘴里念着“嗡嘛呢呗咪吽”，用手拨开嘎玛的眼睛，可什么也看不到。爷爷跑出门去，

一会儿领来一位亲戚，那是位还俗的喇嘛。喇嘛急急念经，但嘎玛的眼睛越来越痛，一家人束手无策。

大人们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了嘎玛的一生。

爷爷牵出白马，过了河边的小木桥。奶奶骑上马，嘎玛被爷爷托到马背上，让奶奶紧紧搂着，一老一小顺热曲河东岸向南骑去。

仁青桑珠跑上来，扯着缰绳央求说：“我也去，我也去！”

妈妈严厉地制止了他，因为这是一次秘密行动。仁青桑珠看白马驮着奶奶和弟弟远去，大哭起来。

这是如凯一家，“如凯”是“战胜”之意。在这个隔金沙江与四川相望的、西藏东部的贡觉县，只有大家族才有姓氏。据说如凯家族在元代就以经商闻名，几百年来一直收藏着一封蒙古人的信函，信中告知各地好好接待这个家族的商队。但文革中，嘎玛的爷爷怕带来麻烦，将这封信烧毁了。

嘎玛三兄弟和一个妹妹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确切地说，他们有一个叫“父亲”的人，但一年见不到一次。他们说不清父亲到底在什么地方，只知道他为那个地方干重活，不得自由。

白马“嗒嗒嗒”往南赶去，马背上，奶奶紧紧抱着嘎玛。奶奶一生最骄傲的是曾去拉萨朝圣——用额头碰触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的脚，是每个藏族人的梦想。许多人从家乡磕等身长头，用身体丈量高山、峡谷与草原，不知匍匐在地几十万次，站起几十万次，一直磕3年，才能磕到拉萨。

现在她经常为自己的孙儿感到悲伤，孩子们再不能去拉萨朝圣了，别说去拉萨，就是见一个当地活佛，比如今天，也要偷偷摸摸。

过去的二十多年，奶奶这一辈藏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解放军1950年西渡金沙江，攻下贡觉县附近的藏东重镇昌都。1951年，中央政府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噶厦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中央政府恢复对西藏的治理。5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对川西藏区进行民主改革，剥夺贵族和寺院的特权地位，从1956年起川西藏区发生叛乱，以理塘为中心，许多寺院、贵族和平民卷入叛乱，叛乱后来蔓延至金沙江西岸的西藏境内，解放军平叛时，双方在贡觉对抗，嘎玛的爷爷奶奶与喇嘛们曾藏在山中躲避战乱。

后来中央政府认为平叛有扩大化倾向，60年代初期有过短暂宽松气氛，不久文革的红色风暴刮过全国每个角落，将雪域高原的沟沟坎坎染红，像全国一样，这里的寺庙大多被拆毁。

马蹄声中，祖孙二人来到小路中间一个玛尼堆旁。石头上刻了佛经，便是玛尼石。刻玛尼石是藏民做功德的方式之一，如同念经、拜佛和将写满经文的经幡挂在山上。因为严禁宗教活动，许多年来玛尼石屡遭破坏，日渐减少，最后只剩下一个小石堆被荒草覆盖。但藏民走到这里心里便有异样的感觉。奶奶嘴里小声念着经文，从一侧经过玛尼堆，告诉嘎玛，回来的时候，要从同一侧再走过来，否则被人发现，会说她变相转经。顺时针绕玛尼堆转，或绕寺院转，也是藏人做功德的方式。寺院里的转经筒和藏人手里的转经筒是同样道理，转经筒里装着经文，转起来等于念经，增加功德。

在附近的村子里，曾有村民从玛尼堆一侧走过去，再从另一侧走回来，被干部发现，他们逼迫这些“乱搞宗教迷信”的村民跪在尖石上接受批斗。因此人们小心谨慎，生怕稍不当心露出内心的渴望，带来麻烦。

如凯家的麻烦已经太多了。过去20年中，爷爷的喇嘛弟弟被抓走，儿子做苦役，寺庙被拆毁，佛塔被炸，佛经被烧，尊贵的上师香曲多杰被关进监狱。如凯

这个荣耀的姓氏，一千年来第一次给家族带来灾难：土地被剥夺，收获的青稞全部充公。粮站验收员对如凯家的青稞挑三捡四，还时常来翻箱倒柜，检查有没有私藏粮食。

“这是一个黑暗时代，”妈妈说，但她不允许儿子在黑暗时代闭上眼睛苟活，“我们要牢牢握好酥油灯。”她要儿子学好藏文，像喇嘛一样有学问，而且，她盼望着，她的儿子能像在以前的时代里一样，当个喇嘛。

但20年来，那些高僧们死的死，关的关，还俗的还俗，一片肃杀凋零。让儿子成为高僧的梦想，随着寺院的倒塌而毁灭。但爷爷、奶奶和妈妈仍旧将被迫还俗的僧人请到家里，悄悄地念经，偷偷教儿子写字。妈妈说：“不管在黑暗中，还是将来的光明中，知识都很重要，有了知识，就是开个会你也坐在中间，要是不懂知识，就像一头牦牛。”

孩子们才不在乎开会坐哪儿，也不觉得变成牦牛有多么可怕，但慢慢地知道知识和佛经有多么重要。

嘎玛出生后一直没有剪头发，这是大户人家的习俗，表示对这个孩子的钟爱。一位曾是喇嘛的舅舅——嘎玛喊他“舅舅喇嘛”——特别喜欢嘎玛，在他四岁的某一天，这位舅舅喇嘛骑着马来到了嘎玛家，他喝多了，摇摇晃晃下马，摇摇晃晃抱过嘎玛说：“这是我的孩子！今天是好日子，我来给他剪头发。”家里人明白其中暗含的意味：这个孩子被尊贵的喇嘛剃度。虽然这不是真的剃度，但人们醉心于它的象征意义：这个孩子与佛有缘，他会福泽深厚。

没有人将这个意义告诉嘎玛，但嘎玛已感到它的存在。在舅舅喇嘛给他摇摇晃晃地剃发以后，小小的他觉得自己是喇嘛了。

嘎玛隐隐约约知道那V形的山谷后面是什么。那里有一座狮子神山，名为“森格南宗”，山下有一座寺院，是梦境般的地方，文革时这里成为禁地，大人不敢踏足这种“迷信”场所，更不会带孩子去那里。

嘎玛骑在马上，很想看看那山后的世界，但他的眼睛痛着，不敢睁开。走了八公里山路，白马停住，奶奶悄悄地说：“嘎央，到了，不要说话。”将他抱下马。嘎玛悄悄睁开右眼，发现正要进入一个低矮的小屋子，屋子外拴着一头黑牦牛，瘦小得像一只大狗。

奶奶牵着嘎玛的手进了小屋，里面黑黑的，一个中年女人躺在卡垫上，看不清脸。阳光从她背后的小窗射进来，令她的黑发闪着光芒。“很好看的头发。”嘎玛想。一般藏族女人扎许多条小辫子，而她少见地留着一条长长的大辫子。

奶奶弯腰说：“阿依，这孩子眼睛疼，请你帮个忙吧。”

“阿依”是“大姐”之意，是这个部落对她的尊称。阿依睁开眼睛，对嘎玛说：“你过来。”

嘎玛走过去，阿依斜倚在卡垫上，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分开嘎玛的眼睑，说：“在这里呢。”右手取出一根细小的青稞麦芒。她用舌头舔舔嘎玛的眼睛，又吹了一下，嘎玛的眼睛立即不疼了。

嘎玛揉揉眼睛，惊奇地盯着这个女人，现在能看清楚了——她很美，美到不能形容，“一眼望过去，再也忘不了。”嘎玛长大后回忆说。她就是著名的女活佛阿达拉姆，文革中最大的“坏分子”。阿达拉姆冲嘎玛笑笑，从枕头下拿出一块冰糖和一块核桃仁给他。嘎玛从没吃过，兴奋地紧紧攥在手里。

奶奶对阿达拉姆说着感谢的话，嘎玛紧紧盯着女活佛：“她是谁？这么神奇！”

阿达拉姆拔下一根头发交给奶奶，叮嘱她，每天拿这根头发在嘎玛的眼睛上抹，连抹七天。藏人深信，活佛的头发具有神奇的功效。

奶奶带嘎玛告辞，一出门，嘎玛像被雷击一样——他看到了娘拉寺！

在阿达拉姆房边，一堵高大的残墙矗立在森格南宗山下。高高的东西两面墙相对站立，南北两面墙倒塌了，让视野毫无遮挡地穿过寺院，直达对面郁郁葱葱的高山。没有喇嘛，没有佛像，大经堂只剩残垣断壁，墙上壁画的残迹斑斑驳驳，被一道道铁锹的深痕斩断，就像一个人脸上深深的疤痕。

那个瞬间，娘拉寺的残骸像巨大的磁铁将嘎玛吸住。怎么有这么高大的房子？它为什么倒下去？嘎玛震惊而迷惑。他从没见过寺院，这神圣而令人悲伤的地方。忽然一阵狂喜冲来，嘎玛心里大叫：“我见到寺庙了！”

此时他才想到：“噢，我的眼睛好了！”

他长大后依然无法解释当时的强烈冲击：一个残破的寺庙，为什么如此震动一个七岁的孩子，让他如痴如狂？

小嘎玛盯着寺庙想：“谁建造了这个大房子？那个漂亮女人是谁？”

他后来知道，娘拉寺的创立者是香曲多杰，嘎玛出生时，香曲多杰已圆寂，阿达拉姆是他的女儿。她行为放荡，跟很多男人关系亲密。如果是普通人，这就是行止不端，但她的“放荡”似乎有特殊使命。

她1923年出生，年轻时未嫁人。她的父亲、那位大成就者香曲多杰说过：“这女儿没办法嫁出去啊，这是请过来的空行母（度化人的女性佛），人们看她是女人，实际上她是佛，不能嫁给谁。”

到阿达拉姆将近40岁时，世道变了，香曲多杰被关了九个月，出狱后，他让女儿嫁给他的佣人扎西唯色。阿达拉姆的儿子就是现在娘拉寺的寺主嘎旺法王，仁青桑珠的上师。

香曲多杰说女儿是空行母，符合藏传佛教理论。

2006年5月，我在云南西北部的德钦县向修行者木梭请教佛学。木梭说，“佛”是古梵语，中文译成“佛陀”，简称“佛”，藏文中译作“觉胜”。“觉”指从烦恼和业障中觉醒，佛即“大解脱者”。

佛的外在表现有三身：一是无形的法身，存在于一切角落；二是报身——报身的意义，就是一个人把好事做绝，就会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身。报身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它具备最完美的身体，最庄严的穿戴，只有金罗汉和菩萨有缘当他的弟子；但还有众生在轮回中，佛舍不得他们，所以又化为第三身：化身佛。化身佛没有固定形态，好让众生接近他。他也许是喇嘛活佛，也许是妓女屠夫，甚至是沙漠里的河，大河上的桥。

在古印度一个国家，山上住着一位伟大的修行者，国王和百姓请他出来传法，但谁也请不动。国王谕告百姓，谁能请动这位修行者，他就奖赏谁。

一个妓女摇摇摆摆地来了，说：“我能。”

国王怀疑地看着她：“你？不可能吧。”

“你们等着瞧。”妓女说罢，转身摇摇摆摆地走了。

她很快回来了，那位修行者低头跟着她。

人们惊呆了：哎呀，什么大师啊，经不住一个妓女的勾引！人们哄笑他，斥骂他，唾沫和石头像雨点一样飞到他身上。

大师抬头看着人们，叹口气说：“太可惜了！我本是来度化你们的，现在机缘过了。”他把妓女抱起来，两人忽然化为密宗里的大本尊明妃。人们瞠目结舌，看着他们越飞越高，终于不见。

我问木梭：“什么是明妃？为什么密宗里要有男女双修？”

木梭说：“我若对你说多了，是犯戒。密宗的修行为什么那么快？就是一个佛和你融在一起，强行把你的业障化开，功力极大。”

木梭说，我们限于社会伦理道德，认为男女之间是脏的。但密宗的境界早已超越社会伦理，男女性事不再是小勾当，而是大修行的工具与途径。如一人因为前世的业障，今世成为好色之徒，佛有“大方便”法门，因你而设，你是好色之徒，便通过男女交合这一法门来度你。

阿达拉姆行为大异常人，许多人对她侧目而视，但更多的人尊敬她，包括与她关系密切的如凯家族。

这天晚上，爷爷对几个孩子说：“咱们那只羊疯了，找不到，你们睡觉，我们去找。”

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爷爷说那只羊又疯了，他要去找找。

奇怪的是，这只羊每个月都要发一次“疯”。嘎玛和仁青终于发现，每当羊“发疯”的那个晚上，爷爷奶奶将一条黑黑的牛毛毡子搭在白马背上，底下藏着炒面(将青稞炒熟后磨成的面粉)，去给阿达拉姆家送。阿达拉姆家极穷，孩子没有糌粑吃，只能吃一种名为“让巴”的野草。但她是“阶级敌人”，没人敢公开与她来往。

嘎玛盼着那只羊再次“发疯”，不久后它果然又“疯”了，这次嘎玛哭了，央求爷爷奶奶带他去，他想：“那里肯定有糖吃。”

爷爷牵着马，马上驮着炒面，奶奶背着一桶酸奶，还有一块拳头大的酥油，带着嘎玛去娘拉寺。嘎玛高兴地想，这块酥油肯定是让他在路上吃的。但他盼了一路，也没得到那块酥油。

到了阿达拉姆门外，那头瘦牦牛还在。奶奶悄悄叫门，一条狗窜出来，吓得嘎玛躲在奶奶身后。女管家将他们领进门，将酥油和酸奶悄悄收下。

嘎玛没有失望，阿达拉姆果然又送他一个核桃，还有一块纸包的糖，嘎玛高兴坏了，“我要留着过年吃。”他想。

后来，奶奶又送了阿达拉姆一头三岁的黄牛。嘎玛特别喜欢这只牛，有一次，这头牛在桥上与别的牛打架，掉到河里，被热曲的激流冲下去。嘎玛在岸上哭喊着拼命追赶。牛会游泳，终于挣扎着爬上岸来，嘎玛搂着它脖子号啕大哭。

它在1976年春天做了妈妈，可以挤奶了，奶奶把它送给女活佛家。如果要卖掉这头牛，嘎玛绝不答应，但送给她家，嘎玛觉得它上了天堂，“真有福气的一头牛啊，我都不能天天呆在她家。”他艳羡地想。

二 白马骑士

我随嘎玛在他的临时博物馆里转悠。看到那么多珍贵的收藏，我越来越震惊——收藏品大约 8000 件，他从十几年前开始收藏，平均一天收藏近两件，做生意赚的钱几乎全耗入其中。我问：“你当初为什么做收藏？”

他走到一个木架子边，拿起架上几张宽大的黑色佛经页片说：“你看，这是我爷爷当年保护下来的，我收藏抢救藏族文化，就是受他的影响。”

我翻检着那些经书，像是将历史翻到 30 年前，看到那个黑夜山林里的白马骑士。

爷爷吃完糌粑，坐在灶前好久，等夜深了，拿起黑毡子走出门外。

“爷爷去哪里？”仁青桑珠问。

“你们睡觉吧，”爷爷回头小声说，“那只山羊又疯了，不回家，我去山上找它。”

“我也去！”仁青桑珠和嘎玛桑珠抢出门外，争着去牵白马。他们知道，只要那只山羊一“发疯”，就会有刺激好玩的事。

奶奶悄悄说：“下次带你们去。”不许他们再说话。爷爷给白马盖上黑毡子，悄悄消失在黑夜里。

“这个黑暗时代啊，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光明？”妈妈说。

妈妈所说的“黑暗时代”，并非仅指财产被剥夺，而是压制信仰、拆除寺院、烧毁佛经、批斗僧人。财物只是一件衣服，而信仰是天上的太阳，是黑夜中的灯。

如凯家族努力呵护着这盏狂风中的酥油灯。东巴村的南边有娘拉寺，北边有扎拉寺。政府命令人们拆掉扎拉寺，石头、木头，谁拆走算谁的。人们动手砸掉佛像，拆掉屋顶。里面有两间最好的房子，是扎拉寺两位活佛的居所，爷爷找到政府说，村委会需要房子，这两间不要拆。政府觉得有理，这两间保存了下来。

东巴村有两户人家分到几间房子，爷爷悄悄上门送茶叶和山羊，请他们不要拆。他自己住进寺院，日日夜夜守护着，三个月后，国家政策变化，破坏行为停止。

80 年代宗教恢复，扎拉寺重建，爷爷保下来的几间房是新扎拉寺的主要建筑，人们这才感到这位老人的智慧。

扎拉寺的大部分文物也保存下来，这归功于爷爷的弟弟。他是扎拉寺的喇嘛，嘎玛和仁青喊他“爷爷喇嘛”。爷爷喇嘛曾被抓进监狱，与香曲多杰关在一起。

寺庙破坏之前，爷爷喇嘛已把经书和宗教器物藏起，上头要他交出，他说：“这里很穷，只是个让人念经的地方，算不得寺庙，没什么器物。”

审讯者说：“胡说八道！这么大一个地方，还不算寺庙？你们管家是谁？”

爷爷喇嘛毕恭毕敬地说：“小地方没管家啊，管事的就是我。”

审讯者说：“把那两个寺主活佛抓来问问。”

爷爷喇嘛说：“他们一个老，一个小，没什么权力，这里就我说了算。”

审讯者火了：“狗日的！那你们领头诵经的喇嘛是谁？抓过来！”

“也是我啊。”

“这个神经病！打他！”人们一阵拳打脚踢，打完了再说：“温在(领诵的人)应该很懂经文，你读读经看看。”

他站起来，“喔喔喔喔”地乱念一气。

他被当成神经病，关了几个月就放了。

爷爷两兄弟保护了村北扎拉寺，却没保住村南娘拉寺，娘拉寺毁了，只剩下几堵残墙，但爷爷偷偷藏起来许多经书。文革初期，爷爷将娘拉寺的经卷藏到家里和山洞，这些经书包括创寺者香曲多杰的佛教与藏医药著作。因为自家目标大，他转移部分经书到一户贫穷的邻居家，但邻居家没人看管，有一次失火，烧掉了几百页。

爷爷越来越觉得不安全，有时他会像今夜一样，给白马盖上黑毡子，隐入黑夜，将经书藏到山洞。如果被人碰到，便装模作样问一句：“你见到我那只疯山羊了吗？”

爷爷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感到上师香曲多杰与他在一起。上师圆寂前将这匹马送给他，说：“留着这匹马，它会帮助你。”马本是青色，当它上了年岁，全身变成了白色。

娘拉寺附近的山林里，一人一马，常常像幽灵一样地跋涉着，保存着信仰的火种。

当嘎玛对我讲到爷爷时，我似乎看到那位骑着白马的老人，像一位英勇的骑士，令人敬仰。或许他应该被记在史书上，就像那位刺杀朗达玛的白马骑士拉隆·贝吉多杰，那位力图拯救佛教的吉祥金刚。

佛教刚传入吐蕃(西藏古称)时，受到传统苯教势力的抵制，赤德松赞约公元800年左右继藏王之位后，增修寺庙，翻译佛典，特别优待僧人，王室成员可以出家，僧人干预政事。

赤德松赞死后，小儿子赤热巴巾继位，赤热巴巾大力支持佛教，但尊佛过度，比如规定每名僧人可得到七户平民供养，对僧人怒目而视者剜其眼，恶言诋毁者断其舌。以他的哥哥达玛为首的王室贵族反对藏传佛教，大臣们发动政变，乘赤热巴巾醉酒时将其绞死，拥立达玛为王。后人称达玛为“朗达玛”(“朗”是“牛”之意)。

朗达玛继位后打击佛教，桑耶寺、大昭寺被封闭，小昭寺被当作牛圈，许多佛像被钉上钉子扔到河里。因为文成公主也曾将佛教从汉地带来，被诬为“罗刹鬼转世”。佛经被烧毁，少数佛经被僧人埋入岩洞保存下来，这就是以后发掘出来的《伏藏》典籍。佛教僧人遭镇压，被迫还俗，有的被逼打猎。朗达玛在位只有几年，但对佛教的打击沉重，以致西藏佛教史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称为“灭法时期”。

公元846年(一说842年)，僧人拉隆·贝吉多杰来了，他将白马染成黑色，穿一件里白外黑的长袍，弓箭藏在长袍里。《西藏史话》一书中这样描述：

一天，朗达玛来到唐蕃会盟碑前，观看碑上的盟文。

旌旗簌簌，街人、商人在远远围观着。持刀拿枪的御林军侍立四周。

这时，化了装的拉隆·贝吉多杰以目示意，又暗示地瞧瞧两边的士兵。很快，穿俗装的僧人们分成两拨儿，慢慢挤向两侧的士兵。

拉隆·贝吉多杰瞥瞥左右，从宽大的左袖中抽出弓箭，“刷”地射出了一箭。这

一箭，射进了朗达玛的胸膛，他痛楚地巡视着周围，倒在了地上。

人群立时大乱。兵士和百姓们高叫着：“刺客！刺客！”捉住他！捉住他！”

攒动的人头，慌乱的尖叫声。人们乱哄哄地拥挤着。拉隆·贝吉多杰在僧人们的掩护下逃出人群，跨上了马。

黑马黑袍的拉隆·贝吉多杰风一般穿过一道山口，驰向清澈透明的河中。御林军在后面紧追不舍。

河水洗去了马身上的黑色，拉隆·贝吉多杰翻穿了袍子，立时，黑马黑袍的人变成了白马白袍，逃走了。¹

朗达玛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争立，从此吐蕃王室分成两支，争斗不休。紧接着，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席卷西藏，吐蕃王朝随着佛教的衰落而崩溃，藏王时代结束。佛教再次兴盛于雪域高原，已是 100 年后的事了。

佛教史上把松赞干布时佛教在吐蕃发展，到朗达玛灭佛这一时期，称为“前弘期”，100 年后佛教复兴，称为“后弘期”。佛教后弘有两条路径：一是从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那里从印度请来了阿底峡大师，倡兴佛法，被称为“上路弘传”；再一条是指佛法从青海安多藏区复兴，称为“下路弘传”。《西藏史话》中有段记载：

在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交汇的曲水地方，有一座山名叫贝吉曲沃热，这是著名的静修之地，山洞里住着藏·绕赛三位僧人，他们年复一年在那里静坐修禅。有一天，他们被山间鼓号声声、人呼犬吠惊动了，走出禅洞一看，山坡上有许多僧人，正在用弓箭射杀野兽呢。三人喊道：“要么是老僧眼睛花了，要么是你们疯了，看你们都是出家人，怎么能在神山圣土上大开杀戒呢？”

那些打猎的人回答：“不是大师眼睛花了，也不是小僧我们疯了，只是当今达玛毁法灭佛，捣毁寺院，焚烧经书，强迫我们受戒僧人到山上打猎杀生！你们没有被恶主发现，实在是佛法的大幸，如果不赶快离开这里，就会落得和我们一样的下场！”藏·绕赛三人连忙把戒律经卷装上一头骡子，扮成乞丐逃往异域他乡。

他们辗转奔逃到青海安多，公元 894 年，当地僧人穆苏·赛拔儿拜会藏·绕赛三人，请求他们授以具足戒。按照佛教教规，授具足戒必须有十名以上僧人在场，即使是边地也应有五人。他们派人到康定迎请在那里密修的拉隆·贝吉多杰，拉隆·贝吉多杰以自己杀过藏王达玛为由加以推辞。于是他们请来两位汉族和尚，由他们五人给穆苏·赛拔儿授具足戒。后穆苏·赛拔儿成了佛法下路弘传的关键人物。至今藏传佛教僧人的袈裟上面，还有两道蓝边，这是对两位汉族和尚的纪念。²

¹ 陈庆英、丹珠昂奔等，《西藏史话》，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第 73 页

² 同注释 1，第 101 页

就像用骡子驮经书出逃的三位喇嘛一样，嘎玛爷爷将娘拉寺的薪火传了下来。一天晚上，爷爷背着经书上山，被一个干部碰上，将他抓走。所幸十几天后爷爷被放回，但经书被烧掉了。

但爷爷还是那个英勇的白马骑士，他仍不断寻找那只疯山羊。许多年后宗教恢复，嘎玛一家将爷爷保护的经书送回娘拉寺。人们惊讶地发现，经书那么多，八头牦牛也不能一次驮完。此时爷爷已去世，他没有等来光明，连 1976——那个预示着时代将巨变的年份，他也没有看到。这不要紧，他相信，只要播种就有收获，那盏酥油灯，只要有人护持，就会照亮黑夜。“你们要相信因果，”他总是对孩子们说，“你种下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就像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的影子总跟着你。”

三 感谢毛主席

1976年9月17日，一位汉人干部来到孜荣部落，要求每家出两个人，第二天到乡上开会。“非常重要的会，必须去！”他非常严肃地说。

当人民公社终于在这个部落建立的时候，已是七十年代。有些汉人干部随着公社的建立而进驻，包括三个汉族女人。嘎玛不知道那三个女人是干部，还是干部的家属，他只记得那些女人脸白白的，漂亮得很。

汉人喜欢练枪，嘎玛最怕打枪，枪声一响，他就钻进牦牛圈与牦牛挤在一起，虽然捂着耳朵，仍听到枪声“啪啪啪”地响着，令人心惊肉跳。

文革给藏人留下极深的记忆，虽然全中国都陷入灾难，不独藏人，但许多藏人认为灾难是汉人带来的。有的藏人称呼汉人为“加”，当孩子哭个不停时，大人会吓唬说：“再哭，加就要来了！”孩子们不知道“加”是什么，但知道“加”会带来恐惧。

多年以后，仁青桑珠终于走出大山，碰到真正的汉人时，他对“加”的偏见才慢慢纠正。他喜欢的第一个汉人是北大教授吕植，“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负责人。这位女士对他在家乡进行环境保护很感兴趣，出资支持他。与他深谈的第二个汉人是我，一个记者。在四川康定，我们与他谈完之后，他兴奋地告诉扎西多杰：“原来‘加’也有好人。”

除了这些不愉快的事偶尔发生，嘎玛快乐地长大。他最喜欢的游戏是和小朋友们扮佛。他们在山坡草地上盘腿打坐，满心欢喜，微合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尽量装得像莲花生大师一般庄严。面前摆着一块块小石头，那是“供物”，几个小孩子轮流跪在“佛”面前，双手合什。孩子们念叨的经文一丝不差，是大人悄悄教的莲花生度母经。

嘎玛还常常到草地上捉鼠兔，鼠兔是草原上最多的动物，样子很像兔子，但个头儿很小，有点像田鼠，所以称为鼠兔。鼠兔一般有几个洞口，嘎玛脱下鞋子，将鞋口对着一个洞口，嘴巴对着另一个洞口“呼”地一吹。鼠兔怕风，一有风吹进洞口就没命逃窜，嘎玛觉得手里的鞋子一动，欢声大叫：“抓到了！抓到了！”他从鞋子里抓到鼠兔，穿上鞋子，“啊啊”叫着往村里跑去，几个孩子紧紧跟着他。

他来到一户人家门前，高声喊：“给点青稞吃吧，可怜的鼠兔要饿死了。”

一位老者出门，笑呵呵地说：“这鼠兔是不是死的呀？”

嘎玛说：“活的呢。”如果鼠兔死了，就没人给青稞了，他生怕老人不信，伸出手说：“你摸摸。”老人伸手来摸，小鼠兔拼命挣扎，弄得嘎玛手心痒痒的，很刺激，他无比快乐。

“嗯，活的。”老人笑着，拿过嘎玛的麻袋，狠狠往里装了十来碗青稞。嘎玛背着麻袋，又快快活活跑向别的人家。

这个游戏起源于藏区一个习俗。在有些农区或半农半牧区，牛羊被狼吃掉是藏民的巨大损失，如果哪个人把狼打死了，就为大家立了功，但他杀了生，又添了自己的罪孽，所以他拿着狼皮跑到附近的村子里，挨家挨户讨要奖励与同情：“我把狼打死了，你给点粮食嘛。”

如此讨来的可不是残羹冷炙，而是粮食、酥油和盐巴，猎人要牵着马去讨饭，否则背不动那些战利品。讨饭者气派大，要是一户人家吝啬，猎人就将狼鼻子伸到他家门上，这家人就要倒霉了，因为狼鼻子会带来坏运气。所以讨饭者从不点

头哈腰，而是大摇大摆，理直气壮。

在东巴村，虽然宗教活动已被禁止，但佛教不杀生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传承下来。孩子们几乎每天都听大人们唠叨：不要伤害小鸟、青蛙、鼠兔和虫子。如凯家的孩子受到的训诫最严厉，嘎玛生性善良，很少伤害动物，即使喜欢草原上的野花，也只摘一朵插在头发上，从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大把采来。他心疼那些生命，即便只摘一朵，也尽量不让爷爷奶奶看到，否则爷爷会说：“啊，不能摘花草啊，摘了花草，你会活不大的。”藏族人的鲜花只供在佛前，不会献给人，即使他是头人。

与温顺憨厚的嘎玛不同，哥哥仁青桑珠特别调皮，老人们说，一百年也出不了像他那么调皮的。他的手脚永远都在搞破坏，一年夏末，青稞快要成熟，他站在山上，望着下面满山坡的庄稼，雄心陡起，领着一群孩子滚下去，看谁先滚到坡底。兴奋的尖叫声中，一群孩子像小小的雪崩一样滚下来，毁了一大片青稞。

爷爷告诫仁青桑珠：“千万不要学别人钓鱼，要不你会长豁嘴的。”仁青桑珠想：“哎，我的嘴豁掉的话，多难看啊。”但他难以拒绝钓鱼的乐趣，于是做个小鱼塘，把钓来的鱼放进去。妈妈看见了，哭着说：“做这种坏事会带来灾难啊，我的儿子怎么这样！”

见妈妈哭了，仁青桑珠很不安，“我再也不杀生了！”他暗下决心。

但他的手永远比脑筋快。这一天他手拿着棍子赶牦牛，一只小鸟停在旁边一堆肥料上，他想也没想，棍子一甩，“啪”地一声，正中小鸟，眼见是不活了。仁青吓了一跳，匆匆扒开肥料把小鸟埋进去，手忙脚乱间，背后“哎”地一声，声音不大，却让他魂飞魄散。回头一看，弟弟嘎玛站着楼顶上，笑嘻嘻地说：“我要告诉妈妈。”

仁青桑珠慌慌张张跑回家央求弟弟，嘎玛只是拿眼看着他，不置可否。在以后的许多天里，仁青桑珠忍辱负重，使劲拍马屁，就怕嘎玛告密。孩子们杀生，会受到大人严厉的惩罚。

现在孩子们聪明地模仿大人，抓来鼠兔，以“杀生”要挟大人。嘎玛又跑到一户人家前，这时他的麻袋快装满了，几个孩子一起抬着。嘎玛将鼠兔伸到这家大面前说：“给鼠兔点青稞吃吧。”

大人说：“没有没有，走吧走吧。”

嘎玛不怕，伸着手说：“你要不给，鼠兔就要饿死了。”然后轻轻捏弄小鼠兔，那意思是，你要不给，鼠兔就要死在我手里，不，死在你手里！鼠兔用力挣扎，似乎在向大人求救。

这公然的敲诈是孩子们屡试不爽的绝招儿，大人立即投降，“千万别伤害它。”然后用大碗大碗的青稞，将嘎玛的麻袋装满。

嘎玛将鼠兔放地下，鼠兔“刷”地跑掉，孩子们高声欢叫着，抬起麻袋，来到村头路口，那里来了一个货郎。这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子没有商店，每年秋收后，小商贩赶着牛马驮着货物来到村里。孩子们将青稞抬过来，换些风干牛肉和糖果，几个孩子见者有份，怀揣肉和糖果，各自欢天喜地回家。

大人们心里明白，那青稞不是给鼠兔的，而是给孩子们零花钱。每年秋天，孩子们可得到丰收后的犒劳。

9月17日，一个“加”来到孜荣部落的这一天，嘎玛舅舅家14岁的表哥多登在山上放牛，碰到以前当尼姑的索南拉姆，索南拉姆神秘地叫他：“多登你过来，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多登凑上去。

索南拉姆悄悄说：“毛主席死了。”

“你不要胡说！”多登吓坏了。

“我父亲听收音机说的。”索南拉姆的父亲洛嘎是孜荣部落唯一有收音机的人。

多登揣着大秘密回到家，这消息把每个人吓坏，想到那个严肃的干部让大家明天去开会，消息的真实性似乎得到了印证，大家都压低声音说：“不要乱说！不要告诉别人！”但消息像风一样，立即刮进全部落人家的窗子里。

嘎玛这天在山上为公社看护牛犊和羊羔，天黑回到家，奶奶告诉他，明天他要和仁青代表全家到乡上开会，“听说毛主席死了。”她压低声音说。

嘎玛吓了一跳：毛主席？他怎么会死？

嘎玛对毛主席的认识来自一份藏文《西藏日报》。过去当喇嘛的才仁达杰用佛经教孩子们藏文，那时政策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干部不下乡了，小孩子们就集中起来读书，听说干部下乡了，立即作鸟兽散。课本除了佛经，只有村里订的一份《西藏日报》。送报纸的乡邮员酷爱报纸，他一条条地撕下卷烟抽。他没有香烟，藏区有一种白花，枯萎后变成红色，人们将它晒干当烟草抽。比烟草更匮乏的是纸，只有乡邮员掌握这一资源，有时候他没有抽完——或者说他的红花烟草断粮了，就把残破的报纸送到办公室，这是孩子们认识汉地的唯一途径。

老师让孩子们轮流读报，藏文是拼音文字，只要会30个字母，即使不认识生字，也能根据字母组合读出音来。嘎玛慢慢知道了几个汉人名字，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和孔老二，这些人在报纸上被一次次打倒。报纸上只有一个好人，就是毛主席，这位叫毛主席的不该是人，而是菩萨，没有人能活一万年，他却天天“万岁”，应该是菩萨吧？

毛主席去世了，这并不影响奶奶做晚饭施舍讨饭的人。在如凯家的后院里，经常有讨饭的人过夜，最多时有30个，如果有老人，奶奶还会请他们住到二楼上。第二天，旧的走了，新的再来。周围的村民贫困至极，好在东巴村的土地多一些，平均每人三亩，土地肥沃，能吃饱饭。奶奶从不拒绝乞讨者，尽管给别人一份，自己家里就要挨饿。她往热腾腾的大铜锅里放面粉，做成面糊糊，加上肉和圆根片（一种类似萝卜的蔬菜），一碗碗地分给讨饭的人。

如凯家的大铜锅救了很多人的命，嘎玛长大后说：“邓小平的改革要是晚两三年，那里的人会饿死一半。”

毛主席去世，嘎玛立即想到了一位老喇嘛，人称“毛主席喇嘛”，他一直感谢毛主席给他带来了新生。

这位老喇嘛次成巴登来自昌都地区西部的洛隆县，本不是出家人，50年代中期去金沙江东岸的四川德格朝拜德格印经院，路过贡觉歇宿时，梦见一位大活佛牵着一只白山羊，令他仰慕。当地人说，那是大成就者娘拉·香曲多杰，就在娘拉寺里。次成巴登找到娘拉寺，果然看到了梦中的香曲多杰。

他向香曲多杰求法，香曲多杰安排他进厨房，做些杂七杂八的事。五十年代末贡觉发生叛乱后，香曲多杰80多岁了，病得很重，仍然被抬上担架抓走。许多百姓哭喊着追他，香曲多杰说：“这不是别人害我，不是毛主席，而是我们以前种下的因。大山要倒下来，谁也拦不住，就是佛祖也没办法。你们不必痛苦，祝愿我们在莲花生的道场相聚。”

次成巴登握着香曲多杰的手哭道：“我跟随你五、六年了，你也没教我佛法，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

香曲多杰躺在担架上安详地说：“我们并不只是五、六年的缘分，在我们以前的五个转世中，你我都有缘。以后你不用管寺院的事了，不用念经，也不用拜佛。你这辈子会很顺，会幸福地活下去。”

香曲多杰慢慢将手抬起，放到次成巴登头上，给他摸顶传法，次成巴登急忙跪下磕头。

次成巴登回到家，其实那不是家，只是娘拉寺旁边一个山洞。他不再管寺院的事，也不念经，每日枯坐冥想。他从一个杂役变成不念经的修行者。

文革来了，人们在他旁边热火朝天地拆毁娘拉寺，他视若不见。这一天，县上的女干部果嘎书记带人冲进山洞，她因去过北京而闻名乡里。果嘎书记喝斥道：“你不是寺院的管家吗？把佛像和经书交出来！”

次成巴登说：“我没有。我不知道。”

果嘎书记命令红卫兵小将挖开山洞地面，并呵斥次成巴登：“站起来！”次成巴登没有衣服，只是赤身围着一块牦牛毯，他说：“不好意思，我没穿衣服啊。”但还是顺从地站起来。果嘎书记找不到杂役的一点罪证——他听从上师的话，没有佛像，没有经书，没有袈裟，连一件衣服也没有。他一无所有。

看着那些人徒劳地挖着坚硬的地面，忽然，他悟了，心中一片空明。一切无常。一切是空。

他心中升起对毛主席和果嘎书记的感激。是他们让他知道什么叫无常，让他一无所有，也让他彻底摆脱我执之心。佛教修行，要摆脱的就是“我”——我的寺院，我的土地，我的一切。现在“我”没有了，是毛主席让他在全无之中，思索，觉悟。

从此后次成巴登常对人说：“谢谢毛主席，如果不是毛主席，果嘎书记不进来。”因为口口声声感谢毛主席，人们称呼他为“毛主席喇嘛”。

文革期间，他生活得幸福平安。文革结束后，十几岁的嘎玛经常去看他，给他送大白菜和野蒜，他给嘎玛讲故事听。在别人看来，他的遭遇悲惨：上师进监狱，寺院塌了，他无处栖身，住到岩洞里，一无所有。但他觉得幸福，受到迫害并不愤怒，不埋怨，而是真心感谢，冷静平和。这位一句六字真言也不念的老杂役，第一个向嘎玛展示了佛教的力量。

毛主席的确于9月9日逝世了，直到七八天后，这里的藏民才得到消息。公社组织哀悼，但“毛主席喇嘛”没有参加。第二天中午，嘎玛和仁青逆热曲河走了十公里山路，来到一个叫扎嘎的地方开追悼会。公社曾计划在这里修建聚居地，将孜荣部落十一个村全部搬来，集中食宿与管理。那里修了个巨大的房子，分成十一个部分，一村一个。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大人们不停上山砍木头，就是为了修建这个大房子。

这个建筑本计划修两层，可直到1976年秋天只修了一层，还有许多土墙立在空地上，没有搭上房顶。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开了这次毛主席追悼会。

扎嘎村在南北两山夹峙下的一片平地上，热曲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过。这是嘎玛与仁青此生走得最远的地方，他们站在河边，好奇地到处观看。河的南岸是一座高山，上面有一片白桦林，当地人称“卓娃”，叶绿皮白。方圆几十里内，这种树只在这座山上落脚，是孜荣部落头人家族的神树，人们不敢砍伐。但文革期间百无禁忌，人们砍了很多来盖那个半截子聚居地。乳白色树皮软而结实，一层层剥下来，可以用来写字。上有黑色的印记，像是指甲印，当地人传说，释迦牟尼为了用树皮写佛经，种下此树，他一个堂兄不喜欢佛教，老给释迦牟尼捣乱，

用力掐树皮，留下了他的指甲印。

兄弟俩听到有人大喊大叫，回头一看，在河边的空地上，藏族干部思加大声嚷嚷着，“站好，站好！别乱说话！”他一会儿又哭起来，眼睛红肿。

思加是县干部，老家是贡觉以西的察雅县，身子矮胖，黑脸，大嘴巴，塌鼻子，脾气暴躁，动不动骂人打人，孜荣部落的孩子都怕他，仁青和嘎玛要是远远见他来了，就像鸟儿见到鹰一样没命逃窜。

这次追悼会之后，人们许多年没见到思加。几个孜荣人在八年后的1984年到拉萨朝圣，忽见一面熟的老者围着大昭寺虔诚地磕长头，不是思加是谁？他们将这个大新闻带回家，很多乡人不敢相信：干部思加居然去朝圣，干部思加居然去磕头！他可是个干部！

人们排好队，30来岁的乡秘书阿琼两脚分踩一块石头，高出人群一截，挥舞树枝领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是藏文，人们整齐地跟唱。人们在文革中唱熟了这首歌，它往往回荡在群众集会上，伴随着对林彪、刘少奇、邓小平和喇嘛们的批判。嘎玛盯着阿琼，觉得他好神气。

唱完歌，追悼会正式开始，嘎玛看到大家特别严肃。主持追悼会的思加一边讲一边痛哭流涕。他旁边站着公社副书记达孜那加，达孜那加没有哭，只是很严肃地低着头。“达孜”是“养马人”之意，因为他小时候在娘拉寺养马。

几位女村民手里拿着竹筒，捧在嘴上吹得“嗡嗡”响，那是一种女人玩的传统游戏。思加在哭泣中听到声音不对，扭头大骂副书记“养马人”那加：“她们居然在玩！他妈的，给我找出来！”

“养马人”那加说：“是蚊子‘嗡嗡’飞，你听错了。”

“不是，绝对不是！”思加咬牙切齿地喊。

“养马人”那加副书记更加坚决地说：“是蚊子，我发誓！”

四 孤儿

1976年9月18日下午3点，当嘎玛和仁青站在西藏那个叫扎嘎的地方，我正站在两千公里外一个农村小学里，努力让自己悲伤些。

在山东省寿光县双井口村小学，我左臂戴着黑纱，与村里的大人孩子们排着队，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我七岁，一个月前刚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堂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

在队列的前面，老师一岁的儿子左臂戴着小黑纱，穿着开裆裤，埋头玩着沙子。我很喜欢他，看他那么快乐，我咧嘴乐了，但自己吓了一跳——这个时候是不应该乐的！我斜眼看旁边一位老太太，她虽然没有眼泪，但脸上看起来很伤心，我学起她的样子。

几天前的9月9日下午，我爸爸借了一辆卡车拉石头，那是我们盖新房子的石料。我二哥长大了，没有新房子就娶不到媳妇。爸爸是公社税务所的干部，到那天为止被打成右派19年，半辈子没有翻身。他坐车经过公社，听说毛主席逝世了，大惊失色，19年来养成的政治敏感令他觉得不妙，立即将石头卸在半路。后来有人告状：“这个老右派果然有政治问题，听说毛主席逝世，欣喜若狂拉石头盖房子。”

工作组后来对爸爸调查，结果自然是拉石头在先，毛主席逝世在后。工作组又罗织了新罪名，说他不参加毛主席追悼会，爸爸自然不服：“我怎么没参加？9月18日追悼会在公社党委举行，大家面向东，党委张书记主持。”言之凿凿，又有许多人证，此事不了了之。

两年后，爸爸“右派”摘帽，我家盖起了新房。9月9日那天的石头，为我家打下了新生活的基础。那年春节，我爸爸写下大门上的春联：“二十一世冰雪化，多亏华邓救我家。”他把那漫长的21年称为“二十一世”。

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在同一时刻，做同一件事。1976年9月18日下午3点，几乎全中国的人都站在哀乐中，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站在自己人生的拐点上，不管是在天安门广场，还是西藏昌都，不管是在山东沿海，还是长江上游通天河畔。

在青海海拔4600米的草原上，长江上游通天河边，干部、牧民和学生整整齐齐站在索加小学里。高音喇叭里，一个叫华国锋的人严肃地讲话。14岁的小学生扎西多杰手持木棒，与民兵一起守着学校，防止坏人变天。

他偷偷抬起头，看见那位乡党委书记，一位满脸胡子的天津人，哭得脸上肌肉抖动。

扎西多杰左臂上戴着黑袖章，他对这黑纱很感兴趣，几天后都不想摘下来。后来“治多县志”这样记载：“毛泽东逝世，全县各族人民共同戴孝、致哀。戴孝在藏族历史上是第一次。”

扎西多杰很早就知道毛主席。生产队里有个叫巴姆的女人家庭成分不好，扎西多杰钻到巴姆的帐篷里调皮捣蛋，巴姆吓唬扎西多杰说：“你再调皮，毛主席要打你了，”她指着帐篷里那张《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说，“你看毛主席握着拳头，要打人呢。”

扎西多杰吓得跑出去，见到大人就说：“巴姆家里不要去啊，毛主席生气了。”大人问：“谁说的？”

“巴姆说的。”

于是巴姆在生产队里遭批斗。

这是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治多县，“治多”是“长江源”之意，形成长江源头的许多河流汇集于此。由县城再往西265公里，通天河边，就是无人区可可西里边缘的索加乡，在西藏自治区的北边。“索加”是“灰色木桶”之意，出自此地一座同名的山峰。这里地广人稀，野生动物众多，野牦牛、野驴、雪豹纵横奔跑。治多县是传说中格萨尔王妻子珠牡的家乡，是珠牡父亲嘉洛家族的牧场。

这是名副其实的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昆仑山脉雄居北部，长江上游通天河的各个支流纵横交织，雪山耸立。唐蕃古道通过境内，后来的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也从此穿越。扎西多杰长到快20岁时，只见过草，不知道树是什么。当他后来到嘎玛和仁青的家乡，见到郁郁葱葱的森林时，惊叹同样是康巴藏区，为什么地理景观如此不同。

扎西多杰1962年出生于县城附近的牧区，在他出生前，治多县经过了数年的政治动荡。³他出生时，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政治生活略为宽松，治多县的秋吉活佛被特赦，他后来说服一伙叛乱者归降。

妈妈请秋吉活佛给孩子起名，秋吉活佛选了“扎西多杰”——“吉祥金刚”之意。妈妈喊儿子为“扎多”。

与整个藏区一样，治多县人度过了文革前平和的几年⁴，用邓小平的话说：“西藏人民平叛改革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⁵

但好景不长，父亲于1966年去世，四岁的扎多跟着妈妈迁往265公里外的索加。那是刚成立的一个乡，因为治多县东部草场不足，要在西部另辟草场，那里荒凉偏僻，整个可可西里无人区都在其辖区内。

他们骑着牦牛，一个星期后走到那荒无人烟的地方，重新组织成各个大队：“八一”、“反帝”、“向阳”、“永红”，扎多属于八一大队的三队。他们丢掉了原来的部落关系，丢掉了寺院，丢掉了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因此扎多从小所感受的文化与嘎玛和仁青完全不同，他一直长到近20岁都不知道佛教是什么。后来他回忆起一位老人，他经常坐在帐篷外，手里拿着念珠，面带微笑地数着有多少只牛，多少只羊。扎多不认识念珠，不明白他为什么天天玩算盘珠子，后来明白了，老人是在念经，却装作数牛羊。

但远迁的人们没有摆脱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10月底，恢复不久的贡萨寺遭到彻底破坏。文革如一场火，烧过高山和草原，一直蔓延到这蛮荒之地。

扎西多杰的妈妈是斗争对象，他有时夜里很晚才等到妈妈回家，看她偷偷哭一阵。批斗时，她被架到火炉上用烟熏，后来死于肺病，只有40岁。

³ 《治多县志（征求意见稿）》在关于1958年有如下记载：

7月15日，治多紧急召开县人委会、政协全体委员会议。少数部落头人拒绝参加会议，更多中下层人士缺席，县委副书记伊本干在会上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劝导大家不要参与反革命叛乱，不要破坏社会主义改造，不要上坏人的当。

8月，玉树州人代会期间，发生了拉达百户出逃事件，囊谦千户等玉树二十五族头人全部当场关押。

8月底，赛群尼玛一伙叛乱分子，突袭扎河肖格政府，并将商店财物洗劫一空。

9月15日，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治多。

11月12日，我平叛部队一举摧毁盘踞在贡萨寺院的百平日哇族人叛匪，没收寺院贵重财物移交政府。

11月15日，我空军侦察飞机被盘踞在当涌地带的扎武百户等叛匪击落，机上两名解放军壮烈牺牲。

⁴ 1963年10月，治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纠正了几年来工作中的失误，甄别处分的干部，释放错捕错判的群众，安置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开放寺院，”并“总结了平息反革命叛乱中扩大化问题。”——《治多县志（征求意见稿）》

⁵ 《与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318页

妈妈改嫁后生了个小女儿。继父懒惰，八岁的扎多就要干重活。一只母羊在山上产羔后，小羊站不起来，扎多要将它抱回家，但母羊保护羊羔，用羊角将扎多一下顶倒在他，扎多在草地上骨碌碌滚出去。他恨恨地冲上去，顶着母羊，又哭又叫，又撕又咬，嘴里咬满羊毛。将母羊逼走后，扎多抱起小羊就跑，母羊旋风般追上来。扎多放下小羊，拿起石头将母羊打跑，再抱起小羊狂奔。母羊在后面低着头，羊角对准扎多，利箭一般“嗖嗖”地追上来。

回到家，妈妈夸他：“我儿子真了不起，是个男子汉啊。”

扎多盼着妈妈夸奖，而妈妈从没让他失望：“扎多把牛羊赶回家的时候，我看牛黑压压的，羊白花花的，好整齐啊。”

扎多挺高了胸脯问：“战德扎西在做什么？”

“他还在尿床呢。你是大男人了。”

战德扎西是生产队里一个小男孩儿，扎多从与他的比较中得到自信。妈妈一夸儿子，扎多就高高兴兴唱着歌上山放牛。草原上有熊，有的石头越看越像熊，扎多害怕，妈妈说：“没事，我看着你。”扎多甩着手大步走出去，觉得妈妈一直在看着他，他走啊走，翻过山了，好像也没走出妈妈的目光。晚上，筋疲力尽的男孩儿回到帐篷，妈妈又一通夸奖。儿子问：“战德扎西在做什么？”

“他还在尿床呢。你是大男人了。”

妈妈生病了，人们拉着她去乡医院，后来要到玉树州州府结古镇开刀。州上？那是多么陌生遥远的地方，听说要走10天才到。

扎多去乡上卫生所看妈妈，见妈妈睡在床上，枕头边有糖果和苹果。那是他第一次见苹果，妈妈一直为儿子留着。扎多啃着苹果，妈妈拉着儿子的手，微笑着看他。

牧民们拉来两头犏牛，犏牛是牦牛与黄牛杂交所生，躯体比牦牛高大。人们在两头牛中间扯上绳子，做成担架，将妈妈抬到担架上。扎多抬头看妈妈，妈妈像被两头大象夹在中间，那恐怖的印象一直留在他记忆中。一头犏牛名叫“左果切”，全身黑黑的，像绸缎一样闪着亮光，那曾是扎多生父的坐骑。

妈妈要走了，她努力撑起身子，给儿子一个笑脸。在儿子眼里，妈妈是那么聪明快乐的人。扎多曾抓过一只鸟，妈妈劝儿子放掉，“小鸟多可怜啊。”但扎多怎么也不愿放。“那你把它打死吧，”妈妈指着远处一块石头说，“扔到那上面。”

扎多生气了：“好！”将鸟用力朝石头扔去，小鸟扑楞楞地飞走了。妈妈哈哈大笑。

现在，快乐聪明的妈妈要离开儿子了。扎多大哭着看妈妈远去，两只犏牛渐渐消失在望不到边的草原上。

继父和妹妹陪妈妈去了州府结古，冬天过去，春天来了，通天河的冰要化了，继父和妹妹还没回来。有一天，一群牧民来到扎多的帐篷，女人们给扎多换了一身新衣服，上衣没有钮扣，女人们用线给他缝起来，一边缝一边哭，并轮流把扎多搂在怀里，泪珠落到他的胸前。男人们不说话，默默地送毛主席像章给他，在他的胸前和衣袖挂满了“毛主席”。

帐篷小学里，一位“幸福老师”不许孩子们唱歌，孩子们安安静静的。

扎多没有哭，他突然冲出人群往山里跑去。他坐在山坡上，盯着东方，那是去结古的路，除了大山，就是萋萋青草，妈妈就消失在那草原深处。他知道妈妈没有了，但不知道死是什么，草原很快隐入黑暗中，“以后还能找到她吗？”他痴痴地坐着，眼睛盯着那巨大的黑夜。

初夏，继父与妹妹回来了。继父苍老了很多，整天躺在帐篷里，草原上有人

唱歌，他愤怒地冲出帐篷，要和人拼命。

扎多讨厌他，偷偷溜出帐篷，继父跑过来抱住他，痛哭起来：“你不要走，你妈妈临死时说，不要让你们兄妹分开。”

扎多冷冷地挣脱开，“妈妈会不会被他卖掉了？”他想。等他长大后到了结古和西宁，见到街上讨饭的老太太，他总会多看几眼，心想：“这会不会是妈妈？”

扎多再也没有妈妈了，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夜里。他早早睡下，往往半夜一下惊醒，睁大两眼，知道又没梦到妈妈。他把枕头换个方向再躺下，心里喃喃央求：“妈妈，到梦里来看我……”

五 流浪

为了扎多，继父布多不要命了，他要横渡通天河。

妻子去世后，他想离开这伤心之地，去投靠曲麻莱县的亲戚，而继子打死也不跟他走，布多于是做出惊人决定：游过通天河，到河对岸的措池村找亲戚收留扎多。

在八一大队的历史上，没人渡过通天河。通天河不是窄窄的一条河，而是许多条河连在一起，漫在高原上，如同一个湖泊，有时宽度超过10公里。人们只能等到冬天结冰时过河，但继父没耐心，骑着一头牦牛消失了，人们说：“布多肯定被水冲走了。”

两个月后，他居然回来了，令牧人们惊喜。原来他过河时将绳子一端系腰上，另一端系牛鞍上，扯着牛尾巴被牛带过河。

继父带来河对岸扎多的一位表哥，这家人心地善良，愿意收留扎多。表哥告诉扎多，那边有白面吃，有牛有马。扎多跟表哥踩着通天河上的冰走，冰面上太阳明晃晃的反光刺得他眩晕。扎多的毛袜子里满是虱子，藏族人有句话：“谁的袜子里虱子多，谁就要离开家乡了。”

骑着牦牛走了三天才到措池村，亲戚一家对扎多很好，但过了几个月，扎多呆不下去了，他想妹妹和小伙伴们，想那头调皮的牛，那头牛老走在牛群前面，是牧人们所说“喜欢走路的牛”，最讨厌，因为它引着牛群到处乱跑，但扎多喜欢它。他还想念家乡的嘎瓦拉孜山，意思是“白色的神山”。扎多想家想得发疯了，他常常跑到山上伸直脖子往家乡看，可群山挡住了他的视线，只是偶尔看到通天河远远闪着亮光。

继父两年后从曲麻莱骑马来了。扎多不想靠近他，继父对扎多说：“帮我去喂马吧。”扎多不情愿地跟他走出帐篷，走着走着，继父忽然哭起来，吓了扎多一跳。继父擦干眼泪说：“你妹妹想你，那天她一定要过一条小河，说过了小河，就能见到哥哥。”

扎多的眼泪一下涌出，“好，我跟你走，去找妹妹。”他们半夜偷偷跑掉，继父顺手偷了人家几头牛。那本是扎多来时带的，是扎多的财产。

他们过冰河后听到一个消息，家乡的牧民外出驮粮食要经过此地。索加乡没有农耕地，时不时派驮队出去买粮食。扎多赶着牛，大睁着眼睛，生怕错过驮队，在一条大沟里，他远远地看见了——驮队！就是他们！

扎多撒腿跑过去，眼泪奔流，似乎要投入妈妈的怀抱。

家乡的人们见扎多来了，欢声大叫。扎多抱住他们再不放手，“我要跟你们回家！”他一遍遍地大喊。

家乡人劝继父说，明年到曲麻莱送屠宰的牛羊时，会把扎多带去，继父到县城来接。继父没办法，一个人赶着牛走了，扎多兴奋地跟着大人们回家。一路走了好几天后，大人停住驮队，带扎多去打猎，十几只猎狗跑在前面，发现了几只被咬死的岩羊。“雪豹！”一个牧民说，“肯定就在附近！”

雪豹是食肉动物中居住海拔最高的一种，雄踞冰峰雪岭之上。传说猎物丰富时，雪豹经常咬死猎物，只喝血，然后在附近草丛中休息。牧民们撒出猎狗，几只狗飞奔向草丛深处，牧民们持枪跟上，忽然狗吠大作，“打起来了！”牧民们喊。只听“汪汪”声回荡在山岩间，人们冲上去，果见一只雪豹正被猎狗围咬，它的肚子极大，看来吸血过多跑不动了，敌不过几只猎狗。

一位年轻牧民对雪豹打了一枪，雪豹终于倒地。一位年长牧民骂他：“好好一张豹皮让你弄坏了！”

那雪豹体型巨大，一个大人扯起它两条前腿背起，雪豹的后腿还耷拉到地上。雪豹尾巴几乎等于身长，强壮有力，是最厉害的武器，但它的尾巴被猎狗从根部咬断了。猎狗围攻雪豹时，一只狗先从后面冲上紧咬其尾巴，令雪豹无法施展手段。

扎多问：“这只雪豹是妈妈吗？它的孩子会怎么样？”

大人本来欢呼雀跃，听他一问，人人沉下脸来。扎多追在大人屁股后不停地问：“它的孩子怎么办？”有人忍不住喝斥：“别胡说了！”

走着走着，突然见那白色神山嘎瓦拉孜远远耸立，扎多的眼泪一下涌出。

没人能解释藏人对家乡的热爱，就像无法解释对母亲的热爱一样。许多藏人对家乡的感情异乎寻常的深厚，这也许来源于独特的藏族文化：与现代社会相比，他们的生存不仅更依赖于自然的馈赠，而且与自然有更亲密、和谐的关系。不必说与人通灵的牛、马和狗，就是山、水、树木与草原，也被藏人赋予独特的内涵：它们也是生灵，是人类友好的邻居。还有，藏人之间的友好互助，加深了他们对家乡的依恋。

但对扎多来说，也许有更直接的原因：他在这里失去母亲，他对母亲的回忆，全部展现在这些高山和草原上。他只有站在那里，才能活生生地看到母亲。

等扎多走到山前，天已黑了，全村人正在开会，见扎多回来，许多女人哭了，上前摸摸扎多的衣服，拉拉他的手，请他住到自己家里。扎多高兴啊，他所有的小伙伴都在。“我再也不走了。”他对自己说。

这里是高寒山区，冬天气温摄氏零下三四十度，大风猛烈刮在扎多身上，而他只有一条裤子，连衬裤也没有，腿上经常被风吹开一道道口子，一旦坐下就不敢站起来，冻伤的口子痛得他呲牙咧嘴。他讨点热酥油涂上，自己治疗一下。他的皮袄裂了，一条袖子掉下来，他要时时夹着胳膊，一不慎就会赤膊上阵。另有一只单鞋，鞋面与鞋底藕断丝连，他不敢抬起脚来走路。

他也有风光的时候。八一大队忆苦思甜，稿子由扎多来念，那是最高荣誉，需对扎多打扮一番，一个老奶奶用羊毛线帮扎多缝好了袖子和鞋，扎多觉得那是有史以来最舒服的一天，可以放心大胆抬脚走路了。

扎多后来看《三毛流浪记》和《卖火柴的小女孩》，觉得自己的藏民太伟大了。他虽是孤儿，但从没挨过饿，如果不是那些藏民，他早饿死了。

在一年的秋天，二队的一个老太太收留了他，她是扎多生父的亲戚

河流融化，春天来了，母羊在4月开始产羊羔，羊群一天产五六只，扎多忙得脚不沾地，每天耳边都是“咩咩”的羊叫声。一天，他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准备书包，心里一痛：“我不要流浪了，我要上学！”

妈妈在世时，村里动员孩子上索加乡小学，那是遥远的地方，一年只能回家一次。扎多求妈妈让他去，妈妈笑着说：“你自己连腰带都系不起来，怎么上学？”藏袍要用腰带系，那很复杂，对孩子来说尤为可怕。

扎多只好上村里的帐篷小学。有位老师让孩子们用汉话喊他“幸福老师”，孩子们害怕“幸福老师”，有时候他不在，孩子们在帐篷里打闹时，他在隔壁喊：“我看见了啊，我看见了。”孩子们立即鸦雀无声，以为他真看见了。帐篷小学还有一个姓白的年轻女孩教汉语。扎多喜欢唱歌描述两位老师走路的样子：

“白老师擦啦啦

幸福老师耶啦啦。”

扎多崇拜“幸福老师”的儿子索南达杰，他长得高大魁伟，当时在西宁读书，放暑假回家时，常在帐篷门口吹口琴，引来一群孩子好奇地围观。有一年他回家，喝多了酒，脸红红的，要骑一匹烈马，一群牧民围着他劝阻，索南达杰直着脖子叫：“为什么不行？我偏要骑！”

他从牧民手里抢过缰绳，跨上马，一人一马像旋风一样扑出去。牧民驯马时一般小心翼翼，慢慢地调教马儿，但索南达杰在马上大呼小叫，马一会儿前腿立起，一会后腿猛踢，但马跳得越凶，索南达杰叫得越欢，最后那马慢慢停下脚步，被他驯服。

扎多在觉得这人真有意思，又倔犟又英雄。索南达杰穿着白衬衣，蓝裤子，一身汉装，似乎代表着那个外面的世界，令人高不可攀。要到那个世界，读书是唯一的途径。

扎多渴望上索加小学，收留他的老太太便让他赶着一头母牛，交到学校牧场，学校就用牧场养着学生。

索加小学的孩子轮流为学校牧场放牧。扎多放牧时，一只两岁的牛犊丢了，后来发现被人打死了，埋到草原上。无产阶级代表找扎多谈话，要他认罪，扎多发誓说不是他干的，但他从此有了坏名声，一个女同学给他起外号“亚苏”，意指“两岁小牛的杀生者”，扎多受了冤枉，恨得要死：“我要把她干掉！”

他寻找着机会。女同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一直藏在宿舍里。过了一段时间，她抑制不住电影的诱惑，出来看《闪闪的红星》。扎多一直卧薪尝胆呢，远远跑到她后面，风驰电掣一般冲过去。这一招是跟打架的公羊学来的，公羊打架时，双方先分开，然后相对冲过去，羊角“砰”地撞在一起。扎多激情四射，将头“砰”一声撞到女同学背上，她被撞出好远，晕死过去，学校里一阵尖叫声。

小女孩博雷和妹妹是老师的宠儿，她们衣服干干净净，完完整整，而且带来的奶牛最好，老师经常夸奖：“你们看，博雷的父母送来了最好的奶牛。”而扎多的牛是最瘦的，这让他很自卑。

这一天，作为大队长的扎多到二年级耍威风，命令大家遵守纪律，当然，顺便炫耀一下丝绸红领巾，别人的红领巾都是布的。博雷没有在乎他，低头揉着一张羊羔皮，扎多对受到的蔑视极为恼火，对她喊：“你给我站起来！”

博雷站了起来，一扬手，把羊羔皮扔到扎多脸上。扎多大怒，直追过去，博雷跑到一个老师家里躲起来，扎多在门外喊：“你出来，我打死你！”博雷在窗口冲扎多做个鬼脸。

10多年后，博雷成了扎多的妻子。

通天河冻了又化，化了又冻，1979年，索南达杰来了。索南达杰现在是县民族中学的老师，骑着马来家乡招生，一个星期后，他宣布录取扎多在内的四个学生。博雷第二年也考来了，她很胆小，扎多热情地教她学校里的规矩。

扎多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学校的伙房。伙房隔壁是牛粪房，有灶里扒出来的灰。扎多夜里带领同学，脚上穿不同号码的鞋，手上也套着鞋子爬进牛粪房，造出很多人进去的痕迹。他再用软铁皮捅开伙房门，先把桶里的清油倒掉一半，然后大肆偷牛肉。有家庭的人才对清油有兴趣，学生不自己开灶，所以按道理不会偷清油。他的迷魂阵效果不错，炊事班发生内讧，彼此怀疑，吵成一团。

几年后中考，扎多考了玉树州第一。因为治多没有高中，他只有考中专，只要上了中专，就有城市户口了，这个孤儿的命运将发生重大转变。他想进公安学校，但个子矮小，最后填了青海邮电学校，学校在西宁，他面临一个更大的城市。

去西宁前，扎多又回到索加。他是20岁的青年了，虽然矮小，但眉清目秀，白衬衣，蓝裤子，一个文化人的样子。一个老奶奶在帐篷里给他煮奶茶喝，流浪时，这位老奶奶也收留过扎多。老奶奶看他喝着奶茶，忽然哭起来：“你真的长大了！你妈妈要是看见，会多高兴啊。”

第二章 出道

世界中心须弥山

顶天立地别动摇

太阳月亮绕你走

绝不会走错道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六 阿达拉姆虹化

1980年2月的一天傍晚，嘎玛放牛回家钻进厨房，直奔酸奶桶。

现在嘎玛12岁，仁青15岁。在过去的几年，爷爷和父亲去世了，整个国家经历了文革结束、批判“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改革开放还没来到西藏，但社会氛围已宽松了一些。

奶奶和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嘎玛啥话不说，舀起一勺酸奶美美地大吃一口。新鲜的酸奶可是诱人啊，每天吃也吃不烦。

“家里有客人，要有礼貌。”妈妈提醒他。

嘎玛睁大眼睛。他家的厨房很宽敞，但窗户极小，阴暗昏沉，嘎玛刚从阳光下进来，眼前更是模糊不清。慢慢地，他看出一个男人坐在灶台边，那不就是在毛主席追悼会上见过的“养马人”那加副书记吗？这个干部怎么跑到自己家来了？他跟自家并不亲近。更奇怪的，他居然在低低地哭泣。

嘎玛害怕干部，见干部也有软弱的时候，有点吃惊，直直地盯着那加。

那加家住娘拉寺边的德吉村，是女活佛阿达拉姆的邻居，现从乡上回家，路过嘎玛家，不知怎么就上了楼。

那加两手捂住脸抽咽着说：“阿依（大姐）走了，我像是没有家了，就是回到村里，也觉得空空的，那里什么也没有了。”他不停地擦着眼泪。“阿依”是乡人对阿达拉姆的尊称。

嘎玛明白了，他是在为阿达拉姆伤心。阿达拉姆前几天圆寂了。

妈妈给那加添满茶说：“天快黑了，喝完茶就回家吧。”

藏族人很少催客人早走，但妈妈想让那加早回去看阿达拉姆。

那加流着泪下楼走了。妈妈和奶奶长吁短叹：“别看他是干部，原来心里和我们一样啊。”

阿达拉姆圆寂时57岁，她去世几天后，一个传言慢慢扩散，说活佛走了，她的法体渐渐变小。那些守着遗体的喇嘛们感到事态严重，看来活佛的法体要“虹化”，如果再不告诉村民，活佛的法体最终不见了，怎么让人家相信呢？

喇嘛们先秘密通知了一些重要家族，嘎玛跟着奶奶去了，他看到，原来170公分高的阿达拉姆变小了很多，看起来好像十几岁的孩子，身体用白布包着。

知道的人们越来越多，贡觉县城附近有一个大工程，几千农民在工地上劳动，这时也成群结队来看。

五天后嘎玛跟奶奶又去看，阿达拉姆更小了，放在一个茶盘里，看起来像五六个月的婴儿，她的长头发披下来，将身体盖住。

桑珠村村民松吉次仁怀疑地问：“这是她吗？你们好好看了吗？她的下半身是不是给切下来了？”

站在旁边的嘎玛说：“即使下半身切下来，她原来的上半身也比现在大啊。”

松吉次仁属于另一个教派，一直不喜欢阿达拉姆。但他的怀疑站不住脚，因为许多人看过，那的确是阿达拉姆的全身。

许多喇嘛坐在那里念经，这是嘎玛第一次看见喇嘛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没有穿袈裟，但穿着与袈裟颜色相近的绛红色俗装。

政府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一位姓李的干部与一个藏族干部下乡来调查，正碰到一群孩子，孩子们见有“加”骑马来了，纷纷往路边躲藏。他们已成习惯，只要碰到干部，就把胸前的佛像佛珠藏起来，逃之夭夭。

两个干部骑马追上去，虚晃着马鞭问：“你们到哪里去？”

孩子们害怕地说：“阿依圆寂了，我们去拜她。”

“为什么拜？”

“她的身子变小了，小得能装进瓶子里。”

第二天，两个干部召集孜荣部落11个村在东巴村开会，女活佛的三个孩子全被叫来，包括后来的嘎旺法王。

姓李的汉族干部坐在那里不出声，藏族干部发言说：“昨天我们听小孩子说，出了那样的怪事，你们可不要受骗！人怎么能小得装进瓶子里？连鱼都装不进去！完全是骗人！完全是封建迷信！”

会议在嘎玛家邻居的院子里召开，嘎玛好奇地盯着那个李干部的一举一动。李干部一直没说话，只是玩弄着手里的铅笔，嘎玛往前凑凑，见铅笔白色的笔身上印着熊猫和蝴蝶，很漂亮。李干部手边还有一个搪瓷杯，上面印着几个红色的汉字，他时不时端起杯子来喝，听大人说，这个“加”在喝开水。开水是什么？

“就是热水！”加央巴桑比嘎玛小两岁，非常聪明，他告诉嘎玛：“抽大前门，打火机，喝白开水，那是干部。”

“为什么喝热水？怎么不喝茶？”嘎玛问。藏族人很少喝白开水。

“你不懂，人家喝的是白糖水。”

那位藏族干部继续训话说，现在春耕，不要影响了一年的农业生产。要大事化小，尽快处理，“尸体明天必须天葬。”他说。

家人和喇嘛们被逼无奈，只得在第二天举行天葬，那一天是藏历二月十日，阿达拉姆圆寂的第18天。嘎玛放完牛，急急忙忙跑去了。喇嘛们用一个盘子将阿达拉姆的法身端出来，约20公分长。人们不断磕头，喇嘛们边哭边诵经。他们相信将法体再放二十几天，阿依会完全虹化，只剩头发和指甲，但人们干涉了她的修行。村民们哭着，围着她的房子转经。这时大家终于都相信，她果然是一位大成就者。

关于高僧虹化，在藏区有许多记载和亲见。修行“大圆满”教法的虹化者临终时，打坐的身体不断发光，在发光时形骸不断缩小而渐至消失，最后只剩下指甲与毛发。在其肉身发光缩小之际，头顶上方出现红光，这便是“大圆满”修行者追求的死后最高境界——虹霓法身。尚有次等者，其肉身发光中缩小到一定程度便停止，剩下的形骸坚硬如铁。

藏学家南喀诺布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终身教授，是在西方影响最大的藏传佛教高僧之一，几十年来一直在西方传授“大圆满”教法。他最重要的上师就是阿达拉姆的父亲香曲多杰。南喀诺布讲“大圆满”的《水晶与光道》一书中说，从“大圆满”的观点看来，个人是宇宙的中心，也就是个人的小宇宙是整个外在宇宙的圆满反射。其中之一者之本性即是另一者之本性，当修行者了悟自性，便了悟了宇宙的本性，也就是觉悟。觉悟就是完全从条件存在中解脱出来的状态，通过将自身与宇宙融合，修行者显现“光身”，是“大圆满”修行者最喜欢的体现觉悟的方式。

南喀诺布还写道，香曲多杰告诉南喀诺布，他的上师那拉帕玛都杜将弟子们召集到一起，传法过后告诉弟子们，他死的日子到了。弟子们恳求他继续住世，他说时候已到，无法避免。香曲多杰师兄弟陪师父上山，上师住进一个小帐篷里，让弟子把帐篷缝起，说七日之内不要打扰他。香曲多杰师兄弟下山静候七天，这期间经常下雨，山上出现许多彩虹。七天后他们上山，发现帐篷一如七天前，打

开帐篷，上师不在了，只留下头发和指甲。衣服像蛇蜕的皮一样留在那里，腰带仍系于中间。

南喀诺布的伯父多当也是修行者，1952年，他亲眼见到一位普通修行者闭关七天后虹化，只留下头发、指甲和衣服，当时中央政府的军人也在场。伯父看到那些场景后，眼中含着泪水对南喀诺布说，这位看似平凡的人就住在附近，但无人认出他是伟大的修行者，实在是个悲剧，因为本来可以从他那里请得教法。但大圆满修行者就是这个样子，从外表绝对看不出来。

在狮子山下的天葬台上，喇嘛们将阿达拉姆的法身处理，喂给盘旋着的兀鹫。藏人认为，离世时献身躯喂鹰行善，让神鹰把不洁净的身躯带到高山之巅，洗除不洁与罪孽，可使灵魂早日解脱。

神鹰只是蜻蜓点水地啄几下，人们说，神鹰伤心阿达拉姆离世，不想吃。也有人说，阿达拉姆生前经常变成神鹰，所以鹰不忍吃她。

但从世俗角度看，鹰不吃肉是因为肉太硬，因为阿达拉姆的肉身变得像钢铁一样。后来人们纷纷争抢她成为碎块的法体，当作宝贝珍藏起来，就像珍藏佛陀的舍利子。

一个比嘎玛小两岁的孩子抢到一块，愿与嘎玛平分，他们用刀子割了半天也分不开，只好用石头将它砸成两块，一人一半。嘎玛心满意足地往家走，路上碰到哥哥仁青。“你过来看。”仁青悄悄把藏袍的前襟打开，露出他抢到的一块，比嘎玛那块大一点。

天葬的时候，一只鹰叨着一块骨头，仁青桑珠和孩子们用石头打鹰，从鹰口中争得一块手指大的骨头，上面带肉。

一个孩子想把他那份风干，晾到了外面，结果被一只狗吃掉了。“啊，那只狗太走运了。”仁青对我说。

其实佛教不鼓励这种做法，但有些藏民认为这是宝贝，能保佑平安。2006年10月，在北京，当仁青桑珠对我讲到阿达拉姆圆寂时，他让我大吃一惊：他拿出贴身的铜制佛盒，打开，拿出里面一个小小的蓝布包，再打开，里面有块干干黄黄的东西，有小指肚大小，说：“这是我抢到的。”

我感到离奇，不适，仁青笑道：“这就是思想的不同，你认为那是人肉，我们从不这样想，我们觉得是珍宝，跟佛的舍利子没什么两样。”

他说得对，这是我们之间的不同。虽然我很尊重他的信仰、他所遵循的尊重生命、利他、因果等佛教原则，但那些怪异的行为还是令我不舒服。我后来问其他藏人，他们也觉得怪异，无法理解。在广大的藏区，各地区文化有很大差异，大多数藏人并不认可仁青这种行为，他可能只代表金沙江西大山深处某些部落的人们。

2006年6月，成都，嘎玛对我和扎多谈到阿达拉姆时，也给我们看他胸前护身符里阿达拉姆的头发和几颗天珠，那是阿达拉姆和她家族的人当作念珠念了1亿遍经文的。“我有了这些，刀枪不入，绝对！”嘎玛说。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望着他。扎多也望着他，与我的眼神一样充满怀疑。扎多在生命的前20年没有接触佛教，他腕上挂着念珠，但在如何看待世界上，他跟我这个无神论者也许更接近。

我很疑惑嘎玛为什么那么坚定，但我只是看着他，没有表达我的怀疑。我最好当即拿起一把刀子，看能不能扎进他的胳膊，但是，“算了，”我对自己说，“不必较真，不必去挑战他的信仰。”

而且，与嘎玛和仁青相比，在认识这个世界上我是不是更拥有真理，我没有把握。阿达拉姆的虹化是事实，她的遗体缩小到原来的七分之一，至今没有科学家能站出来，像戳穿魔术一样让我们恍然大悟，这神秘依然神秘。这外来人眼里的“神秘”，对嘎玛和仁青却再正常不过，这正是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的人生。

七 1980 年

宗教与文化缓慢深入心灵，政治一夜之间改变命运。

阿达拉姆去世后几个月，1980年夏天，嘎玛又被叫去开会。他上次开会是四年前的毛主席追悼会，现在他12岁了，爷爷和父亲已去世，家中再没长辈男人，他代表全家出头露面。

开会几个村子的中间地台凯村，那个开毛主席追悼会的聚居地彻底被人遗忘，主持会议的领导换了新人，那些哭毛主席的“加”们不见了。

在这次会议上，嘎玛听到一个新的汉人名字——胡耀邦。

一位藏族副乡长说，胡耀邦总书记给大家送礼物来了，每家每户一坨砖茶，还有每人两块钱。嘎玛家六口人，奶奶、妈妈、仁青、嘎玛、弟弟和妹妹，一共12元。嘎玛高兴极了，他看到那茶砖上写着“民族团结”。

副乡长告诉大家，总书记还说了，以后大家可以做生意，种自留地，藏族人民一定要富起来；民族自治要落实，必须由当地人当领导，援藏干部是来帮助当地的，不是来当领导的，要慢慢减少。

胡耀邦不仅送了茶和两块钱，还赠送了衣服和玉米。但没人吃过玉米粒，不知怎么处理，煮上半天还是太硬，难以下咽，后来有人拿玉米喂牦牛，牦牛很喜欢。

胡耀邦1980年去西藏，标志着中央对藏区政策的巨大转化。⁶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任农垦厅副厅长洛嘎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在拉萨告诉我，胡耀邦痛感于西藏人民生活的艰难，在大会上生气地说，多年来中央援助西藏的钱，“都扔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⁷

洛嘎后来任拉萨市长，他说，胡耀邦的政策给藏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福利⁸，但也有过激之处，大批高素质的汉族干部被迫离开西藏，致使西藏各项工作一下陷入困境。

其实从1979年开始，新的气息就扑面而来。1979年3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代表。几天后，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376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6000余人，一律“摘帽”。

进入1980年，拨乱反正的步子加快，出狱后的十世班禅大师被补选为全国人

6 新华社记者刘回年写过一篇回忆录，记叙胡耀邦去西藏考察的事：

1980年5月，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便决定亲自去西藏考察。不久前的4月份，刚刚组成不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书记处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推翻了封建农奴制，改变了西藏几千年来的落后面貌。但同时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明显改变。中央提出，要坚决清除“左”的指导思想，尽快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7 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说，西藏要解决六件大事：第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第二，要坚持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第三，要在所有的经济政策方面，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的大量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不要浪费，过去浪费太大。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建议好好办一所综合大学，办点中学。第六，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加强藏汉干部的亲密团结。——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第329页

8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西藏问题座谈会以及胡耀邦考察西藏，给西藏带来了实惠，免税、免征购、鼓励私有化、解散人民公社。中央政府给西藏的财政拨款，从1979年的5亿多元增加到1994年的近29亿元。

大副委员长。10月，国家拨款修复在文革中破坏严重的拉萨甘丹寺。宗教恢复已见苗头。

如果没有这次政策调整，嘎玛的人生会完全不同。正在他命运的禾苗要飞速拔高时，春雨及时来到。

开完会，嘎玛随村里的大人往家走，那些大人们多年没那么兴奋了，一位老人抽着烟，一直感叹：“唉呀，现在国家的政策非常好！这么好的政策，以前噶厦政府的时候都没有啊！”

一位表哥对嘎玛说：“以后你们如凯家要发财了。”他也许意识到，这个史上有名的商业家族，将再度积累起财富。

嘎玛回到家，奶奶将六张纸币和茶砖恭恭敬敬装进宝瓶，供奉起来。许多藏人像如凯家一样，那珍贵的钱和茶从没舍得用过。

时间就像一只弓，进入80年代，这张弓被拉满了，只等手一松，很多人的命运就像箭一样射向天空。现在整个藏区就像全中国一样，面对着新生活。

嘎玛渐渐长大，吸引他的除了佛教，还有财富，现在劳动成果可以归自己所有，他渴望拥有更多。

一个表哥邀嘎玛上山砍树，这是当地人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不砍活树，只砍火灾中烧死的树。文革期间，政府将许多山头砍得精光，现在当地人小心维护着所余不多的森林，他们认为，森林的茂盛与否与人的命运相关。

表哥说，砍一根柱子和大檩条可以卖两块钱，小的也能卖七毛。妈妈说：“不行，树倒下来会压死你们。”

嘎玛坚持要去，奶奶只好准备食物。两个15岁的孩子把斧头磨得像亮闪闪的镜子，带着食物，雄赳赳出了门，先走八公里到娘拉寺，然后爬进娘拉寺西边的山林里。仁青对劳动和金钱都无兴趣，留在家里看他的经书，画他的画。

从四五岁起，嘎玛就着迷地喜欢劳动，当他将牲畜管理得井井有条时，仁青桑珠还不知道该把牛拴哪里。每只牛有固定的牛桩，就像买下来的停车位，不能乱换，否则牛们会打起来。当仁青桑珠拴牛时，毫无疑问，牛们的友谊将在那一天被破坏。母亲说：“牛羊是给我们带来福气的，你连牛羊都管不好，将来没福气啊。”

最可气的是，弟弟骨子里热爱劳动，在玩耍的时候见到牛粪，立即欢天喜地地捡起来送回家里。牛粪是燃料，是农牧区藏族人家的生活必备品。每当大人们说：“你要像嘎玛一样多好啊！”仁青就痛下决心：下回也捡堆牛粪回来，让大伙儿瞧瞧！

但他下次带回的不是牛粪，而是另外的麻烦。他把邻居种的花搬回家，当天就被发现，邻居说：“仁青桑珠真厉害啊，你种的花当天就长那么高了。”仁青的脸烧起来，红得像康巴人头上的红穗子。

嘎玛和表哥上了山，晚上住山洞里。从这里往东走10分钟，就是爷爷藏经书的那些山林。他们砍了几天，砍倒100多根，然后回家，等木头干燥后变轻了再运出来。一个月后他们又上山，先费几天工夫修出一条路，再每天费力地将十来根木头扛到山边。10多天后，他们终于将全部木头抬到山边一个斜坡，只要将木头滑下去就大功告成了，外来的木材商人在山下等着。

他们先将最大的木料一根根滚下去，山间“哗哗哗”响个不绝，最后传来“砰砰”的巨响，往下一看，五根大梁木摔碎了。

那是最难砍、最难运、最贵的五根大梁，许多天的辛苦白费了。

“大梁断了！可怜的孩子怎么办啊！”山下一个大人失声喊道。

嘎玛穿着红色的粗羊毛藏袍，脸上脏得一塌糊涂，头发乱成干草。他看了看山坡下，擦擦汗，转身回到山上，继续挥动斧头。两个男孩当天又把几根大梁木拖过来，开通了另一条路，将大木运到山下。

木料卖了130元，嘎玛分到65元，那是嘎玛赚到的第一笔巨款。对他来说，失败似乎是脸上的汗水，抹掉就是。他相信因果，只要付出努力，就会有收获。

秋天到了，嘎玛到山上割草，为牛羊准备冬天的饲料。他牵着母马，将毡子和炒面搭在马背上，名为“弟弟”的小马驹跟在后面。嘎玛一手牵马，一手提着镰刀，镰刀的把子长长的，放在地上几乎够着下巴。

村民们上山了，他们的镰刀如阵阵疾风将草刮倒，多少年来，他们从来没那么快乐地劳动。

傍晚人们下山回家了。嘎玛不回，他不喜与人竞争，不愿与人们在一起割草，宁愿花更多的力气跑到没人的地方。他趁着暮色，牵马爬到扎热玛，“扎热玛”是“石头围栏”之意，这里平坦的地面长满绿草，四周被石壁围住，像一个大院子。嘎玛很满意，他放下行李，拴住马。这时天黑了，他拿起塑料桶继续爬山，一个小时后顺水声爬到一处高高的石缝，将泉水灌满塑料桶。这是当地最高的山，如果天晴，往北可看到青海玉树境内，往东北方向，可看到120公里外四川雀儿山白雪闪耀。

他提着水桶往回走，这里有两条路，他选了一条远路，因为那条路熟悉。多亏如此他才没有遭难，那条近路上宿着四只棕熊，熊如果离人很远，不会主动攻击，但人与熊冷不丁打个照面，人怕熊，熊更怕人，恐惧之下往往发狂伤人。

又一个小时后回到驻地，母女两匹马还在静静地啃草。嘎玛用镰刀砍下干树枝，点起火，将铝锅放到火上烧起来，一点火光在黑暗的山峦间孤独地闪烁着。

大人们回家了，没人为割草露宿高山，现在满山的青草只属于这个孩子。嘎玛吃完糌粑，拿起镰刀，弯下腰，“刷，刷，刷”，一把把青草割断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响起来，“刷，刷，刷，”随着这美妙的声音，草香弥散于夜空，令嘎玛沉醉。

第二天早上，妈妈和嘎玛三弟晋美朗加牵着牦牛来驮草，远远看见四只动物，牦牛？不像，再往前走，身边两只狗狂叫起来——棕熊！两只狗飞速跑向嘎玛。晋美朗加追不上狗，看不到哥哥在哪里，疯跑到高处大叫：“哎——哎——”嘎玛远远听见弟弟的叫声，也放声大叫：“哎——哎——”

妈妈和晋美朗加循声赶来，妈妈吃惊地看到，一大片青草已被儿子放倒，儿子满头汗水，憨憨地笑着。

嘎玛每天要割五头牦牛驮的草，他和弟弟将青草像扎辫子一样扎起来，一条草辫子比枕头还粗，一米长，每个牦牛要驮16根，到家后人们再把草辫拆开晒干。

一天夜里雨夹雪，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山上，夜冷浸骨。嘎玛躺在厚厚的青草上，小马驹“弟弟”不停走动，用蹄子轻踢嘎玛，看来它冻坏了。嘎玛起身将毡子披到母马身上，再脱下咖啡色尼龙棉衣披到小马驹身上，帮小马抬起前腿，将袖子给它套上，系好纽扣。这是亲戚送他的，是他最漂亮的衣服，平时舍不得穿。他再穿红色粗羊毛藏袍躺在青草上，藏袍白天是衣服，夜晚可当被褥，方便实用。他将割下的青草盖到身上，青草虽湿，也能保暖。小马驹暖和了，再也不闹，静静站在小主人旁，一人二马度过安静的寒夜。

嘎玛早上醒来，见雪花纷纷扬扬，起身一看，山上山下一片雪白，青草被压

得低下头。带着积雪的草很难割，不如回家休息，等雪化了再来吧。他牵着小马驹下山，却见山下许多大人正冒雪上来，看来他们不想停工。嘎玛立即停住脚步，返身上山，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地盘拱手让与他人。大雪中，这个孩子再次弯下腰，充满喜悦，手中明亮的镰刀像雪花一样飞舞起来。

八 出家

文革期间，仁青偶然看到一个手摇转经筒，那在当时是违禁品。妈妈让他去田里看守圆根，以防牛羊啃圆根，仁青带着转经筒好好研究一番，从田里拨出圆根，依样画葫芦刻了一个，得意洋洋带回家。妈妈说：“哎呀，让你守地，还不如让牛来守，你毁得比牛还多。”

爷爷却摸着仁青的头呵呵笑道：“好孩子，不错。”

藏人有句谚语：“孩子玩什么，这个时代就有什么。”如果这句话可信，童年的仁青桑珠就已预测了未来。他最大的梦想是当和尚，身披袈裟在山中修行。

当宗教一点点恢复的时候，这种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妈妈对此早有准备，三个儿子中，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出家，但谁有这个福分呢？这是大事，要通过喇嘛占卜来决定，不是仁青想当就当的——因为嘎玛也想当和尚呢。

外人可能无法理解藏人对出家的热情。在汉地，许多人认为出家是失意后对生活的逃避，僧人是被社会遗忘和同情的边缘人，如《红楼梦》中，宝玉出家被汉族读者看作悲剧的象征。如果藏族也有本《红楼梦》，宝玉出家象征的绝不是悲剧，而是走向得道成佛的正途。

而且僧人在现实中也极有地位，20世纪50年代前的西藏，政教合一，宗教首领和行政长官都由僧人担任，僧人属于最尊贵的阶层，是佛、法、僧“三宝”之一。

单从佛教修行来讲，僧人因守戒律而修行快速，更易摆脱六道轮回。藏人重视的不是活在当下，而是未来，生生世世的轮回是痛苦的，通过修行摆脱轮回，才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所以，这极大的福分，妈妈要通过算卦来决定，她不想亏待哪个孩子。

仁青可是铁了心了，他一定要当和尚，至于两个弟弟谁想当和尚，那时他们两个再算卦嘛，仁青先把第一个指标抢到手再说。

放牛的时候，仁青在空旷的大山里，对着天空大声呼喊香曲多杰的经文，自由的声音像一阵风，将他的信仰送出很高很远。有种叫“角嘎”的小鸟（即“角百灵”），喜欢“计较计较计较”地叫，嘎玛认为它在喊叫：“追太阳，追太阳，我把太阳追下来！”它一边叫，一边直直地冲向天空，越飞越高，最后只看见一个小黑点，但还能远远听见它的叫声，突然它箭一样射下来，“计较计较”，似乎在喊：“今天追不上，明天追，明天追！”仁青躺在草地上，一听到那鸟叫声，心灵像伤后复原一样高兴，与嘎玛不同，他听到了不同的歌声，在茶砖纸上记下小鸟鸣唱的诗句：

“不相信因果，你把幸福甩掉；

不相信朋友，你把幸福甩掉。”

藏区的宗教恢复从拉萨开始，慢慢扩展到边远地方，到1984年，仁青19岁，嘎玛16岁，娘拉寺开始有佛事活动，但喇嘛们没有声张，只是偷偷地恢复寺院建筑。1985年，仁青要去找娘拉寺主嘎旺法王给自己剃度，嘎旺是女活佛阿达拉姆

的儿子。妈妈说：“你们三兄弟谁出家，要算卦的。”

仁青说：“好好，算卦，算卦。”但一面说着，一面跑去找嘎旺。嘎旺正在闭关，仁青对他说：“阿活(大哥)，我要出家，你给我剃度吧。”

如凯家族与香曲多杰家族历来关系密切，仁青小时候，嘎旺就喜欢他，常常抱着他玩，因此仁青与嘎旺最亲近。嘎旺为仁青剃度，仁青终于在众兄弟中，捷足先登。但他还没有被授具足戒，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僧人，不能穿上袈裟。藏区很多俗家人也剃发，但只是等于被喇嘛点化，续个佛缘。

嘎旺法王的外公香曲多杰的著作原有八千多个木版，其中大部分被仁青的爷爷保护，但文革中毁掉两千多个，现在需重新刻版印制。这一年，嘎旺法王从四川德格印经院请来五个刻工，重刻经书的木版，也请来一个“巴擦”，即“书写经书的人”。巴擦先把经文写下来，刻工再将他的笔迹刻到木版上，因此巴擦的书法要过硬。

仁青喜欢写写画画，忍不住写了一页，嘎旺法王见他写得不错，说：“你来学写经文吧。”

11年后，那被毁掉的两千个木版，终于由仁青和德格印经院的人重刻完成。

1986年冬天，仁青回家休息，此时娘拉寺正式恢复，喇嘛们可以念经了。嘎旺捎信来要仁青回寺院诵经，诵经？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做的，仁青跳起来：“法王要我正式出家了！”

妈妈不放心的说：“你们兄弟谁出家，还是要算卦的。”但仁青已兴高采烈地奔向娘拉寺，他终于穿上了梦想中的绛红色袈裟。

当仁青还没如愿当上和尚时，嘎玛坐在娘拉寺边一个山洞里，用三年的光阴来刻玛尼石。

嘎玛放牛时最喜欢刻玛尼石。在很多山崖上，他用刀刻上六字真言“嗡嘛呢

呗咪吽”——

索甲任波切在《西藏生死之书》中说，这六字真言大悲咒象征一切诸菩萨的慈悲和加持，特别是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观世音是佛的报身，他的咒是佛陀对一切众生慈悲的精髓。观世音菩萨已经深深烙在西藏人的意识里，因此小孩只要会叫“妈”，就会念“嗡嘛呢呗咪吽”。

据说在无数个“劫”之前(佛教称天地从生成至毁灭为一“劫”)，有一千位王子誓愿成佛，其中一位如愿成佛，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但观世音发愿在其他王子成佛之前，自己绝不成佛。他也发愿要把一切众生从六道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在十方诸佛的面前祈祷：“我发愿帮助一切众生，如果我对这项伟大的工作有所厌倦，我的身体将碎成千片。”据说他首先下降到地狱道，然后逐渐上升到饿鬼道，最后是天道。他从天道往下看，吓了一跳，虽然他已经从地狱道救出无数众生，却仍有无数众生不断投入。这景象令他十分悲恸，片刻之间，他对自己所发的神圣誓愿失去信心，于是身体爆炸成千片。他在绝望之中，向一切诸佛呼喊求救，一切诸佛从十面八方来帮助他，像温柔的雪花飘然而至。诸佛以大威力让他复合，从那时候起，观世音便有十一个头和一千只手，每一个手掌上都有一只眼睛，象征智慧和善巧的结合，这是真慈悲的标记。他的法相比以前更灿烂亮丽和威武有力，可以帮助一切众生。

据说，在他为轮回之苦感到忧伤时，两滴泪珠落了下来，通过诸佛的加持，

变成两尊度母，一尊绿色，另一尊白色。度母的意思是“解脱者”，她载着众生渡过轮回的大海。

大乘经典记载，佛陀赋予观世音神圣的工作：帮助宇宙间一切众生成佛。在这个时刻，一切天神把鲜花如雨般洒落在他们身上，大地震动，天空响起“嗡嘛呢呗咪吽”，把这些字写成诗歌就是：

观世音如同月亮，

他清凉的光熄灭轮回的烈火。

慈悲的莲花，

在它的光芒中绽放。

将大悲咒刻在石头上，就像读经一样有功德。有些人专业刻玛尼石，也是一种生意，刻得很快，但不讲究字体好坏，而嘎玛刻的时候，像他一贯做事的态度：认真，讲究，缓慢，但完美无缺。很快，他刻玛尼石的名声传了出去。

爷爷的妹妹去世了，那家人送来一匹母马做礼物，请嘎玛刻经书，以超度亡人。另一个亲戚也来请他做一项浩繁的工程：将一本经书刻到石头上。

嘎玛要刻玛尼石了，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时，死不悔改，永不放弃。15岁的少年在娘拉寺边选了一个山洞，在三年里，除了做一些农活，比如砍树和割草，他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

这个山洞就是那位“毛主席喇嘛”的住处。文革结束后，嘎玛经常到山洞看望“毛主席喇嘛”，后来老人去世了，这里只住着一位老奶奶，当年果嘎书记来搜查时，她就在这里伺候喇嘛。她不懂多少经文，只是天天念佛诵经。

2006年7月4日，我与扎多从青海玉树驾车来西藏贡觉，嘎玛正在这里，他领我们去看那个山洞。从山下爬上去，发现那山洞仍有一位老尼姑住着，山洞朝阳，人们用树枝和泥巴为山洞做了一面墙壁，开上一个半米见方的简陋窗户，还有一个小小门口，人弯腰才能进去。洞里面低矮逼仄，用木板搭两个床板，在洞壁上挖出一个灶台，生活简单自然。出得门来，有一个大的平台，站在这里才知风景绝佳：对面山上覆盖一片绿绿的林子，这座山和娘拉寺所在的狮子山之间，一条小河自西向东流来，汇入热曲。再往远处看，山峰之间天碧云白，令人大畅襟怀。

山下河边有一个水磨坊，是香曲多杰七八十年前建的。现在德吉村的人仍用它磨青稞。德吉村意为“幸福村”，是娘拉寺所在的村子，这里本来没有村，娘拉寺以前养了很多要饭的人，这些人有的念经，有的帮寺庙印经文，大部分是东南西北来的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后来寺庙毁了，这些人就形成了德吉村。这是最贫穷的村庄，嘎玛日后成了商人，照管了这里80多户老人的生活。

嘎玛从山下河滩找到合适的石头，背到山上，用刻刀刻，一笔一划，极为精细，自然间学会了认字，学会了读经。“我每个字都认真看几遍，刻完了，我的文化就很高了。”嘎玛后来笑道。三年刻经生涯，是嘎玛一生中唯一完整的“教育”经历。

晚上他在山洞里读经书，有一天他读香曲多杰所写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嘎

玛相信，香曲多杰的前世是莲花生大师的弟子，这经书不是香曲多杰查找资料所写，他只是回忆自己前世所见而已。酥油灯下，嘎玛试着将经书解释给那位老奶奶听，老奶奶听着，不住流着眼泪。

嘎玛住在山洞中，想着“毛主席喇嘛”。上师香曲多杰告诉他，我们遭到的一切灾难，都是我们自己种下的因，不要恨毛主席，不要恨汉人，要宽容地对待一切。那是真修行者的慈悲。

当嘎玛刻完三年玛尼石后，仁青已是和尚，他最敬仰的也是香曲多杰，“我希望像他一样，在山林里修行，有一碗饭吃就行了。”

兄弟俩长大了，那个童年传说中身着白衣、手牵白山羊的香曲多杰，那个伟大的上师，似乎离他们越来越近。

九 牵白山羊的喇嘛

如果不了解香曲多杰，就无法理解嘎玛为什么成为今天的嘎玛，仁青为什么成为今天的仁青。他们是精神上的父亲，他的影子引领着他们长大。

香曲多杰被称为“惹称喇嘛”，即“牵着山羊的喇嘛”。他像个讨饭者，牵着一只白山羊，走乡串户，捉妖降魔。

他个子高大，英俊俊美，声音洪亮，只是怪模怪样，不穿红色袈裟，披一件床单似的白色长衣，镶着红边，那叫“咱刹”，是花色袈裟。他没有剃发，长长的辫子盘在头上，腰里别着长刀，腰带上挂着抛石器和羊皮口袋，口袋里装着小石头，好像随时准备战斗。他左手摇着拨浪鼓，走到哪里，哪里就“当当当当”响着，右手持转经筒，转经筒的转轴上垫着海螺壳，时间长了，海螺壳中间被磨光，掉下来，他就拿它当耳坠，晃晃悠悠挂在耳上。

人们怪怪地看着他，这个和尚像是活佛，更像“角巴”，就是专门治病捉妖的巫师。但他一念经，人们就不由自主围上来，一边听一边流眼泪。但不能太靠近他，他的白山羊亮出坚硬的角，警惕地望着人们，要是有人凑过来，它就毫不犹豫地发起战斗。

他1875年(藏历木猪年)生于现四川新龙县(藏语称为“娘拉”)一个贫穷人家，名为阿嘎，母亲是乞丐。娘拉出了不少大活佛，香曲多杰的祖师爷娘拉·白马敦登是藏区有名的大喇嘛。阿嘎师从荣日多杰大师，荣日多杰给他取名为香曲多杰，即“菩提金刚”。香曲多杰没有进寺院，仍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今天给东家放牧，明天给西家打工，一边干活儿一边大声念莲花生的诵辞和六字真言。他后来对弟子们说，他小时候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现在有些经文看不懂，不会写字。

长大后，当地人叫他“角巴娘巴”，“娘巴”是疯疯癫癫的意思。仁青说，他看起来像汉地的济公和尚。

香曲多杰年轻时游历藏区、汉地和印度，回家后，娘拉一个大活佛依西多杰对他说：“你走路穿破一百双鞋，不如打坐坐破一个垫子。你没有潜心修行，太浪费时间了。”

香曲多杰很惭愧，在附近维亚扎山里闭关七年，出关后到各个教派求法，不存门户之见。依西多杰又对他说，贡觉有座狮子山，你的使命是到那里建寺传法。

1908年，香曲多杰33岁时，牵着白山羊跨过金沙江，来到贡觉。

他刚到此地，模样怪怪的，人们没拿他当尊贵的喇嘛。几年后娶了江达一个头人的女儿卓拉，生了六个孩子。没人知道他何时与如凯家族建立了密切关系，只是后来人们看到，各地僧人来求法，香曲多杰一般将他们安排到如凯家借宿。后来他的儿子、女儿和外孙嘎旺，都与如凯家关系亲密。

1918年，香曲多杰43岁时在孜荣部落建立娘拉寺，此时他到贡觉刚好10年。他在山谷中用水泥建了汉式房屋，自己建水磨，采金砂，把金子磨成金粉，为修好的佛塔镀金。他设厂造纸，筑炉炼铁，成立药厂，藏区各地的人前来求药。他是极有成就的藏医，救人无数。

香曲多杰在娘拉寺周边的森林里做佛事活动，禁止在神山里砍树，并率众种树。2006年夏天，我在娘拉寺边看到，他当年植下的大树，高大茂盛，现在需两人合抱。没有人打猎，没有人砍伐，以前狮子山强人出没，人们经过此地，只想快快逃命，甚至丢了鞋子都来不及捡，香曲多杰来后佛法兴盛，再没有强盗了。

意大利藏学家南喀诺布法王是香曲多杰的学生，1954年，他在四川梦见了香

曲多杰，他在《水晶与光道》一书中说：

一天有人来村里拜见我父亲，我无意中听到他和父亲谈到一位非常特殊的医生，我敢肯定这医生就是我梦中的老人。我请求父亲和我一道去探访他，我们第二天出发，骑马走了四天才到。我发现这位老人就是我梦中所见的，而我也似乎真来过这个村子——以水泥建造的汉式房屋，门上写有咒文。这无疑就是我的上师，我应留在这里受教。这位上师就是香曲多杰，从外表看来他就是一位普通的西藏乡下人，穿着和日常生活很普通，他周围的弟子们也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都是很简单的人，一边修行一边种青稞。

当时我在知识上已受到最高教育，头脑中全是从佛学院学到的东西，我以为要得到大圆满教法的传授，复杂的灌顶仪式是必要的，于是我请求香曲多杰给我灌顶。我每天向他请求，但总是被他拒绝。

“有什么用呢？”他说，“你已从别的上师那里得到很多这种灌顶，在大圆满教法中，那样的灌顶并不是主要的，传授并不只是在灌顶中才能得到。”

我对他的回答不满意，我希望他戴上一顶特殊的帽子，准备一个坛城，然后在我的头上洒一点水，诸如此类，这才是我热诚向往的，但他总是拒绝我。

由于我强烈坚持，他终于答应了。这个灌顶并不复杂，一位熟练的上师可以很快完成。当我期待的日子终于到来时，他从早上9点开始，直到午夜才将灌顶传完！

他首先要自己做好准备，做一个自灌顶，直到中午，然后为我灌顶，他不会念诵法本，也不会做必须的仪式，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上师。

他找了一个弟子当助手，这位弟子在这方面是行家，准备了所有的坛城和仪式用品。这位弟子开始念诵法本，告诉上师下一步该怎么做。当他念到上师要做某个手印时，香曲多杰不知道怎么做，弟子再停下来教他。

有一段很长的祈请文要唱诵，祈请所有传承上师，唱诵时上师应同时摇铃击鼓，但香曲多杰对此不习惯，于是整个局面变得非常混乱，完全是一场闹剧。首先他和助手要弄清法本附注的内容，“啊，它说这儿应该摇铃！”于是他拿起铃，摇啊摇，摇啊摇，一直摇了五分钟。“现在应该敲手鼓！”于是他又敲啊敲，敲啊敲，又连续敲了五分钟。突然又说：“啊！现在我明白了，应该同时摇铃敲鼓！”于是他又摇铃又敲鼓，但又忘了应该念诵什么了，于是弟子帮助他从头再来。

他就这样磕磕绊绊花了一个白天和半个晚上灌顶，终于做完时，我几乎休克了。我知道灌顶绝对不是这样的。

这时已近半夜，大家都饿了，饭后上师给我一个对灌顶和传法的真正解释，这时我才了悟，虽然以前受过那么多灌顶，却从未了解其真义。

香曲多杰又用了三四个小时传授我大圆满的真实解释，不是以知识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非常直接、轻松、友好的谈话方式。我受过那么多正规教育，这是第一次一位上师以这种直接的方式传授我。他自然并连贯地高声说法，就像说一部大圆满密续，我知道，即使再博学的学者也做不到这一点。他讲的不是知识，而是明性。

从那天开始，我以往非常看重的知识研究就不那么重要了，我的思想建设完全崩溃。

香曲多杰从未受过知识教育，他的智慧和种种功德却十分显赫。他每天坐在自己屋前封闭的天井中，接纳前来求法求医的人。他从未学过医药，他的医药知识是从伟大明性中自然显现的，而此明性是生自他的禅观。

当我刚开始和香曲多杰住在一起时，他要我为他做口授笔录，因为他不会读写。我坐在屋内窗边的桌旁，能看到外面天井中的上师，他一边为病人和弟子们

忙碌，一边毫无片刻犹豫地口授。我写好后，会向外喊我完成了，他就暂时打断和来者的谈话，继续不间断地口授，有时是散文，有时是偈颂，但他从不问：“刚才我说到哪儿了？”相反，常常是我请他重述我忘记的内容。

刚开始笔录时，我相信他口授的内容不可能和谐一致，但夜晚我重读记录，发现整个结构次序是那么连贯，如同经过完美构思的学术著作。我们连续工作了几个星期，完成了一部分量很重的著述，后来我看到类似这样的二十几部著作，都是他向弟子们口授的。

南喀诺布法王说，随着大圆满修行的深入，一切思想和感官都解脱了，会出现五种神通。当然这只是修行进步的副产品，不是修行的目标。他记叙说：

关于我的上师香曲多杰的明性，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将这些神通解释得很明白。有一次他治愈了一个病人，病人为感恩，派了仆人带礼物送给上师，礼物是绳子捆扎的大包，里面有许多小包的茶。仆人带着礼物骑马出发，一天夜里，离香曲多杰家还有两天的行程时，他用小刀将包裹割开，拿走了三分之一的茶叶，然后小心地封好，包变小了，但是很完美，似乎从未打开过。

两天后，我正在香曲多杰家中，他突然要夫人准备饮食，说有客人马上就到。他身边的人对这种事见惯不惊，上师夫人立刻去准备。上师要求食物和所有餐具要正式摆设，但特别规定不许放刀子。

那位仆人到后，我仔细地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非常恭敬地将包裹呈上并转达他主人的谢意，香曲多杰也向他致谢，将包裹放在一边说一会儿再打开，并请他进餐。饭比我们平时吃的丰盛，有很多道菜，他吃得津津有味。肉端上来时，他看桌上没有切肉的刀，就把手伸到自己衣服里摸刀子。上师瞪了他一眼，然后平静地说：“朋友，没用的，两天前的晚上你把它忘在路边的大石头上了，当时你

还用它割开包，偷了三分之一的茶叶。”

我向嘎玛提到南喀诺布亲历的这个故事时，嘎玛说当地人都知道这件事，甚至知道那位仆人来自哪个村子。

不知什么机缘，20世纪20年代初，香曲多杰一个叫阿南的学生到拉萨去，带了上师的经书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看。达赖喇嘛让他坐下来，并给他倒了茶。这对藏民来说，是特别的礼遇。

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完经书，把经书放到头顶，两行眼泪流出来。他把经书包好还给阿南说：“这是一位纯正的喇嘛，虽然住在偏僻山区，却是雪域大地的无价之宝。”他留阿南住了15天，并给娘拉寺60个僧人每人一个“则仲”的册封。

阿南将崇高的荣誉带回寺里，和尚们兴高采烈，册封后，当地头人应给每个和尚更多的供奉。香曲多杰把册封收起来说：“你们要跟着我，就不要这些待遇。佛教是一心一意为他人谋福利，不是为自己。”

追随他的人在娘拉寺周围造起房子，最后形成了一个修行者的小村庄，富人对穷人提供饮食，由于香曲多杰的感化，每个人都对社区贡献自己的所能，大家都参加田间劳动，采药制药，一种合作社自然产生了，这迥异于西藏当时的社会制度。⁹

香曲多杰八千页著作主要在修行方面，另外包括藏医药，他研制了一百多种新药，这些药从未记载于历代医书。另外他自己创造和记录了一百七十多种佛塔造型，有些佛塔造型在西藏从未有人见过。

对嘎玛和仁青来说，香曲多杰最大的力量是他的慈悲心。后来香曲多杰遭批斗时，一个女牧民把香曲多杰扯到地下，骑到他的脖子上。这对藏人来说是最大的污辱。

香曲多杰却不生气，只是平静地说：“那个和尚今天受到很大污辱啊。”他说“那个和尚”，好像受污辱的不是他。他已经没有了“我”，只有对众生的怜悯和慈悲。

他被关了九个月后释放，在不久后的1962年年初圆寂，享年87岁。圆寂前一天，他把那些刚释放的弟子们叫到跟前说：“我可以虹化，但不想那样做，你们把我的身体留下来，以后人们转我的法体，会治很多病。”

他将左手放到酥油灯前，“你们看。”弟子们看到手掌透明，没有影子。

“不管日子怎么不好过，你们要坚信因果，你种下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就像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的影子总跟着你。”他说。

然后他做了一生中最后一件事：给每位弟子重起了名字，里面都有他名字中的“多杰”。“多杰”是“金刚”之意，是佛教的法器，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

他第二天圆寂时，天空雷声震震，卧室里藏香的青烟，变为缭绕的彩虹。三棱、六棱和十棱的雪花，像花朵一样飘下来。

⁹ 南喀诺布记叙香曲多杰的故事摘自 Namkhai Norbu(南喀诺布), *The Crystal And The Way Of Light*,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2000,第 28、35—38,140—141,154—155、165 页

十 少年商人

嘎玛趁奶奶和妈妈不在家，牵出小马驹“弟弟”，过了热曲桥，“腾”地跳上马背。

这是1984年冬天，16岁的嘎玛穿着他最好的咖啡色棉衣，出门前特意换上朋友送他的新裤子，他平常穿的裤子全是补丁，几乎露出屁股。

一直到15岁，嘎玛不愿到公共场合，因为连条能穿的裤子也没有。内裤？不，嘎玛从来不穿内裤，不是不想，是没有。村里有个比他大两岁的朋友去拉萨做生意，赚了几千元回来，送给嘎玛一条裤子。

没钱就会露出屁股，残酷的现实让嘎玛知道钱很重要。虽然胡耀邦在1980年说，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但乡政府还是要求村民上交酥油，后来又索要虫草。

虫草即“冬虫夏草”，名贵中药材，是分布在高寒草甸的一种珍稀生物。¹⁰ 除了一户猎人，东巴村本来没人挖虫草，藏人认为，挖虫草会伤害草里小虫子的生命，是丑陋的行为。但乡政府要求，不交虫草，就要交钱，那时候虫草一斤已达280至300元，谁有这么多钱来上交？嘎玛家勉强用粮食换钱买虫草上交，后来又將一头牦牛卖掉换来虫草，但实在撑不住了，也只好上山挖虫草交差。嘎玛一天可挖400根，按今天虫草高昂的市价，他一天可得到5000至10000元，即使在当时，他也应得到100多元，但他大部分劳动成果无偿交给乡政府。

没有钱就没有裤子穿，还要被逼无偿劳动，嘎玛很不高兴，当个有钱人的冲动，令如凯家族潜伏在他身上的商业基因跳将出来：他要做生意！要做生意就要有本钱，因此，他今天找本钱来了。

他骑着小马“弟弟”到了娘拉寺，继续顺热曲河往南进入一个山谷，那山谷平时水大难走，但冬天热曲结了冰，“嗒嗒嗒”，小马清脆地踩着冰面穿过山谷。小马能跟小主人一起出门，兴奋得一路小跑。

嘎玛家有三匹马，除了小马驹“弟弟”，还有它的妈妈，另外就是香曲多杰送给爷爷的白马。这匹马对保存娘拉寺的经书立了大功，爷爷去世后，家里人不再役使白马，只是好好养着它。它幼时跟随香曲多杰修道传法，后来到了嘎玛家，经历了艰难困苦，与爷爷一起保护经书，看四个孩子一个个出生，驮着嘎玛去找旧主人阿达拉姆，再看到文革结束、宗教恢复，看到这个家族焕发青春——仁青和嘎玛长大了，心灵中沸腾着宗教和做生意的热情。现在它像如凯家族的长辈，历经沧桑之后，荣辱不惊，每日缓缓上山，晒着太阳，啃几口青草，颐养天年。它一直活到90年代中期，接近40岁时才去世。

一人一马来到香边区农村信用社，许多藏民牵着牦牛和马排在门外，等着借钱，他们大多借一百两百，接着买上粮食驮回家。等了半天排到嘎玛时，他对年轻的银行职员乌热多杰说：“我要借钱。”

乌热多杰看嘎玛一眼，见他只是个孩子，懒得搭腔。

“我要借钱。”嘎玛提高声音。

乌热多杰坐在那里，两手抱着膝盖，眼皮不抬。

¹⁰ 虫草本是一种鳞翅目蝙蝠蛾属幼虫，但被一种“中华虫草菌”寄生在身上，通俗一点说，就是这种菌钻入虫子身体，形成二、三公分长的一条虫、菌结合体，虽说是虫，却在地上如草一般生长出来，虽说为草，看起来却是一条虫子。其核心分布地带处于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源头的高寒草甸，是藏区的主要经济物产之一。

嘎玛见柜台里有个50来岁的人，走过去说：“我要借钱。”

那老者对他上下打量一番：“你是哪家的？”

“如凯家。”

老人露出微笑，他是这里的主任阿旺才仁（他十多年后出家当了和尚）。他说：“原来是如凯家的，我认识你爷爷，他可是个好人啊。你想借多少？”

“三千。”

“多少？”阿旺才仁吓了一跳，恐怕抢银行的冲进来，也不会让他如此震惊。

“三千。”嘎玛说。

阿旺才仁摇摇头：“没人能借那么多的，你们全村一共才能借两千，你看那些人，”他一指那些拴牛牵马的乡民，“他们最多借两百。”

嘎玛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买粮食，我要做生意，做生意能赚钱，赚了钱我就还你。”

阿旺才仁说：“要你们家大人来吧，你小孩子简直瞎胡闹。”

如果妈妈知道他来贷款，一切都砸了，嘎玛不停对阿旺才仁说：“求求你，求求你！”

如凯家的好名声起了作用，阿旺才仁说：“借给你一千块吧。”

“多借点，多借点，”嘎玛说，“我听说到拉萨做生意要三千块本钱。”

阿旺才仁不理他，嘎玛一直站在柜台边恳求着，两个小时后，他仍直直站在那里，阿旺才仁无奈地说：“我再给你加二百块，这是我最大权力了。你小孩子不懂，这钱是要还的，你要发誓的呀。”

嘎玛只好答应。阿旺才仁拿出一本经书放柜台上，说：“你发誓。”

嘎玛把手放到经书上说：“我发誓，明年一定还钱。”

那本经书只是一张封面，里面不是经书。银行怕农民不还贷款，就用这办法吓唬他们。藏族人最怕发誓，一旦发誓，必守誓约，对发誓当儿戏的藏人很少见。

嘎玛将1200张崭新的一元纸币揣进怀里，跨上心爱的马儿，高高兴兴回家，心里盘算着发财后要买什么礼物给奶奶和妈妈，然后，他对马儿说：“‘弟弟’呀，我要给你买个好鞍子。”

这马驹是嘎玛最好的朋友。亲戚请他刻玛尼石时，送给如凯家一匹母马，母马才四岁，按理说还不到生育的时候，但它已怀孕了，大家都不知道。母马肚子慢慢大起来，嘎玛特别兴奋，把最好的草给母马吃。一般来说马在春天产仔，可这匹马偏偏要在秋天分娩。这样有风险，因为冬天太冷，又缺青草。但不该怀胎的时候怀了，按藏族人的说法，这样的牲畜叫“用”，很吉祥，会让全家健康，财气很旺，主人家不会卖出去。

秋天的时候，家里放马上山，天晚了不见马回来，嘎玛在山洞里刻玛尼石，妈妈和小儿子晋美朗加去山上找，怕马被狼吃掉。到了一条沟里，发现小母马站在阳坡上，她在那里分娩了。因为山坡太陡，刚出生的小马驹一动就摔下去，再站起来又摔下去，一直摔到了庄稼地里。年轻的马妈妈不知所措，原地站着。

嘎玛得到消息，高高兴兴地赶回家。母马太年轻了，不会照顾女儿，嘎玛将马驹带到母马跟前，帮着挤奶喂马驹，马驹慢慢学会吃奶了。藏族男人不挤奶，那是女人的活计，如果让男人挤奶，那是男人的耻辱，比穿露屁股的裤子还要丢人。而在牧区，比如扎多的家乡，男人们甚至只拴公牛，不拴母牛。

嘎玛细心照顾马驹，亲热地给它起名为“弟弟”，冬天没有青草，嘎玛就喂它青稞和羊奶，“弟弟”也知道谁疼爱他，与嘎玛很亲密。它跟着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吃草，嘎玛只要喊一声“弟——弟——”，马驹连妈妈也不要了，急急地跑过来。

1984年夏天，也就是嘎玛去信用社的几个个月前，他为乡政府挖虫草，在山上呆了一个月，日日想念小马。等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去山上找小马，找到很远的山谷里，远远看见小马在吃草。嘎玛想：“一个月没见面，小马还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弟——弟——”嘎玛喊。他看见小马驹抬起头，跑上跑下，好像在找他，但遍寻不着，焦躁起来，急得萧萧鸣叫。嘎玛提高声音“弟—弟—”，小马终于看到他，奔跑过来。嘎玛担心山坡陡峭，摔伤马驹，撒开腿跑过去，一人一马迎上，嘎玛哇哇叫着，搂着小马的脖子，小马亲热地用嘴巴拱着嘎玛，两个朋友搂抱着在地上打起滚来。

嘎玛怀揣钞票骑着小马回家，妈妈吃了一惊，骂儿子：“我们一旦还不起怎么办？那是国家的钱啊！”

贷款一年的利息是100块，如果生意做不好，拿什么来还？妈妈可不像嘎玛那样有莫名其妙的信心，虔诚的信仰、正直守信是她唯一剩下的财富，她不想坏了如凯家族的名声。

他们想了一个主意，请朋友家代为经营这笔钱。那家人与如凯家关系亲密，他们在昌都和德格做虫草生意，嘎玛妈妈把钱交给他们，一年后，他们把钱带了回来，赢利500元，嘎玛如期把贷款还上。他那时还不知道，他和弟弟晋美朗加将共同娶那家的女儿为妻。

如凯家交上乡政府的虫草后，还余下三斤，如果卖给来收购的人，一斤280多元，但听说在成都能卖700块。成都远在天边，但昌都还是可以闯一闯的！16岁的嘎玛跃跃欲试，他已压制不住做生意的热情。

村里人听说嘎玛要去昌都，纷纷把虫草交给他，请他代卖，最后装满了一麻袋，他未来的岳父家又交给他两麻袋。

在今天，如果开越野车从东巴村去昌都，需要行驶八小时以上，而且有几个前提：不能下雪，不能下雨，不能有修路工程，不能有泥石流——实际上这几个条件很难凑在一起。如果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出现，行程就会变成一天、两天甚至十天。而在二十多年前，当嘎玛想去昌都的时候，走多少天才到，只有佛祖知道。

艰难地跋涉了七天，嘎玛终于搭上一辆过路卡车，翻过海拔4700米的大马拉山垭口，要过澜沧江时，桥上有个检查站，一旦发现虫草就没收。虽然中央一再鼓励藏区农民进行商业活动，发家致富，但基层政府并没落实，到处设置卡子，轻者乱收苛捐杂税，重者没收，几乎等于抢劫。甚至迟至2001年，扎多所在的青海玉树州的卡子才裁撤。

司机停车问嘎玛：“虫草会没收的，你卸下来背着爬过山，有小桥可以过江。”

“我不下车，”嘎玛说，“我算过命，没事。”他离家的时候，曾到扎拉寺找喇嘛算命，喇嘛告诉他，算得是不错，但不要完全相信，不要冒险。

司机骂道：“要没收了，你们家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

嘎玛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他相信喇嘛。再说，三大麻袋的虫草，他想背也背不动。

司机只好让他藏在篷布里面，嘎玛听到外面声音嘈杂，想看看昌都什么样子，悄悄掀开篷布，发现桥对面有处山坡塌方了，有辆推土机轰轰叫着，许多警察手忙脚乱地收拾。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嘎玛脑袋从篷布里钻出来，“嘿，你找死啊！”他低低骂道。嘎玛赶紧钻进去。

他们很走运，人们忙着修路，没有检查。嘎玛进城找到藏医院院长扎西才仁，那是跟自己家里有过往的。扎西才仁让他住家里，他来找买主，“你是小孩子，不要管了。”

但嘎玛做生意的冲动就像小时候手里的鼠兔，挠着他痒痒的。他第二天悄悄去了虫草市场，学着大人的样子，与买主在袖子里握着手指谈生意。家乡才280一斤，这里500多元，而且在不断上涨！他很兴奋。八天以后，扎西才仁还没找到一个买主，嘎玛等不及了，趁他不在家，背着一个麻袋去了地拖冈，那是昌都的主要市场，就像拉萨的八廓街。

嘎玛悄悄问一个人：“要不要虫草？”

那人说：“要啊。”嘎玛打开藏袍前襟让他看样品，讨价还价后，以610元一斤成交，嘎玛正要交货，斜刺里杀出一人来，却是院长扎西才仁，他头上冒着汗，拉起嘎玛就走。原来他回家不见嘎玛，一麻袋虫草也不见了，心下大骇，生怕嘎玛被人骗了，急忙跑来找他。他把嘎玛带回家里，将虫草锁起来，说：“你要出一点事，我怎么向你妈妈交待？”

第15天，院长找到一个买主，以680一斤成交，嘎玛的三斤虫草卖了2000元，其他乡人有七八百的，也有四五百的，嘎玛认真算出每家应得多少钱，收起来，然后盯着自家那些钱，“我要做生意了！”他想。他没有立即为家里人和小马买礼物，他还小，不敢做主乱花钱。

他首先想到苹果，贡觉没有苹果，女活佛阿达拉姆曾送他和仁青一个，让他回味了许多年，“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他想。他买了400斤苹果，还有电池和蹄铁，装满了四条麻袋。

他搭车回到家，立即成了富人！十里八乡的人们喜欢他带回来的苹果、电池和蹄铁，一块钱的本钱，他能赚好几块。二十多年来，如凯家从没有过那么多钱。

嘎玛有钱了！他花十二块买了一条红色秋裤，穿在里面暖暖和和，而且不露屁股！奶奶高兴地说：“哎呀，红红的太漂亮了！穿在里面多可惜，穿在外面吧。”

于是嘎玛将这条内衣穿在外面，就像踩着一团红通通的火，在村里招摇过市。

他时不时回到娘拉寺边的山洞刻玛尼石，1987年4月的一天，天气有些暖了，他在山洞外面的露台上，顶着满头的星星入睡。夜里约两三点钟，一阵急促的叫声把他惊醒：“嘎玛桑珠，嘎玛桑珠！”

他睁开眼，娘拉寺的两个喇嘛站在面前。

“仁青桑珠病了，嘎旺法王要你去一趟。”喇嘛说。

嘎玛激灵一下：“肯定是大病！”他跳起来，冲到娘拉寺。

阿达拉姆老房子隔壁是一间护法神殿，那里亮着灯，传出仁青痛苦的叫喊声。嘎玛跑过去停在门口往里看。这是僧人念护法神的地方，俗人严禁入内。

只见仁青因剧烈的腹痛大喊大叫，几个喇嘛手忙脚乱抓着他，极力想让他安静下来。二十多个喇嘛坐在地下，在酥油灯阴暗的光下，嗡嗡地念着经。

嘎玛扶着门框，心里难过，紧紧盯着哥哥。

仁青的病好像越来越严重，不停说着胡话：“彩虹！长的，短的，红的，绿的……”嘎旺法王为仁青摸了摸脉搏，神情严肃地对喇嘛们摇着头，悄悄说：“仁青的灵魂正在离开他。”看来仁青不行了，几个喇嘛哭出声来。

嘎玛不住抬头看天，如果天亮一点的话，赶紧回家叫妈妈。

嘎旺法王与几个上年纪的喇嘛在门边围成一圈，嘎旺说：“香曲多杰留了一些药在宝瓶中，这些药也许能治仁青，但香曲多杰圆寂前有交待，不能轻易打开，

这药应留给未来的人。这怎么办呢？”

嘎玛知道，这就像莲花生大师的伏藏，要过几百年才由后人打开。

大家沉吟一会儿，“仁青马上要走，我们不能等了。”嘎旺法王说。

“救人要紧，打开吧！”喇嘛们说。

嘎旺拿出一个铜宝瓶，把香曲多杰的封口打开，倒出一粒手指肚大小的黑色圆药丸。“茶！茶！”喇嘛们连声叫。

尼姑香秋王毛从隔壁厨房急急端出茶来。她三十来岁，是香曲多杰的孙女，嘎旺法王的表妹，虽然还没正式出家，但这几年住在娘拉寺，剃了头，穿着袈裟，也算是尼姑。她一直未睡，烧茶做饭，侍候着喇嘛们。

一个喇嘛走到门口，从她手里接过碗，嘎旺法王将药丸放仁青嘴里，用茶冲下去。过了一会儿，仁青沉沉睡去。

嘎玛法王与喇嘛们坐在地下，继续为仁青祈祷，嗡嗡的念经声响在黑夜里。

天蒙蒙亮，嘎旺法王又摸摸仁青的脉搏，脸上露出喜色，对喇嘛们说：“好了！”

喇嘛们交头接耳，一片欢喜。香秋王毛也挤到门前朝里看，“好了好了！”高兴地对嘎玛说。

嘎玛想回家叫妈妈，嘎旺法王叮嘱他：“一定对妈妈说，仁青没事了，要不会吓坏她。”

嘎玛急走八公里山路回家，妈妈一听仁青病了，立即哭起来，母子二人赶到娘拉寺，见仁青已被抬到厨房里，香秋王毛正扶着他，帮他喝水吃药。因为护法神殿俗人不得入内，为了便于家人照顾仁青，便将他移到厨房。这里有几个房间，村民为寺院干活时住，外来的僧人也住。香秋王毛住其中一个房间，嘎玛看到，她的房间没有门，只用一个白布帘子挡着。

仁青很清醒，身体也不痛了，只是没有力气。妈妈放了心，感谢香秋王毛，香秋王毛不好意思地笑笑。

其后仁青便由香秋王毛照顾，妈妈回去照料家，嘎玛继续回山洞刻玛尼石，时不时来看看哥哥。仁青一天天好起来了。

十里八乡的年轻人来附近砍木头，有时住在嘎玛旁边的山洞里，最近来了几个桑珠乡的小伙子，其中坏小子达加有一天突然说：“娘拉寺的尼姑香秋王毛真漂亮，我要去亲她！”

“你神经病，竟然打尼姑的主意。”小伙子们笑他。

一天半夜，达加果然去了，一会儿跑回来，兴冲冲地叫：“我亲了她，我亲了她！”

嘎玛和小伙子们将信将疑，却不知娘拉寺厨房里闹翻了天。香秋王毛睡梦中被人亲了一下脸，突然惊醒，见一个黑影跑出去，她跑到仁青和村民索南求培的房间门口，大喊大叫：“你们是谁？你们太坏了！”她愤怒地吵个不停。

仁青莫名其妙挨了一通骂，心中奇怪，不理她，翻个身又睡了。过几天他见到嘎玛，说：“香秋王毛有毛病，半夜三更冲我发脾气。”

嘎玛肚子里偷笑，但觉此事不雅，没告诉仁青实情。

几个月后，夏天到了，妈妈让嘎玛去给仁青送牛肉。他来到厨房，发现仁青搬到另一个大房间里，他走进去，赫然发现，香秋王毛也住这里，两张床各在墙边。

藏族男女共住一个房间并不奇怪，特别是在朝圣和经商的旅途中，大家都习惯了，不起邪念，但喇嘛与女人绝不会共处一室。嘎玛心中惊疑，但哥哥是喇嘛，

他一直敬重，香秋王毛是尼姑，他也敬重。

“这样有点不太好……”他心想。但他只藏在心里，对谁也不说。他有点怀疑，却不敢怀疑。

嘎玛很快忘了这事。这时充满他心灵的，是拉萨，拉萨，拉萨。

十一 我要去拉萨

两个月后，1987年夏末的一天，嘎玛与奶奶在楼顶晒青稞，嘎玛站在木架上，奶奶在下面给他递着青稞。他出神地望着楼左首的远处，十几栋房子层第座落在山坡上，房子外是连绵的青山，热曲就从那山间流来，顺热曲逆流而上，就是去拉萨的路。嘎玛说：“阿奶，我应该去拉萨了，人家比我小的都去了！”

奶奶说：“嘎央，你还小嘛，过两年再去。”

奶奶已用这话拦了他好几年，嘎玛气冲冲地说：“我们家这辈子好像没缘分去拉萨了，让我去试一下，”他一指热曲的拐弯处，“走上二里路，要是走不到拉萨我就回来，我们念念经，下辈子再去吧。”

奶奶生了气，一下把青稞扔地上，说：“怎么这么说呢，嘎央！你想那样去的话，可以，你去去去，我们不拦你！”

嘎玛知道自己话说得不妥，红了脸。

去拉萨是每个藏族孩子的梦想，大人喜欢抓着孩子的两耳，将他们提起来问：“看见拉萨没有？”如果孩子不喊痛，大人就说：“嗯，这个孩子长大了能到拉萨嘛。”

嘎玛小时候爱听奶奶讲故事。“我去拉萨的时候……”奶奶总是这样开头。她背着粮食走了四十七天，每一天的事记得仔仔细细。随着奶奶一遍遍的讲述，嘎玛好像将去拉萨的每寸道路看得清清楚楚。终于，他要行动了，他要去拉萨，拜佛，赚大钱！

每次有人从拉萨回来，全村人都去热曲桥头迎接，所有人与他碰碰头，因为他的头是拜过佛祖的。小孩子们唧唧喳喳围着，等着品尝拉萨的糖果。

大表哥多登三年前已去拉萨，他给嘎玛写信，请他去拉萨朝拜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

嘎玛一直梦想成为伟大的人，但怎样才能变成伟大的人呢？只有两条路：第一是当喇嘛，可这条路让仁青捷足先登了；第二是去拉萨，给孩子们带回好东西。嘎玛想，我要是去了拉萨，给村里人带什么回来呢？——他要一人送一个苹果！想想那情景：他大摇大摆从拉萨回来，所有大人和他行碰头礼，他从麻袋里拿出苹果，孩子们唧唧喳喳围着他，一人得一个红红的苹果，欢天喜地，多么美妙！多么伟大！

政策宽松后，很多人跑去拉萨朝圣¹¹。几年后，许多外来朝佛者留在拉萨经商，个体经商者数量大增。朝佛者中还有大量的青少年，他们离家出走，成群结队跑往拉萨。这在藏区很普遍，不仅西藏自治区，在四川、青海省的藏区，每年村里都有十几岁的男孩子突然失踪，大人虽然着急，却也见惯不惊。

嘎玛也策划过逃跑，13岁时，他与一个小伙伴商量潜逃计划，第一步要偷粮食，因为路上要走好久，必须自己带粮食，但这是最危险的一步，大人一旦发现少了粮食，就意识到将有逃跑事件，妈妈的教训给了嘎玛这一知识。妈妈年轻时与女伴往拉萨逃了三次，前两次都被快马追回，第三次她们避开大路，翻山越岭，

¹¹ 1981年3月，西藏向中共中央打报告说，最近拉萨朝佛人员由几千人猛增到一万余人，除西藏自治区内有数千人外，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省去拉萨朝佛人员骤增，因此西藏请求说，“这么多人拥来，增加了各方面的压力，建议中央将此情况转告有关省、区，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控制。”——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1949-2004》，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第349页。

但嘎玛外公追着脚印又将女儿捉拿归案。妈妈长大后，在大人的安排下才光明正大去了一次拉萨。

嘎玛很有节制地每天只偷两块曲拉，天长日久，慢慢凑足了一口袋，又用同样方法偷了一袋炒面，藏到牦牛圈里。

大功将要告成，出逃的前几天，嘎玛钻入牛圈检查装备，打开口袋，一股臭味熏得他鼻子都歪了，一看，曲拉和炒面成了绿色。原来地上潮湿，粮食霉烂了。

他的小伙伴说：“没关系，我们还是跑吧。”

“那不行啊，”老成持重的嘎玛说，“我们会饿死的。”

第二年那伙伴和另一个孩子跑掉，他们偷了一只羊腿揣在怀里，若无其事地走出村庄，一离开大人的视线就拼命奔逃，结果把羊腿弄丢，没有吃的，西去拉萨是不成了，他们转头向东，过金沙江去了德格，绕德格印经院转了1110圈，然后一路讨饭回家。

但嘎玛不想逃跑了，爷爷和父亲去世了，家里只有奶奶和妈妈，自己跑掉会让她们担心，所以必须先征得同意。从昌都回来后的两年多里，嘎玛不断央求：“我去拉萨吧，我去拉萨吧，我去拉萨吧。”奶奶总是说：“嘎央，你现在还小嘛，以后再去。”“嘎央”是奶奶对嘎玛的昵称，“央”是“宝贝”之意。

但随着嘎玛个头的拔高，他的语气越来越坚决，脾气也越来越大，终于在楼顶上发了火。奶奶虽然生气，却从此改了主意，让嘎玛去找舅舅喇嘛算命，嘎玛高高兴兴到娘拉寺，舅舅喇嘛算了一下，说算得很好，但他又说——不知是他的神灵说的，还是他自己说的——“好像去得有点早嘛。”

奶奶说：“喇嘛说得对，你现在去的太早了。”但19岁的嘎玛像奔跳起来的小马驹，不易阻挡了，奶奶只好为孙子张罗起来。一般去拉萨的人要带足三个月的粮食，也就是二、三百斤炒面，另外要带许多酥油，在大昭寺的佛前点酥油灯。

听说嘎玛要去拉萨，很多乡人来了，有的送酥油，有的送钱，三元，五元，一位喇嘛给他送来10块钱，让嘎玛一生难忘。帮着凑盘缠是藏人的传统，当年舅舅去拉萨的时候，嘎玛将自己砍树赚的钱拿出来，那65元，他拿40元给妈妈治病，另外25元送给舅舅。

舅舅说：“啊呀，你大冬天在山上砍了几个月的树，才挣这些辛苦钱，还是自己买衣服穿吧。”

嘎玛一定要舅舅带上，舅舅收下了，嘎玛很高兴。

舅舅家与嘎玛家感情很好，仁青、嘎玛和几个表哥表弟就像亲兄弟一样。奶奶对亲戚很好，所以如凯家有最亲密的亲属关系。

但并非所有村人都与亲戚相处融洽，一户邻居就与亲家不和。贡觉风俗，女儿出嫁要陪送许多财物，这家人向女方要九头牛、九匹马和九颗天珠，因女方一时拿不出来，最后商定婚后补齐。结婚后，牛和天珠慢慢凑齐，但新娘子生下孩子好多年了，马还欠着呢。这一天，儿媳的娘家哥哥骑马经过，把马拴在门口进去看望妹妹，喝完一碗酥油茶出门，却见妹妹60多岁的婆婆正颤微微跨上他的马，娘家哥吃了一惊：“啊，你干什么？”

老太太在马上说：“你们家不是还欠着马吗？！”言毕打马扬鞭，绝尘而去。

嘎玛这回可要去拉萨了，没什么能拖住他的脚步，包括他的婚姻。

在过去的两年中，嘎玛已有一个妻子，或者说，他与弟弟共同拥有一个妻子。在嘎玛18岁、弟弟晋美朗加15岁时，兄弟俩娶了一个15岁的新娘茨成拉姆，如果仁青没有当和尚，或许也是丈夫之一。

一妻多夫是西藏的重要婚姻形式，而且是被尊重的美好传统之一。¹²这一传统如今仍部分保持着。¹³

很多人认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是人们选择一妻多夫制的主因，在青藏高原，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对家庭的生存是必需的，比如几头牛羊和几匹马，多少土地和牧场。如果让儿子各立门户，分割财产，意味着大家庭和新家庭都陷入贫困。

14

但实际上，最贫穷的人家并不一定兄弟共妻，富有家庭却经常兄弟共妻，因此有人认为，一妻多夫制的初衷主要不是为获得糌粑和酥油，而是为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尊重。因为一个兄弟一旦离开大家庭，就会因财富的减少而失去原来在大家庭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而且，藏族人相信同胞兄弟的团结具有无上的价值，这就助长了一妻多夫制的实行。¹⁵

妻子在一妻多夫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大户人家选妻子非常小心。¹⁶茨成拉姆家是牧区的大家族，与如凯家关系亲密。关于孩子们的婚姻，两家人在嘎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商谈，只是孩子们蒙在鼓里。这里的婚姻大多由父母包办，一般由孩子的舅舅做主，嘎玛的舅舅与茨成拉姆家谈条件，他们家应陪嫁多少牦牛和天珠。男孩子入赘很普遍，不像汉区农村一样受歧视，但男的入赘只陪嫁一匹马就行了，女的嫁到男家，陪嫁就很可观，所以嫁女儿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舅舅要求对方陪送十颗天珠，但茨成拉姆有好几个姐妹，父母还要留点天珠给其他女儿作陪嫁，所以只能给七个。舅舅认为如凯家族最少值十颗，双方谈不妥，拖了一年。嘎玛的妈妈不想太强硬，因为如凯家受难时，对方经常帮助他们。

结婚了，新娘的舅舅和哥哥带着马队浩浩荡荡而来，舅舅带领如凯家的马队在山边接着，两个新郎等在家里。两支马队会合，相互对歌吹牛，嘎玛舅舅唱：“我们如凯家的门槛高过山，只有仙女才能登门。”

茨成拉姆的舅舅唱：“我们女儿喝野牦牛奶，你家可有？她洗脸用雪山狮子奶，你家可有？”

外面热热闹闹，欢天喜地，但好像与嘎玛无关。舅舅喇嘛和嘎旺法王在佛堂里念经，嘎玛一直随侍在侧。

他一直说自己小时候很笨，的确，单从他对自己婚姻的迟钝反应来看，他说得没错——他18岁了，还不知道当丈夫是什么意思，既然大人决定他要结婚，那就结婚吧，生活不会有什么不同。

按当地风俗，姑娘嫁进门要改名，一个喇嘛给茨成拉姆起新名为巴丁央宗，人们习惯喊她“巴央”。按习俗，巴央婚后几天与娘家人一起歇宿，婚后第三天回娘家，按道理过15天后再回婆家。但她只有15岁，便留在娘家继续放羊。后来偶尔到婆家来，也没有与丈夫们同房，所有的工作是与晋美朗加和小妹妹玩。父亲很快把她接回去，过了一年，等再次听到消息的时候，她已经搭便车去了拉萨

¹² 1995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发布妇女境况白皮书说，据50年代初的调查，旧西藏一妻多夫家庭占24%，一夫多妻家庭约占5%。也就是说，每4户就有一户是一妻多夫。

¹³ 据昌都地区法院1994年的一份调查材料，在芒康县9824户中，每5户就有1户是一妻多夫。从一些资料大致可以看出，昌都地区总体而言，一夫一妻是主要婚姻形式，一妻多夫次之。《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第339页

¹⁴ 《关于藏族多偶制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认识》，根旺，《藏学研究论丛·第七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¹⁵ 《巴哈里与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度新探》，戈尔斯坦，《西藏研究》2003年第二期

¹⁶ 如果妻子能搞好兄弟间的团结，一家人和睦相处，就会受到称赞，如果兄弟不和，就会认为妻子偏心，受到人们指责。昌都丁青县丁青村的阿巴与卢呷两兄弟结婚，她比较喜欢弟弟，但在日常生活中，对两兄弟平等相待，在性生活上对哥哥也尽量满足，不偏心。因此两兄弟对她也很关心，家里团结和睦。——《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第340页

朝圣，嘎玛要去拉萨时，这个少女新娘还留在遥远的娘家，并不知道将失去一个丈夫。

现在嘎玛要去拉萨了，他与每个人依依惜别，就是没想到还有个妻子巴央。

在热曲桥头，奶奶牵着嘎玛的手一遍遍叮咛：“做生意不要太辛苦，不要老想赚很多钱，自己满意就行。我们以前那么多财产，现在哪里去了？嘎央，财富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佛祖。”

十二 带亡灵回家

嘎玛骑马到桑珠乡公路拦下一辆卡车，把炒面和酥油搬到车上，与弟弟和小马驹道别。小马驹恋恋不舍地用嘴巴蹭着嘎玛的衣服。

嘎玛到了昌都找藏医院院长，忽然发现有些不寻常的事发生了：据说西藏有些地方发生了骚乱，上头要求昌都的干部家庭不许接待外人。院长将嘎玛带到医院的门诊大厅，让他在长椅上胡乱睡了一夜，第二天安排他住到一个乡民家里。那时正好过藏历新年，嘎玛兴致勃勃地看跳锅庄唱歌，几天后，他又转到了市场。

嘎玛见几个回族人卖山羊皮，他不知羊皮好坏，硬着头皮买了13张，背到地拖冈，原来那些羊皮质量不错，他很快脱手，一张挣了四块，一共五十二元。唉呀，太好了！他笑得闭不上嘴。

嘎玛离家时带了家里最好的靴子和仁青的被子，嘎玛不舍得穿那靴子，花三块钱买了一双布鞋，八块钱买了一床六斤棉的被子，然后又花五十元巨款为小马驹“弟弟”买了个漂亮的马鞍。家里的马鞍又大又重，嘎玛心疼小马驹，一直想给它换一身新装备，现在终于圆了心愿。他又给奶奶买了件软软的红衣服，看起来质量不错，然后请人把衣服、马鞍、被子和藏靴捎回家。

嘎玛又花75块，坐进一辆解放卡车的车厢里，走，去拉萨！冷风呼啸，冬天的露天车厢里滴水成冰，但嘎玛感不到冷，他全身热血沸腾，啊，去拉萨啊！

四十个人挤在车厢里，倒可以相互取暖，不过实在太挤，有时甚至要坐别人头上。路上遇到三个女孩儿要求搭车，大家都同意，都是去拉萨嘛，藏族人相信，只有前世有缘的人才能一起去拉萨朝圣。

有位女人一直唱着“喻嘛呢呗咪吽”，声音高亢处像飞越高高的雪山，低回处又像穿过幽深的怒江峡谷。四十多人和着她唱，歌声一路唱向拉萨。夜里到了白马山，忽听“叭”一声巨响，轮胎爆了。司机修车，不知要修到什么时候。天实在太冷，人们只好往前步行，也好增加点热量。走累了，便在路边扯些干树叶烧起来烤烤火。夜里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下面远远的水声，那是200米深的怒江。

第二天早上，大雪铺天盖地而来，昨天晚上没吃饭，早上大雪之中点不着火，也没饭吃，人们饿得前心贴后背，也没力气唱歌了。

经过波密县时，路边有塌方，一块大石拦在路中，司机和三个男人下车搬石头，还没挪动，有人惊叫：“上面掉石头！”就听见头顶“哗啦啦”地响，抬头一看，大大小小的石头直往头顶砸来，嘎玛吓得闭上眼睛，不住念佛，耳旁听到尖叫声，也有人“妈呀，妈呀！”地乱叫。一块比人还大的石头带着“呼呼”的风声落下来，贴着卡车“轰”一声砸路面上，有些小石子掉到车上，好在没伤人。

大家急忙跳车逃离，同行的三个喇嘛说，是他们念经才让汽车躲过了石头。这三个年轻喇嘛是嘎玛的同乡人，其中两个是偷跑出来的。

这段悬崖是川藏南线的鬼门关之一，许多人丧命于此。2006年5月，我与扎多经过此地去拉萨，路况比二十年前好了很多，但悬崖下狭窄的公路上仍然发生了事故，堵了我们五个小时。

嘎玛一行人艰难地走向拉萨，汽车动不动爆胎，一共爆了27次，把嘎玛锻炼成熟练的轮胎修补工。到拉萨东边的甘丹寺附近，两个轮胎同时爆掉。这回轮胎破得像嘎玛小时候的裤子，再也没法补了，四十多人只好下车，司机开着剩下的四个轮子去拉萨修车。他走了两天没回来，让嘎玛一伙人在山路上熬了两夜，原

来司机刚到拉萨就被交警抓住，六轮的卡车只剩下四轮，交警不抓他才怪。

实在等不到那车，嘎玛与一个喇嘛拦下一辆“东风”卡车，直奔拉萨。

嘎玛站在车厢里直着脖子眺望，什么时候见到拉萨啊？什么时候见到布达拉啊？忽然，远远看见了红白两色的高高楼宇，嘎玛的眼泪一下涌出，一边念经，一边使劲睁大模糊的泪眼，望着那神圣的布达拉宫。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将政治中心从山南转移到拉萨，当时这里还是一个牧场。他在这里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并为迎娶的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大唐文成公主修筑了大昭寺、小昭寺和最初的布达拉宫。传说松赞干布驱使山羊背土填塘，修建大昭寺，人们便以“惹（山羊）萨（沙土）”作为这一城市的名称。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前来朝佛的人日益增加，围绕大昭寺逐步建立旅馆、商店、民宅、官府，形成了一条环形的八廓街。藏族人把这个城市视为圣城，于是“拉萨”——意为“圣地”，成了它的新名字。

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受清朝皇帝册封，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以拉萨为政权中心。他重修布达拉宫，主体建筑共十三层，高117.19米。自此布达拉宫既是历代达赖喇嘛生活起居场所，也是西藏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

嘎玛没有表哥多登的地址，一路小跑着去找大昭寺，到了大昭寺门口，“释迦牟尼佛就在里面啊！”他忽然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对着门口磕长头，磕了不知多少个，爬起来再绕大昭寺转。转完三圈，忽见一个老乡过来，嘎玛心里乐开了花，看来只要找到佛祖，一切迎刃而解。他悄悄走到老乡身后，两手蒙住他的眼睛，老乡猛转身：“呀！嘎玛！”

他把嘎玛领到八廓街南边一个院子，进屋对多登说：“老家来人了，你猜是谁？”

多登脱口而出：“嘎央？”嘎玛冲进去，兄弟相见，极为欢喜。

在大昭寺碰到亲戚并不稀奇，藏人到拉萨投亲访友者极多，而先前来拉萨的亲戚，有固定住址的不多，所以很多人围着大昭寺转经，说不定哪一天碰到亲戚老乡。

第二天，表哥陪嘎玛先去拜了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像，将带来的酥油点在佛前，然后嘎玛住到拉萨一位亲戚奶奶家。嘎玛想好好看看布达拉和大昭寺，看看那著名的新年大法会，但没想到，在藏历正月十五那天，拉萨发生骚乱。

一年一度的拉萨祈祷大法会在中断20年后，1986年正式恢复，嘎玛赶上的是第三年。拉萨祈祷大法会由600年前的宗喀巴大师创建，宗喀巴针对当时藏传佛教时弊，倡导僧尼少欲知足，严守禁戒，并建立了新的系统——格鲁派（黄教）。后来的达赖和班禅两系活佛，都出自他的门下。

宗喀巴认为，拉萨的释迦牟尼佛像与真佛无异，如能供养则大利益于众生，于是发愿创建拉萨祈祷大法会，于1409年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举行了法会。

藏历正月十五这天，嘎玛走到大昭寺广场，那里摩肩接踵，人声如潮。人们用五彩调制的酥油塑造成各种佛像、菩萨、宗喀巴三师徒和松赞干布等，造型优美，栩栩如生。

大法会期间，僧人们要进行“格西”学位考试。“格西”意为“善知识”，是黄教显宗的最高学位之一，要获得“格西”学位，必须学完因明、释量、中观、戒律、俱舍五大论，对任何考问对答如流。学经僧人一旦考取“格西”学位，就成为宗教界高级人士，可以继续深造密宗。经过辩经，考取“格西”是拉萨祈祷大法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嘎玛抱着亲戚家的孩子，站在大昭寺广场兴致勃勃地看和尚们辩经，他们一

边辩论，一边将手掌拍得“啪啪”响，以壮声威。忽然看见有人奔跑，听见有人大声喊“西藏独立！”嘎玛问旁边一个人：“‘独立’是什么意思？”那人也不明白，说：“有人打架吧。”

嘎玛到拉萨后还有500多块钱，放到自己缝的布钱包里。他将钱包拴到铜制佛盒的肩带上，过了一会儿低头一瞧，钱包露在藏袍外面，他放回去，过了一会儿再看，钱包又露出来。街上太乱，他回家仔细一看，藏袍腋下被割开，钱包被刀子划破了三道口子，小偷如果再沉着一点，把绳子割开，钱就可以到手了。

第二天上街，骚乱好像更严重了，有人扔爆炸品和石头，嘎玛看见军人持枪行进在街上，忽然有催泪弹扔过来，嘎玛慌里慌张地跑，几乎找不到家。

从此亲戚奶奶不让嘎玛出门，嘎玛刚到拉萨，正在兴头上，却不让出门看看圣地，实在闷得很。

拉萨太乱，那就去拜拜日喀则和山南的寺庙吧。嘎玛向派出所申请，批准后出了城，远离了纷攘的拉萨，和一位叫扎那的老人父女一起去朝拜萨迦寺。在日喀则的晚上，朝圣的人们与牦牛睡在一起，驴子时不时“哦哦”大叫，嘎玛睡得很香，忽听有人急促大叫：“嘎玛桑珠，嘎玛桑珠，扎那格布倒下了！”“格布”是“老人”之意。

嘎玛奔过去，只见扎那昏倒在地，头扎在一个地窖里。原来他在院子里走，忽然头晕，一头扎进放圆根的地窖，好在地窖只有80公分深。大家手忙脚乱把他拉上来，嘎玛叫着“扎那，扎那！”用拇指狠狠按着他的人中。扎那身体僵硬，像死人一样，嘎玛又用力扳他的后颈。藏人认为，人的灵魂这时马上要走了，必须用力抓住他。

嘎玛佛盒里藏着很多宝贝，他把一缕喇嘛的头发和衣服拿出来烧了，又拿出喇嘛加持过的药给他塞嘴里。扎那终于醒过来，说刚才做了个梦，梦见他一边刻玛尼石一边放羊，狼吃掉了他的羊。“这样的梦不吉利啊。”老人说。

“你病了，大家不去萨迦寺吧。”嘎玛说。

“不行！我是一个打猎的罪人，如果能在朝拜萨迦寺的路上死掉，是多么好啊。”扎那说。

在藏人心中，死在朝拜的路上是结束此生、开始新生的最好方式。扎那老人想朝拜萨迦寺，但站不起来了，只得停在日喀则休息，嘎玛与一些老乡去萨迦寺。

萨迦寺坐落于萨迦县奔波山上，是萨迦派的主寺。萨迦寺用象征文殊菩萨的红色、观音菩萨的白色和金刚手菩萨的青色涂抹寺墙，所以萨迦派俗称“花教”。

萨班贡噶坚赞是萨迦派的著名人物，《萨迦格言》的作者。13世纪初期蒙古人占领中原，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进兵西藏前，召见萨班贡噶坚赞，1244年，萨班贡噶坚赞率侄子八思巴去凉州（今甘肃武威），1247年在凉州会见阔端，并写信说服西藏各派高僧和贵族接受了条件，把西藏正式纳入蒙古人版图。忽必烈建立元朝中央政府后，封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命统天下释教”，即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协助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统领西藏十三万户。八思巴遵忽必烈所嘱，在西藏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1268年在萨迦建立地方政权，萨迦派势力达到鼎盛。

萨迦派协助元朝统领西藏时期，西藏结束了400多年的战乱。14世纪后半叶，随着元朝的灭亡，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被噶举派取代。

嘎玛将酥油献上，围萨迦寺转了三圈，往回走时，嘎玛一直想着扎那：他还好吗？公交车停在扎什伦布寺大门口，嘎玛快步回到住地，一进门，发现扎那的女儿在哭泣。老人走了。

嘎玛从扎什伦布寺请了喇嘛念度亡经，在日喀则的贡觉老乡们也来帮忙。念完经，人们先用白布把扎那包起来，外面再用绳子把身体绑起一团，以头抵膝。这种习俗来自古老的苯教，这样亡者的灵魂才能解脱。

有人想将扎那抬到扎什伦布寺天葬台，那里只有三公里远。但嘎玛想把他带回拉萨，他不忍把扎那老人丢在外面，再说，就像汉地的墓地讲究风水一样，藏人认为拉萨色拉寺的天葬台最好，很多去拉萨朝圣的人要去那个天葬台，割破手，将几滴血滴在天葬台上，然后在上面躺一会儿，好像死去一样，那意味着，我以后的尸体已有幸放到这里了。走时，还要把一点头发和指甲留在这里。

但老乡认为不必多事，那么远，怎么把尸体带回拉萨？嘎玛不再多说，他虽然只有20岁，但打定的主意决不摇摆。他买了去拉萨的公共汽车票，诚实地告诉汽车站：“我要带个死了的老乡，我可以多买一张票。”

汽车站的那个男人眼珠子像是跳出来，一句话不说，一把抢回车票，忙不迭把钞票扔还给嘎玛，好像那钱烫手，“快走快走！”他摆着手。

嘎玛在扎什伦布寺附近看见两辆五十铃卡车，车上写着“拉萨汽车四队”，两个汉人司机在吃饭。嘎玛说他们有三个人，还带着一匹牛肉，想搭车。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车票17元，嘎玛说可以付给他们25元，他带的东西付双份的钱，并替司机付了吃饭的账，两个司机很高兴。

一位老乡对嘎玛嘀咕说：“你真笨啊，根本没必要带回去嘛。”但嘎玛下定决心了，第二天一早，他用麻袋和毛毯将尸体包起，放到车厢里。

因为拉萨骚乱，路上卡子很多，嘎玛一直担心被发现。汽车到了江孜县，这里有个著名的江孜寺，嘎玛和扎那的女儿及一个老乡下车去拜，两辆卡车等在路边。拜完后嘎玛从寺院里冲出来，只看到一辆车在那里，尸体所在的那车不见了！

嘎玛的心“砰砰”乱跳：难道被发现了？好在那辆车很快回来了，嘎玛跳上车，吃了一惊：因为包扎得不紧，加上道路颠簸，扎那的两只脚露了出来！嘎玛忙用在昌都买的新被子将他严严包起。

一路过了四个关卡，警察查得仔细，但没人查那个大包。过曲水县大桥时，一个警察拦住问：“车上什么东西？”

司机说：“鞋子，衣服，牛肉。”

警察到车厢边看，嘎玛坐在驾驶室里，虽是冬天，他脸上的汗冷冷地流下来。那警察突然跳上车厢，嘎玛像被刺了一下，猛得打开车门跳下来，但见那警察慢条斯理地打开一个个麻袋，全是衣服。嘎玛的心越揪越紧。

警察盯住那个大包，慢慢走过去，端详来端详去。嘎玛的心冲到嗓子眼，嘴张大了，绝望地看着他。警察忽然一屁股坐到包上，嘎玛的心“忽悠”一下，几乎从嗓子眼蹦出来。警察看来是累了，找了个好所在坐下，用手扒拉身前的麻袋，等把麻袋检查完，他抬起屁股，跳下车，冲嘎玛和司机一挥手：“走吧。”

到了雅鲁藏布江大桥，许多持枪的军人拦住车辆，嘎玛的恐惧达到极点。现在骚乱时期，查出来有个死人，他如何交待？他连个医院证明都没有，不明不白。车停下接受检查，军人查得很细，连驾驶室座位底下都检查了，嘎玛心里害怕极了，就是他自己杀了人，恐怕也没这么恐惧。他一遍遍地念经，祈求莲花生大师、度母和嘎旺法王施展神通，帮自己度过难关。最后，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们还是没有查那个包！

回到拉萨，嘎玛兴奋地多给了司机一份钱。见扎那回来，孜荣部落在拉萨的老乡60多人都觉得宽心——逝者没有被抛弃。他们将扎那天葬在色拉寺。

拉萨仍然很乱，但围大昭寺转经的人一直没断，没人干涉，只是高音喇叭在

不断地喊：“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马上回家，不要出门。”

嘎玛大部分时间呆在亲戚家，两个月后，家乡的几个老人来了拉萨，嘎玛与他们结伴出拉萨去拜桑耶寺，嘎玛比桑耶寺的喇嘛还清楚这寺院的布局，老人们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嘎玛在山洞里刻玛尼石的时候，熟读了香曲多杰一部经书，那部经书讲莲花生大师修建桑耶寺传法的故事。

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寺庙，位于山南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扎玛山麓，于公元762年开始兴建，寺院选址于藏王赤松德赞的出生地，乌仗那国来的密宗大师莲花生大师主持桑耶寺的建设。

寺院于公元779年建成后，赤松德赞邀请印度、汉地、于阗等地僧人住寺讲经弘法，剃度七名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七人是西藏第一批住寺僧人，被后人奉为藏传佛教的先驱者，史称“桑耶七觉士”。

香曲多杰的经书对桑耶寺的布局，甚至每一尊佛像都写得清清楚楚，嘎玛就像对自己的山洞一样熟悉这座寺庙。

想到香曲多杰，嘎玛想家了：想狮子山上温暖的阳光、娘拉寺嗡嗡的念经声、奔流的热曲，想到奶奶和妈妈为第一次出远门的孩子担忧，孤独的小马驹到处寻找小主人……拉萨朝拜完了，该回家了，“我应该从圣地带回什么？”嘎玛问自己，“转经筒，《甘珠儿》！”

释迦牟尼讲法时没有文字记载，弟子们后来收集他的言行，形成了佛教经典《甘珠儿》。嘎玛出生时，爷爷很高兴地整修老房子，在房里设计了一个放大转经筒的地方，他梦想转经筒里装着《甘珠儿》，每日旋转。可因为文革，他直到去世也没盼到。

妈妈和奶奶经常唠叨：“什么时候能满足爷爷的遗愿？”

买《甘珠儿》和转经筒要16000元。嘎玛想赚钱了，他要为爷爷买一个转经筒，让它在家里永远转着，金光闪闪。

第三章 荒原

骏马好像离弦箭

高山大岭想挡住它

左挡右挡挡不住

它从山沟里钻出来

勇敢少年像大鹏

敌人在各方挡住它

左挡右挡挡不住

他从刀枪丛林钻出来

——藏族民歌¹⁷

¹⁷ 王沂暖收集和翻译的玉树民歌，收于《玉树藏族民歌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十三 长江源的年轻人

我七岁时，有天晚上跟哥哥去邻村看电影《农奴》。悲惨的西藏农奴生活吓得我不敢睁眼，我不想看完，央求哥哥带我回家。那是我最不喜欢的电影，其压抑阴沉的画面，给我的藏族印象定下了基调。

一直到1987年，我18岁，在山东寿光一个农村中学念高二。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1987年《人民文学》第一、二期合刊发表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严重丑化和侮辱了藏族同胞的形象，歪曲了藏族人民的生活，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引起藏族同胞的不满和义愤。本期《人民文学》杂志被查禁，主编刘心武被撤职。

我一秒钟也不迟疑，冲入学校图书馆，在书架上翻来翻去，但就是找不到那期《人民文学》，图书管理员斜我一眼说：“甭找了，早收缴了。”

我想：“那上面写了什么？怎么歪曲了藏族人的生活？真实生活又是怎样的？”那个时候，《农奴》所告诉我的，仍是我对西藏的全部认识。

我站在书架前，出神地想着藏族人：他们是否与我有同样的生活？

将近二十年后，我曾仔细地询问书中的藏族朋友，1987年，当一个汉族年轻人在两千公里外揣测你们的生活时，你们在做什么？

1987年，当嘎玛雄赳赳离开家乡去拉萨时，扎多正气昂昂从西宁返回故里。他们结束了这一生主要的教育生涯：一个是宗教，一个是学校。嘎玛用三年光阴在山洞里刻玛尼石，沐浴在佛教的阳光下；而扎多被关进西宁现代科学教育的黑洞里整整四年。现在，扎多也要钻出他的“山洞”，面对新世界，对他来说，青海省邮电学校的四年，才是“黑暗时代”。

扎多的自尊心在那个学校受到全面摧残：这里没有他喜欢的藏文课，却全是让他几乎晕厥的高等数学、信号、线路、交换机之类。扎多为了透口气，周末便往气象学校跑，他像讨厌邮电一样讨厌气象，但他喜欢这里的文扎，文扎是他在治多中学的朋友，他们天天混在一起，遍读文学名著。

在西宁的治多县学生有狂妄的使命感：他们是治多的救星，要解治多人于倒悬。有一年，警察学校的几个治多学生毕业了，要返回家乡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扎多和文扎在西宁办了一个晚会。他们在长途汽车运输公司花10块钱租了个房间，买了些酒肉。一位警校学生画了一幅画贴在墙上，两边分别是一条腾飞的龙，中间醒目地写上拗口的宣言：“未来治多主，濒临腾飞时的欢聚。”

他们飘飘然如在云端，崇敬地看着自己，怎么看怎么像龙，而且“濒临腾飞”。一位治多警察和他押带的治多犯人也来聚会，大家喝酒吃肉，无论贵贱，“未来治多主”轮番上台演讲，讨论巨大的话题：现在的县领导是什么样的蠢才？如果我是县长，要怎样让治多腾飞？最后一位演讲者是那位犯人，他上台发表了长篇宏论：“我如何搞好治多的社会治安。”

很快轮到扎多大展宏图了，他毕业分配到玉树州邮电局。但他不认为结古镇是他的家乡。这个在治多县城以东200公里的地方，是玉树州府所在地，这儿唯一让他亲切的，是可以让他想到母亲，母亲与他永别后，来到这个地方治病，并消失于此。小时候的扎多经常想，母亲是不是仍在结古？现在他在结古，每当看到讨饭的老太太，就想到母亲。

扎多要离开这里，回到老家治多，他需要爱情和家。

牧区的孩子早恋早婚，扎多在治多中学的时候，他旧时的伙伴，那些十五六

岁的男孩子们，早开始在夜里钻女孩子的帐篷了。听说扎多居然没有钻过帐篷，伙伴们笑他“肯定有问题。”但扎多自认“胸怀大志”，喜欢背着手，像领导一样走来走去，思考重大问题。

1985年夏天，扎多从西宁回索加过暑假，正与伙伴们玩着，忽见一女子站在眼前，美丽优雅，不是博雷是谁？那个将羊羔皮扔到他脸上的小姑娘长大了。

博雷有点羞涩，小声地问：“放假了？”

“嗯，嗯。”扎多忽然被这个女子震慑，说不出话来。小学时，他对她颐指气使；中学时，他像对小妹妹一样照顾她。两年以后，一切全变了，她成了光彩照人的姑娘。扎多不敢直视博雷，说话装模作样，语无伦次，心头突突乱跳。

他仓皇回到朋友家，呆呆回想博雷的样子，特别是她的白衬衣领子翻出来，那么俏丽清秀。一想到博雷那迷人的白衬衣领子，扎多就要犯心脏病。

伙伴们不难看出大人物扎多陷入爱情，鼓励他立即“钻帐篷”。朋友的父亲是做木匠的，朋友为扎多翻出一张纸，又找出父亲的木工铅笔交给他：“快给她写信！”

心如潮涌的扎多根本不需要怂恿，他骑在木匠的长板凳上，像做木工活一样，横平竖直写下他第一封情书。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信含蓄却明了：“你愿不愿意发展我们的友谊？”

信托人送去，博雷没有回音，扎多心神不宁。事后证明，博雷的沉默不过是女儿家的羞涩，那个戴丝绸红领巾的索加小学大队长、治多中学趾高气扬的学生会主席，是她最心仪的男生。在扎多连续做了几次“木工活”之后，事情朝他期待的方向发展，两个月后，他就敢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了——1985年9月20日，他从西宁给博雷写信说：“我对你的爱是义无反顾的，如果你对我们的关系的看法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突变，而且有信心永久我们的关系，那么请考虑一下……”在如此多的铺垫之后，他郑重提出要求：“……能否给我寄一张你的照片。”

在结古镇工作两年之后，扎多调回治多县。扎多没有一分钱，博雷带着800块积蓄嫁给了他。博雷父母送给新婚夫妇一床毯子，邮电局分给扎多两间土房子，但直到结婚那天，房子里仍然像草原一样空旷，连张床也没有。第二天他们回索加看博雷的父母，一个月后的一天，他们半夜回到县城的家，一打开门，顿时眼花缭乱，又惊又喜：一位老师送了他们一个木床，有人送他们一个五斗柜，朋友们还为他们挂上了窗帘，房子里花花绿绿，煞是新鲜。扎多终于在母亲去世16年后，有了一个家。

这个小家很快成为治多县的智囊中心，扎多的几个朋友：气象局狂放不羁的文扎、治多中学稳重内向的副校长扎西以及一位年轻的气象局长，时常聚在这里，慷慨陈词，决心要唤醒被世界遗忘的治多。

治多县在青藏高原的最中心，属于康巴藏区。藏区按方言分为三大区域：卫藏、康和安多。卫藏指现今西藏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康区指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和四川、云南、青海的大部分藏区；而青海东北部的小部分藏区、甘肃甘南州和四川北部的阿坝州则为安多。从所处地理位置来看，治多县是卫藏和康区的过渡带，从生产方式来讲，治多处在藏区游牧文化的中心地带，几乎没有过人类科学文明的介入和开发，别说拉萨那样的城市文明，就是嘎玛家乡昌都那样的农业文明也被阻挡在高原之下。

这些在外面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无法容忍家乡的沉闷，他们成立了“唤醒会”，气象局长是会长。他们办油印刊物，名为《黑刺林》。黑刺是河边一种带刺的植物，这些有远大抱负的年轻人要用它来扎醒治多人。《黑刺林》分汉文和藏文两

部分，扎多是汉文主编。他们热热闹闹举办了“唤醒会”成立大会，把一位副县长也请来。他们采取在西宁“未来治多主”大会的方式，争先恐后上台演讲，气象局的嘎才在演讲中批评县领导时，捏着鼻子看一眼副县长说：“无能！”

那位副县长很有涵养，没有发作。

《黑刺林》出版了，唤醒会的小伙子们油印了几十份，快活地送到全县各处，虽然没有人叫出声来，但他们认为已刺痛了长江源头的人们。扎多积极准备第二期的出版，气象局长比他更有政治嗅觉，告诉扎多暂停，以观风向，“事情好像不对，等等吧。”他说。

没几天，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了。过后有人打小报告说，别看这里是穷山沟，却也刮来了资产阶级自由风。一位州委副书记下来调查“唤醒会”，他找来扎多，要他拿出“唤醒会”的章程，慢慢看起来。

扎多心里不明所以，就像给博雷递过情书一样，不知对方是何反映、自己是福是祸。

副书记终于看完，抬起头来，指着章程的第一条说：“小伙子，这一条救了你们。”

“唤醒会”章程的第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小伙子，我理解你们的热情，但是不需要另立组织嘛，”副书记说，“做社会工作，有共青团和工会嘛。”

副书记没有追究，扎多得以脱身，“唤醒会”却寿终正寝。但“唤醒会”的公益精神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留了下来，10年后，扎多、文扎和扎西成立了青藏高原第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

“唤醒”的声音哑了，“黑刺林”的刺也被拔掉，但这些青年人的热情没有被熄灭，扎多和朋友们要从教育入手，把那些孩子，那些“未来治多主”教育成改变治多的人。

几个朋友在扎多的小屋里深谈，在博雷煮的奶茶香中，一个重大决定做出来——他们发誓放弃高收入，当中学老师，去改变可恨的家乡。

教育局长很激动，谁都知道这几个人是治多最耀眼的读书明星，很快安排他们试讲课。扎多彻夜难眠，精心准备了高尔基的《海燕》。试讲那一天，他面对黑压压的教师、官员和学生，汗水涔涔而下，但热情将诗句燃出火花：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激昂的诗句表达了扎多沸腾的心，他如愿成了“扎多老师”。一年多后，文扎在青海民院进修毕业，仍想调到治多中学，但州气象局不放。他问扎多：“你发过誓，这辈子就当老师，是吗？”

扎多说：“是！”

“我也是！”文扎说。

他破釜沉舟进了中学，与扎多和副校长扎西凑在一起，霎时兵强马壮。他们

鼓动成立了校委会，重大事项由校委会民主决定，而非校长一人说了算，扎多成了校委会成员。他们又要改革，那时“承包”最流行，扎多与文扎想承包一个班，所有课程由他们两人完成，所有的指标完成时，比如有多少学生考上高中，不需要奖励，完不成任务则扣工资。扎西支持他们，校长同意了。

三人准备大展宏图时，校长忽然变卦，说社会压力太大，教育局不同意，他决定取消这一改革。

“你的决定？”愤怒的扎多喊，“最高权力在校委会！”这个一直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年轻人，还没学会妥协，也无法体谅校长的苦衷。“如果不改革，我们就走！”扎多、文扎和扎西气冲冲地对校长说，在他们心里，只有勇往直前，没有迂回退让。

扎多满心希望校长挽留他们，但校长眼睛看着别处，没有说话。

三个狂怒的年轻人无台阶可下，气呼呼走出学校，但自己知道步子有多么虚浮：自绝了退路，哪里可以安身？

扎多不知道，等着他的，是荒野可可西里。

十四 索南达杰

1992年7月的一天，博雷到街上买菜，她要好好给扎多做点好菜吃，丈夫现在“落难”呢，憋在家里不出门，前途迷茫。

像很多藏族妇女一样，她戴一个白色口罩，以抵挡高原上热情的阳光和冷峻的风。治多县城只有一条街道，治多中学、县委县政府、供销社和银行一字儿排开，就是这里的全部大机关，从县城的这头走到那头，也不过10分钟。黄黄的房墙和院墙，将县城从绿绿的草原上凸显出来。在这个典型的牧区，城镇是新鲜玩意儿，这条街道的历史也不过40年。1953年治多县成立，秋吉活佛提议将县城建在这个叫嘉仁格巴的地方，“嘉仁格巴”意为“吉祥福聚的家园”。

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盆子，四周高山连绵，围住平铺的草原，而县城像一粒青稞洒在巨盆的中央。博雷如果往北望去，可看到嘉杰博洛格山脚有一座红色土丘，名为“嘉洛卡玛”，意为“嘉洛红宫”，在《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王妃珠牡出生在这座宫殿里。

在《格萨尔王传》里，这里是“十全宝地”，可惜如此宝地却种不出大白菜。直到十几年后的2006年，菜店也只有两三家，珠宝一样摆放着从一千公里外的西宁拉来的菜蔬。路上颠簸了几天，菜蔬无精打采，像是患了高原反应症。

但博雷巧妇可为无米之炊，丈夫是在西宁念过书的人，早就习惯了在糌粑和牛肉外加点蔬菜，因此她是这里最会做内地菜的藏族女人。

博雷走过农业银行，看一张红纸贴在墙上，有人围观，她上前一看，原来是县委的汉文通知：

“为开发可可西里，造福治多人民，治多县委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同志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现招聘工作人员。有意者到县委报名。”

博雷菜也不买了，急忙忙回家告诉丈夫。扎多眼前一亮，索南达杰！那是他的村人，他的老师。可可西里？无人区？管他呢，现在走投无路，去哪儿都行。

扎多与文扎、扎西来到县委见索南达杰。这个38岁的新任县委副书记对三位年轻教师非常客气，尽管他们曾是他的门生。“请坐请坐。”他热情地招呼。

“我们想跟你走。”扎多说。

“为什么呢？你们有那么好的工作。”索南达杰问。

三人讲述学校的遭遇，骂那校长胆小无能，出尔反尔。扎多与文扎口才好，说起来口若悬河。索南达杰的脸色渐渐沉下来，扎多以为索南达杰为他们义愤填膺，于是滔滔不绝，继续斥责：“我们和他势不两立！”

不等他讲完，索南达杰变了脸，手指伸出，指着三人大骂：“没出息！凭这些话，我不要你们！好像都是别人的错，还背地里说人坏话！”

三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索南达杰顿了顿，语气和缓一点说：“可可西里是无人区，到那里比索加牧民的生活还要艰苦，而且有生命危险。我为什么要贴海报呢？其实县委可以点名要人，但那里太苦了，我要拉人走，他和家里人会怪我，所以希望大家自愿。你们要充分考虑一下。”

扎多愣在那里，惴惴不安揣测他的意思，被他臭骂了一顿，好像没希望了，但又说“考虑一下”，难道还有余地？

索南达杰说：“西部工委最需要三种人：一是好司机，因为动不动就在无人

区行驶上千公里，汽车坏了修不起来，我们就死路一条。我看中了一个司机，但他家里不同意，我也不好强求；二是医生，在可可西里能救命；第三种是有才的，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帮我写写材料。但对治多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医生和老师，我把最好的医生拉过去，是治多人民的损失，所以我没要；你们要是跟我去，治多就失去几个好老师，所以也不能要。我很矛盾。”

三人告辞出门，文扎气呼呼地说：“我不去了！哼，牛烘烘的，请我也不去！”他拿过报名表，将自己的名字划掉。扎西也“刷”一声划掉自己名字。

最后，索南达杰在30多位报名者中选了扎多一人。此后一年半，扎多跟随索南达杰进出可可西里，直到索南达杰牺牲。

索南达杰是治多的传奇人物，他青海民院毕业，任治多中学教师，后任县教育局副局长、索加乡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兼西部工委书记。但他成为治多最有名的人物，并不因为他是官员，而是他的所作所为。

索南达杰自小没有母亲，只有父亲“幸福老师”，后来到西宁读书，本来可以进入城市，甚至北京，但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他渴望报效家乡，于是回到治多中学教书。

他做事不教条，任校长期间，上头要求学生捡的虫草只能卖给县外贸公司，他却以高价卖给商人，收入由学校支配。

索南达杰当官后我行我素，他当面给县委书记起外号为“青蛙”，说完又摘下帽子郑重道歉，让领导尴尬难堪。所以后来领导评价索南达杰：“此人不可不用，不可重用。”

他是无神论者，不信佛教。在路上见到去拉萨朝拜者，他认为这些人不事生产，浪费资源；对大活佛也不敬，说他们受人供养，如皇帝一般，是“吃人肉者”。但对秋吉活佛却有些佩服，但绝不会去朝拜，只说：“如果再批斗他，我不会参加。”

在藏北和青海牧区，宗教气氛比其他藏区淡得多。藏区按方言分为卫藏、康区和安多；如果按地域，又分上阿里、中卫藏和下多康。藏人说，上阿里拜神山，这里有全藏区以及印度人崇拜的冈仁波切（冈底斯山）；中卫藏拜寺庙，这里有藏传佛教最早最著名的寺院，如桑耶寺、大昭寺和拉萨三大寺；下多康拜喇嘛，许多大喇嘛出生于多康地区，如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都生于西宁附近的安多。而藏北和青海高原处于卫藏与多康的过渡带，牧区人烟稀少，宗教不如农区及半农半牧区昌盛，文革期间大破“四旧”，宗教更是消灭殆尽，所以索南达杰这代人从小没接触佛教。从扎多与嘎玛幼时对宗教大相径庭的认识，就可知道牧区与半农半牧区宗教氛围之迥异。

索南达杰行侠仗义，扶弱救贫。他做老师时，带学生到牙琼山挖虫草，学生扎西突患急性阑尾炎，周围没有牧户，借不到牛马，索南达杰背着扎西，一夜急赶40公里山路送到医院。

很多人怕他，很多人佩服他。恨他的人恨不得给他下毒药，而爱他的人恨不得为他掏出心窝子。

1985年之前，领导想让他去索加当党委书记，名曰“培养”。但索南达杰当场揭穿：“是不是我呆在你们眼皮底下特别讨厌？你们不是培养我，是赶我走。”他说不去，也无人敢坚持。

1985年10月17日，暴雪袭击青藏高原腹地，几天内，从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到黄河源头，东西横亘1000多公里、南北纵深200多公里的辽阔草原，被没腰深的积雪覆盖，气温骤降至零下40度，灾情最严重的就是索加乡，26万头牛羊中，

22万头冻饿而死。

时为县教育局副局长的索南达杰来索加救灾，他带着几个牧民，背着几口袋羊粪，踩着厚厚的积雪奋力往山上攀登。到半山腰，索南达杰在雪地上用手画出巨大的“SOS”，指挥牧民把羊粪摆在字母上。兰州部队的救援飞机向“SOS”飞来，投下粮食、燃料、棉被和大衣。

人们一生积聚的财富，被雪花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这场雪灾刺激了索南达杰，他主动要求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从1987年开始一千六年，做了许多惊人的大事出来。

原来从索加往西直到140公里外的青藏公路，无路可通，索南达杰带领几个干部，在摄氏零下30度的冬天，历七天七夜，一步步量完和勘定从索加到沱沱河的冬季运输线，可以让索加人从青藏公路上运粮食。此事可谓开天辟地。

索南达杰曾告诉扎多，他一生所做“最伟大的事”是对上不交税，对牧民不征税。他不是傻瓜，知道这样做要免官坐牢，但牧民损失惨重，他实在不忍雪上加霜——实际上20年后，索加牧民的牲畜都没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他曾想挑出境况好一点的人家来交税，但牧民们都很艰难，矮子里拔不出将军来。他往上级做工作，但上级不免税，他只有一条路：抗税。所以，索加在交税方面倒数第一，年年如此，他敢做敢当，处之泰然。

但他在任时，没有索加人感激他，因为他冷峻寡言，从不示恩，人们不知道他为家乡做了什么。只要他下乡，听说索书记来了，全村人诚惶诚恐接待他，在他面前甚至连话都不敢说。他对牧民并不嘘寒问暖，做表面文章。在他任职六年间，独霸一方，为索加人争得许多利益，索加被戏称为“索加人民共和国”。但他不谋私利，有一股凛然气概，令人敬畏。有一个故事说，县里开会，乡党委书记索南达杰迟到了，他身穿大衣，进得门来，会议桌前的所有人不自觉地站起，包括县委书记。

但不管他怎样努力，索加仍然贫穷落后。牧业是这个荒凉高原的主业，却容易被一夜大雪摧毁，这一阴影时时笼罩着他。他后来对扎多说：“索加盯着牛屁股和羊屁股，永远翻不了身。”

一个春天的傍晚，一群地质队的汉人来到索加，索南达杰赶紧把索加最好的房子腾出来，又张罗着送来牛粪、开水，把屋子里烧得暖洋洋的。

地质队野外勘探极少遇到如此热情的干部，只见这位书记身体健壮，前额宽大，一脸络腮胡子，看起来既豪爽干练，又彬彬有礼。地质队出发时，在雇牛马上遇到了麻烦，牧民要价太高。索南达杰黑着脸骑上马奔了出去，告诉牧民，地质队是来为索加牧民找矿的，要帮助大家致富，大家要为地质队提供服务。

索加有六条水系汇入通天河，水利资源丰富。有一天，索南达杰与地质队员找建电站的坝址，回到乡里，兴奋无比，找来两瓶白酒庆贺。在与地质队员相处的两个夏季里，他学会了怎么找矿，如何辨别矿石标本，怎么看地质图，怎么定位。

地质队员们告诉索南达杰，既然你知道光靠牛羊搞不成现代化，为什么你不去可可西里？可可西里有黄金。¹⁸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可西里发现了金矿，出现淘金热，每年约三万金农非法进入采金，沉寂了几十万年的可可西里，被大肆开膛破肚。

索加乡一共六万多平方公里，几乎是海南省面积的两倍，四千余牧民生活在

¹⁸ 本章关于索南达杰救灾及与地质队交往的故事，部分引自中国青年报1995年11月12日报道《血染的希望》，王伟群

青藏线以东一万多平方公里的草场上，青藏线以西五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在行政区划上虽属索加乡，但因是荒蛮的无人区，没有草场，治多人早将之抛到脑后。现在那里的矿产资源令索南达杰兴奋起来，也许可可西里能救索加？

1991年3月28日，玉树州委书记史国枢来索加乡视察，在此之前，很少有州委领导到偏远的索加。索南达杰坐在史国枢的车里抽烟，史国枢讨厌抽烟，“灭掉烟。”他说。

索南达杰却对司机说：“停车，”他下了车，一边抽烟一边对惊愕的州委书记说，“你们前面走，我跟着。”

在史国枢面前，大部分官员低头哈腰，这个索南达杰倒不一般。

在此之前，索南达杰跑到一位州领导家里，与他谈玉树州西部索加等几个乡的开发，那位领导不耐烦地说：“全州有多少个乡？要是乡党委书记都来找我，我就不用于别的了，天天接待基层干部吧。”

索南达杰大怒，一拍桌子，指着那领导的鼻子骂他“官僚主义”。

而史国枢喜欢索南达杰这样直率的干部。在索加乡，索南达杰向他汇报工作，无非是牛羊多少，成活率多少，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虚假数字。史国枢说：“你少来这一套，我也在牧区干过，不是不懂，你给我实打实地说。”

索南达杰很激动，他终于找到一个喜欢听真话的领导。史国枢走后，索南达杰给他写了一个报告，提出治多的索加和玉树其他县的五个西部乡，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交通最不便，应该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做出适合当地情况的发展规划。

史国枢立即将他的报告转发全州，随后在三个县各成立了西部工委。索南达杰升任治多县委副书记，兼任西部工委书记。1992年7月23日，成立治多县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索南达杰任总经理。

他对扎多说：“我是世界上最大的总经理，管五万多平方公里；但一分钱没有，也是最穷的总经理。”

现在，索南达杰与他的老同事靳炎祖、学生扎多，这三位前治多中学教师赤手空拳掌管着可可西里——这块与宁夏面积一样大的新世界。

十五 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是蒙语，意为“美丽的少女”。蒙古人曾统治青海藏区，以蒙语命名，倒也有些道理。在格萨尔王传里，这里是妖魔之地，寸草不生，格萨尔把魔鬼埋在可可西里，所以这里的水不能喝。美丽的妖女阿达拉毛住在可可西里，她给格萨尔喝了忘情水，两人成亲，让格萨尔在九年里忘了妻子珠牡。也许因为这里有阿达拉毛，才名为“美丽的少女”。

但这里的环境远非那么美丽，自然环境严酷，气候恶劣，人类无法长期居住，在人类急剧改变世界的三千年里，这里基本没受人类影响。站在这里，远望苍苍茫茫，唯见雪山荒原，间或有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天地间一片萧索。如果格萨尔王一千年前真来过这里，他当时所见，恐怕与扎多和索南达杰看到的没什么两样——除了最近20年挖金矿与盗猎的痕迹。

可可西里名义上属于索加，但索加没人知道什么是可可西里。索加人传说，50年代解放军测绘队进可可西里，索加人赶几十头牦牛进去为部队服务，牦牛都受不了恶劣的环境，只有一头牦牛幸存。扎多跟随索南达杰进入可可西里，才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这里最暖和的地方年平均气温摄氏零下4度，最冷的地方年均摄氏零下10度，气温最低时摄氏零下46度。这也是全国风速最大的地方。扎多跟索南达杰进入可可西里，大部分时候没有帐篷，就睡在卡车车厢或吉普车里，每次睡下去，全身冻得麻木，听着冷风呼啸，担心第二天冻僵的身体还能不能化开。

在18个月里，索南达杰十二次进可可西里。他们没有钱，没有油，起初也没有车。从治多县城往西260公里是索加，再往西140公里是青藏公路，青藏公路以西，便是那世界第三大无人区可可西里。可除了结冻的冬天，他们无法西行直达可可西里，必须绕个大圈子：往北行1000公里到西宁，从西宁西行700多公里到格尔木，再沿青藏公路南行200公里抵可可西里边缘。

第一次进可可西里的路上，索南达杰读着一本《工业矿产手册》，“你要不学知识的话，就变成野牦牛了。”他对扎多说。

他们歇脚在西宁的晨光旅社，那里五元一夜，到处乌烟瘴气，脏乱不堪，索南达杰并不觉得这小旅社的条件与县委副书记的名头不符。他和扎多走出旅社，兴奋地指着西宁的楼房说：“以后我们可可西里也要盖很多房子。等我们有空了，带着炒面口粮到沿海地区转一圈，考察考察，看跟谁合作好。”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的蓝图有多大。在玉树和西宁的机关单位，索南达杰喜欢这样介绍扎多：“这是我秘书，很厉害的，懂英语。”扎多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美滋滋地想：“原来索书记也吹牛啊。”

索南达杰并不只是吹吹牛，他要扎多学好英语，“我们以后有大事业，还要国际交往。”

成立西部工委时，文件上写明，西部工委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奶，自收自支，第三年为财政做贡献。索南达杰的目标是可可西里的金山。

他们到了可可西里边缘，租了车慢慢进入，扎多惊讶地说：“怎么有这么多车辙啊？这是无人区，怎么会有路？”

“你知道这路是怎么来的？是拉金子的，可见拉出去多少金子啊。”索南达杰说。

他们沿路见到许多被杀的野生动物：有的只剩骨架，有的藏羚羊骨肉完整，

却被剥了皮，血肉模糊。

可可西里素有青藏高原“动物王国”美誉：栖息着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雪豹、棕熊等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有金雕、黑颈鹤、大天鹅等鸟类；湖中游动着裸腹叶须鱼等鱼类。这些均为青藏高原特有物种。

每年5月底6月初，成群结队的临产藏羚羊从东部向腹地卓乃湖、太阳湖一带迁徙产仔，数万只母藏羚羊在湖畔分娩，场景壮观。但随着非法采金人越来越多，藏羚羊被大规模屠杀。

从可可西里回来，扎多发现索南达杰空前焦急。西部工委买了一辆北京吉普，索南达杰兼任司机，这一天开车拼命往结古镇赶。他身体不好，腰痛时将一块石头放背后垫着，停车吃饭时，他吃不下，就在后排座上休息一下。

他们在下午赶到州委，史国枢书记正与新任州长谈话，索南达杰与扎多在吉普车里等着。等到晚上10点，史国枢走出办公室，很不耐烦地对索南达杰说：“有什么事非要我出面？县委不能解决？”

扎多很诧异：“这个人怎么这么坏？”

史国枢继续批评说：“你做的这件事，我非常不满意。抓一个是一个嘛，为什么乱铺摊子？”

“这是什么意思？”扎多一头雾水。许多年后他才明白：这时的索南达杰已在考虑可可西里的环保问题，可上级领导并没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他们只想到开采资源。

“我只有15分钟，明天5点钟起床去西宁。”史国枢骂完后说。

扎多想，这下糟了，按索书记的脾气，他会指着史国枢的鼻子骂起来。但令扎多惊讶的是，索南达杰极谦恭地说：“好的，书记，我简单汇报一下。”

扎多暗暗失望：索书记当了一点小官，就不敢得罪人了。

过了一会儿，索南达杰从办公室出来，告诉扎多：“史书记是我们西部工委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西部工委。”

1992年11月12日，索南达杰在西部工委成立“黄金管理委员会”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后又成立“高山草场保护办公室”。人们被他搞糊涂了——西部工委成立的目的是开发可可西里，现在怎么成了“保护野生动物”？

索南达杰虽没有受过佛教教育，但藏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比如众生平等、不杀生、保护自然等观念，已令他开始关心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命运。

扎多发现，索南达杰的脾气越来越不好，这个事事高瞻远瞩的人，无法被他的同僚和上级理解。

1993年夏天，县委组织到草原上野游。索南达杰让司机打来旱獭煮了吃。除了处在蛮荒之地的索加人，没人吃这种肉，在别人眼里那是肮脏的行为，如果一只锅煮了旱獭，别人会把锅扔掉。但那一天索南达杰表现怪异，故意跟同僚们过不去，“来吃旱獭肉，”他对县委书记和县长喊，“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要满脑子迷信。”人们很恼怒，不欢而散。

扎多猜测，索南达杰必定有什么愁闷无法排解。在这个小地方，他的胆略和智慧使他成为孤独的人，没人是他的知己，包括他的下属。

扎多觉得索南达杰前后判若两人：扎多到西部工委之前，索南达杰对他客客气气，自从进了可可西里，却很少给他好脸色。他去索南达杰家里，索南达杰不对他说话，似乎没看到他，令扎多手足无措。扎多热切地想与他做朋友，像兄弟一样，而不仅仅是上下级，但他们无论如何做不到，索南达杰动不动骂他，守着外人也不顾忌，令扎多灰心。

索南达杰鼓励扎多在工作上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唯唯诺诺，扎多终于做了一次。在曲麻莱县与治多县边界有个盐湖，按行政区划应属治多，但曲麻莱县已对盐湖经营多年，扎多刚刚听说曲麻莱县又要有什么动作，兴冲冲来告诉索南达杰，希望得到他的夸奖。

索南达杰正坐在桌前用扑克牌算命，扎多说完，索南达杰没有反应，继续一张张出着牌，一句话也不说。扎多不知所措。

沉闷的几分钟后，索南达杰终于开口：“那又怎么样？”

扎多嗫嚅道：“我不知道。”

索南达杰把牌一扔，斥道：“你不负责任！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有个对策。”

扎多好像兜头一盆冷水泼下，本来兴冲冲想得表扬的，不料反遭责骂。后来扎多不再提建议了，反正思路总也超不过索南达杰，干脆不要思想，老老实实执行，万事大吉。

1993年5月，西部工委在青藏公路设卡，阻止非法采金者进入可可西里。之前他们在《青海日报》登通知说，进可可西里采金必须先到西宁的玉树州办事处办手续。玉树州无人采金，采金者大多来自青海东部。但通知发过后，竟连一个人也没来，西部工委只好在青藏公路不冻泉设卡。后来发现淘金者其实另有通道，据说那里有私卡，过往者须交买路钱。

但索南达杰一直没找到那个通道，看着进出可可西里的车辙，索南达杰叹口气：“这里不是无人区，是无法区。”

此时可可西里盗金已近疯狂。1989年2月，青海省黄金领导小组决定在可可西里马兰山40平方公里内试采黄金，人员限定为一万名。但当地官员大肆炒卖和重复发售采金证，大量金农涌进可可西里，5月25日，暴雪突降，8000多名金农被困。他们没有吃的，一辆东风汽车只能换来两个馒头。政府动用直升机空投物资救灾，仍有42名金农丧命。据说空军驾驶员看到下面饿得疯狂号叫的人们，居然不敢降落，生怕被抢，只能远远地投下面粉。

可可西里除了淘金者，更有许多强盗。有些强盗一路跟随找金矿的老手，一旦发现金矿就劫夺过来，占地为王。扎多曾见过一个山沟，山的两侧修着碉堡，进山的车道两边挖成10米深的大坑，外来车辆一不小心就掉下去。更有些不法之徒随便圈起一座山，放出风去，说这里遍地黄金，派人到各地招徕农民，老乡骗老乡，很快一个所谓金矿就聚集上千农民。策划者发放自制采金证，每人交500元，若有不交者，打手们找机会打死个人，杀鸡给猴看。于是农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挖上一年的土，所谓“矿主”坐地生财。

金矿的幕后老板从来不去可可西里，进去的只是二老板、三老板等小角色和打手。冬天金矿停工，留许多人在可可西里运粮、运煤，看守金场。打手们也打猎，起初主要猎杀野牦牛，这样夏季大队人马进驻时有肉供应。后来知道藏羚羊的毛可以卖钱，于是夏天采金，冬天打猎。

其实他们不是最先猎杀藏羚羊的人，只是令凶手的队伍骤然庞大而已。

藏羚羊是藏北高原上的旗舰物种，但处于灭绝边缘。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估算：20世纪初，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超过100万只，而到90年代中期，只有65000至72500头，超过九成的藏羚羊消失了。夏勒博士认为，沙图什贸易是藏羚羊日益减少的关键原因。

“沙图什”意为“毛绒之王”，指藏羚羊的绒毛，它是世上最柔软、最保暖的绒毛，由它制成的披肩代表着稀有和奢华，备受贵族和富人的青睐。由于一条

宽一米长两米的披肩可以轻松从戒指中穿过，所以被称为“戒指披肩”。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沙图什披肩成为许多富人的时尚，可很少有人知道沙图什的来源。经营沙图什贸易的商人向消费者编织谎言：“在海拔超过5000米的藏北高原上，每年换毛季节来临之时，一缕缕轻柔细软的羚羊绒从藏羚羊身上脱落下来，当地人历尽艰辛把他们收藏起来，织成华贵而精致的披肩。”这样的谎言令购买沙图什成为一种高尚行为——支持藏区的生态保护和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但由于藏羚羊善于奔跑，难以活捉，更难以活体取毛，所以偷猎者驾驶吉普车追踪藏羚羊，在夜间包围它们，用灯光照射使羚羊视觉消失，然后用枪大批屠杀。

目击者如此描述他们看到的情景：“数百头藏羚羊全部被屠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倒在血泊中的藏羚羊妈妈身怀未产出的胎儿，它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吮乳的孩子，幼小的藏羚羊羔仍在沾满鲜血的红色乳头上吸取乳汁，羚羊妈妈的鲜血染红了小羚羊的嘴巴、鼻子和它那憔悴的面颊。失去母亲关爱的小羚羊过不了多久即被老鹰和狼吃掉……”

一头藏羚羊只能剪取100—200克羊绒，一条女士披肩相当于三头藏羚羊的生命，当人们戴着沙图什披肩炫耀着高贵和优雅时，其实正背着三具藏羚羊的尸体招摇过市。

藏羚羊皮被运送到西藏的日土、普兰、拉萨和青海格尔木，然后偷偷运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沙图什在那里手工编织成披肩，然后通过秘密途径销往全世界的时尚中心。

在中国的黑市上，每张藏羚羊皮的收购价约合80美元。在印度，一条纯沙图什披肩的价格在800—5000美元，进入国际市场后，披肩的价格升至5000—8000美元，最高超过15000美元。

1970年以前，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对于藏羚羊的猎杀仅限于当地牧民，到了80年代，藏羚羊绒价格的不断上涨，引发了对藏羚羊的大规模猎杀。许多人专门从事这一行当，手持先进武器，驾驶车辆无情地追杀藏羚羊。¹⁹

索南达杰带车进入可可西里，在路上，他下车捡起两块漂亮的花石头，很爱惜地装进口袋：“送给我儿子当生日礼物。”

他们在野外烧开水煮方便面吃。这里海拔高，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气压低，沸水温度只有摄氏85度。索南达杰吃了方便面，又吃了一小块有点发霉的牛肉，过不多久，突然“啊哟”一声蹲下身去，身体佝偻着躺到地上。扎多和靳炎祖吓坏了，急忙去扶他，发现他身上冷汗直流，可能是急性胃炎。人们七手八脚将他抬到车里，索南达杰病情没有缓解，最后痛得在车里翻来滚去。扎多和靳炎祖决定立即赶回治多。

扎多与司机在前探路，发现有辆拖拉机停在旷野，旁边搭了顶帐篷，右边的土坎下有个东风卡车的车厢。“我的妈呀！”扎多心里叫出来，他看见车厢旁边的地上堆着藏羚羊皮。

扎多想下车看看，司机急忙叫道：“他们有枪，会打死我们！”吉普车立即呼啸着冲回营地，汇报这一重大发现。索南达杰病得厉害，无法起身，命令扎多带人冲回去，他们只有一支冲锋枪，是索南达杰借来的。等冲回那个地方，天已黑了，只看见空帐篷和拖拉机，旁边扔掉很多羊皮，看来那些人刚刚逃掉。扎多手持手电筒钻进帐篷，“啊！”叫出声来，地上一支小口径步枪闪着亮光，拿起来

¹⁹乔治·夏勒，《青藏高原上的生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6页张恩迪之序言

一看，子弹已上膛。

正在此时，远处射来汽车灯光，人们立即埋伏起来。一辆吉普车开到帐篷跟前，三个人下车。“不许动！”扎多端枪跃起，三个人呆在当地，这三人正是这群盗猎者的老板。

西部工委回到青藏公路，县里其他工作人员已将成百上千非法采金者堵在青藏公路上，采金者越聚越多，索南达杰觉得不妙，如果这三个老板与那些采金者有关系，说不定西部工委会遭围攻，他急令快撤。只凭卡子是堵不住的，不如撤了卡子，擒贼先擒王，那群人只是普通淘金者，而抓回三个盗猎头子才是正经。

他们驶到五道梁，五道梁北距格尔木290公里，是青藏公路的中继站，有兵站和道班，也有数家小旅社和饭店。索南达杰命令从五道梁往东开，直接回治多县城。他不想绕那将近2000公里的大圈子了，但车行不久，卡车就陷进泥里，人们挖了一夜，等晨星东挂，往西边看去，五道梁仍在眼前。

好歹将车挖出来，走不多远又陷下去。这是五月底，冻土已融，荒漠和草地到处是陷阱，车一陷下，他们将三个犯人押到一边，奋力苦战。有一次实在累极，挖着挖着居然躺倒，死睡过去。冲锋枪就在犯人脚边，犯人虽然戴着手铐，但完全能捡起冲锋枪置他们于死地，好在犯人没起歹意。

索南达杰的病已有缓解，但有两天没吃东西，仍然在前开车引路。趁同事挖车时，扎多烧了点开水给他送去，打开车门，吓了一跳：索南达杰横躺在车里昏迷过去。人们手忙脚乱将他救醒，索南达杰睁开眼睛轻轻说：“你们冷不冷？冻伤了没有？”扎多的眼泪涌出来。

起初几天，几个人白天挖车，夜晚搭帐篷睡觉，早上收起帐篷继续挖车走路，但走不多远又“扑哧扑哧”陷入泥潭。后来他们干脆不收帐篷，汽车随陷随挖，随行随陷，忙活一天也走不多远，走回帐篷睡觉正好。

索南达杰仍然病着，人们决定让索南达杰乘吉普车押犯人先走，扎多带人押送卡车和羊皮。索南达杰的吉普车消失在荒漠之外，天地间只余这一辆苟延残喘的卡车，扎多忽然觉得极为空虚。

他们日复一日地与泥潭搏命，夜里寒气袭人，没有牛粪取暖，只有从青藏公路上弄的沥青，扎多将沥青点燃，滚滚浓烟扑面而来，很快将全身涂得漆黑。“不知博雷和孩子能不能认出我来。”扎多躺倒在地，幽幽地想。现在他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了，想着可爱的孩子，眼睛湿润起来。“这次回家后，还要再来可可西里吗？”他问自己。每次离开她们赴可可西里，他心里都很难过，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回来，尽管到可可西里工作，除了在冰天雪地里遭罪和时时的生命危险，他没有得到什么，但他耻于有退缩的念头。“索书记能去，我就不能做胆小鬼。”他给自己打气。

第二天走着走着，看到一个土堆，上面有什么纸张。扎多下车拿起，是一个烟盒，上写：“你们一定要保重！”

“索书记留下的！”扎多失声喊道。

八天之后，扎多终于回到治多，他浑身黑臭，声音嘶哑。索南达杰站在路边，含泪迎上来，将他紧紧拥抱。

十六 最后一次巡山

1994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结古镇一位官员家昏暗的灯光下，索南达杰擦着一把54式手枪。这是刚从公安局借来的，不知在铁柜里锁了多少年，生了厚厚的锈，与其说是一把枪，不如说是一块像枪的铁疙瘩。扎多说：“反正打不响，还擦它干嘛？”

索南达杰笑笑，黑框眼镜架在他瘦削的脸上，显得有些大，大衣披在身上晃晃荡荡。他穿一条厚厚的羊皮裤，可并不感到暖和。可可西里的一年半搞垮了他的身体，使这个近一米九的魁梧大个子像瘦弱的病人。可他眼睛明亮，热切地盯着这块黑铁，擦了好久，看起来真像一把枪了，左看右看，交给扎多笑道：“这个你挎着，你个子矮，挎上像汉奸一样。”于是扎多挎上那块打不响的铁疙瘩，心里纳闷索书记这次为什么一定要配枪。

这是他们第十二次可可西里之行。索南达杰虽是县委副书记，在县委并不设办公室，好像随时准备回可可西里。他手提包里的书籍，由《工业矿产手册》变成复印的散页《濒危动物名录》。扎多搞不懂索书记在想些什么。从《工业矿产手册》到《濒危动物名录》，不知不觉间，索南达杰对可可西里的认识发生巨大变化，可是他孤独寂寞，没人可以与他对话。

一个干部问索南达杰：“可可西里的草场到底怎么样？能放牧牛羊吗？”

索南达杰说：“那里怎么会有草场？”

“那你呆在那里做什么？！”

索南达杰只有苦笑，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为那块蛮荒之地拼命。他得不到多少支持，甚至那辆吉普车的汽油也是靠西部工委三个人的工资垫付。但他一句怨言也没有，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扎多这才明白，当他找索南达杰报名时，索南达杰为什么那么痛恨他埋怨校长。只有一次，在数次向上打报告得不到回音后，索南达杰叹口气：“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办不成的。”

不去可可西里的日子里，他找了个临时办公室，让扎多坐他对面。人们络绎不绝地找他办私事，为了自己的职位、儿女的工作，在他面前又哭又闹。有一日又有人来烦扰他，扎多不由感叹：“原来当官有这么多烦恼！”

索南达杰似乎看出扎多想什么，冲他笑笑说：“我们还是进可可西里吧，这里太烦了。”

1994年1月初，他们最后一次进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这次十分郑重谨慎，跟县长借了一把77式手枪，跟公安局借了冲锋枪和54式，之前11次去可可西里只有一次带枪。他还每天400元租了一辆东风卡车拉着装备。

扎多要跨上西部工委的吉普车时，瞥了一眼车号：青G0519。这车号他早就看惯了，但这次忽然有不祥的预感：“不好，519——‘我要救’！”

“别胡说，这是‘我要金’！”索南达杰说。

这个车号永远印在扎多心上，“我要救”，“救救我”，那是不祥的预兆。那辆可怜的车，最后被打得满是枪眼。

这次出行兵强马壮，除了索南达杰、靳炎祖和扎多，还有撒拉族向导韩伟林、从县上借的司机才扎西、东风车的车主和司机，一共七人。装备也是史无前例的充足齐备：索南达杰跟格尔木天池饭店的朋友借来被褥，买了几大桶汽油，买了塑料桶，在格尔木昆仑矿泉里装上山泉。索南达杰规定，在可可西里不许洗脸、刷牙和刷碗，节约用水。

1月8日夜里11点45分，两辆车从格尔木出发。动身前，索南达杰给夫人才仁发了一封电报：“元月9日离格赴可，索。”没有写归期。

从青藏公路进入可可西里有南北两条线，他们八小时后到达南线，在靠近楚马尔河的地方发现了车印。在可可西里辨别敌我很容易：除了西部工委，所有人都是非法者。因此只要顺着车印追，肯定能找到盗猎者或采金者。

他们先遇到一辆东风车，那司机老马竟是熟人。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可可西里时碰到他，警告说这是西部工委的地盘，以后再进来要办手续。老马连声答应：“啊，没问题，明年就去办手续。”

这次狭路相逢，索南达杰可不客气了，扣了他的东风车，押着老马进入可可西里。有趣的是，老马一路与大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谈自己怎么搞女人，幽默风趣，倒颇解大家的旅途烦闷。

他们顺车辙追到海丁诺尔湖，湖的对岸有个白帐篷，索南达杰让车队慢慢绕过去，接近帐篷时突然加速，人们跳下车端着枪冲进帐篷。十来个人还在睡觉，被抓个正着。在此之前西部工委无数次抓人，知道这些人露营时都把枪藏起来，生怕政府抓住偷猎证据。

“交出枪来！”索南达杰喝道。

“我们没枪。”

扎多把他们从帐篷里拉出来，站到冰面上。这时太阳落山了，四处黑暗，只有冰面的反光。扎多问：“你们进可可西里干了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干，昨天刚进来。”

扎多看见有个人的脚冻伤了，“昨天刚进来，怎么可能冻了脚？！”他大声喝问。

他们张口结舌，但还是不承认有枪。一会儿，索南达杰在离帐篷30米的地方搜出两支小口径步枪、3000发子弹。

索南达杰下令把盗猎者的柴油收缴，只给他们留下回青藏公路的油。那么多人无法抓走，只好让他们离开可可西里。但如果他们有钱，便可在青藏公路买了柴油再进来，索南达杰对此无能为力。

当天晚上扎营在庫赛湖北岸，1月10日扎多开车绕湖巡视，又抓了一伙人，缴获两支小口径步枪、一支改装半自动步枪和3400发子弹。1月11日下午，他们进入一个河沟，名为“豹子峡”，大家忙着搭起帐篷，埋锅造饭。

索南达杰在车边研究地图，没人敢打扰他。他很疼爱那些地图，怕弄坏了，用几十条一公分宽的透明胶带把地图粘起来，一直放到车里。北京吉普里面两侧有夹子，还扯着细绳，上面挂着他的宝贝地图，吉普车就是他的办公室。他边看边在笔记本上记录。

扎多不明白，这附近没有金场，索书记又写又画做什么？他们把茶烧好送给索南达杰，可索南达杰忘了喝，一杯凉了再换一杯，似乎浑然物外，一直盯着地图，不知想些什么。

索南达杰出去巡视，把77式手枪交给扎多。扎多把玩着手枪，“砰”的一声，子弹擦着他的腿飞出去，将地上的毡子打了个洞。扎多没敢告诉索南达杰。

13日，一行人沿昆仑山南麓西行，往北爬上一座高山，这是昆仑山的主脉，忽见北边一座高山雪峰连绵，那是海拔5800米的雪山峰。索南达杰兴奋地说：“开酒！”他们带了两瓶“互助头曲”，打开一瓶，你一口，我一口，顷刻见底。大家烈酒下肚，更觉一览众山小，无不欢呼雀跃。

1月14日，他们行至马兰山，在四道沟里发现一个金场，一袋袋面粉堆在一

起，还有大批燃煤，就像粮站和煤站。看来这个金矿想在夏天大干一场。

索南达杰从帐篷里拉出几个青壮年，厉声喝问：“枪在哪里？！”那些人嘴很硬，什么也不说，索南达杰拳打脚踢，靳炎祖也动手了，但扎多有些心软，犹豫着不动。索南达杰生气地说：“我这些人手脚瘫痪了，要让我自己来动手。”

扎多有些不好意思，但不会下手打人，只好劝告那些采金者：“我们肯定能找到枪的，你们又挨打又挨骂，何苦呢？”

索南达杰以前从不对盗猎者动粗，其他人吆喝吆喝，他还不高兴地说：“这也是老百姓，不要粗暴。”但这一天索南达杰似乎变了个人，脸色铁青，愤怒地将那些人拉拉扯扯，大声呵斥。

最后从火炕底下搜出两支步枪，有一支枪栓很涩，索南达杰用手去拉，纹丝不动。他把枪交给金场一个老头，老头“哗”一下拉开，不费吹灰之力。

缴获了武器，西部工委撤出四道沟，谈论着那有蛮力的老头，老马说：“你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人！他是打手队队长，常年不敢回家，回去后无数人找他报仇。”

他们出得沟来扎营，这才发现断粮了。索南达杰责备扎多没买够粮食，扎多自觉理亏，说：“我回去借粮。”

扎多不喜欢舞刀弄枪，他放下冲锋枪，与司机进沟借了一袋面粉，返回营地时，索南达杰迎上来，挥手要车停下。扎多下车兴冲冲地说：“索书记，我借到粮食了。”

索南达杰铁青着脸问：“你的枪在哪？”

“放帐篷里了。”

“你干什么！”索南达杰喝道，像是平地打个惊雷，“我们是与犯人打交道！”

扎多一句话不敢说，急忙钻帐篷睡了。从这一刻起，索南达杰的脾气更加暴躁。

他们已有二十来支枪，索南达杰把枪栓卸下来，将枪支和枪栓、弹夹分开，塞到吉普车的座椅底下。

15日，一行人顶风冒雪来到可可西里最西北角的泉水河河谷，这里是青海、西藏和新疆三省区交界处，顺河谷往前走，就会径直到了新疆境内的鲸鱼湖。他们在河床上发现了许多车辙，扎多兴奋地说：“这是一帮大家伙。”

这一天雪大风狂，大家早上没吃饭，好几个轮胎又爆掉，人们情绪低落，索南达杰一直脸色阴沉，没人敢招惹他。

下午六点多钟，雪停了，远远望出去有几座雪山屹立。索南达杰乘吉普车顺车辙往前直追，将两辆卡车甩到后面。追到一处河谷，这里弯弯曲曲，是个避风处。索南达杰让司机停车，严肃地对扎多说：“你下车，等后面的车赶上来，告诉他们在这里扎营，等我回来。”

扎多依言下车，看索南达杰的吉普车远去。白雪皑皑，山谷寂寂，天地间很安静，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如果索书记碰到那帮大家伙，他单枪匹马，还不被收拾了？”

他急跑到半山腰往远处眺望，吉普车不见了，只有雪地中的车辙曲曲折折隐入山后。

两辆卡车赶上来，扎多告诉靳炎祖，索书记命令在此扎营。“但我觉得索书记有危险，我们是不是追上他？”他问。

靳炎祖犹豫着说：“既然索书记让我们扎营，还是在这等他回来吧。”

靳炎祖是扎多念治多中学时的老师。在只有三个正式干部的西部工委，索南达杰是他领导，靳炎祖是他老师，因此扎多总是服从者。但今天扎多做出反常举

动，他跳上另一辆卡车，“快，快！”他冲司机叫。东风卡车猛地窜出去，“轰轰”的巨响回荡在河谷。

“东风”追出好久仍不见索南达杰的影子，天渐渐黑了，汽车减速顺河谷前行，忽然前方灯光一闪，一个黑影冲过来。扎多一惊：盗猎者？急令司机停车，挺起腰，将枪握紧。

来人很快冲到近前，车灯照耀下，却是索南达杰。扎多跳下车。索南达杰以为来的是盗猎者，见是扎多，怔了一下，收起枪，跨上一步，手指扎多的头，声色俱厉：“谁叫你来的！”

“天这么黑了，我怕你有麻烦……”扎多道。

“谁是县委书记？你，还是我？”索南达杰气狠狠地叫，“这是战场，只有一个领导！”

扎多打个冷战。索南达杰比他高出一大截，气势汹汹站在面前，如同一座黑塔。“他要打我了。”扎多想。

索南达杰继续大骂：“我不相信你们，我给你们枪，都不知道你们枪口要指着谁！”

扎多小声说：“我带车过来，是想……”

“你带车？你说了算吗？你是领导吗？谁任命的？”索南达杰句句如刀。

扎多嘀咕说：“我以为你会有危险……”

“‘我以为，我以为’，你以为你是谁？你读过几本书？”索南达杰喷出的怒火几乎要将扎多烧焦。

可可西里的寒风呼啸着，刮起雪花打在脸上，扎多苦苦熬着，可索南达杰狂怒未止，扎多站在他面前，心里冤屈苦涩，悲愤难言。可可西里很苦，他这个习惯受苦的孤儿都无法忍受，每次离开老婆孩子，心中又害怕又悲伤，生怕再也见不到她们，但一有退缩之念就骂自己胆小鬼。可如此受苦，换来的是什么？

他从来没得到索南达杰的尊重，索南达杰总是骂他，骂他，连他系错了鞋带都要臭骂。扎多仍然对他忠心耿耿，尽管后悔来可可西里，却从未下决心离开他，今天也是为了他的安全，没想到又被欺辱。“我越待你好，你越欺负我！”扎多灰心绝望，心里反生出一股力量：“你骂吧，我这一次出去可可西里，绝不再回来！”

扎多打定了主意，心神稳下来，反而淡定许多，不再辩解。索南达杰骂完，说：“走，回去！”往吉普车走去。

扎多没跟他走，转身登上卡车。

索南达杰回身大喊：“过来！这才是西部工委的车！”

索南达杰坐副驾驶位上，扎多默默钻入后排，不料索南达杰不解恨，扭过头来继续痛骂：“你们那一拨人，自以为看过几本书，就自以为是。你们知道什么？你们什么也不懂！”他连扎多的朋友扎西和文扎也骂进去了。

“好好好，你骂吧，”扎多心想，“我再跟你，我不是人！大不了再回去当牧民，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由害怕、伤心、绝望，渐渐转为愤怒。

快到宿营地时，索南达杰忽又转身，将手指着扎多的鼻子，愤怒和剧烈的胃痛令他的手颤抖着。扎多痛定思痛后，伤心像冰融为水，汨汨流出来。他甚至听不清索南达杰骂的什么，只觉得自己太傻。有人警告过他，索南达杰只是利用他，跟着他没有好下场，可自己仍然那么坚定地跟随他。

车慢慢行驶，车窗外一弯新月升起，照着白雪覆盖的可可西里，天地一片银辉。车行至宿营处停下，扎多满腔怨气，操起钢钎去河边打冰烧茶。

靳炎祖走到索南达杰面前，也许想给索南达杰消消气，说：“我告诉过扎多不要再走了，他根本不听话嘛。”

扎多再也忍耐不住，回头大喊一声：“你闭嘴！”

“你说什么！”索南达杰勃然大怒，如一头狮子般冲过来，右手将扎多手里的钢钎抢去，左手“砰”一下推到扎多身上。

扎多冲上去，一把将索南达杰推得“噎噎噎”倒退几步。他像野牦牛一样豁出去了，甚至想到了腰上的藏刀。

“你凭什么？我也是单位的干部，不是你儿子，你算老几？！”他圆睁双眼，恶狠狠地冲上司叫。

索南达杰愣一愣，喊：“你个小娃子，你要是长到我这么高，我嚼都不嚼就吃了你！”

扎多的怒火倾泻而出：“我怎么就不如你？我不当官就不是人吗？我也是男子汉！你能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你要是动手，我今天就跟你拼了！来来来，今天就是两个男子汉来拼一拼！”

索南达杰看着他，呆在当地。

“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县委副书记？你的椅子坐热过没有？你是被人家赶到可可西里来的！”

扎多意犹未尽，用藏人中最恶毒的话骂索南达杰：“吃你父亲的肉！”至于索南达杰的父亲就是他的“幸福老师”，却也顾不得了。

索南达杰忽然像小孩子一样低下声音说：“你跟我过不去不要紧，为什么要骂我父亲？咱俩是一个村子，我靠得住的，不就是你一个人嘛，当年我从多少人里把你挑来的？”

“没人愿跟你，你不就是看我孤儿好欺负嘛。”扎多叫道。

索南达杰说：“我把最好的枪给你……”

“别说什么枪不枪，”扎多喊，“明天我他妈的不拿了！”

“你还这么说！为了你们的安全，这是我一个个求来的，子弹也是我一颗颗求来的，这些你都看到了……”索南达杰说。

“我没看见！”扎多喊。

索南达杰彻底软下来，低声说：“这两年来，我在这里迈一步，你也迈一步，我们在可可西里的每个脚印，我们受过的苦，只有你我都知道，我老婆也不知道嘛。”

“我不知道！你少来这一套！”扎多喊，“你不就是利用我吗？我他妈的再也不干了！再也不受你欺负了！”终于痛快了的扎多越来越有劲。

索南达杰气得胸膛起伏，怔怔地说不出话，忽然大喊一声：“你走！”

“好，我走！”扎多大叫一声，手持手电筒转身便往黑暗中走，他知道自己单身一人走，不是饿死就是冻死，但在狂怒中哪还顾得上这许多。

索南达杰在身后喊：“那电筒是西部工委的财产！”

扎多闻言，将电筒举过头顶，奋力砸到地上，电筒立即稀烂。他抬脚便走，一抹额头，满手的汗水。在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冬夜，他全身火烫，恨不得索南达杰过来动手，他扎多会往死里打！虽然他比索南达杰弱小得多，但愤怒激起的勇气，让他敢以死相拼。

人们冲上来拉住扎多，靳炎祖也来劝：“我刚才只是随便说一句嘛。”扎多有点不好意思，也知道自己往外走是死路一条，只好钻进帐篷。他吵完后脾气消了一点，却也不想补救了，反正是撕破脸了，破罐子破摔吧。

索南达杰坐在帐篷里，用一条毡子将全身裹得紧紧的，缩成一团，脸上冷冷

的满是伤心绝望。靳炎祖给他倒杯热茶，问：“要不明天休整一下，修修轮胎？”

“别问我，”索南达杰说，“我不是领导了，我管不了了。”

他打开包掏出一大把药片，一般人吃四片，他是一次十六片，一把一把地咀嚼，如牦牛吃草一般。他不喝水，也不吃饭，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不是那个40岁凶巴巴的壮汉。

管他呢！扎多吃完饭，将铺盖收拾好躺下便睡，平时他负责整理索南达杰的铺盖，今晚理所当然不再理会。其他人很尴尬，帐篷里气氛比外面还要冷峻。

索南达杰一夜辗转反侧，扎多却睡得酣畅，这一夜昏睡如同一盆冰水浇到头上，将怒火熄灭，扎多早上醒来突然觉得不好意思：索南达杰来可可西里不是为私利，是为了家乡，我和他是家乡人，他又是我的老师，他又病又累，就是打我一通出出气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为什么沉不住气？

索南达杰起床后自己收拾被褥，装到口袋里。那是重活，平时是扎多帮他做的，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爬上卡车，将东西递上去扔下来，就是扎多这样的小伙子也勉力支撑，需要时不时停下歇一阵。看索南达杰喘着粗气艰难地收拾行李，扎多一下子想通了：这么可怜的人，我何苦再添他烦恼？

又快断粮了，索南达杰拿起枪，开车去打猎。他们本是在保护野生动物，但现在不打猎就要饿死。扎多看索南达杰孤单的车影远去，越来越后悔，忽然觉得索南达杰没错，全是自己的错。

上午11点钟，索南达杰回来了，没打到什么猎物。大家急忙倒茶给他，他坐在毡子上，不喝水，不说话，只是捂着肚子扭头看着地下。扎多知道他的病有多严重，亲眼见他在可可西里痛得死去活来。就在这次进可可西里前，他对扎多说，以前在索加，冬天把冰块放胳膊上，看着胳膊冒热气，还是觉得全身火热。“现在不行了，穿着羊皮裤还是觉得冷，唉呀，40岁了，人老了，不行了。”他说。

扎多说：“是啊，上一次赛马会上你穿着公安制服，我当时感觉你怎么连衣服也没撑起来，没那么魁梧了。”

“是啊是啊，老了老了。”索南达杰感叹道。

索南达杰低头坐着，显得苍老孱弱，扎多偷眼看他，越看越难过，终于鼓足勇气走过去说：“索老师，我昨天错了，对不起。”

索南达杰将头扭向一边说：“算了，别来这套了，我们两个这辈子就这样了，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扎多蹲在他面前，低着头，手抠着地下的土，眼泪一串串滴下来，打湿了地下。索南达杰抬起头，眼望远处说：“别这样了，你昨天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各走各的路。”

扎多不知道说什么，“吧嗒吧嗒”掉着眼泪。索南达杰忽然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好像一下有了精神，喊：“韩师傅，今天修修轮胎吧，我们休整一下。”扎多知道他生气了。

人们听他开始说话，无不宽慰。恰在此时，轰轰的马达声传来，还没回过神来，一辆吉普车已冲到跟前。人们手忙脚乱操起枪大喊：“停车！”吉普车迟疑了一下，猛地加足马力冲过去。

人们举起枪冲吉普车轮子“啪啪”射击，索南达杰跳上自己的吉普车，大喊一声：“注意后面！”吉普车“轰”地一声追了下去。

扎多拿着枪冲来路紧跑几步，果见有烟尘滚滚而来，是一辆卡车。那卡车司机来到近前，见面前五六个汉子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戛然停车。人们将车里的几个人拉下来绑起，上车一看，满车血淋淋的羚羊皮。

索南达杰押着逃跑的盗猎者回来，扎多将昨天的气全撒到盗猎者身上，穷追一个家伙，狠狠踢了几脚，那人吓得钻到吉普车底下，扎多一脚踢过去，“当”一声踢到车上，“啊呀！”扎多大叫一声，脚几乎骨折，痛入骨髓。

这一仗抓获盗猎者八人。扎多存了警惕之心，跑到河对岸，那里看得更远，见又有烟尘一路而来，“啊，又来了！”他大叫。

一辆卡车开过来，见有人用枪指着他们，立即放慢速度，人们以为要停车了，可车开到跟前突加油门，横冲而过。人们一边躲避一边噼里啪啦开枪，水箱打破，玻璃“哗啦啦”打碎，轮胎也被击中，汽车一头栽在路边，汽油哗哗地流出来。扎多想，电影上打中油箱总会起火，看来并非如此。司机一侧的驾驶室门上有三个弹孔，人们把司机拖出来，他“哎哟哎哟”地叫着，原来大腿中了一枪。

又是一车血淋淋的羚羊皮。

扎多把司机拖进帐篷，发现伤口青青的，并没流血，正想怎么包扎，远处又冲来一辆吉普车。索南达杰将皮大衣扔到地上，手拿小口径步枪冲上去将车截下。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冷了，对扎多说：“把我衣服拿来。”扎多奔跑着去拿大衣，心里很高兴，索南达杰又理他了！

这一仗又抓获12人，缴获一支火枪、一支改装半自动步枪、9支小口径步枪和3000发子弹。

司机才扎西悄悄对扎多说：“韩伟林打了很多子弹，应该节省着用啊，不知道还要遇到多少人呢。”韩伟林手持冲锋枪，一射一梭子弹，其他人只是一枪枪地打。

扎多想到驾驶室门上的三个枪眼，一个念头一晃而过：“原来是他打伤了司机。”

盗猎者全部拿下，大家欢呼雀跃。索南达杰悄悄问扎多：“司机腿上那一枪是谁打的？”

扎多说：“可能是韩伟林吧，听说他冲车打了一梭子。”

索南达杰沉吟一下，肯定地说：“是我打的。他们讨厌得很，我就对着门上打了三枪。”

扎多怔一下，心想：“他是不是要抢功？”

索南达杰悄悄说：“你回到治多千万别说是他打的。他是老百姓，是我们拉来当向导的，如果这些人报复他，他就没法混了。我们是政府人员，没事。”

扎多呆在当地。枪声甫歇，索南达杰居然想得那么深远。

十八 英雄之死

扎多手持冲锋枪，命令当天抓获的20个盗猎者面对悬崖，每人相隔三四步跪下。这20人都来自西宁附近，没有一个藏族人。西部工委的人急急埋锅造饭，他们在缴获的吉普车里发现一只刚打死的藏羚羊，身体还温热，西部工委断粮了，正好煮肉吃。

那些盗猎者被可可西里折磨得不成人样，戴着破毡帽，只露出两只眼睛，胡子拉碴。有些人的裤子撕开了，用绳子捆扎着。有个高个子得了高原肺水肿，不停咳嗽，看样子快要不行了。这种病是在高原地区急剧缺氧而引起，应立即下高原治疗，严重者会死亡。

太阳快落山了，大家搭起两个帐篷，西部工委的人和前几天抓的盗猎者住一个帐篷，扎多将新犯人押入另一个帐篷。西部工委只有一副手铐，却有20个新犯人，也不知道该铐谁，干脆谁也不铐。索南达杰钻入犯人帐篷，扎多持枪跟着。

索南达杰温言抚慰说：“你们是犯了罪，但也不要紧张，只不过杀几个动物，也没杀人放火，只要好好配合我们，罪行不严重。”

扎多知道索书记在极力安抚他们，使之不起歹意。就凭几个工作人员押解20多个不法之徒横穿可可西里，不测之险太多。

20人中，受伤者的哥哥穿得最干净，戴一顶牛皮帽子，别人对索南达杰点头哈腰，但他一句话不说，恨恨地盯着索南达杰。扎多隐隐觉得这个家伙很危险。

索南达杰出了帐篷，命令将一辆东风车开动马达，车头对准帐篷打开车灯。这辆车时好时坏，他生怕过一个寒夜之后再发动不起来，因此不能熄火。他喊来扎多、靳炎祖、韩伟林和才扎西在车里开会，很严肃地对向导说：“韩伟林，我正式宣布，你现在是我们西部工委的干部。”

大敌当前，他要团结更多的人。

韩伟林提议，明天开拔时以租来的那辆“东风”开路，这样可给车队限速，不允许超车，索南达杰坐吉普车押后以保车队安全。大家觉得有道理。

突然一阵哀叫声传来，大家钻进帐篷，受伤的司机痛得滚在地上，被哥哥紧紧抱着。情况紧急，必须立即送伤员出去治疗。西部工委又开会讨论，扎多提议索南达杰带伤员先走，其他人押犯人殿后。索南达杰沉吟不决，他担心自己的人分开更加危险，最后说：“扎多带两个伤病员先走，到格尔木医院，我和其他同志押犯人。”

如果索南达杰先走，那么永远留在这里的就不是他，而可能是扎多了。

索南达杰把77式手枪给扎多，问：“你会不会用？”扎多说会，但没敢说走火的事。

“你试给我看！”索南达杰命令。扎多装弹演试。索南达杰又细细教他怎样用保险，要他不要怕手冷，必须二十四小时持枪。他低低而坚决地说：“万一他们有什么动静，不管三七二十一，干掉！天塌下来我撑着！”

扎多觉得索南达杰过于紧张了，他后来才知道，对于形势的险恶，索南达杰比他清楚得多。

索南达杰细细叮嘱：如果迷路了，要认准北极星，要是阴天，就看地上的冰块，哪边化得多一点就是南方。如果发现一丛草，哪边草密一点也是南方。“如果真的迷路，他们就是不打死你，你自己也活不下来，要是走错了二三十公里，汽油不够用，也回不来了。不要看车印，那也许是自己的。记住，所有的山和河

都是东西走向。”

索南达杰安排扎多坐后排的右边，肺水肿病人坐副驾驶位，伤员坐扎多左边，这样扎多可以持枪监视两人。

伤员的哥哥突然冲进车里，他也要跟着走。扎多劝他不要去：“我们会救你弟弟的。”

“我弟弟要是死在路上，连个念经的人也没有，我可以给他念经。”那人叫嚷道。

他说得也有道理，索南达杰发了脾气，说：“把你的手铐上，一起走吧。”

盗猎者中跑出一个人拉住伤员的哥哥说：“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看来伤员的哥哥是一个头目，其他人怕他跑掉。他只得下车，哭着抱了一下弟弟。

索南达杰又把扎多叫到一边，从口袋里把所有的子弹掏出来，他的药片和子弹混在一起，扎多从他掌心挑出子弹，索南达杰拍拍他的肩说：“一定要活着出去。”

他转头对肺水肿病人厉声道：“你好好跟着扎多走，如果动了他一根毫毛，我下半辈子不当书记了，专门抄你的老窝！”

扎多的车慢慢驶离营地，回头看，索南达杰还站在那里看着他。经过昨天的争吵之后，在他们相处的最后一天，他与索南达杰才有那种他所盼望的兄弟情谊。

扎多又回头看一眼，索南达杰仍在，母亲被牦牛驮着离开他的情景，一下子回到眼前。

扎多走不多久果然迷路了。雪花纷纷扬扬，星星看不见，山脉也看不见。索南达杰还教过他，实在辨不出方向，就原地不动。可留在这无人烟的可可西里，岂不是等死？再说再拖三天，两个伤病员必死无疑，还是硬着头皮往外冲吧。

没多久，车也出了毛病，机油和水混到一起，走走停停。扎多问：“我们的速度和手扶拖拉机相比，哪个快？”司机才扎西说：“当然拖拉机快。”

更糟糕的是吉普车的水箱漏了，四人轮流往水箱里小便，吉普车像蜗牛一样往300多公里外的青藏公路挪动。小便很快没了，他们把雪塞进水箱，好在大雪下个不停，扎多一直咒骂的坏天气救了他们的命，如果不是所到之处都在下雪，他们必被困死。

这正是可可西里全年最冷的时候，大约摄氏零下40度，雪塞到水箱里不化，他们用喷灯来烧化。喷灯需用大量的汽油，他们的汽油迅速消耗，扎多的心渐渐往下沉，不知汽车能不能坚持到五道梁。

吉普车在可可西里踉踉跄跄了两天之后，1月18日晚上，终于快接近青藏公路了，才扎西突然说：“索书记不好了，索书记很危险。”

扎多说：“没事没事。”他跟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征战11次，总能化险为夷，“索书记身经百战，没问题。”

才扎西一直嘟囔道：“我不舒服，很不舒服，可能索书记完蛋了，索书记不好了。”扎多后来才知，那恰是索南达杰出事的时候。

才扎西原来是和尚，后来还俗，这次去可可西里，行至西宁时告诉扎多，他梦见治多县一个小伙子的床被人劈掉了，“他可能完蛋了。”他说。他们在可可西里时，那人果然在治多被人砍伤。

才扎西是第一次进可可西里，他走到结古镇的时候，听说秋吉活佛在此，赶忙去见他。他知道索南达杰不喜欢求神拜佛，不敢问他。他问扎多去不去，扎多

想去，秋吉活佛不但是扎多的上师，也是他父母的上师，“扎西多杰”这个名字也是秋吉活佛取的，但他害怕索南达杰批评他封建迷信。才扎西回来时，手里拿一个打了结的黄色哈达，是活佛给他的。

秋吉活佛还送给才扎西一些盐，那是十世班禅大师1989年圆寂后，喇嘛们用来擦他的法身的，在藏传佛教信徒来看，这也是极珍贵的宝物。才扎西分了一点给扎多，扎多偷偷藏起来，不敢让索南达杰知道。他相信，自己身上有了佛的加持。

扎多与索南达杰一样，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但与索南达杰不同的是，1981年6月这里宗教恢复时，扎多19岁，仍在治多中学读书。他虽然对佛教接触不多，但世界观尚未成型的心灵不拒绝本民族的传统信仰。

索南达杰出事后，扎多一遍遍回忆那些似有若无的先兆：他们从玉树向西宁出发时，过黄河源玛多野牛谷，发现右边不远处有一只狼。牧区人认为，男人出门遇到狼和鹰非常吉祥。但索南达杰不管这些，他一枪打断狼的脊梁。他把枪递给扎多，让扎多把狼打死，扎多不干，他觉得狼太可怜了。才扎西也不打。索南达杰骂他们：“封建迷信！”韩伟林一枪把狼崩掉，剥了皮，到了西宁，索南达杰把狼皮送给靳炎祖的父亲做褥子。

扎多后来对一些牧民说起此事，牧民们说：“哎呀，太不吉利了，你看出事的三个人，索书记、靳炎祖和韩伟林，一死二伤，都跟这只狼有关系。”

在黑夜沉沉的可可西里，扎多的吉普车缓缓挪动，终于汽油耗尽，颓然趴下。两天的折磨后，伤员和病人已半死不活，才扎西和扎多也几乎瘫痪。油箱里一滴油也没有了，座位底下的副油箱也见了底，他们把副油箱拿出来，将它斜立，将喷灯里仅余的一点油倒进去，汽车艰难地开起来，当它耗完最后一滴油时，刚刚走到五道梁！

扎多命不该绝。假若这车真在可可西里抛锚，他与才扎西不是死于严寒与饥饿，就是死于身后的匪徒之手。

扎多带伤病员离开后，1月17日早上，索南达杰带车队出发，前方是租来的卡车，后面是西部工委的北京吉普，中间夹着几辆盗猎者的车。风雪交加中折腾一天只走很少的路，天黑后便宿在大雪峰上。索南达杰让卡车车厢上的盗猎者下来，坐在驾驶室里，否则会冻死。他自己驾车出去寻路。

这些盗猎者中后来被抓住的人供认，他们夜里悄悄商量，想把索南达杰吉普车下面的机油帽拧掉，这样第二天开不多久机油漏掉，索南达杰困住，他们乘机逃跑。可晚上一直没机会下手，索南达杰手持冲锋枪守夜，一夜没睡。盗猎者于是密谋了另一方案——把西部工委的人抓住，再赶上扎多，抢走伤员。

这一夜奇寒难忍，索南达杰走到靳炎祖和韩伟林跟前问：“有没有冻坏脚？”给他们脱下鞋来替他们揉脚，生怕二人入睡后冻伤。如是者一夜三次。

18日走了大约四五十公里，来到太阳湖附近的马兰山，此处地面犬牙交错，北京吉普颠簸严重，索南达杰已经三天没吃饭，几天没睡觉，身体极度虚弱，受不了颠簸，于是坐到老马的卡车上。卡车比吉普车平稳一些。西部工委的北京吉普里只韩伟林和靳炎祖两人，以及所有的资料、笔记、地图、行李和几十条枪。

行至太阳湖西岸时，索南达杰所乘卡车两个左轮爆胎，索南达杰对韩和靳说，加速前进拦住车队，让他们烧水做饭，“几天没吃饭了，一会儿我们过来喝个热茶。”

靳和韩领命而去。晚上8点，他们在太阳湖南岸赶上大车队，让租来的车去

接索南达杰，其他所有的吉普车和大车排成“一”字形，他们则将西部工委的吉普车停在车队的对面。“好好好！”盗猎者连连答应。

韩伟林坐在驾驶位上，下体裹着大衣，冷得要命。太阳要落山了，可可西里能将人轻易冻死。靳炎祖好久没见那些人下车烧水，对韩说：“我去看看。”他把冲锋枪放座位上，挎着一把手枪径直走向中间的吉普车。“你们怎么不烧水？”他问。

一人下车说：“水烧着呢，局长，外面太冷了，进来坐。”他们都喊政府的人“局长”，也不知哪来的规矩。一人在吉普车里拿喷灯喷着火，火上是一个铁杯子，里面的水快冒汽了。

靳炎祖好几天没喝水吃饭，那杯热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于是他径直上了后座。副驾驶位上一人急转回身，一把抓住他头发，旁边的人抓住他胳膊，外面的人打开门，将他三下两下拉出去，正想挣扎时，一个铁棒砸在腰上，将他打翻在地。

韩伟林正在车上昏睡，什么也没看见。一个盗猎者走过来招呼：“我们茶烧好了，你把碗拿过来。”

韩伟林比靳炎祖警惕，说：“不要了，我不喝茶，”他又补了一句，“再说我也没有碗。”

“没关系，我们有，给你端过来。”

那人一手端着碗开水，一手托着碗炒面过来。韩伟林把冲锋枪放副驾驶座上，打开车门，两手去接水和炒面，眼看要接到时，那人手一松，两只碗掉在地上，韩伟林“啊哟”一声，那人顺势抓住他的双手往外急扯，韩伟林腿上裹着大衣，无法借力，“扑通”摔倒在地。一盗猎者从另一边打开门，拿起冲锋枪，七八个人围上来毒打，打昏过去，醒来再打，很快身上血肉模糊。

一个年轻人说：“干掉他！”一个老者劝住说：“人不要害，人不要害。”意思是不要杀人。

盗猎者将两人扔到西部工委的吉普车里，韩伟林被反绑在驾驶座上，嘴里塞了床单。靳彦祖被反绑在后排座上，头被狐皮帽套上，挡住了眼睛。韩伟林虽不能动，但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他眼看盗猎者拿出吉普车里的几十支枪，装上子弹。

眼看他们人手一枪，排兵布阵。

眼看他们将车发动，一辆辆车排成弧形，面对索南达杰来的方向，形成半包围圈。

眼看车灯熄灭，可可西里陷入沉默和黑暗，像死亡一样令人窒息。

眼看远处车灯闪亮，索南达杰来了！他的车在车阵前50米停下，过了几秒钟，索南达杰下车，像是有所警惕地慢慢走过来。

眼看盗猎者们慌乱起来，举起枪，枪口对准他。

索南达杰下车前，他的司机听到他自言自语：“可能出事了。”他拔出那支生锈的54式手枪，“太大意了。”他说，然后走上前去。

伤员的哥哥从对面走过来，好像与他打招呼，走到跟前，那人突然一个虎扑将索南达杰抱起，两人撕打起来，只见索南达杰一下将其摔在地下，抬手一枪，那人再也不动。54式手枪居然打响了！

枪声“叭叭叭叭”响起，一排排子弹射向他。所有车灯打开，照着索南达杰。他手持54式，冲那一片车灯射击，就像舞台上的孤胆英雄，又像一只藏羚羊，在

灯光照射下失去视觉，任人枪杀。索南达杰似乎中弹了，一条腿跪下，艰难爬起绕到车后。人看不见了，但枪声持续，韩伟林和靳炎祖不断听到“哗啦”、“砰砰”的声音，那是子弹击中汽车。后来方知，索南达杰凭一支旧枪打烂了大部分车灯。

枪不响了，可可西里静悄悄的，一片死寂。

过了好久，一个盗猎者冲索南达杰的卡车司机喊：“把车开走，要不吃肉喝汤一块干！”

那司机“轰轰”地将车开走，灯光下，只见索南达杰匍匐于地，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一动不动，犹如一尊冰雕。

没人敢过去。即便死了，他也令人胆寒。

第四章 爱情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香雾中 蓦然听见你诵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我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十八 我要去远方

这年夏天，嘎玛经商至青海治多，他听说这里有政府收缴的金子出售。一个当地官员将他领到一个仓库，那仓库离他后来的朋友扎多家只有几百米，里面堆着上千张藏羚羊皮。“我们县委副书记为收缴这些东西牺牲了。”这个治多人说。

嘎玛对藏羚羊皮不感兴趣，但他从此知道西部工委的故事。

这时的嘎玛已经商至中国各地，他有时腰缠万贯，有时一贫如洗。有时住有金把手的高级酒店，有时缩在五块钱一夜的车站旅社；他有时灯红酒绿，沉溺于应酬游乐，活脱脱一个生意人；有时在孤独的旅途中，他带着经书，从信仰中汲取力量，又如一个虔诚的苦行僧。

在他充满大起大落的一生中，如果让他回忆，他会首先想到什么？

2006年6月的一天，我在成都与嘎玛聊天，问他这个问题。

“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在藏北做生意。”他回答。

一位朋友曾将他带到深圳一家俱乐部，让他喝下一杯饮料，据说这饮料能让人沉于冥想，把头脑完全打开，思想如一支利箭，射出500年。

嘎玛静静躺在床上，迪斯科音乐响在耳边，心中却一片空明，音乐丝毫不影响他的思绪。他毫无阻挡地接近自己的过去，看着自己的人生。就像在电脑上使用“谷歌地球”，似乎可以将地球放在手里，超然地看着它。

嘎玛闭上眼睛，手中的“地球”不断放大，他将自己投入进去，如长着翅膀的神明，飞速冲向他曾经的人生。他冲下去，冲下去，对着地球上嘎玛桑珠的足迹俯冲下去……他看见爷爷牵着白马，驮着经书，偷偷跋涉在山林里；奶奶带他骑着白马去拜见阿达拉姆，女活佛长长的头发边缘闪着光，她将一针麦芒从嘎玛眼中取出，他睁开眼睛——啊，他看到残破而雄伟的娘拉寺，在太阳下悲怆地矗立着；他看到妈妈在桌子前，督促哥哥仁青桑珠学习藏文，风很大，妈妈用手护着酥油灯，酥油灯将如凯家照得温暖明亮。

他从热曲河飞过去，看见那嘎玛怀着当个伟大人物的梦想，在大雪中欢唱着“嗡嘛呢呗咪吽”，走向拉萨，走向山南，走向日喀则……他又飞走，飞到那曲，飞到阿里，飞到玉树，飞到西宁……他看见那一个个留着大辫子的嘎玛不停地走着，腰间挂着长刀，笑着，交朋友，赚钱，读书，大把地花钱……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眼睛像波斯美酒一样明亮，冲他莞尔一笑，那笑如同月光，令大地宁静；他看见自己关进监狱里，在那地狱般的地方，他看见了香曲多杰，看见了佛祖，他得到力量，终于从地狱中飞升。

最后他要降落了，像安宁地入睡一样，他轻轻降落到一片沙漠。他忽然感到渴，感到累，他看见自己沉重的脚步艰难地挪动，身上背着60公斤的货物，还推着一辆满载货物的自行车，脚和自行车时不时陷到羌塘荒原的沙地里。太阳在头顶烤着他，前后左右都是无边无际的荒漠，他着急，慌乱，渐渐绝望。他已在荒漠中走了一天，可找不到人家，找不到水源。他舍不得扔掉货物，那是他的希望所在，他要凭这些衣服、鞋子、电池和小录音机换来爷爷生前没得到的转经筒。

嘎玛盯着自己的脚步，那脚步机械地挪动，虽然艰难，但不犹豫，因为它们知道，如果原路返回，很可能再也支撑不了漫长的旅程，也许水源就在前面，牧人的炊烟就在前面。嘎玛清清楚楚看着17年前的脚步，迈过了沟沟坎坎，迈向一个商人从未到过的荒野。“我要去商人从未到过的地方。”他听到那20岁年轻人的誓愿。

嘎玛没有再飞走，他盯着自己在羌塘荒原的脚步，沉醉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定格在这疲惫却不放弃的脚步上，他一生事业的最初几步，远比后来的巨大成功与牢狱之灾更值得他怀念。

嘎玛的冥想停留在1988年5月，到拉萨的几个后，他的第一次生意之行。

他想用几个月的时间做点生意，为爷爷买转经筒。他拿着大表哥多登的16000元本钱，跑到八廓街购进许多百货。其中进货最多的一家百货店，是如今的八廓东街25号，一家“萨陀”唐卡画店所在的地方。嘎玛要质量最好的货物，其他商人购进的人造皮衣20元，他却买进50元的好货色。有人对他说：“你买错了，你出去卖，没人知道你的货好。”嘎玛心里嘀咕：如果卖不出去，可以带回家自己用嘛；便宜货要是卖不出去，带回家给乡里人穿多不好。

嘎玛问表哥：“有没有商人没去过的地方？”他总认为自己很笨，羞怯与人竞争，所以想去没商人的地方。

藏区给了嘎玛巨大的空间，一眼望不到边的高原上，有许多地方极少有商人的影子。1988年5月28日，兄弟二人租着一辆卡车，拉着五六吨重的货物离开拉萨，一星期后赶到拉萨西北数百公里外的羌塘荒原，驻扎在那曲地区尼玛县的一个村子里。

这时又来了三个贡觉老家的商人，嘎玛提议大家到远方去，四个人兴冲冲背起货物上路了，嘎玛用一辆自行车驮着货物，身上还背着一个大包，走到中午，水喝光了，不见帐篷的影子，脚下是荒漠，上面是烈日，四个人头晕目眩，又渴又饿，把货物打开，拿出糖果来吃，可一吃到嘴里，嘴巴立即被粘住，就像那沙漠滞住他们的脚步。嘎玛回头看三个老乡，一个个面如土色，嘎玛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死在这里？”

他昏昏沉沉地想：“嗯，我终于找到一个商人没来过的地方。”

四个人在荒漠里拖成一条线，缓慢挪动着，不知道方向，只看见荒漠与远山。在他们四周100公里内，分布着藏北高原上一座座高山：达日格、卓布、尕阿鄂玛、阿崩日、木嘎各波、查乌托迭、青扒贡陇，高度分别是6037米、5866米、5383米、5891米、6289米、6138米、6336米。往东南方向300公里，则是念青唐古拉峰，海拔7162米。

嘎玛和朋友们在群山中跋涉着，走到傍晚，看到远远一座山的半山腰有云汽缭绕，“那里有水！”嘎玛喊。如一条鞭子痛打在疲惫的老马身上，那云汽振奋了绝望中的人们，他们挣扎到山上，山坡下，一个湛蓝的大湖刺入眼中！

嘎玛嗓子里发一声低叫，扔下货物，抽一条装着炒面的口袋，骑自行车顺山坡冲下去，如果不是下坡，他就再没力气骑过去了。他的眼前模模糊糊，只看见那蓝蓝的颜色，不管山路崎岖，也意识不到翻车的危险，一任自行车冲到水边，扑倒在地，将脸浸在水里灌了几口水，耳朵“嗡嗡嗡”叫着，再也没有知觉。

等他醒过来，已不知过了多久。他从口袋里拿出炒面和水吃了，一下有了力气，将水装到炒面袋子里，推车上山。因为布袋子里有炒面，并不漏水。

来到山上，只看到几堆货物，却不见了伙伴，往远处一看，三个人正踉跄着奔向一个帐篷。嘎玛骑车追上，让他们喝水吃糌粑，大家吃完精神大增，回转身背上货物来到帐篷。一见主人好不惊喜，原来那牧人曾骑马到嘎玛驻扎的村里买过货物。因为他手头没钱，嘎玛赊给他一双球鞋和一个录音机，等他把山羊绒卖掉后，再还他钱。那个时候，商人赊给牧人商品不必担心，“诚实守信”是牧人骨子里的信条。

嘎玛请他帮自己卖五双球鞋，减轻了一点负担。四个伙伴当晚宿在水源的草

皮上，他们拿出录音机，放上流行歌曲，疯狂跳舞，捉对摔跤，好不快活。

生怕失去水源，他们第二天顺着河边走下去，终于找到一个村子，那里从未有商人去过。村民们热情围上来，给四个商人一顶帐篷住下，然后货物摆开，人们就一群群地来了。四个商人之间立即有了竞争，那三人都三十来岁，能说会道，嘎玛脸皮薄，不会吆喝叫卖，只好等他们卖完了自己再卖。好在牧人越来越多，人们骑着马源源不断而来。

嘎玛成本50元的衣服，要价59元，牧人拿山羊绒来换也行。当时山羊绒业务由政府外贸公司垄断，市场价每斤100多元，他们只给百姓12元，而且严禁私人经营，因此路上到处是关卡，一旦发现私人买卖就没收。嘎玛想把百货换成山羊绒，回到那曲去卖，这样一趟就做成两笔生意。只要能通过关卡，肯定能赚大钱。

嘎玛卖完货物后挨家挨户收山羊绒，他比政府出价高，不是13块，不是14块，而是18块。嘎玛第一次正式做生意，就表现出他后来一贯的经商风格：高价买进，高得出乎卖者的期望。这倒不是什么商业策略，这个刚出家门的年轻农民没什么心计，他只是觉得多给别人一点，就是行善积德。他从小所受的佛教教育，指导着他的商业行为。

嘎玛与一个伙伴走到一户帐篷，这里只有一个年轻女人和她的孩子，没见丈夫在家。同伴喜欢那个女人，问：“我们今晚住这里行吗？”

女人高声回答：“可以啊！”

嘎玛从未经历男女之事，但再傻也看出伙伴与那女人间的眉来眼去，住这里晚上会发生什么？想到这一层，他的脸立即红了，似乎要行不轨之事的不是他们，而是自己，他当即说：“不，我要回去！”

同伴与女人劝他住下，但嘎玛背起山羊绒抬脚就走，在他心中，男女之事很脏。他一个人背着夕阳走，走出好远，同伴背着东西呼哧呼哧追上来，一边跑一边骂：“你太笨了，那里干净得很，你还不住！”

在嘎玛的鼓励下，其他三人也收了一些山羊绒，但他们本钱少，嘎玛借钱给他们，大家一共收了400斤，其中嘎玛最多。但赚了钱大家平分，不会因为嘎玛的本钱多就多拿红利，这是当时藏族人做生意的规矩，情义比钱重要。

他们租了五头牦牛将山羊绒驮回尼玛县，表哥听说嘎玛差一点丧命沙漠，严禁他擅自出门。但他正有事回拉萨，前脚出门，嘎玛后脚就跑，带两个麻袋往东北方向走去，那里有一座山，他想，山背后肯定有人家，他要翻过去。他总是乐于寻找那没人去过的地方。

爬上山顶，眼前一片平原，极远处有三个白帐篷。嘎玛有点害怕，不知道天黑前能不能走到那里。在荒漠里，天黑前走不到帐篷非常危险。嘎玛鼓起勇气朝帐篷奔去，天渐渐黑了，什么也看不见，好在听到了狗叫声，循着叫声摸到帐篷。

帐篷里是一对老人兄弟，哥哥名叫桑杰。他们不敢把山羊绒卖给嘎玛，怕政府知道，但羡慕嘎玛腰间一把长刀，那刀似乎可以用来对付野熊。“你的刀子卖不卖？”桑杰兄弟问嘎玛。

“五斤羊绒换。”

成交。第二天早上，嘎玛帮他们用铁耙子从羊身上拔羊绒，并央求他们多卖点，他给18元的高价，桑杰兄弟同意卖给他40斤。嘎玛随身带着一个小秤，但桑杰兄弟不放心，用自家的秤称了40斤给他。盯着那两麻袋羊绒，嘎玛觉得不对劲，为什么那么大两堆只有40斤？

“绝对不是40斤，你们吃亏了。”嘎玛说。

“绝对没问题，我们是从公家买的秤，还用这个秤卖了几百斤给公家呢。”

桑杰说。

嘎玛手脚利索地把羊绒掏出来，用自己的小秤一点点去称，40斤变成了80斤！原来老人手里是一支公斤秤。

桑杰兄弟二人愣了一下，突然抱着嘎玛的脖子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啊，生意人哪有这么好的？你前世是不是我们的儿子？”然后把山羊绒一把把塞给嘎玛，又送他很多小羊羔皮。嘎玛也送他们每人一件衣服，三个人像父子一样亲热，“你明年一定再来啊。”桑杰兄弟一遍遍叮嘱他。

三个人都朴实得不知变通，本来嘎玛可以付80斤的钱，但既然讲好了40斤，他还是卸下来一半，背着行李继续奔走，又收购了100多斤。他可以住在人家的帐篷里，第二天早上再回，但想着他的转经筒和《甘珠儿》，想着爷爷，想着回家送给奶奶和妈妈的礼物，热切地想着这些，他一刻也不能停了，背起200多斤的货物连夜往回走，走了整整一夜一天，回到驻地，累得瘫在地下，再也站不起来，伙伴们将他拖进屋子。

这时山羊绒价格一直上涨，收购800多斤后，嘎玛没本钱了，再以每月百分之三十的高利借钱，继续收购。他的大胆令别人惊讶，因为关卡还牢牢卡着他们的脖子。但嘎玛有十足的信心，他从小就坚信：“我一定会发大财！”这是他的舅舅喇嘛告诉他的。

他小时候，舅舅喇嘛给他看手相说：“这是很有财富的人啊，但你们家族不长寿，要念长寿经啊。”

奶奶吓得哭起来：“你帮帮我孙子吧。”

舅舅喇嘛说：“没关系，念经就可以，我能带他长寿。”舅舅喇嘛也曾给嘎玛的父亲看过手相，说他不能长寿，没有办法解决。后来嘎玛的父亲早逝。

既然舅舅喇嘛说自己能有财富，嘎玛坚信自己要发财。这次从拉萨离开时，他也曾找喇嘛算过两次，结果也令人满意，因此他没什么好怕的。

嘎玛找了辆车拉他的羊绒，其他20多个商人见他胆大，也托他捎带。嘎玛相信他的运气，下决心闯一闯关卡，而且是白天大摇大摆过关。快到关卡，远远见七八个人站在桥上，司机把车停下说：“嘎玛桑珠，你最好不要把羊绒带过去，他们不但没收，还会打人呢。那些人很坏，是专门雇的打手。”

嘎玛也担心起来，他远远看一眼关卡上那些打手，闭上眼睛，在心里又算了一卦，仍是上上大吉。他问其他人：“我下决心了，你们怎么办？”

“你那么多羊绒都不怕，我们怕什么？”他们说。但嘴里刚硬，却一个个搭其他车先自溜了。

嘎玛一人押着满载山羊绒的汽车，冲向关卡。当时藏区有些地方违法私设关卡，雇流氓打手敲诈勒索，无法无天。一个月前，一个商人的大批山羊绒在此被抢，还遭了痛打。他去西藏自治区找关系，拿来一个政府介绍信，又从老家带来一队人马，准备先礼后兵。因来势汹汹，关卡把部分山羊绒还给他，但有不少已被私分。

车驶到桥上，几个人冲上来截住问：“车上带的什么？”

“山羊毛。”嘎玛回答。

“有没有山羊绒？”

嘎玛开玩笑道：“满车都是山羊绒嘛。”

一个当官的一挥手：“让他走！”

此时关卡查得紧，没有哪个敢大白天带羊绒过关，关卡不信这个年轻人有那个胆量，因此懒得一袋袋打开检查。嘎玛开过关卡，没开出200米，车嗡嗡叫着

陷在泥地里。嘎玛下来挖车，直折腾了一夜，车越陷越深。车太重了，嘎玛只好把货物卸下来，又怕关卡的人过来发现真相，身处危境，真是又气又急。但让他最懊恼的还是过关时不得不撒谎。

包括嘎玛在内的许多藏人认为撒谎是大罪。许多年后的 2001 年，他老家的根仓多登有一支防狼的小口径步枪，听说私藏枪支违法，他从山上骑马进城，将枪缴给公安。这一送却送出了毛病，因“私藏枪支”被判三年。嘎玛去上访，不料惹恼了当权者，反判成五年。嘎玛又找律师，事情越闹越大，管事者害怕了，与嘎玛妥协，出主意让根仓多登装病，监外执行，放出来了事。

嘎玛进看守所把实情告诉他：“你必须病一下，很容易，天天睡觉就行。”

“唉呀，我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怎么就病了呢？”根仓多登说，“不行，就是枪毙，我也不撒谎。”

“你要不病，就在里面呆五年。”

“五年就五年，反正我不撒谎。”

他说啥也不病，嘎玛气得大骂，好在他势力大，强行让根仓多登“病”了。根仓多登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念经刻玛尼石，以赎撒谎的罪过。

其他商人在前面等嘎玛，等了一夜不见人影，以为羊绒被没收了，血本无归，有人居然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嘎玛终于将车挖出来，急急逃离关卡，迎面碰到表哥多登坐车来接。嘎玛眉飞色舞讲关卡历险，对他来说，闯关卡已不陌生：几年前去昌都卖虫草，他顺利通过澜沧江上的检查站；今年上半年，他带着死去的扎那老人奇迹般冲过六道卡子，回到拉萨。在无比凶险之地，他总能懵懵懂懂闯出一条生路。他从不认为自己胆大心细，或神机妙算，他把一切归于对佛教的虔诚和佛的保佑。

等山羊绒卖完，兄弟二人带着钞票悄没声来到那曲赛马场，那里一望无际，两人脑袋对着脑袋点钱，点完了，你看我，我看你，抓耳挠腮，喜不自胜——居然赚了10万块！

嘎玛不想回家了，这财富游戏刺激着他玩下去。表哥已有三年未回老家，他想带钱荣归故里。兄弟俩赚的钱不分你我，嘎玛请哥哥带钱回家，为两家各买个转经筒，他在拉萨继续做生意。

数月之后表哥从贡觉回来，他说仁青没买转经筒，因为喜欢读经，去德格印经院买了《甘珠儿》。但提到仁青，表哥欲言又止，嘎玛追问，表哥左顾右盼，支支吾吾。此时在拉萨，仁青的故事已在老乡与亲戚间风传，但没人敢告诉嘎玛。

“到底怎么了？”嘎玛生气地问。

表哥只得告诉嘎玛真相：“仁青还俗了，因为一个女人。”

嘎玛如遭五雷轰顶。他一言不发，独自走开。走上修行路的哥哥曾是他的偶像，现在这偶像忽然倒塌。他偷偷哭泣，甚至宁愿仁青死掉，也不要给家族带来这一耻辱。

在其后的一年里，从未有人见嘎玛笑过。他多年对哥哥避而不见，直到仁青有了四个孩子。兄弟二人终于见面后，都对此事讳莫如深，这是他们一生最不敢揭的伤疤。

十九 仁青桑珠还俗

2006年10月11日，仁青桑珠从拉萨来到北京。福特汽车公司请仁青桑珠参加授奖答辩，他因从事环保活动获得了20万元奖金，后来全部捐给了村里。扎西多杰作为他在环保上的引路人和朋友，兼翻译，专程从青海玉树赶来北京帮他答辩。

答辩之前，在中关村富驿时尚酒店817房间，仁青在床上盘膝而坐，我和扎多听他讲自己的故事。讲到还俗，扎多问：“怎么回事？”

他们相识几年，并成为最好的朋友，但仁青从未对他提过此事。

仁青不好意思地笑笑：“那，就是碰到女人了嘛。”

扎多说：“你说仔细点。”

“那就是，欲望嘛，”仁青呵呵笑道，“不想仔细说。”

“仔细说说嘛。”扎多坏笑道。

仁青低下头，过了一会儿低沉地说：“我这一辈子，除了妻子，从来没有摸过别的女人，也许我们俩有这个缘分。但我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痛苦，那一个瞬间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这个痛苦将一直陪伴我，直到我死。”他的眼泪流出来。

他用T恤擦着眼睛，忽然抽咽起来，一直持续了将近五分钟。“现在看见喇嘛们在法会上诵经，我每次都流眼泪，因为我从小祈愿的一切都落空了。”他抽泣着说。

扎多和我面面相觑。谁也没想到，这个天性快乐的42岁男人会这样悲伤。

仁青似乎在自言自语：“我确信释迦牟尼所教导的是真理，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成为穿袈裟的人是我的梦想，我所向往的喇嘛，不是有名有利的大喇嘛，别人都说‘哇，人家大喇嘛多风光！’我不喜欢这种。现在很多喇嘛很会赚钱，但可能不会修行。我最敬仰的是香曲多杰，还有自己的师傅嘎旺法王，他们在山里打坐闭关，没什么奢求，只要一碗饭就行了，但他们的修行对人类有帮助，我期盼成为这一种喇嘛，但我为了一个女人失去了这个机会。我经常祈祷，下一生一定再做喇嘛。”

他擦一擦眼泪，继续说：“我的妻子叫香秋王毛……”

我写下她的名字，扎多提醒我说：“‘毛’是毛主席的毛。”

仁青很惊奇地问：“怎么，是毛主席的‘毛’？”

扎多说：“对，也是毛病的‘毛’。”

“啊？毛主席的‘毛’和毛病的‘毛’，这两个字怎么能一样呢？”仁青不认识汉字，觉得惊奇无比，说完一边擦眼泪，一边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1987年，当仁青大病时，比他大9岁的香秋王毛一直服侍他。看到她爱怜痛苦的眼神，仁青心里居然美美的，他不知道香秋王毛为什么那么痛苦，是爱他吗？他感觉灾难要来了。

病好之后，两人更加亲近。虽然香秋王毛晚上被人偷偷亲了一下，她怀疑是仁青干的，当时大为生气，却也没影响两人关系。后来寺院一时需要房子，他们两人挤在厨房的一间大房里三天，但各有各的床，那就是嘎玛去给他送牛肉看到的房间。

“最后一个晚上，我忽然对她有了兴趣，要钻进她的被窝。她没有反对，这一下子，我就完了。”仁青说。

讲到此处，仁青身体扭来扭去，嘿嘿地笑着，忸怩之极，嘴里不断说“左左，

切左左”，那是藏语“肮脏”之意。

仁青第二天早上睁开眼，见到身边躺着的姑娘，比魔鬼睡在身边更让他惊惶，他急急跑出去，手足无措。再见到姑娘时，她与他一样，面红耳赤，不敢相对。仁青去念经，可他忽然觉得自己很脏，不配与喇嘛们坐在一起。没过几天，香秋王毛悄悄离开了寺院。

随后几天，内心的折磨令仁青形销骨立。他确信师父嘎旺法王知道一切，只是不问他。“佛知道一切，”仁青想，“我必须告诉他们。”

他去找师父，在寺院中迎面碰到嘎旺，仁青停住脚步，嘎旺也站住，用慈悲的眼神看着他。仁青低首道：“阿活嘎旺(嘎旺大哥)，我犯错了。我已跟她发生关系，再也没法当喇嘛，没法留在寺院了。”说完痛哭起来。

嘎旺法王眼泪流出，他一直对仁青寄予厚望。法王说：“你要重新做喇嘛，重新开始。”

“不，我已不干净了，我不能一会儿僧人，一会儿俗人，一会儿又是僧人。寺院和袈裟是神圣的，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家族的耻辱，让家里人伤心，我要出去流浪，不再回来。”

“你不要走，在寺院继续整理经文吧。”嘎旺说。

仁青从此脱去袈裟，在寺院中干活。两个月后香秋王毛回来了，她告诉仁青自己已怀孕，但除了哭泣，她不知道怎么办。

母亲知道消息后伤心地哭了，暗示儿子，她可以替他养着孩子，他继续当喇嘛。但仁青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虽然也有普通喇嘛有家室，但他认为那是不纯洁的，他无法饶恕自己。

妈妈的痛苦又一次发生在儿子身上。妈妈从小盼望做个尼姑，可被家里逼着嫁给了仁青父亲。妈妈流泪为儿子祈祷：“佛祖啊，度母啊，我儿子今世只能做俗人了，请大发慈悲，让他来世再修行，重新做一个喇嘛。”

仁青无法忍受内心的痛苦，离开寺院去德格印经院。嘎旺法王把小褂脱下来给弟子穿上。

仁青向东跨过金沙江来到四川德格，白天转印经院，在大街上闲逛，晚上睡在一位格萨尔说唱艺人的阳台上。天时常下雨，雨点打在屋檐上，一片细密的响声。外面的小溪流着，工人在隔壁印经院的柱子上凿刻图案……“刷刷刷”，“哗啦啦”，“砰砰砰”，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将他惊醒。他坐起来，内心纷乱，提起笔，用六世达赖诗歌的形式写了大量四句诗歌，思念上师，忏悔罪过，悲伤自己再不能穿上袈裟。

“有没有写诗怀念你的女人？”我问。

“有，有。”他承认，然后摊开两只手说，“我一只手是忏悔，一只手是爱，两只手一直在打架。”

“思念上师的诗写得多，还是思念女人的诗写得多？”

他不好意思地说：“还是想女人的多。”自己也觉得可笑，两手拍着两膝，“哈哈哈哈哈”，仰天大笑。

我想起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首情歌：

观想的喇嘛尊容，

怎么也不显现；

没想的情人脸庞，

却在心头灿烂。

仓央嘉措是藏族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十四个达赖喇嘛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世。他在故乡农村生活到14岁，不像其他达赖喇嘛幼年就被奉为神明。他幼时形成了自由奔放的性格，无法忍受布达拉宫刻板的学经生涯，时常易服溜下红山，混迹拉萨街头，不守清规戒律，放荡不羁，时不时发生风流韵事。他写道：

住在布达拉宫，

我是持明仓央嘉措；

行于山下拉萨的民居，

我是浪子宕桑汪波。

他写了大量诗歌，赞颂女人，也表达对修行的理解和观想，很多人将他的爱情诗作出宗教上的解释。

他有两首诗，描述与情人幽会的情景：

看门的大胡子老狗，

你的心比人要乖：

别说我夜里出去了，

别说我早上才回来。

入夜去会情人，

破晓大雪纷扬。

保不保密都一样，

脚印已留在雪上。

仓央嘉措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生于西藏南部门域的宇松，属于门巴族，他的家族信奉红教(宁玛派)。

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藏族人尊称其为“伟大的五世”)于康熙二十一年圆寂后，西藏政府首领第司桑结嘉措秘不发丧，假借五世达赖名义独揽政权。后清廷发现，严词询查，第司桑结嘉措乃于五世达赖圆寂15年后，奉早已被认定为转世灵童的仓央嘉措坐床，是为六世达赖，时年14岁。

第司桑结嘉措与准噶尔部可汗联合，反对代表清廷治理西藏的蒙古族人拉藏汗。康熙四十四年，拉藏汗杀死桑结嘉措，召集各大寺活佛对仓央嘉措进行批判，称他“不守清轨”、“非真达赖”，企图废黜其第六世达赖佛位。但宗教界意见不一，后康熙遣使令达赖赴北京请旨，康熙四十五年，六世达赖经过青海湖附近时病故，终年24岁。但有些传说称六世达赖并未在青海湖圆寂，他后来传法于中原、内蒙古，甚至印度和尼泊尔。

仓央嘉措极富才华，其诗歌珠圆玉润，300多年来一直在藏区传唱，几乎每个藏族人都都会唱他的情歌。他有一首诗表现了修行与爱情之间的矛盾：

如果遂了美人心愿，

今生就与佛法绝缘；

若到深山幽谷修行，

又辜负了姑娘芳心。

我问仁青：“你认为自己的爱情脏，那么仓央嘉措的爱情也脏吗？”

“一个走路的人，无法与飞机相比。他是佛，他的爱情不是一般人的爱情，是有特殊使命。”仁青说。

扎多笑道：“好比以前共产党员进行地下工作，为了保护自己，扮演假夫妻。”

仁青说：“六世达赖喇嘛有一首诗，名为《洁白的仙鹤》，看起来是爱情诗，可他另有深意。”

听到这里，扎多轻声唱了起来：

“洁白的仙鹤，

请把双翅借我，

不会远走高飞，

只到理塘就回。”

仁青说：“这歌听起来好像说有个姑娘在理塘，他去看望。其实六世达赖喇

嘛在暗示自己转世的地方，后来他的转世灵童就在理塘发现。很多人说，六世达赖喇嘛的情诗就是想女人，其实这是他这一世达赖喇嘛的表达方式，他用情诗表达未来的声音，而我呢，”他叹了口气，“想女人就是想女人。”

扎多说：“人家的爱情是中央领导讲话，他的爱情只是老百姓呻吟。”

我与仁青大笑。

我知道，其实藏族人也有一首民歌是这样唱的：

莫怪活佛仓央嘉措

风流浪荡，

他想要的，

和凡人没什么两样。

仁青在德格流浪时，除了转印经院，还转外围的大圈，转经时要经过铁索桥活佛唐东杰布的经堂。唐东杰布是600年前的活佛，一生致力于在大河上为百姓修桥，也是藏戏的创始人。转过唐东杰布的经堂，在半山腰上迎面有块大石，石头旁开着一朵鲜红的花。仁青盯着这朵花，像看见美女，又像看见法师，既高兴，又悲伤，再也不想离开。他坐在花旁写了各种悼歌，忏悔，思念，一颗心被那朵孤单的花搅得翻江倒海。他每天上山与那朵花相会，在她旁边一坐就是半天，痛苦的心灵似乎在向她诉说。夏天结束了，那朵花没有凋谢，每天绽放着等待仁青。有一天仁青想把她带回家，于是连根刨起，可在半路她就死掉了。仁青伤感欲泪，这花朵似乎启示他：贪念一起，他最珍贵的东西便要枯萎。

一个多月后，三弟晋美朗加来德格找他，仁青坚决不回家，三弟说：“你不回家，我也不回，我们都不管母亲了。”此时嘎玛已去了拉萨。

仁青只好重回娘拉寺，以俗人身份继续整理经书。香秋王毛的肚子大起来，他们借了寺院附近一座房子成了家，现在已有四个孩子。

仁青令自己欣慰的是，除了这件事，他成年以来没有违反过任何教义。他在俗世中继续修行，爷爷以前说的话，令他对自己重新有了信心：“最重要的并不是当僧人，而是相信因果。”

这些年来，仁青总结了自己的三原则：真正的因果；自、他一致；无害的行为：如果有真正的因果观念，就不会做坏事，不需要法律和别人来监督。没有任何坏事可以逃过因果，种了青稞，就不会长出苹果，任何行为都会结出果子；而有了真正的因果价值观，就会发自内心地觉得：众生平等，你与我一样；没有你我之别，就不会做出利己损人的行为。

仁青说：“这三个原则是藏民族闪闪发光的核心价值观，它使我的信仰跟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此生没有当僧人的福分了，但我如果能坚守这三条，虽然不能当僧人，我也有活下去的希望。”

仁青承担了整理全部香曲多杰经书的任务。在他这个年纪，当地没有人在修行上比他更好，没有人比他更理解这些经书的意义。他的表现令老师嘎旺法王和弟弟嘎玛坚信，还俗没有妨碍他的修行，他是个了不起的智者。嘎旺活佛对他说：“我死后，经书的希望就在你身上。”

仁青埋头整理经书，15年之后的2003年，这一工作离结束仍遥遥无期。就在这一年，他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机器：电脑。他原来整理的经文需刻木版印刷，但保存木版是个问题，不但怕水怕火，还怕老鼠，已被老鼠咬坏不少。他看到电脑时极度兴奋：佛祖啊，感谢你保佑，我的问题解决了！

他带上老婆孩子到拉萨，租了一个小房子专心整理经书，请人录入电脑。在老家没人知道电脑是什么，连电也不正常。在拉萨请人打一页纸要六块钱，仁青身无分文，嘎玛在经济上支持他，一些佛教界人士也给予帮助。仁青很快学会如何将藏文输入电脑，并教会妻子和孩子们，于是全家日日夜夜在香曲多杰的经文中度过。

仁青在整理中研读香曲多杰的著作，他相信，这些经书会对全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香曲多杰的经书博大精深，数量众多，目前仁青全家整理完的有一万多页。他说，仅从医药部分来说，要把香曲多杰发明的药复制出来，会治好许多人的病。

现在电脑录入的工作快要完成了，但仁青有点患得患失：“人生无常，我不知道有没有福分来做完这件事。”他又流下泪来。

“如果回到还俗以前，你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我问。

“我肯定会当喇嘛，不要女人。”仁青说。

“你有一群很好的孩子，夫妻和睦，他们现在也帮你整理经书，你难道不幸福吗？”

他回答：“做喇嘛可以帮别人脱离苦海，可一个俗人的幸福太渺小了。我如果当喇嘛，那三条原则能实打实地实现，但我现在做的，就像我所说的影子，不太真实，打了折扣。”

二十 耿登丹巴还俗

嘎玛之所以有财力支持仁青，缘于他20年来的各种生意：羊绒、羊毛、羊皮、服装、虫草，但他最成功的是天珠生意。他后来能操纵藏区的天珠价格，所以人称“天珠王”。

在90年代初期的一天，嘎玛在拉萨八廓街看到有人卖很漂亮的天珠，喜不自禁，赊账两万元买了八颗。他从小喜欢天珠，那是藏族人最珍贵的珠宝。他高高兴兴拿回家，不料与他合伙做生意的一位老人将他一顿臭骂：“年轻人懂什么！那么贵的东西怎么卖得出去？！”罗里罗嗦骂个没完。

嘎玛气忿忿转身回到八廓街，不到半小时转手卖出去，赚了八千元。他从此关注天珠买卖。

天珠藏语名为“兹”，主要发现于喜马拉雅山脉一带，是一种宝石，从里到外形成各种图形，有的图形是眼睛，有的是古藏文字母，另外还有宝瓶、莲花、虎齿、闪电、金刚杵。西藏先民传说，天珠是神创造的，是自然生成或天上降下来的。有这样一个传说：天珠是神仙佩戴的装饰物，每当珠子破损，神仙就抛洒下来。

天珠实际是一种石质材料，表面的图纹大部分是人为的。²⁰许多研究者认为，西藏的天珠是古代象雄文明(现今阿里地区)的产物。在古象雄时期，苯教信仰占主导地位，“九”是苯教最重要的数字，所以人们对有九个眼形图案的九眼天珠更加偏爱。

嘎玛对本民族的文化极有兴趣，天珠似乎让他看到古代藏族文化的光辉。按照现代科学技术鉴定得知，天珠绝不是近代人做得出的，其制作方法已失传。在嘎玛看来，天珠是一个密码，能打开古代喜马拉雅高度文明的宝库，而解开这个密码是他的使命。他请仁青桑珠研究天珠，但仁青忙于整理经书，浅尝辄止。他又找到志同道合者苍王·耿登丹巴，一位出色的画家与历史学家。耿登丹巴与嘎玛合作，对天珠研究多年，并将出版一本专著。

耿登是青海安多藏人，出生于艺术之乡热贡地区。他对我说：“在藏语中，天珠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桑培诺布’，意思是‘心想事成的宝贝’。在藏族历史上，没有什么财宝比天珠更珍贵，因为天珠身上蕴藏着藏族文化。藏族人四千年的历史，用什么来证明？天珠能证明！人们说藏族文字四千年前就有了，什么能证明？也是天珠。”

他说，考古发现，四千年之前伊朗、阿富汗和印度都有天珠，那时没有伊斯兰教，没有佛教，也没有印度教，广大的中东、印度和西藏地区只有一种原始苯教。印度教认为西藏的冈仁波切(冈底斯山)是他们的圣地，因为印度人相信，印度文明是顺着恒河从喜马拉雅流下去的。

他和嘎玛相信，那广大地区的文明，发源于喜马拉雅文化。

2006年6月10日上午，我与嘎玛在他成都的家里聊天。他拿着一份《西藏研

²⁰ 白玛多吉先生撰文说：“笔者曾与西藏‘天珠大王’嘎玛桑珠及其他天珠收藏者进行过多次探讨，参阅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天珠的许多论著”，得出结论说：“天珠就是强碱、硝雄蚀刻的工艺玛瑙珠。”他在文章中说，嘎玛桑珠曾将不同类型的天珠送上海硅酸研究所化验，其结论是：天珠图案上的蚀刻花纹除酸碱外，都含有硅酸盐(瓷器上釉的主要成分是硅酸盐)，这再次证明，天珠是人为的，或者说是石头是天然的，而花纹是人为的。

究》杂志给我看，上面有耿登谈藏区“孔子”的文章。有些藏人以为藏族历算是汉族孔子创立，再由文成公主带入西藏。“但在汉地，你们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啊，孔子哪里创过什么历算？但在西藏没人追究，很多人都这么说。”他说。

耿登用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位“孔子”是古代藏族学者宫则池杰。他的研究是颠覆性的。

一会儿，耿登进门，他个子不高，面容黝黑，脑后扎一个小辫子，两个大眼睛放着精光，说话温文尔雅。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手里翻着一本藏族史书《拔协》。他37岁，以前是位喇嘛，后来还俗。

我问：“你为什么不当和尚了？”

“我爱上了一个女人。”他答。

他给我讲起他的故事。

1994年我还是和尚，我画的白度母唐卡得了全国书画展金奖，于是有机会到北京中国书画研究院学习。过藏历新年时，很多藏族人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聚会。联欢会的主持人长得漂亮，身材好，普通话也说得好好听。我问旁边一个人：“她是哪里人？”

那人笑着说：“你是喇嘛，单位也好，她肯定愿意认识你，你请客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

“可以啊。”我开玩笑地说。

没想到他真的认识！半个小时后，他就把那女孩子带了过来。

我好紧张，从来没与陌生女人这样说话。当时我穿的是便服，她不知道我是出家人。

“你是新来的？以前没见过。”她说。

“我刚来北京。”我说。

然后她问我哪里工作，住哪里。原来她的单位在复兴门，而我住西直门，要骑自行车上班的话，经常路过她单位。

她热情地说：“你有时间来我家嘛，我给你做面片吃。”

我说：“好好好。”然后就散了。

那天晚上我很开心，也很害羞，我从来没与一个陌生漂亮女人打交道。后来的几天里，我特别想见她，有一天忍不住了，给她打电话，她说请我客，问我吃不吃麦当劳。

什么是麦当劳？我不知道。在民族饭店边的麦当劳，我点了一个汉堡，几口就吃完了。她吃得慢，一点点，一点点。我吃完了，她问：“要不要再吃？”

我说：“吃好了，吃好了。”我不好意思再要，但我肚子没有饱啊。她说：“我们去河边转转吧。”转来转去，就转到了她家，她家有一盘生牛肉，我吃得非常开心， she就把整箱牛肉送给我。

从此我们有感觉了，她也许喜欢我单纯。我没有告诉她我是喇嘛，不是隐瞒，而是根本没有这种男女间的想法。实际上我已经有恋爱的感觉了，但我不知道恋爱应该什么感觉。

有一天她打电话来说：“你请个假吧。”

“做什么？”

“去五台山。”以前她问我最想去哪里，我说圣地五台山。

“快来吧，我买了去太原的票。”她说。

原来她已经对家里人说她有了男朋友，两个姐姐从拉萨飞来看我，我们四个人去了五台山。这时我们之间从没谈过男女之间的事。

在五台山，她姐姐对我说：“耿登，你们两个赶紧订婚啊。”

我听不懂拉萨话，问：“什么？你再说一遍？”

“你们两个赶紧订婚啊。”

这回听明白了，我吓了一跳，说：“我是出家人啊。”

她惊讶得嘴都合不上了，告诉了妹妹，她妹妹再也不理我。

我也没在乎，我是出家人嘛，你生气就生气吧。我一直是出家人，根本不知道去安慰她，反而觉得这人很怪，怎么又哭又闹，跟小孩子一样？

我们四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睡，我白天走得很累，一下子就睡着了。她要去卫生间，卫生间在外面，她害怕。姐姐对我说：“你陪她去。”我好困啊，嘟囔说：“哪有这样的啊，她一个人去不行吗？我不去！”翻过去就睡了。我出家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关心别人啊，不知道她需要什么。

姐姐生气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们白天去拜佛，有个佛母洞，她不进去，我就用力拉她，她要我温柔一点。唉，我不用力拉，她进不来啊，我觉得女人好奇怪。

我们在黑黑的洞里祈祷，她问我：“你祈祷什么？”

“众生平安啊。”

“还有呢？”

“我父母长寿啊。”

“没有其他的？”

“没啊。”

她就不高兴了。

我们回到北京，她不再理我，我也不敢理她。两个月后我打电话，她还是不理我：“我忙得很，没时间！”

那好吧，没时间就没时间。我很喜欢她，但我是出家人，不能接触女人，不能还俗啊。我在青海民族学院读书时，所有的吃穿都是我师父给的，我到北京也是师父的安排。师父夏日东是有名的大喇嘛，他希望我学成后当寺院的老师。他每天教我，我的书法和藏文基础好，全是老师教的。我要还俗怎么对得起师父？

怎么对他开口？

有一天我到那女孩子家，对她说：“对不起，我是出家人。”

她说：“你骗了我的感情。在我爱上你以前，你为什么不说？”

我说：“我没有故意骗你。”

她说：“北京的藏族人都知道你已还俗了，谁再相信你啊？”

朋友们果然不相信我了。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要回青海见师父，他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我先打电话给青海民院的好朋友华克：“我明天回西宁，你和我一起去见师父，帮我说说话。”

“你是不是要还俗？”他问。他居然早就听说了我的事。

我说：“是。”

他痛哭失声：“我们都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在夏琼寺里做大事，你却自暴自弃。”

我说：“你不要哭。我要对师父说清楚，师父说不行，那我二话不说，北京不回了，学校也不呆，立即去夏琼寺！我发誓！”

我回到西宁，他陪我去见师父。他害怕，带上老婆与我们一起去。我们见到师父，师父正安详地打坐。

我不知道怎么对师父开口。师父是夏琼寺住持，也是青海民院教授，中国藏语系国际佛学院教授。夏琼寺特别有名，是宗喀巴大师的上师确杰顿珠仁青仁波切1349年建的，可以说是格鲁派的第一个寺院，宗喀巴从三岁到十六岁一直在这里学习。我师父是精通显密宗的高僧大德，班禅大师曾说：“夏日东活佛无论在德行、佛学理论还是个人密宗的修持实践上，在整个青康藏地区都出类拔萃、无

与伦比。”这样一个老师对我全心栽培，我却为一个女人辜负了他，我怎么能说出口？

师父见我们来了，高兴地说：“拉木左，你怎么回来了？北京不好玩吗？”

师父特别喜欢我，不叫我名字，总是叫我“拉木左”，就是“画家”的意思，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而且画得不错。

我是青海同仁县人，14岁出家，我哥哥是出家人，我很羡慕他，就糊里糊涂出家了，其实并不了解佛教。我去了很多寺院，学经书，学画画。很多小寺院除了念经、画画，没有哲学方面的学习，我家乡的寺庙也是这样。我看了很多大喇嘛的传记，心想，什么时候我也成为有大智慧的大喇嘛？我的同乡、近代大学者更敦群培曾在支扎寺学习三年，于是我也想去支扎寺学文化。

父亲不同意，我们附近的喇嘛那么多，哪有去学什么哲学文化的？17岁那年我和父亲吵起来，一天晚上拿着18块钱偷偷跑了。几天后家里人找到我，只好把我送到支扎寺。这回我可跟更敦群培一个寺院了。

我在这里跟着大学者阿格雄朋仓学习古文化、藏传因明学(逻辑学)和诗经(诗的理论)。我没有说我会画画，四个月之后还是有人知道了我是个有点名气的画家，寺管会来人问：“你是不是画画的？”

“不是。”我没承认。为寺庙画画要占用大量时间，我只想学文化。

有一天一个喇嘛拿着一个笔记本，看里面《红楼梦》的插图，他说：“啊，真好看啊，如果这画够大的话，我就贴在家里。”

我拿过来一看，随手就画了一个大的，与他手里的一模一样。他立即挂家里，还管不住嘴巴，到处宣扬。

寺管会又来了，说寺里很需要画画的，这里有40个年轻喇嘛，你随便选些人

教教。他们还说，我们知道你的身份了，学经功德无量，画画也是功德无量，否则我们大殿的墙就空着了。

我很固执。我到这里的目的是学文化和理论，不是画画。如果画画，我就没必要来这里了。

他们认为我很傲慢，就去找我的上师。这一天上师讲完经说：“听说你画画很好，但你是不是不想画啊？”

我说：“是的，我要是画画，就没时间学习了。”

上师把我带到经堂，指着墙上一幅壁画说：“那是我画的。”当年他画时，一不小心将颜料洒到袈裟上。当时大学者喜饶嘉措从拉萨来这里辩经，喜饶嘉措大师后来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16年32岁时，在拉萨大祈愿法会上辩经获得第一名拉仁巴格西，是现代最著名的大学者之一。我上师当时是年轻人，什么也不怕，就和大师辩论，结束后喜饶嘉措大师说：“那个身上染了颜料的年轻人辩得很好。”

我仔细看那些画，发现其中我的上师画得最好，心想，我师父是大学者，没想到画画也这么好。

师父说：“你能来画画，也是缘分。”

“好，我画！”我答应了。

寺院允许我不参加其他活动，但分配供养时，我是其他喇嘛的三倍。后来我的名声传开，人家都叫我“画家”了。

几年后我师父圆寂了。我和两个和尚去附近几个县朝拜，先去了夏琼寺，第一次见到了夏日东仁波切，“仁波切”是“无上珍宝”之意，一般的活佛没有这个称号，他是我一生中最尊敬的人。然后我们又去尖扎县的嘎朴寺，拜一个八九十岁的老活佛，我们问他：“我们没有师父了，怎么办？”

他眯着眼捻着念珠，让我们吃核桃。一会儿指着我说：“你们两个去印度，你，”他指着我说，“你去大学。”

他们两个真去了印度，我去了西宁的青海民院，找到在那里读书的老乡，最后旁听在那里当教授的夏日东仁波切的课。这时我什么也没有，没有身份，没地方住宿，一切要他帮忙。他让我和另外一个和尚住他家，旁听他给研究生和老师开的课。我天天参加辩论，认识了年轻教师华克，他也喜欢辩论，是我的老乡，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与他住在一起。

慢慢的我不穿袈裟了，在学校里穿袈裟人家都注意，不方便。我开始接触女同学，后来慢慢对女人有了感觉，有时看到一个女人会想：“这个女人很漂亮啊。”

一个女孩子有点喜欢我，我也有些喜欢她，我们一起玩，她喝醉了，要我也喝酒，我说我是出家人啊，不可以喝酒。我一直控制着自己。

在大学的几年，我一边学习一边在几个寺院画唐卡，也开始学素描和油画。有一次我临摹了几幅大英博物馆的释迦牟尼49岁雕像。我的画轰动了，因为藏人从来没有画过有胡子的佛，我画了胡子和耳环，头发也画得很长。后来我发现我的画到处有挂的，去拉萨时也看见了。

一个女孩子想跟我学唐卡画，我们经常接触，有一天晚上我们去跳舞，我把手放到她的腰上，衣服很薄，我感到她的体温，很害怕，心“怦怦”乱跳。朋友们跳啊，唱啊，很高兴，我却很矛盾，因为我知道，我是和尚，我不能与女人一起玩。

那时我生活中出现的几个女人对我都很好，像对弟弟一样照顾我，让我觉得女人真好啊，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这个时候已经不对劲了，每天晚上对华克讲那个画画的女孩子。

他说：“你可能喜欢上她了。”

有一天我与她一起吃饭，玩到半夜，我将她带回家。我弟弟在家，睡不下其他人，华克的房子大一点，我过去敲开门说：“你去我家睡，我在你这里睡，我带来一个女人。”

“什么！女人！你是和尚啊！”他叫起来。

“我们不是那样，是有距离的。你快去吧。”

我把华克赶走，与她坐着聊天。她说：“你以后肯定要还俗的。”

“我绝对不会！”我发誓。

但说着说着，我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好柔软，我很激动，但我心里马上难受起来：“是啊，我是和尚啊！”

我睡在床上，她睡在沙发上，我们一直手拉着手。我是出家人，她知道我的痛苦。

朋友们知道了我们的事，开玩笑说：“反正你以后要还俗，不如现在就还嘛。”

我非常生气，拍桌子发誓：“这是罪孽啊！我绝不会还俗，我发誓！你们不要乱说！”“还俗”在藏文中为“扎落”，有点贬意。

后来我到北京，见不到那女孩子，以为危险过去了，没想到在这里又碰到女人，而且我好像不得不还俗了。

我在夏日东仁波切面前站着，不敢说话。这位75岁的老人会对我多么失望啊。

师父问：“你什么时候来的？还要在北京工作吗？如果不想在那里呆着，就回西宁工作，去夏琼寺也行。”

我“嗯嗯”地答应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师父说：“画家，你好像不对劲啊，有什么事？”

我还是说不出话，师父说：“你说实话，没关系嘛。”

我终于说了：“老师，我可能当不了和尚了。”

“什么？”师父吃了一惊。我不敢再说了，华克也帮不上我，他在一边发抖。

“怎么了？”师父问，然后开玩笑地说，“遇到了汉族女人？还是遇到了回族女人？”

“不是。”

“那是什么？”

“我喜欢上一个拉萨女人。”

谁也想不到，师父仰头哈哈大笑！笑完了说：“我就知道，就知道！肯定是拉萨的女人，拉萨的女人就喜欢追和尚！”

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听来的故事，讲拉萨的女人怎样追和尚。

最后他“唉呀”一声，低头念经，过了几分钟探过身来对我说：“还了俗一样能修行啊，你以后要记得做好事，还俗也没关系，主要是你的心。”

我没想到师父有那么宽广的胸怀。他又说：“俗世生活是痛苦的，你现在还不知道。”

我哭起来。他培养我好多年，我让他的愿望落空了。

我回到北京，有点恨那姑娘：如果不是她，我不会还俗，所以我一两个月没有理她。

但我最后还是还俗了。我们两个好起来，她要调到拉萨去，我不想去，最后我们吵起来，我只好跟她去了，呆了一个月。

真正进入俗世，我才知道生活是多么痛苦。我当和尚习惯了，根本不能适应

她那大家庭的生活，俗世的那些条条框框让我无所适从。我最后决定回北京过自己的生活。她很伤心，说那样的话我们就没希望了。我还是走了，回到北京，好舒服啊，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是师父说得对，俗世生活太复杂了，太痛苦了！

分手一年以后，她的同事告诉我她一直没谈男朋友，“你要重新考虑，那是个非常好的女人。”我也知道她是非常好的女人，但我过不了那种生活。

夏天回西宁看师父，师父问：“你那拉萨女人怎样？”

我说：“分手了。”

“啊？”师父又吃一惊，“怎么了？有没有新朋友？”

“没有，找不到啊。”我开玩笑说。

“啊，怎么办呢？”师父用手摸着头说，“你还俗了，又没有女朋友，你痛苦吧？我想想，什么人家里有没有和你一样大的女孩子。”然后很认真地想。

几天后我与华克夫妻一起去看师父，华克的妻子看过师父好多次了。师父把我悄悄叫到里面问：“那个女人是谁？”

“哪个？”我没明白。

“那个，那个。”师父用手偷偷指外面。

“华克的妻子啊。”

“啊，”师父一拍脑门，很失望的样子，“你说找不上女人，我以为今天带一个来给我看了。”

这时我们家乡的也嘎寺要在佛堂画大威德金刚本尊像，他们曾经预选了三个画家，通过算卦认定由我来画，等到要画的时候我已还俗了，他们又算一遍，还应该是我。但他们还是拿不准是否要让名声不好的“扎落”来画，就去问夏日东

仁波切：“仁波切，他是个还俗的人，不知道能不能行。”

师父问：“你们那佛堂是谁盖的？”

来说：“我们村里的人。”

师父说：“那你们拆掉，再让你们僧人自己盖嘛。既然俗人不能画，也不能盖佛堂。”

来人无言以对，赶紧回去请我。

我回到北京，有个台湾人六万元买了我一幅唐卡，我有了钱，开始吃吃喝喝，经常去魏公村的香巴拉藏餐厅。有一天我在这里碰到了梅朵，她是康巴人，漂亮，非常漂亮，不是一般的漂亮，我看上她了。后来我们一起出去喝酒，坐出租车时，我把另外的人推到前面去，我与她坐后面，这样我可以多与她说话。在漂亮女人面前，有些男人不敢说话，我一还俗，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可以随意说话。我们喝酒，我挑逗她，摸她的下巴，她笑着说：“不要这样。”我说：“对不起，我可能喝醉了，不礼貌了。”

我特别想抱一下她，我觉得长时间寻找的女人好像就是她。我说：“不要生气，我可能喜欢上了你。”

“你喜欢我什么？”

“我不知道啊。”

她也许看出来了，我是真喜欢她。

我去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她也去了，在走廊上碰到，她问我：“你刚才说的是真话吗？你能负责任吗？”

我不太懂这种绕来绕去的话，说：“真的，我就是喜欢你。”

“那我可以考虑。”她说。

过了几天，内蒙古的乌兰根活佛邀请我去画画，我立即去了呼和浩特，我给她的传呼机里留了言，结果她没收到！

我几天后回来，才知道她找我都要找疯了，病了，饭都吃不下。我根本不知道她那么爱我。我去看她，她说再联系不上我就要撬我的门，她怕我出什么事。

我们1998年在她的老家四川理塘结婚，2001年我们的女儿索南瑟姆出生，但2003年我们不得不离婚。她喜欢的生活是跟她一起吃饭，聊天，散步，与朋友们一起喝喝酒，上班，下班，晚上十点半睡觉。

这样无聊的生活就像等待死亡。我晚上要看书，写东西，不为赚钱而画画，有些画家，人家需要什么就画什么。我想画出自己的风格，如果想要千篇一律的，可以去找别的画家。这样可能一两个月，我一幅也画不出来，没有收入。但有时候我灵感来了，四个小时画出一幅，卖4000块。我喜欢这样，可她更喜欢稳定有规律的生活。

我喜欢研究，看书，发现很多大人物的书写得不怎么样，为什么我不写？但跟她一起生活我就不能搞研究了。我看书到两点钟，悄悄睡觉，第二天她就不理我，冷战，成年累月这样，我受不了了。

后来我应聘到一个学校研究民族艺术，一个人在学校生活很舒服，做研究，星期天也不回家。她怀疑我有外遇，其实我没有嘛。两年半后我回家了，她又经常出差，我们很少见面，慢慢两个人的感情淡了。我告诉她，这样的生活我不想过，我们两个人的人生目的不一样。我们离婚了。

我还了俗，婚姻也没有成功，看起来像是个失败者。但我对还俗从不后悔，一点点也没有。不还俗的话，我单纯得像个傻瓜。我现在认识了生活，我能找到快乐，还有痛苦，明白了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还俗对我们藏族人来说的确不是好事，但我对自己的还俗特别高兴。我并不满足现在的生活，我并不是成功的，但我在寻找内心一直追求的东西。我很快乐，我能做我想做的，画我想画的。前几年我碰到嘎玛，开始研究天珠，我从历史、美术和考古这三个角度来研究，我喜欢做这件事。

我不是一个虔诚的喇嘛，但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对佛教理解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虔诚。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娶妻生子后，29岁才出家。他懂得生活啊，他在生活中觉到了空，才最终成佛。释迦牟尼离开皇宫，到处学习，闭关苦修，可六年过去他也没解脱。最后他累了，饿了，想放弃，吃了牧羊女送的牛奶，靠在树下，身体恢复了。一起闭关的那些人认为他放弃了，失败了，离开了他。这时他听见农人从田里回家，唱道，琴弦太紧了会断，太松了出不来声音，必须松弛有度。他一下觉悟了，成佛了，他的中观论就是这样来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合适的度，不能勉强，这一点为什么他闭关那么多年觉悟不到？

喇嘛对世界的理解是宏观的，但对具体生活，脑子里是空白的。我当喇嘛时对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男人与女人，一点都不理解。我们十来岁就去寺院念经，能懂什么？

我小时候看不懂佛教理论，我还俗了才能理解。很多修习密宗的人，很多的大成就者，他们也有家啊，也过普通人生活，可他们觉悟了，成佛了。

男女之间的爱情，世上任何东西比不上，这是自然规律。你把世上最幸福的事情戒了，当然痛苦。我到仁青桑珠的老家，看到他写宣传单说禁止淫欲，我不理解：佛都结婚了，我们为什么不能？

“善事即佛事”，这是佛说的。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做事，就是佛事。最大的修行是在人间，而不是躲在深山。济公的传记里说：“小修修于隐，大修修于市。”

我很喜欢。“隐”就是寺院，我不喜欢呆在寺院里，我要呆在生活中。

我经受了生活的痛苦，才更理解佛教的真理，我在生活中找到深刻的幸福。

二十一 送我一束玫瑰花

2005年11月25日，我们还俗的朋友耿登来到成都罗马假日广场，在一家花店前，盯住一束红、粉两色的玫瑰。

耿登离婚后，小女儿跟妻子生活，他住在成都嘎玛的一套房子里，专心研究天珠。

他盯着玫瑰，再抬头看一眼对面“度母屋”藏饰店，那个美丽的姑娘在里面。

几天前，他的朋友、嘎玛的秘书告诉他，“度母屋”的主人是个非常漂亮的藏族女孩子，他曾特意到店里看了一眼，果然，那个姑娘高挑身材，一双大眼睛如圣湖纳木错一般清澈，秀发长至腰间，有藏族女子端庄、大方而秀丽的美。耿登是画家，一直寻找典型的藏族女子形象，“就是她！”他心里叫绝，这正是他喜欢的那种女子。

自从见了这女子，耿登心里再放不下，今天经过这里，不由停下脚步看起那束玫瑰。

“这束花真漂亮，”他对身边的朋友说，“我要送给对面那个女孩子。”

“开什么玩笑？你又不认识她。”朋友吃惊地说。

“那有什么！”耿登说。他花50块钱买下那束花，捧着走进“度母屋”，径直走到姑娘面前，将花放到她桌子上说：“你这里很漂亮，如果有这束花就更漂亮了。”

姑娘惊呆了，脸立即飞红，“天哪！”她心里惊叫一声，用手捂着嘴巴问，“真的呀？”

这位姑娘是白玛旺姆，她不认识送花的男子，但那束花让她怦然心动，又惊又喜又慌张。

前天花店的姑娘插这束花时，白玛旺姆站在一边看，非常喜欢，开玩笑道：“谁把这束玫瑰送给我，我就嫁给他！”

第二天，居然真有人把这束玫瑰送来了，“天哪！”白玛旺姆心想，“这是天意吗？”

白玛旺姆是四川康定木雅人，从小被雅江县的姑姑收养，雅江县城学校没有藏文教育，她只会说汉语。当她十一岁时，大哥把妹妹接回康定接受藏文教育，他不希望妹妹连藏语也不会说，弄得既不是汉人，又当不成藏人。白玛旺姆回到家乡，她汉语出众，学校让这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兼任汉语老师。中学毕业后，她考入在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

2003年大学毕业，她不想回老家规规矩矩坐公务员办公室，梦想自己做番事业，于是来成都找工作，后来开了这家饰品店。

2005年，有水电公司要在她家乡朋布西乡建水电站，几千乡人被迫搬迁，失去家园。许多人奋起反对，白玛旺姆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便带着摄影师朋友回家乡，她自己作模特，身穿传统服装，将民风民俗和美丽风光拍下来，免费放到“四川在线”网站，告诉公众这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优美的环境将被破坏。

这个活泼的藏族姑娘喜欢舞蹈，虽然经营着小店，却梦想组织一个孤儿舞蹈团。藏区有许多孤儿，她希望编排一个舞剧教孩子们表演，那些舞蹈来自藏族日常生活的动作，比如割青稞、盖房子、打酥油，教孩子们学会这些，既是美的艺术，又保存了藏族文化，更重要的是，让孤儿们树立自信与自尊，以诚实劳动和艺术创造赢得尊重。

四年前，白玛旺姆经人介绍，与在国外念书的一位藏人建立了恋爱关系。那位先生说五年后学成归来，白玛旺姆从未见过他，但一直等着，其间拒绝了无数追求者，被追得紧了，有时干脆说自己结婚了。

当她等到第五年时，耿登送给她这束玫瑰。

“我叫耿登丹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卓玛。”自我保护的本能，让她撒了个小谎。

耿登要了她的电话说：“我过几天去康定开会，回来请你吃饭。”

白玛旺姆红着脸答应了。

“谁把这束玫瑰送给我，我就嫁给他！”耿登走后，白玛旺姆整天端详那束玫瑰，心里一阵阵热烈地跳着，“天意？天意？”一遍遍念叨着，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此后几天她心思不属，盯着玫瑰，想着那个送花男子，忐忑不安等着他的电话。

终于在一天下午，那个盼了好久好久的电话响了：“卓玛，我是耿登，今天请你吃火锅好吗？”

白玛旺姆一只手抚住急剧跳动的胸口，尽量平静地说：“好啊。”放下电话，“啊啊”地欢叫着，手忙脚乱冲出小店，“你帮我关门！”她冲对面花店的姑娘喊一声，奔跑着去见那个男子。

“你中彩票了？”卖花姑娘吃惊地喊，“门都来不及关！”话没喊完，白玛旺姆已跑没了影儿。

耿登还约了另一位朋友，三人吃过饭去唱卡拉OK。那位朋友被白玛旺姆的美丽所震惊，偷偷对耿登说：“我喜欢这个女孩儿，你别追了，让给我追吧。”

耿登很不愿意，又不想伤了朋友义气，含糊地笑笑。这时嘎玛来电请他回办公室一趟，他一个多小时后再赶回歌厅，发现那朋友喝多了，缠着白玛旺姆唱歌。耿登不知道白玛旺姆与朋友现在什么状况，想与白玛旺姆一起唱，又怕朋友不高兴，只得坐在沙发一角，心里酸酸地看着他们。

白玛旺姆正被缠得不耐烦，见耿登回来，心中高兴，却见他坐得远远的，对自己不理不睬，心中慌乱起来。自己盼了他好几天，终于盼回来了，怎么如此冷淡？难道他送花给自己只是心血来潮，其实全不当回事？

一个女服务员认识耿登，见他郁郁寡欢，走过来说：“我来陪你唱。”

耿登有了伴，顿时精神起来，连唱带跳，好不快活的样子。白玛旺姆见他与别的姑娘打得火热，更加伤心，原以为这“玫瑰奇遇”是天意，这男子喜欢自己，也值得自己喜欢，她女孩子家才不要矜持，巴巴地跑来，没想到全是一厢情愿，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她忍住泪水，强颜欢笑，没滋没味地低声唱着。

耿登哪里知道她在想什么，忽然想起一首拿手的歌，也没注意白玛旺姆正在唱着，遥控器一按，说：“我来唱首好的！”

白玛旺姆的歌被拦腰掐断，她再也忍不住，冲耿登喊：“你欺负人！”扭头朝门口冲去。

耿登不明所以，急忙抢上去拦住问：“怎么了怎么了？”

“你欺负人，你太欺负人了！”白玛旺姆一通乱喊，眼泪迸流。

耿登急忙拉住她手：“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对，别走别走。”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但先认错总是没错。

白玛旺姆还是要走，耿登一下将她拥在怀里。白玛不再挣扎，伏在他肩头哭起来，耿登用手轻抚她的背，不停安慰。

他那位朋友早喝糊涂了，醉眼迷离地独个儿浅吟低唱，哪知道那边已是花好

月圆。

两人相处日久，白玛旺姆越来越喜欢这个男人，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她告诉耿登，她四年来一直在等一个国外的男友，现在男友的母亲生病，他心情不好，白玛旺姆不忍心现在与他分手，她会找时间与他说明一切。耿登说：“没关系，我给你时间。”

耿登的宽宏大量让白玛高兴，但也有一事让她耿耿于怀。耿登此前有个女友，朋友聚会时，那女子仍经常出现在耿登左右，令白玛旺姆不胜其烦，“你为什么不能和她一刀两断？你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我们早就断了！”耿登说，“但断了还可以做普通朋友嘛，你别那么小气，我不能跟人伤了和气。”

白玛旺姆以为耿登与别的女人藕断丝连，对她则三心二意。两人经常为此怄气。

两人恋爱半年后，白玛旺姆一日翻检照片，拿一张照片给耿登看，笑道：“这就是我等的男朋友。”

耿登大叫起来：“啊呀，怎么是他呀！”

那人却是他的老朋友，两人20年前就认识。耿登从此有了心病，觉得自己抢了朋友的女友，心中不安。

没过几天，国外男友的母亲在藏区去世，他回国料理后事，到成都看白玛旺姆。“这次一定要跟他分手了。”白玛旺姆想。但人家母亲刚逝，他又那么热切地跑到成都看自己，怎么能说出口？白玛旺姆左右为难。

耿登听到了消息，他与那国外朋友有共同的朋友，人家说那人回来是与白玛旺姆结婚的。耿登大恸。

白玛旺姆知道她爱的是耿登，虽然耿登身边似乎还有女人，她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他。现在不能拖了，必须马上做出决定。走在去看男友的路上，她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跟他分手！

耿登恰在此时打来电话，他低沉地说：“白玛，如果你选择他，我祝福你们。”

白玛旺姆心中霎时一片冰凉：这个男人，他终于找到借口甩开我了！

她压抑着伤心愤怒，冷冷地说：“谢谢你。”

两人都努力保护着自尊，再不联系。白玛旺姆与那位男友相处不久就分了手，她时时拿他与耿登对比，耿登已在她心里扎了根，再容不下别人。她越想他，便越恨他，她通过朋友给耿登传去假消息：她结婚了，她很幸福。

失意的耿登与嘎玛去昌都考古，研究天珠。他还俗后婚姻失败，交往过几个女性，知道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俗世的痛苦，却没找到真正的爱情。当他十几年后终于找到他爱的女人时，却很快失去了她。

2006年10月3日，昌都的天阴沉着，雨和冰雹轮番来袭。夜间天晴了，耿登打开窗户，清冽的空气扑进来，有些冷意。他仰望天空，明星闪烁，不由心潮起伏，以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诗的格式，写下藏文诗句：

与你在一起，

不知爱你有多深；

情人分别后，

伤痛充满我的心。

日通的夜空，

星光灿烂，

我心中的爱人白旺，

你可也看见星星闪亮？

他扔下笔，躺在床上，听到身下“咯”的一声，翻身一看，原来眼镜被压断了。他叹口气，拿起眼镜想扔掉，手臂划了一个弧圈，心里忽一激灵，想起这是白玛旺姆送他的礼物。他看着那只眼镜，心痛如绞：“我的女孩儿，你在哪里？”

二十二 天珠为媒

1994年，当一个女人让耿登丹巴做不成和尚时，另一个女人闯入嘎玛的生活，使他不得不挑战深爱的家族传统。这个女子来自“天珠之家”。

在西宁的“大十字”街口，骑自行车的嘎玛碰到一位姓张的西宁人。老张知道嘎玛喜欢天珠，对他说：“有个好看的天珠，你要不要？”

嘎玛跟他来到一个店里。一个刻印章的汉人拿出一只三眼天珠，上面有三个眼形弧圈。三眼天珠比较贵重，嘎玛看一眼，果是上品，不禁喜形于色，拍掌大声赞美：“啊呀，太漂亮了！太好看了！”

两个汉人有点吃惊，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买主。买主一般用不屑的眼光瞟着货物，挑剔来挑剔去，这也不好，那也太差，然后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压低价格。

嘎玛兴冲冲地问：“多少钱？”

老张迟疑地说：“你出个价吧。”他们买时花了800元，两人期望2000元出手。

“两万卖不卖？”

两个人有点迟钝，“两万好不好？”嘎玛大声说，“我再给你中价费5000。”他对老张说。

“你是真的？”两个人问。

“当然真的。”嘎玛说。

“好好好好好！”两人缓过神来，连声答应。

嘎玛没钱，去塔尔寺找朋友借了25000元。那老张在这笔生意上发了财，从此不去单位上班，天天乐颠颠地找天珠。

在90年代的最初几年，嘎玛闻着羊毛和羊皮的味道，从西藏跟到青海。但生意并不顺利，在藏北做羊绒生意赚的十万元，除了一部分拿回老家买了《甘珠尔》，其他几万块被家乡人借去买羊绒，但羊绒价格持续下跌，老乡们血本无归。对嘎玛来说，这个时候讨债是无法想像的齁齁事，他只好两手空空，从头再来，好在他永远不怕。

我后来问他：“你为什么出价那么高？你那时候没钱，明知道给2000块他们就卖的！”

嘎玛说：“那天珠太好了！就是值那么多钱嘛。”

“你太笨了，再值，也不用多花那么多钱。”

嘎玛笑笑说：“我不会讲价嘛，再说，让人家挣点有什么不好？”

他的逻辑就这么简单。嘎玛出高价，尽量让卖主有足够赢利，大家都高兴，当然他不是真的傻瓜，他相信自己能以更高价卖出。他短短几年已成为天珠方面的行家，质量好坏一眼便知，不会看走了眼，而且他比别人有更通畅的销售渠道。

此时台湾兴起天珠热，但藏人并不知情。有些台湾人来藏区收购，价格极低，有的几百块钱一个，带到台湾后，价格像放风筝般扶摇直上。嘎玛曾帮一个台湾人买了一些，那台湾人发了财，立即将其老板带来与嘎玛合作，嘎玛因此知道台湾的市场价格。

嘎玛的诚实获得别人的信任，那个台湾老板将200多万交给他。1994年7月，嘎玛与几个伙伴用白布袋子装着300万现金到青海玉树州收购天珠。离家六年，他从未脱过藏装，夏天天热也不脱，藏装大咧咧穿在身上，大肚皮时不时露将出来，一幅邋邋遢遢样子。

三年之前他来过玉树。50年代末他的喇嘛爷爷被抓后，他的女儿嫁到了玉树。嘎玛希望找到这位姑姑和她的孩子们，听说他们很穷，而他有信心帮助他们。他到玉树时已是半夜，玉树州府结古镇一片漆黑，他在街上摸黑乱碰，刚好遇到一个小伙子，他赶紧问：“这里有没有住的地方？”

那小伙子热情地说：“我送你去。”他把嘎玛带到玉树招待所，安顿下后又带他去餐馆，敲开门，让老板做面条给嘎玛吃。第二天一早嘎玛就找到了姑姑一家，他想再找那个帮他的小伙子，却不知道那人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三年后的今天，嘎玛又要来玉树了，他从西宁一路向南，一如文成公主当年前往拉萨——跨过日月山，经过倒淌河。日月山只有海拔3500米，山口左右各有一座小山包，日亭与月亭分立其上。因山为红色，古代称为“赤岭”。赤岭曾是唐王朝与吐蕃的分界线，传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经过此地，站在日月山顶回望家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取出日月宝镜观看，繁华的长安城出现在镜中。文成公主悲喜交加，将日月宝镜抛下赤岭，宝镜变成了碧波万顷的青海湖，她的泪水汇成了涓涓倒淌河。后人为纪念她，把赤岭改称日月山。

嘎玛跨阿尼玛卿山，到花石峡，抵玛多县，从山路上俯瞰谷地，有数不清的大小湖泊，如星星闪亮在夜空，路边的“星星海”因此而名。往西就是黄河的源头之一扎陵湖、鄂陵湖，碧绿的湖水漫延在海拔4300米的荒野上。松赞干布就是在这湖边安营扎寨，迎接文成公主。

嘎玛驶过黄河源头的一座桥，那被称为“黄河第一桥”。这一段路上藏原羚飞奔跳跃，藏野驴悠闲踱步，狐狸和狼忽隐忽现，雄鹰昂立路边的电线杆上，等着倒霉的鼠兔，并傲慢地看着汽车玻璃后那一张张人类的脸。嘎玛慢慢盘旋着登上海拔4824米的巴颜喀拉山口，山口那边就是玉树，再跨过通天河就是结古镇了。嘎玛心胸舒展，路边闪过的每只动物，都令他像看到老友般高兴，这荒凉的高原，让他宁静愉悦。

与青藏线、川藏线、滇藏线一样，这条从西宁到玉树的路是进出藏区的主要道路之一，是“唐蕃古道”的一部分。从西宁到玉树长800公里，险峻，破败，孤单，集大自然的美丽与荒蛮于一身，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幸福，也见证了许多悲苦伤痛。沿着这条道路，少年扎多远去西宁求学，钻出帐篷进入城市，又沿这条道路从城市回到家乡。后来他陪索南达杰一遍遍地从此进入可可西里，就在1994年，嘎玛再次进入玉树的这一年，索南达杰再没能踏上这条回家的路。

它也是这本书的开启之路。我第一次进入青藏高原就是因着它的指引，但它对我并不友好，事故连续不断：坏车、推车、差点掉入悬崖、挖车时被冷雨淋得湿透、车陷进河里……我和扎多与这条路搏斗了两天之后，终于在玉树草原深处的澜沧江源头见到了嘎玛和仁青。他们远来参加一个赛马会。然后，这条神奇的路开始无限延长，纵横交错，如一把飞梭将我带着在藏区飞翔，慢慢织成这本书。

在1994年，这条路对嘎玛来说尤为重要？他走向玉树，而他生命中的女人也走在同一条路上。这个女人将带给他爱情，同时令他反叛家族传统，打碎心里的宁静。

19岁的珍嘎，这个在陕西当话务兵的玉树姑娘，正哼着歌儿兴冲冲回家休假。玉树州许多青年公子哥盼着她回来，许多人在梦里将她娶回家。她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姑娘，并不仅仅因为她的父亲是活佛和副州长，生活似乎特别青睐她，将一切美好的东西赐给她：个子高挑，优雅漂亮；她受过中等教育，这在玉树女孩中并不多见；她当兵见过世面，普通话说得好，浑身上下带着外面的“洋派”；她能歌善舞，性格开朗，天真烂漫，动不动开怀大笑，人们喜欢与她相处。而这一

切没令她失去朴实、谦逊和诚实的品格。

妈妈见女儿回来，欢喜地说：“你这次回家可能有好事呢，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路上有很多牛粪，你坐的车都开不过来。”在藏人心中，梦见牛粪是好兆头。

1994年7月25日，玉树州召开第一届康巴艺术节。这个艺术节后来轮流在青海玉树、西藏昌都、云南德钦和四川甘孜等康巴地方举办。所谓艺术节，就是更大规模的康巴藏人传统赛马会，有赛马、说唱比赛、摔跤、法会和商业活动。嘎玛到玉树时，正赶上这个节日。

当地公安局除了维持治安，还组织游人射击游乐，只要出钱，想打多少打多少，这是公安局赚钱的小勾当。嘎玛不喜欢枪，爷爷教导他们不可接近枪支，但几个伙伴想玩，嘎玛也不好坏了大家的兴致，只好买几千发子弹让他们尽兴。

一个打枪的女子引起嘎玛的注意，她个子高高，身穿军装，笑语嫣然，但持起半自动步枪来英武有力，持枪、装弹、射击，如行云流水，将一班男人比得很没面子。这女子正是珍嘎，她二哥是组织射击的警察，她想射多少射多少，正合了她豪爽性子。

在嘎玛心中，女人是不可动枪的，“这女孩子又漂亮，又奇怪。”他想。他经常带着近代学者更敦群培的书研读，书中有赞美一个女人的诗句：

她的两眼像两杯波斯美酒

她的面颊似克什米尔苹果

她的发辫犹如蜿蜒的神龙

如果这诗句一定要用到哪个女子身上，那么，眼前这个女子最合适。

但嘎玛不是盯着女人看的男人，再美的女人跟他也没关系，他是有妻子的人，虽然他与那妻子从未有过感情，有过接触。他转过头对伙伴们喊：“你们把子弹打光！”他可不想让他们把子弹带回家，那样小鸟和动物会遭殃的。

珍嘎也看到这个男人，他高高的，如一头牦牛站在一群羊中，脸盘很大很白，“一个男人，怎么能长得那么白？”珍嘎嘀咕。唉呀，他还在头上盘着一条大辫子，那是典型的农村人装束，“真土啊。”珍嘎心里呵呵地乐。不过她不得不承认，这个大个子长得还不算难看，倒有几分康巴人的英雄气魄。

珍嘎在赛马会上玩了个痛快，早把那又怪又土的农村人忘了个干净，等回到家，一进门，迎面就是那大个子农村人！

嘎玛正与珍嘎的妈妈谈生意。珍嘎父亲当上副州长没多久，刚从乡下搬来结古镇，没有房子，妈妈想卖掉几颗天珠建一所房子。嘎玛闻风而至，他早听说这家人出身高贵，有许多祖上传下来的天珠。他不讨价还价，一出口就给大价钱，珍嘎妈妈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母亲虑事周全，严厉果断，处理这样的俗事，丈夫便由着她，当她与嘎玛谈着生意时，她的丈夫和儿子们站在一边，不发一言。

嘎玛觉得这家人的长子很面熟。珍嘎的大哥才仁嘎娃早就看出，嘎玛就是三年前那个夜里闯来玉树的人，他当年帮助了嘎玛，只是嘎玛现在匆忙间认不出来，大哥也不说破。

他们谈成了几个买卖，妈妈心情愉快，“这个商人有点傻。”她想。珍嘎也觉得这个商人厚道，给的价高，而且老老实实，不像别的商人巧舌如簧，只是他自始至终没看过自己一眼，这让珍嘎觉得好奇，她早已习惯了男人们盯着她，这个大个子农村人有点不一样。

买卖谈到最后，珍嘎心里“咯噔”一声，吓了一跳，因为妈妈从颈上拿出一只天珠，那是全家一直珍藏的。“你要这个吗？”妈妈问嘎玛。

那是一颗“四天地”，嘎玛知道是珍品，心中喜欢，立即出价五万五。妈妈同意了，除了这个傻大个儿，天下再没人出这个高价了。

妈妈从颈上解那只天珠，珍嘎跑上来拉住妈妈的手，着急地说：“妈妈，你真的要卖吗？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啊，你说过这是我们家的财富，为什么要卖掉？”

妈妈说：“你别管。”

珍嘎的哥哥们站在一边看着，谁也不插言，可珍嘎紧紧攥住妈妈的手，眼泪含在眼里，哀求道：“妈妈，不要卖嘛，你不是说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吗？”

“我决定了，你放手。”妈妈说。

“妈妈，不要卖嘛，求求你。”珍嘎的手握得更紧。

嘎玛惊讶地看着这个姑娘，他听说这家人由母亲做主，在讨价还价时，其他人不说话，这个女儿却敢做敢为。

母亲发怒了，冲女儿大声说：“快放手，听话！”小孩子家哪知道家里缺钱？这是一桩好买卖，她可不想错过。

珍嘎眼泪流下来，却不哭，手还是牢牢握着：“妈妈，你真的不能卖啊，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

嘎玛忽然同情起这个姑娘，在一旁打圆场道：“你别难受嘛，我再多给500块。”

珍嘎不理他，抓着妈妈的手，脸涨得通红，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这个女孩子太特别了！”嘎玛想。

三年之后，嘎玛得到了“天珠之家”的这个姑娘。与她相比，所有天珠黯然失色。

二十三 藏王后裔

珍嘎敢违拗母亲保留那颗天珠，可能出于对家族出身和传统的珍视。珍嘎有理由比别人更重视血统：她姓拉嘉日，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后裔。

在旧西藏，最高的贵族家庭名为“亚谿”，是达赖喇嘛的父母家族。除此之外，贵族之家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第本”，第二“米扎”，第三是一般贵族。“第本”只有五个家族，其中拉嘉日家族最为特殊，因为它是藏王后裔。对于拉嘉日家族的藏王血统，西藏人深信不疑，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写道：“(拉嘉日)系出自吐蕃王纯净种嗣朗德维松之子安达·贝考赞。”²¹

藏王朗达玛有两个妃子，他因灭佛被射杀后不久，次妃蔡邦萨生下一个王子，也就是拉嘉日家族的祖先。蔡邦萨害怕长妃伤害孩子，白天用阳光照耀，夜里用灯光护卫，因此王子取名为“维松”，意为“光护”。

长妃纳朗萨没有孩子，她怕日后失势，于是在腹部裹上羊毛装作怀孕。有一天她抱着一个孩子出来，高兴地向大臣们宣布：“昨天晚上我生的！”大臣们一看，惊讶得伸出了舌头，因为孩子嘴里已有几颗牙齿。这孩子其实是她从乞丐那里买来的，但纳朗萨家族势大，大家只好顺从默认。王子取名云丹，意为“母意”。西藏许多古书记载了此事，认为维松才是嫡传。

朗达玛死后，赞普宝座无人继承，却一下出来两个王子，王朝权争激烈，维松于公元843年被一派拥立为王。据说他四岁时，西藏不再摧毁佛法，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像被重新安放。

长妃一派不承认维松，把云丹也扶上宝座。从此两个王相互争战，云丹派势大，占据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卫如地区，维松派势弱，退守到吐蕃王朝的发祥地山南地区。

两派的战争很快波及全藏，连续20年，人民处于水火之中，最后一场平民暴动席卷全藏，历时200多年的吐蕃王朝像瓷瓶掉在地上，四分五裂。

平民暴动期间，维松王从山南逃到后藏江孜和拉孜一带(现日喀则地区)。他死后儿子贝考赞继位，后被大臣杀死。贝考赞长子扎西孜巴贝去江孜一带，他的后代形成了贡唐(吉隆)王系和雅隆王系。²²

珍嘎拥有的“拉嘉日”姓氏，就是从这一支而来。她的祖先居住在山南拉嘉日地区，世袭社会地位和土地。

贝考赞次子逃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他的后裔在那里建立了古格王朝。其孙古格王松昂得知祖先时佛法兴盛的情形，决心让佛法之火在阿里重燃。

他派21位聪慧少年去克什米尔学习，其中19人水土不服染病身亡，仁钦桑布是两位生还者之一。他在克什米尔师从75位大德学法，又延请很多僧人译经，西藏宗教史家称他以前的密宗典籍为“旧密”，他和他以后翻译的密宗典籍为“新密”，人们尊称他为“洛钦”，即“大译师”。古格王室还在普兰地方赐给他一个庄园，这是西藏寺庙庄园之始。

公元1016年，古格王松昂50岁时把王位让给弟弟，自己带着两个儿子随仁钦桑布出家，取法名为拉喇嘛益西沃。他希望邀请高僧阿底峡来阿里传法，阿底峡出身达卡王族，当时担任印度名寺超岩寺的上座。益西沃觉得必须用大量黄金去

²¹ 次仁央宗，《西藏贵族世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61页

²² 陈庆英、丹珠昂奔等，《西藏史话》，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第76-79、88页。

请，以示诚意，于是到突厥地方的噶逻禄收集黄金，却被俘虏。噶逻禄人要益西沃改变信仰并归顺噶逻禄，或者交纳与身体等重的黄金赎回。益西沃的侄孙、古格王绛曲沃四处奔走，带着黄金到了噶逻禄，但噶逻禄人说，黄金的数量只够赎回身体，却赎不回头颅。益西沃说：“我已经老了，没什么用了，你们拿着这些黄金，到印度迎请阿底峡大师吧。”遂从容就死。

绛曲沃遵从他的遗愿，派人带金子去请阿底峡。阿底峡听了益西沃的故事非常感动，于1042年抵达阿里古格。古格王绛曲沃带领300人，穿白衣骑白马，夹道欢迎，还专门奏起黄铜长号，称为“欢迎译师班智达长号”。这是西藏吹长号之始。

阿底峡在阿里传法三年，后来又入卫藏传法九年，1054年圆寂于拉萨西南的聂塘。

12年后，古格王孜德举行盛大法会，安多、康区和卫藏大批僧人赶去参加，这一年也正好是益西沃出家60周年，这次法会称为“火龙年法会”，标志着佛法在西藏重新取得合法和主流地位，在朗达玛灭法后，藏传佛教正式开始了后弘期，而从阿里传出的教法，称为“上路弘传”。²³

本书第二节记述，在灭佛时期，三位喇嘛用骡子驮着经书逃到青海安多，令佛法在那里再兴。后桑耶寺首领派十位青年去安多学法，佛法又传回卫藏，被称为“下路弘传”。有趣的是，那位桑耶寺首领意希坚赞是云丹王的后裔。在松赞干布之后长达数百年的西藏历史中，不管是兴佛，灭佛，还是后来的再兴佛教，都与吐蕃王及其后裔紧密相关。

在藏人心中，吐蕃王不仅是世俗领袖，在精神领域也有巨大影响力，所以藏王后裔作为“神”的子孙一直受到尊重。珍嘎的家族姓氏拉嘉日中的“拉”，即是“天子”和“神”之意。在五世达赖时期，拉嘉日家族一成员获得“赤钦”（大法座）称号，从此赤钦成了崇高身份和领地自治的标志，被拉嘉日家族一代代传承下来。每当“赤钦”及其家族成员到拉萨朝拜时，政府要派官员到拉萨河渡口相迎。每逢拉嘉日家族有婚丧等事务，政府都派官员参加。因为西藏政府对拉嘉日家族的尊重，其成员一直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充裕的生活条件。在自己的领地，拉嘉日家族不但拥有自己的人民，还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政官吏。²⁴许多贵族希望能娶拉嘉日家族的女儿，如果有战事，人们会请一个姓拉嘉日的男子站在自己队列中，似乎这样就能得到神的保佑。

珍嘎对自己家族的自豪，并不仅来源于这个血统，实际上这个血统过于遥远，远得几乎成了传说，并无实际意义，特别是在贵族概念全部消失的今天。她有更远的前辈令她骄傲——她的爷爷，十三世拉江贡活佛，那个在玉树地区种下第一棵树的高僧。

600年前，宗喀巴大师的六大弘法弟子之一丹玛堪钦·元旦巴在玉树建立了当地第一个格鲁派寺院拉布寺，他便是拉江贡一世，当拉江贡活佛世系传承到十二世时，进入了拉嘉日家族。

第十二世拉江贡仁波切1832年生于山南拉嘉日家族，两岁时，第七世班禅大师见到他后赞不绝口，为其进行剃度。光绪皇帝病重，久治不愈，有人推荐康区大喇嘛拉江贡活佛，于是第十二世拉江贡应邀赴京，治好了光绪的病，并成为光绪尊崇的帝师之一，光绪皇帝任命其为拉布族百户。拉嘉日家族的这一分支从山南迁来玉树后，至此成为当地政教合一领袖。

²³ 陈庆英、丹珠昂奔等，《西藏史话》，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第99-101页。

²⁴ 次仁央宗，《西藏贵族世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64页

光绪给予丰厚赐赠，其中一只翡翠绿玉盘，当时曾有传闻说，玉树二十五族之资财不抵这只玉盘。另有狮座金属印章一枚，清官服十套，官轿一座，一个楠木盘。这个楠木盘可不寻常：一枚重达七斤的夜明松石嵌于盘中，许多珍珠围镶四周。另有自然红铜铸造的罗汉佛像十六尊，其他珍稀佛器文物不计其数。珍嘎的父亲还记得，无数的天珠装在一个个大盆里，因此玉树有传言，藏区的天珠有三成来自这个姓拉嘉日的拉江贡家族，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天珠之家”。但经过文革后，这一家族的财富就像他们的贵族地位，一扫而光。

第十二世拉江贡著作现存于布达拉宫藏经楼内，其亲传弟子和信徒遍及藏区和蒙汉，其中最著名的有热振活佛和嘉木祥大师。1888年夏，拉江贡圆寂于北京，享年56岁。他遗愿长眠故里，但清室决定将其安葬于京城。拉布寺居然派选十名得力喇嘛，赴京偷回拉江贡法体。1958年，其灵塔和寺内珍藏的多数佛器文物被毁坏。

其转世灵童仍然诞生于拉嘉日家族，第十三世拉江贡便是珍嘎的爷爷，出生于1889年，为民国时期一代高僧，法名江永罗松江措。他收容救济穷苦人，鼓励开垦荒地、修建房舍。他好云游四方，曾骑马走过半个中国，大开眼界。后建立商队，拉布寺商队往返于康、藏、川和西宁、湟源之间，很快成为茶马古道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并在川、藏、湟源、西宁和玉树设商贸栈。拉江贡还建红糖厂，60多年后的今天，玉树还有人以他的方法制作红糖。在他治理下，拉布族经济繁荣，政通人和。其寺院经商传统后来又被传承，2006年我再次去玉树时，便是住进拉布寺在结古镇开的宾馆。

13岁的拉江贡到内地云游，1906年，他17岁时从北京返回途中，做出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玉树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并无一棵树木，而内地绿树成荫给小活佛留下极深印象。走到西宁附近时，他从湟源县购得450株杨树苗，将金银买了牦牛，驮运着树苗，翻山越岭回玉树。他将每棵树苗裹上牛毛毡，根部用泥土包着，晚上宿营时把树苗放在河水里浸湿。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回到拉布寺。

有十三棵白杨熬过了玉树长达八个月的冬天。拉江贡再接再厉，连续六年运树种树，终于建成七处园林，一改玉树无树之历史，从此白杨树在玉树草原安家落户。拉江贡令拉布寺数百僧众每人每年种树十五棵，此制度沿袭至今。上世纪五十年代始，政府号召植树造林，玉树所有树种都由拉布寺提供。今天通天河畔，行行绿树成荫，全因十三世拉江贡之功德。当时有僧人埋怨，别的活佛从外面回来，带给寺院的是金银财宝，而我们的活佛却用金银买来一堆烧火棍。许多年后，信徒们才知拉江贡的远见卓识。

这个政教合一的年轻领袖雄心勃勃，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他对拉布寺进行整体规划，将拉布西山和北山脚下的河水引流汇合至南山脚下，顺流过拉布川地，再汇入通天河。后以北京城和拉萨八廓街为样本，规划建设小城镇。他把道路拓宽，说将来好让一种叫“汽车”的东西通行，这极大考验了村民们的想像力。

他把路分成车行道和人行道，用树来界定路的边界，甚至连电话线和放变电器的地方都留了出来。村民们终于知道什么是“电”，已是50多年后的事了。

拉江贡还安了“电话”——在每个喇嘛的房间安个铃铛，用一条线把这些铃铛串起，他一拉线，铃就叮叮叮响起来，当然，他先设定了信号，比如响一声是招呼近侍，响两声是全体集合之类。

十三世拉江贡于1944年4月圆寂于拉布寺，享年55岁。他的功德给拉嘉日家族带来了荣耀，他14岁的女儿嫁给附近一个头人的儿子，头人家族非常兴奋，他们的新娘子是藏王后裔、拉江贡仁波切的女儿！他们给拉嘉日家送来2000头牛，

迎亲那天，送亲队伍有200匹马，迎亲队伍有100匹马，浩浩荡荡。婚礼举行了三天，新娘子有99套新衣，三天内不停地换衣服，几乎成了时装模特，后来她告诉珍嘎，不停地换那些新衣实在累坏了。

这毫不夸张，2005年我在玉树杂多县的澜沧江畔，亲眼见到一个16岁的小姑娘全身盛装，身上沉重的金银玉石装饰累得她站不直腰。

但十三世拉江贡圆寂20年后，他为家人带来了灾难。文革期间，因为是活佛兼头人的儿女，珍嘎的父亲和姑姑备受折磨。姑姑被痛打，打晕过去再拖到河边浸醒，继续凌辱。她的小女儿饿死，13岁的儿子被红卫兵欺负。珍嘎的父亲被批斗，后被赶出寺院到牧区劳改，妻子与他离婚。他在劳改期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患难夫妻支撑着挺了过来，并养育了一大群儿女。

2006年7月1日，应珍嘎之邀，我与扎多到珍嘎家作客，珍嘎的爸爸江格安坐于主座上。他63岁，身穿黄色藏服，清秀，文雅，缓缓与我谈起旧事。

他小时候，家里装满了光绪赏赐给十二世拉江贡的珍宝，有些箱子还没打开，里面装满了丝绸和花瓶，有时他还钻到箱子里捉迷藏。家人告诉他，赏赐是用300头骆驼驮回玉树的，但路上失散了许多骆驼，有的骆驼居然跑到了拉萨。他小时候见到的珍宝，除了许多钟表，还有几百个鼻烟壶，八套檀木桌椅，许多一人高的花瓶和大量的玉石翡翠。文革中，这些珍宝被抢被毁。

他的父亲十三世拉江贡圆寂后，法体涂着金粉装在玻璃柜里。每年的藏历新年初一，大哥把玻璃柜后门打开，给金身换上新衣服，打扫灰尘，每年法身上都能发现七、八个舍利子，法体的头发还继续长，每年都长一大截。“这是我亲眼见的。”他对我说。

十三世拉江贡有两位妻子，第一位去世后，又娶了第二位，就是江格的母亲，珍嘎的奶奶。她是一位善良的佛教徒，去世后，江格一直珍藏着母亲的遗骨。

珍嘎坐在一旁插话说：“我小时候，爸爸每年会打开一个黄包，里面包着奶奶的遗骨，每次都会发现遗骨长出一些舍利子，像黄黄的小米。爸爸用手弄一些舍利子抹到我额头，说‘你会一生平安。’”

听女儿讲着往事，江格活佛含笑不语。

江格5岁时被认定为囊谦县龙须寺活佛，一年到头，除了一年一次的赛马会上可以游玩，小活佛每天第一次鸡叫就起来念经，背不好不许吃饭。如果该背的背不过，师父发了怒，就会整理衣服向小活佛磕下头去。小活佛一见师父磕头，怕得要命，连声求饶：“老师你不要磕头，不要磕头！”

但老师仍旧跪下去，恭恭敬敬磕三个长头，然后起身，一把将小活佛抓过来，痛打一顿。江格对我说到此处，忍不住微笑起来。

文革中，他被打倒后下放牧区放牛，宗教恢复后，他以宗教界人士被任命为玉树州副州长，现任玉树州政协副主席。

我们说说笑笑讲到此处，珍嘎的母亲脸色沉下来，用藏语严厉地说了一串话，江格尴尬地笑笑，不再说话。珍嘎红了脸，不好意思地对我轻轻说：“对不起。”

我猜出，珍嘎妈妈不愿意丈夫讲下去了。经过历次劫难，她心有余悸，不希望对一个汉人多讲下去。我完全理解，停止了交谈。

世道大变时，这个家族恨不得自己是普通人家，以免遭厄运。历经劫波后，他们仍然习惯性地韬光养晦，不主动对人谈起自己的藏王血统，也不尝试为十三世拉江贡树碑立传。那是昨夜的明月，照不亮今晚的道路，而且，恶运的阴影刚刚退去，不堪回首。

但韬光养晦并没有消灭内心对祖先的自豪。珍嘎的弟弟土旦昂加是一个歌

手，在他的VCD专辑中，我看见这个小伙子在草原上纵情高唱：

在美丽的高原上

树林像大海一样多

种下第一棵树的人

拉江贡，江永罗松江措

是我的根本大师

环保大师

在那三江源上

创建了绿色的家园

在这绿色美丽的家园

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村庄

它的设计者

就是拉江贡，江永罗松江措

是我的根本大师

政教合一的领袖

他就是保佑众生的人

在这雪域佛教之乡

他带来了幸福安祥

二十四 爷爷订的婚事

1994年7月25日，拉嘉日家的妈妈向倔强的女儿妥协。珍嘎终于从商人嘎玛手里抢回那颗珍贵的天珠——那家族传统的象征。

嘎玛并不沮丧，他很高兴认识这一家人，包括这个很特别的美丽小姑娘。他做了那么多年生意，走南闯北，没见过如此不为高价所诱的女孩子。

大家坐下来喝茶，珍嘎妈妈问：“老家是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是贡觉的，家里有奶奶和母亲，还有两个兄弟一个妹妹。”嘎玛说。

“你家乡是不是有个香曲多杰？是不是有个阿达拉姆？”珍嘎妈妈问。

“有啊，阿达拉姆是香曲多杰的女儿，他们早就圆寂了。”

珍嘎妈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嘎玛不明所以，也没说香曲多杰、阿达拉姆与自己家渊源颇深。

“你多大了？”妈妈问。

“27。”

嘎玛一走，珍嘎说：“哼，这个人说假话，他长得那么老，还说自己27，我看他肯定40多了。”

“这个人挺好的，虽然是商人，品质不错。”妈妈说。

“我没见过这么帅的藏族小伙子！”舅妈说，她来自牧区，喜欢嘎玛这样朴实的农村人，“珍嘎，你应该追这个人嘛。”

珍嘎吓了一跳：“我才不呢，我可不嫁农村人！”

嘎玛有个朋友喜欢珍嘎，经常要嘎玛陪着他去拉嘉日家，一来二去，嘎玛与拉嘉日家越来越熟悉，变成了朋友。但珍嘎几乎没注意到那位朋友的存在，嘎玛的来访，总是让她很快乐。

嘎玛离开玉树到拉萨和西宁做生意，但保持着与拉嘉日家的联络。有时他会很惊喜地接到珍嘎的电话，这时珍嘎复员了，到扎多曾工作过的玉树邮电局上班，打电话很方便，“嘎玛，妈妈和你通电话。”她总是这样说。她没有敢单独与嘎玛通电话，妈妈要与嘎玛通话，请他帮忙从拉萨或西宁买些东西时，才能捎带说上一两句。

几个月以后，嘎玛在西宁机场接到珍嘎的电话，但没说几句手机就没了信号，嘎玛由兴奋变懊恼，忐忑不安，“她不要以为这个商人生意做大了，就不理人了吧？我嘎玛可不是这样的人。”

过几天他打过电话去，也没什么事，只是想和她说说话，随便扯几句，心里便觉得快乐。

尽管他不承认自己动过什么念头，但心里对她的喜欢还是不由自主冒出来，就像春天的青草悄没声地长出，突然间就绿遍了山坡。

珍嘎也喜欢上这个农村人，横看竖看，左看右看，怎么看怎么老实诚朴。可他对自己总是正正经经说话，连一句略有感情的话也没有，不知他喜不喜欢自己？

两颗心在沉默中慢慢接近，就像两棵相距很远的大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努力伸展着枝丫，最后枝丫连在一起。但嘎玛仍然什么话也不说，“我是有老婆的人！”他告诫自己。尽管那老婆是兄弟两人的，但如果在外边找别的女人，就违背了家族传统。家乡其他外出的商人也有另找妻子的，但这样名声不好，兄弟各找各的老婆，就像亲兄弟分家，是大家庭不和的征兆。如凯家是大家族，尊重

传统，他嘎玛可不能这样做，而且，妈妈和亲戚们也绝不允许。因此他虽喜欢珍嘎，却不能表达出来。

这期间嘎玛回了一次老家，奶奶高高兴兴来接他，怀里抱着一个小娃娃。许多年没见奶奶，嘎玛与奶奶碰头行礼，却不敢问那个小娃娃是谁的，甚至都不敢看她，“也许是弟弟和我们老婆的……也许是哪个亲戚的？”他想。到了晚上，他悄悄地观察，发现那娃娃到了妈妈怀里，到了弟弟怀里，到了亲戚怀里，“最好是亲戚家的娃娃……”他兀自存着一线希望，最后发现娃娃到了“我们老婆”巴央怀里——巴央不再是过去那个小女孩儿，而是一个妈妈了。嘎玛一下紧张起来，这意味着孩子应该叫自己“爸爸”，也是自己的孩子，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女儿的存在，这令他尴尬。

嘎玛几乎不对巴央说话，也不敢单独与她相处，他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她。他知道那的确是他的女人，可他对她那么陌生，“老婆”只是一个概念。好在他不对她说话并不多么不正常，在这个古老的山村，作为小辈的女人没有地位，在长辈和男人们面前，她甚至不能插话，只能弯着腰，小心翼翼地盯着他们的碗，时刻将酥油茶添满。

嘎玛只在家里住了一夜，单独睡在一间房里。在一妻多夫的藏族家庭，妻子单独睡一间房，根据自己家庭的规则，丈夫们轮流到她房里过夜，早上再偷偷溜回自己房间。哪个男人今晚与妻子同房，便会在房门外做个记号，比如放个帽子之类，别的丈夫自然回避。这个女人自从嫁到如凯家，便知道嘎玛是自己的丈夫之一，虽然这个丈夫一去六、七年，从未与自己有过耳鬓厮磨，但丈夫就是丈夫，是自己的爱人，只是在远行而已。这个家里没人怀疑这一点，奶奶、婆婆和丈夫晋美朗加都把她看作第二人的老婆，不是哪一个人的媳妇，她将是未来如凯家的当家人。

她盼着丈夫回来。丈夫终于回来了，但那一夜，嘎玛几乎想不起自己还有个老婆，他在自己房里一觉睡到天亮。没人知道，那一夜，这个妻子在怎样的期待、羞涩、担忧、惊恐和伤心中度过。

珍嘎着急地等着嘎玛开口，但嘎玛就像一个闷葫芦，不发一言。在玉树，有一打的青年人想办法与珍嘎见面。父亲一位同事的儿子喜欢珍嘎，拉嘉日家觉得那小伙子不错，再说也不便驳了同事面子，便让珍嘎与之见面，珍嘎怕父母生气，只好硬着头皮赴约，又不敢明说不喜欢人家，怕伤了大人之间的和气。那小伙子每逢周末便开一辆丰田越野车来接珍嘎，珍嘎终于熬不住，对他说：“麻烦你对你爸爸说，你不喜欢我，好吗？求求你。”

“不行，”那小伙子说，“我不能撒谎。”这个理由光明正大。

暧昧的沉默最终被珍嘎妈妈打破，她看出了什么，有一天问嘎玛：“你和珍嘎有没有那个意思？”

嘎玛一下红了脸，就像一个饥饿的体面人偷偷盯一眼别人的酥油，却被人发现一样尴尬，“我很喜欢珍嘎，对你们家族也很尊重，但我在家里和兄弟有个老婆，我要经过妈妈和亲戚的同意。”

“那就不要谈了，不要得罪你的家族。”妈妈很干脆地说。

嘎玛不知道说什么好，珍嘎妈妈直接了当的拒绝，似乎让他感到轻松，他不必再折磨自己，不必让家人失望，安心做如凯家的好儿子吧。

但没过几天，对珍嘎的想念又让他生出悔意，难道就这样失去她？我真是太笨了，我不应该那样说，我应该说：“我喜欢她，我要娶她！”

他给珍嘎打电话，珍嘎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对你有感情，但你说了那样

的话，妈妈不会同意的。我们就算朋友吧。”

放下电话，珍嘎哭了一场。

贡觉人有个顽固的习俗，在生意和老婆这两件事上不能求人。“那就这样吧，”嘎玛对自己说，“做朋友吧，不要喜欢她了。”

第二年珍嘎到西宁出差，嘎玛带她与一帮朋友吃饭，几个藏族朋友瞪大了眼睛问：“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你从哪里弄来的？”

待说明原委，一个老乡恨得拍着大腿：“嘎玛你真笨啊，那么好的女人，那么好的家族，你就不要了！其实你不用担心，你家里一定会同意的，你真笨！”

听了此言，嘎玛一颗心又热起来，他对她越来越想念，他相信珍嘎也是这样想他，等没人的时候，他鼓足勇气，期期艾艾地对珍嘎说：“我们……还是再谈谈吧？”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你自己去谈吧，”珍嘎从来都是快人快语，“你要想和我父母谈，就要尽快。”

嘎玛又去拉嘉日家，自从上次谈话后，大家都觉得尴尬，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后，嘎玛结结巴巴地说：“上次说的那件事，我……我可以和家里……商量一下……”

“最好别谈了。你不会嫁到这里，你们家太远。我们女儿也不会嫁到那儿去。”珍嘎妈妈说。拉嘉日家一直想要个上门女婿。

嘎玛的脸红到耳根，头上冒汗，低声道：“对，我不会放弃家庭，那里永远是我的家。但我现在也不在老家住，珍嘎不用住到那里，我们可以住到拉萨。你们也不要急着做决定，我们慢慢再了解。”

拉嘉日家还是没有同意。珍嘎偷偷与嘎玛见面，问他那位妻子的情况，嘎玛如实说，兄弟共娶了一个老婆。

“你和她有没有孩子？”珍嘎问。

“没有。”

“有没有感情？”

“没有，什么也没有。”

“那我嫁你。”珍嘎说。

珍嘎的坚决鼓起了嘎玛的勇气，对她的爱情，也令他重新看自己的传统。在前几年，他还认为另娶是不可思议的背叛行为。表哥多登在家乡与兄弟有妻子，但他在拉萨又有一个情人，并生了女儿。嘎玛坚决不同意表哥与她结婚，他代表家族与那女人的家族谈判：“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钱给你们，但就是不能结婚。”他把多登的女儿要过来放在成都抚养。现在想来，他做得是不是有点过分？唯一的安慰是，表哥当时与那情人的关系并不融洽。

他又想到大哥仁青桑珠，爱情可以让人背叛自己最笃信的原则，推己及人，看来仁青的还俗也并不是那么不可原谅。

珍嘎铁了心要嫁嘎玛，妈妈劝不动女儿，伤心地哭了：“你没听说过吗？贡觉人一辈子都在外流浪，快死的时候才回家。他们野蛮，动不动抽刀子，哪有什么好人啊！”

“珍嘎要嫁贡觉的生意人啦！”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结古镇。一天深夜，珍嘎的一个追求者喝得大醉，打电话对她说：“你知道吗？嘎玛在老家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

“那又怎么样？”珍嘎说，“他就是有七个孩子，十一个老婆，我也喜欢他！”

1997年10月，珍嘎瞒着母亲偷偷跑到西宁，找到嘎玛，与他住在一起。嘎

玛不敢告诉家里人，但也豁出去了。他熟读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诗，这时可能更喜欢这一首：

背后的凶恶龙魔，

没有什么可怕。

前边的香甜苹果，

舍命也要摘它！

拉嘉日家终于承认了这门婚事，但没有举行仪式，拉嘉日家觉得得罪了那么多求婚者，女儿最后却嫁个贡觉生意人，很没面子，不愿声张；而嘎玛更不想让老家的人听到风声。两个人悄无声息地做了夫妻。

但玉树人慢慢知道了这桩婚事，有人问珍嘎的嫂子：“听说你妹妹嫁个了有老婆的人？还是兄弟两人一个老婆？”

“胡说！他根本没老婆！”嫂子说。

嫂子气鼓鼓回家告诉珍嘎，珍嘎说：“你对人家说实话就行，我不羞。”

“不能那么解释！要斩钉截铁！”嫂子说。

1999年12月，珍嘎生下大女儿昂赛央宗。但嘎玛不在身边，此时他在拉萨接二连三遇到麻烦，女儿八个月大时，嘎玛才回家看了女儿第一眼。珍嘎母亲说：“我说对了吧？贡觉人就是这样，到死才回家呢。”

女儿出生后，嘎玛的妈妈终于知道儿子在外面有了家，偷偷哭了。嘎玛从未向她解释，他不敢在妈妈面前提到此事。妈妈自始至终也没有问过一句，只是对他说：“既然有了孩子，一定要待人家好。”

没人知道老家那个女人巴央的感受。

婆婆想见珍嘎和孩子，珍嘎带孩子去拉萨见她，婆婆很喜欢珍嘎。但十年了，嘎玛从未安排珍嘎和孩子回老家，尽管妈妈一再这样要求。他仍然不知道怎样面对家人、亲戚和那个“我们老婆”——十年后，他说起弟妹来，仍然这样称呼。在传统面前，他一直将自己爱的女人藏在身后。

2000年10月，嘎玛带珍嘎去昌都看第三届康巴艺术节，遇到嘎旺法王，嘎玛让珍嘎给法王磕头。

“她是哪家的女儿？”法王问。

“玉树拉布寺拉江贡的孙女。”嘎玛说。

法王点点头说：“她爷爷拉江贡娶过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早逝，又娶了她的奶奶。”然后如数家珍般说出拉江贡的世系。

嘎玛大为奇怪：“阿活嘎旺(嘎旺大哥)，你怎么知道？”玉树昌都间隔重重大山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道路险阻，消息不通，嘎旺又从未去过玉树，怎知如许详情？不料嘎旺法王说出一件奇事来：

大约80年前，嘎旺法王的外公香曲多杰曾有一个故事。一天在娘拉寺的天葬台上，人们发现大鹰们不吃肉，身上灰灰的，没精打采，像病了一样。人们向香曲多杰请教，香曲多杰说：“拉江贡的夫人圆寂了，鹰很难过。”

几年以后，又有人在天葬台看到奇怪的事：神鹰们羽毛光亮，展翅跳跃，边

跳边吃，如舞蹈一般。香曲多杰说：“啊，拉江贡今天娶新夫人了，它们很高兴。”

孜荣部落很多人知道香曲多杰这个故事，但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拉江贡”是谁，包括仁青。2007年1月，我在拉萨对仁青桑珠讲了这件事，他的眼珠子几乎瞪出来：“原来嘎玛的老婆是那个拉江贡的孙女！”他与弟弟嘎玛都有心病，彼此绝对不谈自己的妻子。

仁青正整理香曲多杰的著作，他知道这两个大师在佛法上的渊源。香曲多杰的一部经书里写，在莲花生大师的道场里，拉江贡活佛请求莲花生大师给他某部经书，莲花生大师对他说：“这部经书在香曲多杰那里，但路太远了，香曲多杰要你变只鹰飞过去取。”

看来香曲多杰早知道十三世拉江贡活佛是谁，嘎旺法王也许从母亲阿达拉姆那里听说过拉江贡的故事。

但拉江贡怎样变成鹰飞到香曲多杰那里取经书，香曲多杰的经书中没有写。谜底还是在拉江贡活佛的家族这里。

珍嘎拜见嘎旺法王后回到玉树，对父母说了嘎旺讲的这件奇事。“怪不得！这下全明白了！”妈妈说。然后她说出另一件奇事来：

珍嘎爷爷十三世拉江贡闭关时，由奶奶护关。一天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她梳着一条长长的大辫子，手里拿着一支大鹰羽毛，说：“请把这羽毛献给仁波切。”

奶奶心下奇怪，很多人向拉江贡献宝物，但从没人献羽毛。她对丈夫说了原委，拉江贡仁波切接过羽毛放在头上说：“那女孩儿是阿达拉姆，香曲多杰的女儿，香曲多杰让她来借给我翅膀，我要飞过去取经书。”

珍嘎奶奶去世前经常对儿媳妇唠叨：“你说怪不怪？一个十七八的女孩子把羽毛献给仁波切，你说怪不怪？”

珍嘎妈妈记下了这件事，她听珍嘎奶奶说，拉江贡提过，阿达拉姆和香曲多杰好像是西藏昌都的，因此当年她卖天珠给嘎玛时，便问他家乡是否有香曲多杰和阿达拉姆其人。

“瞧，我和嘎玛多有缘分！”珍嘎对我笑道，“80年前，我爷爷就把孙女的婚事定下了。”

第五章 求道

我的话你们不要轻易接受，要像检验金子一样，煅烧、切割和摩擦。

——释迦牟尼

二十五 辩经

2006年5月7日，我到云南德钦找修行者海木梭。我先到了中甸。为吸引游客，中甸前几年改名为“香格里拉”。几个藏族朋友告诉我，县城商铺的藏文字错误百出，外来人把这里想像成天堂，或至少是天堂门口，但没有藏人认为这是佛教中的理想国“香巴拉”，许多藏人认为，在整个藏区，这是商业化最彻底、藏文化破坏最严重的地方。

从这里去德钦县近200公里全是山路，陡峭险峻，我特意选了一位上年纪的出租车司机，他开车很慢，让我觉得安全。

这条路是茶马古道的一部分，唐宋以来，马帮从云南普洱驮着茶出发，经下关(大理)、丽江、维西、中甸、德钦，西进拉萨。这是世上海拔最高、最险峻的驿道，也是仅存的尚部分运行的古道。珍嘎的爷爷十三世拉江贡活佛创立的马帮，当年马铃叮当响在这壁立千仞的险道上，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商号之一。

我从中甸一路向北，跨过金沙江，再过海拔4000多米的白马雪山垭口，进入德钦县。德钦属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西北角，与川藏两省毗邻。六个小时后，我在傍晚时分进入县城升平镇，它狭长的城区深藏在卡瓦格博雪峰下的崇山峻岭中。38岁的海木梭在德新客栈门口等我，他瘦瘦高高，长长的丹凤眼，长眉飞入鬓角，脸色黑红，戴一顶阔边帽，两侧帽沿被帽带系着折向帽顶，穿着长袖T恤和牛仔裤，活脱脱一个斯文的牛仔。他为我拉开车门，给我一个暖暖的微笑：“欢迎来德钦。”

与嘎玛、仁青和扎多一样，木梭幼时失去父亲。父亲的缺失对这些60年代出生的藏人来说，似乎隐含着一种象征意义：他们是一群文化上断了根的人，因此他们焦灼地伸展触角，想把自己的根基重新扎入本民族文化的土壤。

父亲在木梭四岁时因病去世。父亲小时候在丽江上高中和师范学校，解放军进藏时，他为解放军做翻译，因高大威猛，像活佛，藏区不少民众居然请他摸顶。他借机劝说：“共产党不是坏人，跟国民党不一样。”说服不少土司、活佛和藏民与解放军合作。木梭小时看父亲留下的日记，里面记载解放军进藏时，昨天俘虏了多少藏军，今天劝降了多少人之类。

父亲去世后，对木梭影响最大的是姑父阿图。阿图研究格萨尔传和藏文化，手中有一本绝版格萨尔王传《加岭传奇》，讲藏汉友谊的故事，文革中，阿图为了保护这本书几乎丧命。木梭与阿图很亲近，他的藏文由阿图启蒙，长大后又因学习佛教而重修藏文，因此他是德钦为数不多精通藏文的藏人。

木梭1968年出生，17岁时去中甸汽车总站开车，开着大卡车到处拉木头、粮食和盐巴，他喜欢看书，驾驶室慢慢被书籍装满。

他驾着卡车，似乎是骑着高头大马，到处行侠仗义。一次他开车到成都火车北站，正在溜达，突听有人喊：“抓小偷！”眼见一小偷往这边跑，前面的人避之唯恐不及，哗哗分往两边，小偷乘风破浪而来，木梭冲上去将其一拳打倒在地，交给警察，甚是得意。

在大理古城下关的菜市场，又有小偷逃窜，木梭刚买了几本书，于是站在当街，待小偷冲上来，木梭将书举起，对准小偷奋力砸下去，然后一脚踹倒，大有“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豪情。

1991年，23岁的木梭拉松茸去四川德阳，但松茸卖不出去，木梭坐困愁城，

无聊中逛书店，买了一本《简谱入门》。书中没有发音，木梭有办法，他拿出袖珍计算器，那计算器天生是为木梭学音乐准备的，只要按“1”键，计算器就发出音符声，如此这般，键盘上的1234567，就是音符的Do Re Me Fa So La Te。

木梭自得其乐学习简谱，学成之后作歌一首，名为《格桑梅朵》。“格桑梅朵”之藏文源于佛经，“格桑”是生长在藏区的一种花，“梅朵”指花，“格桑梅朵”是吉祥花或吉祥事物的意思。

这一晚，木梭信步来到一个舞厅，舞厅是几个懂音乐的小伙子开的，木梭腼腆地告诉他们，他写了一首歌。

一位小伙子鼻孔里“哼”了一声，说：“那你唱唱我们听。”

木梭鼓鼓勇气，唱了出来：

“翻过了第一座雪拉山口，

年轻人远远看到故乡。

回到家乡，满山遍野的格桑花儿开放，

我摘一朵，献给恩深的母亲。”

木梭一唱出来，那几个年轻人奏起音乐，架子鼓电吉他轰响，整个舞厅的人跳起来，尽情狂欢。

后来有人告诉木梭，当晚有位学音乐的小姑娘将这首歌带到昆明，一个有些名气的音乐人将这首歌署上自己的名字。

“没关系，随便玩玩嘛。”木梭说。他一点也不在乎版权。

《格桑梅朵》并不是木梭写的第一首歌，而只是他用简谱写下来的第一首。他18岁时写过一首《耳环姑娘》，但因为是幻想一个姑娘与自己对歌，所以一直没好意思拿出来，前几年才被他的歌手朋友拿去唱。现在这首歌仍在藏区流传，在有些藏族歌手的专辑中有这首歌，甚至有一个歌手专辑就是《耳环姑娘》。

18岁的木梭去参加贡卡湖边的端午节，贡卡湖位于德钦县城北侧贡卡山山顶，是一个面积不大的高原湖泊，四面环山，湖水清澈见底，每年端午节，德钦县人穿上盛装到贡卡湖边集会，载歌载舞，谈情说爱。木梭自小内向，不好意思去跟姑娘们对歌，但春心萌动，幻想有位美丽的姑娘与自己对歌，那姑娘明眸皓齿，更动人的是戴一对大大的耳环，顾盼之际，耳环丁当作响，听得木梭心神俱醉。

木梭躺在湖边，看白云青山，听鸟叫泉鸣，心中忽忽唱出一首歌来：

“那一天我听你唱起布擦布擦呀拉索，

我弹起吉他陪你唱一首布姆布姆呀拉索，

唱得那小河流水沙啦啦啦呀拉索，

唱得那姑娘的耳环丁当丁当呀拉索。

今天我又来到这里布擦布擦呀拉索，
再也听不到姑娘的声音布姆布姆呀拉索，
只见那小河流水沙啦啦啦呀拉索，
不见那姑娘的耳环丁当丁当呀拉索。

虽然梦想遇到一位仙女般的姑娘，但木梭与其他长途司机不同，他不与女性接触。他在“解放”卡车的副驾驶门上安了一把大锁，并贴告示：“此车不搭女客”。其他司机见女人就搭，说话油腔滑调，令木梭厌恶。他读的许多古书，总要教他伦理道德。

这位喜欢自学的年轻人听说周易最难学，心痒难挠，开车经过“恐龙之乡”云南禄丰县，在书店买到一本《周易预测学》，如获至宝，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一边开车一边拼命学。学得差不多了，才明白这本书是算命的，于是试着算卦，不敢算人，怕算坏了，算算天气吧，没想到挺准。

木梭越算越准，越准越心惊。有一年有位朋友丢了 23 万块钱，木梭在家算了一卦，心里明白是谁偷走的，而且逃向何处，但他没敢对人讲。后来公安侦破，与他所卜算的八九不离十。

听到这个消息，木梭呆坐当地，脑中一片空白。

从小学习唯物论的木梭，根本不“迷信”，但自己的卜算明明白白告诉他，有一双大手操纵着一切，大家都在同一列火车上，人的命运不由自己决定。这对相信自己能主宰命运的木梭是沉重打击——果如是，我再努力有什么用？

看来冥冥之中自有一种大规律。可这规律是什么？木梭无法破解，苦恼不已。

某一日他在报上看到，有人练“香功”解破了周易大智慧，他极为亢奋，在丽江花 10 块钱买了本《香功》，照着书练了一个月，除了饭量增大，没什么其他反应；又听说张洪宝大师创立了中功，非常神奇，木梭专门跑到昆明找中功。那是 1994 年，满大街挤满了人做气功广告，好不容易找到中功摊点，摊主说：“初级班，交钱，56 块。”向木梭伸出手。

真理也许就在眼前，不可失之交臂，木梭交上 56 元。学了不久，一个朋友胃口不好，吃不下饭。木梭想试试自己功力如何，照着中功所授，一边观想，一边对朋友发功。因自学惯了，他易心静，所以观想并不困难。

发功完毕，朋友胃口大开，一顿饭吃了一斤多。车队的总经理也吃不下饭，听说这个奇事后来找木梭。木梭心想，根据中医知识，必是脾脏出了问题，于是对总经理的脾胃观想半天，然后一起吃饭，没想到总经理连吃三碗，意犹未尽，又出门买糕点去了。

木梭用中功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小有名气了，便跑到离县城十公里的飞来寺租了一间小民房，专门给人看病，想试试功效究竟如何。这里是小村子，影响不大，他还不敢在县城当土郎中。

两年里，他一边练功一边医治病人，看病从不收费。一位看管飞来寺的老人犯头痛病，一天要吃 20 片去痛药，医生不给多开，他必须两天去一次县城买药。

木梭给他治了治，那老人从此不再吃药。但木梭并不是常胜将军，他对一个哑巴发功，想让他说话，那人至今没开口。

木梭渐渐不满足，他要寻找的是大智慧，而不是让哑巴说话，他在中功里找不到大智慧。中功传播者的所为也令木梭厌恶，一个人甚至对木梭说：“我们要让中功人率先奔小康。”

“我练中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木梭说。他从此抛弃中功。

木梭在此之前学过佛学著作，但只是自学，没有老师。拜师是学佛中最重要的环节，没有师父引领则不得其门而入，书本佛学知识学得再多也无法获得成就。师父要谨慎收徒，徒弟也小心求师，一旦择错，大误修行。木梭生性自傲，不愿贸然拜师，因此到处拜访高僧大道，与之辩论，以探对方之道行与才学。

1997年的一天，木梭开车经过中甸时前去朝拜松赞林寺。这里有一位印度回来的喇嘛，专攻性相学，他问木梭：“你在这里可有大学生朋友？”

“有啊，”木梭开玩笑道，“我自己就是初中本科生。”

“我希望找一个大学生，他用科学知识，我用佛学知识，我们来辩上一辩，可惜不好找啊，”那位大和尚摸着肚皮，言中颇有寂寥之意，“我这满肚子的学问哪，得找一个开锁的人。”

这一句激怒了木梭，他说：“要不，咱们两个辩一辩？”

“好啊！”大和尚满面笑容，“我们来辩一辩。”

木梭道：“我没上过大学，我的科学知识只是初中水平，我就用这初中水平与大师辩辩吧。请问大师，白色的雪化得快，还是有污点的雪化得快？为什么？还有，热水瓶里的水为什么热那么久？”

大和尚呆在当地，无言以对。

木梭知道，性相学不讲这些，和尚肯定答不上。

木梭说：“大师，你错了，你不应该拿佛祖的成果对抗人类的科学成果。佛祖传法的目的是帮助众生，而不是与众生干架，你的发心错了。”

那僧人又羞又惭，向他行礼致谢道：“我错了，我要立即改正。”

奔子栏有个东竹林寺，寺里一位老格西天真烂漫，一会儿大发雷霆，一会儿喜笑颜开，像老顽童一般。木梭去拜访他，谈到“空性”时，老格西问他：“你用什么看东西？”

木梭说：“眼睛。”

“你错了，”老格西说，“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

“如果眼睛不能看东西，那用什么看？”

“用心。”

“好，”木梭说，“请你把眼睛闭上。”

老格西闭上眼睛。木梭将一个碗拿到手里，问：“你用心看看，我手里是什么？”

老格西暴跳如雷：“佛经里就是说用心看的，你竟敢取笑佛经！”

木梭看过《楞严经》，佛祖说过，看东西需要眼睛、心、物体、光线、距离等许多因素，其实老格西说眼睛看不到，并不全错，但当时的木梭年轻气盛，一味要辩经取胜。

两人很快成为朋友，后木梭又去看他，他不像普通藏人见和尚就磕头，而是彬彬有礼，不卑不亢。

格西见木梭来了，亲自为其打酥油茶。木梭客气地说：“我来打吧。”格西笑

道：“你不会打茶，就等着喝吧。”打完茶往一个陶罐里倾倒，木梭急忙说：“我来吧，打茶我不会，倒茶我总会的。”

老格西眉毛一挑，笑道：“你会倒茶？”然后一指陶罐说，“此乃无常物。”

一听此言，十余人立即围上来，目不转睛瞧着木梭，看他如何作答。老格西首先挑战了。

老格西说陶罐“无常”，表面是说如果不当心，会把它打碎，并可引申到世事无常，同时暗示木梭，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不要执著于世俗礼节，世人认为僧贵俗贱，你我虽有僧俗之别，但众生平等，众生皆是我母亲，又讲什么长幼尊卑？

木梭心下明白，众生平等，僧人打茶我也可享受，但要存一颗端正的心，若施施然享受高僧供养，是为罪过。木梭反问格西：“既是无常，那么，常在何处？”木梭此言之意是，既然世事都是无常，那么，“永恒”在哪里？

老格西抬头看天，微微一笑。

木梭抬头看去，只见蓝天一碧，晴空万里，霎时心领神会，二人相对哈哈大笑。

原来老格西抬头看天，意指那天空才是永恒。天是虚空，虚空的境界才是永恒的。

但木梭仍未拜师，他到处访师，但求一败，输得让自己心服口服，以找到明师，寻到心灵的归宿。直到有一天，他的师父来到面前。

二十六 哪里找到我的灵魂？

这一天，西藏昌都的仁青久乃活佛来德钦寺传法。在木梭后来所拜的六位师父中，仁青久乃活佛对他影响最大。

仁青久乃活佛是西藏昌都芒康县人，在甘达寺出家。仁青久乃活佛小时是放羊娃，六岁时能记忆起前世，见到仁钦贡波大师时竟跑上前认老相识，被大师识出是顶巴大修士的转世灵童。

因为芒康甘达寺是小寺院，没什么气派，只有两个哥哥送他进寺院。两个哥哥不服气，不相信弟弟是转世活佛，说：“既然你是转世活佛，在前面领路吧。”

小活佛于是在前引导，走了两天，那陌生的道路，他像走过几百遍一样熟悉。到寺院一个月后，他说想去前世的家里看看。寺院派一个知道他前世家的大胡子僧人带他去，那僧人故意逗他，走着走着说忘了路了。“没关系，我知道。”小活佛说。六岁的小孩子走在前面，翻了两座山，来到一处草原，找到他前世的家。前世活佛 20 岁就圆寂了，母亲还在伤心中。小活佛叫了一声“妈妈”，抱着妈妈的脖子哭起来。妈妈见儿子的转世来了，也抱着他大哭。

擦干眼泪，小活佛问前世妈妈：“我那只碗还在不在？”他前世时最喜欢那只碗。

妈妈说：“卖了。”

孩子生气了，说：“我说过不要卖的嘛。”

他的活佛生涯结束在 1950 年解放军进藏。寺院在离芒康县城 30 公里的山上，消息还没传来，活佛就知道天下有变，一日对僧人们说：“我们散了吧。”

他离寺回家，继续当他的羊倌。甘达寺僧人后来与解放军交火，伤亡惨重。他躲过战火。

县里组建供销社，他这个昔日活佛成了供销社主任。文革后期，他晚上偷偷带领过去的喇嘛学经，为了闭关修行，他常请病假。政府来人检查，他妈妈把经书藏到窗台后面，来人把菜地、厕所、所有可查的地方都查过了，恰恰没查到窗台。

文革后，班禅大师经过此地发现了他，把他带到北京高级佛学院学习一年。后来北京有人到昌都地区打听仁青久乃活佛，当地干部说：“他在供销社当主任呢。”

“啊，你们不要？北京佛学院要。”北京来说。

昌都地区这才想起这个人才，立即将他调上来，现在是昌都地区政协副主席。

这位活佛极为谦恭，常对弟子们说：“我没上过学，没知识，只是给你们讲些故事。”而木梭认为，师父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学问极高，“难道是前世所学，他回忆起来了？”

活佛绝不故作高深，他对弟子们讲过一个故事。他当供销社主任时去一个村子，在两河交叉处看到一头牛。他进了村，一个人正急慌慌地找牛，见他来了，喜道：“活佛来了，你给算一下，我的牛在哪里？”虽然他是供销社主任，人们仍当他是活佛。

活佛装模作样算了一会儿，说牛在两河交叉处。那人急急赶去，果然找到。“肯定能找到嘛！”活佛对弟子们笑道。

从此那人到处宣扬：“活佛太神了，连牛都能找到！”

“那是吹牛，我可不会算命，那牛是我看到的。”活佛对弟子们说。

这天傍晚，因为来了这位大活佛，德钦寺热闹非凡，许多人来朝拜，木梭亦来旁观。入得门来，地下跪倒一片，木梭昂然不跪，拿眼冷看活佛。仁青久乃见到他，慈祥地说：“啊，我的弟子回来了。”当即赠他一尊珍贵的小金佛。

众人很惊讶，大活佛居然对第一次见面的木梭如此厚爱，可见二人缘分极深。

木梭却不为所动，他不像一般藏人见佛就拜。木梭认为，信仰有三种：因为大家信仰而信仰，因有所求而信仰，因了解而信仰。大部分藏人属于第一种，他可不人云亦云。他崇敬那些实修者，不只是学知识，而是艰苦实修，不图虚名虚利。

噶当派先圣有座右铭曰：

修法在深山，

深山修苦行。

苦行愿舍身，

尸身愿施狗。

木梭敬信这样深山里的苦修者，却怀疑那些名声大的喇嘛，因此仁青久乃活佛对他厚爱，木梭反以为是装神弄鬼，大有骗子嫌疑。但大活佛这么“套近乎”，木梭也不好不给面子，拿了人家的手软，木梭不好当即与之辩经，于是哈哈一笑，告辞出门。这一次与一生最重要的师父失之交臂，两年后才皈依座下。

木梭终日寻寻觅觅，找碴寻斗，终于也厌倦起来。他虽抛弃了中功和周易，但还没找到人生的道路，内心的大矛盾仍无法解决。虽学佛，但没有皈依，人生不明，陷入巨大的痛苦中。当时木梭作《红尘飞歌》唱道：

磨不破远去的脚步，

看不透红尘的眼，

到哪里

才能找到我最初最终的灵魂？

1996 年的一天，听说一位堪布从印度回来，到了中甸松赞林寺。这位堪布一生修行，守戒很严，比丘 253 戒一生从未犯过，可谓高僧大德。木梭诚心而去，见到堪布慈祥的面容，突然一股强烈的安静感将他罩住，一时间，所有的狂躁妄想化作无形，争辩之心也无影无踪，只想俯伏在地，皈依门下。

木梭说：“师父，人生无常，我也许明天就开车撞死，但我快 30 岁了，还没有戒律，如果死掉，肯定会堕入饿鬼道。我迫切希望您作我的上师，请师父收我为徒，授我居士戒吧。”

此时木梭对佛教越学越深，轮回观念已深印于心，生怕死后陷入万劫不复的轮回。而有了戒律来守，就可以通过修行摆脱轮回。他一直不服人，但在死亡面前，他失去了自信。

佛教经典说“善戒如大地”。万物生长离不开大地，一切善功德都生于戒地，无戒地一无所成，皈依受戒是进入佛教之门，如果不受戒而自己持戒，比如不杀生、不说谎只是善事，有福报，但对修行却无功德，别说成佛，连入道也无门。受戒就是对佛祖对众生做出承诺，其后功德积累飞速增加。而受戒必须拜师，拜师之后，师父身上的法脉才能传到弟子身上。

师父见木梭诚心求师，便为木梭授了居士戒。所谓居士戒是指不必出家、在家终生修行的戒律。出家是为了脱离世俗的繁杂事务，保持身心清净，更重要的是保持心性清净。若能做到心性清净，出家在家都是一样。佛法要求人们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品行脱俗。

28岁，在木梭寻找真理十年之后，终于进入佛教之门，从前的困惑、忧虑、绝望一扫而空，从此人生焕然一新。

进入佛教之门后，木梭对周易不再感到神秘。周易利用了大自然的某些规律，但不是绝对真理，比如五行生克，北寒水南热火，如果换在赤道以南，这些道理就完全讲不通。佛教认为，绝对真理是缘起性空，就是说一切皆有因缘，因为事物是由各种因缘凑成，所以实质不存在。事情互为因果，从果可看到因，从因可看到果，易经看到了这些因果，分析这些因果，“但你了解了周易，也只是了解了命运，却不能掌握命运，佛教让你掌握命运。”木梭说。

木梭所拜的第二个师父就是仁青久乃活佛。自第一次见面后，活佛每来德钦寺，木梭必随侍在侧，但从不拜他，反正已有一个师父了，不着急，再考察考察。

这一天，仁青久乃活佛又来到德钦，木梭去见他。在一个小屋子里，有十来个人陪着活佛。木梭问：“大师，听说你学问高，智慧大，我有个问题，可不可以请教？”

仁青久乃活佛微笑道：“我没有那么大的智慧，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嘛。”

“请问活佛，学佛应以何为本？”

“以善戒为本。”

“以何为目标？”

“以普度一切众生究竟成佛为目标。”

“凡人如何求得心安法？”

“凡事为他人着想。利在人后、功在人先者心安，少欲者心常乐，无诤斗心者心安静。”

木梭心下钦服，把真正的疑惑拿出来请教：“佛教说要慈悲为怀，但我看到有些佛事活动，杀牛宰羊，大摆筵席，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它生命的痛苦上，心口不一，这样对吗？”

“那不是佛教徒应该做的，他们错了。”仁青久乃说。

木梭跪下说：“师父，对不起，我考察您两年了，现在真心向您拜师，请您接纳我。”

活佛颌首道：“太好了！师父选弟子，应考察三年；弟子选师父，应考察十二年。我们做不到十二年，但认真的考察还是要的。”

木梭终于找到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上师，从此终身追随。

仁青久乃对木梭身教胜于言传，他本身的行为就是木梭的典范。他大慈悲心，从不想自己，只想能为别人做什么，“在我所见的人中，他是最伟大的大慈悲者。”

木梭说。

木梭陪师父传法，负责师父的交通和食宿。有一次传法的地方对活佛接待简慢，结束后，木梭开着自己的破车送师父离开，心里有些不痛快：“这么了不起的师父，却受这些苦楚，这是因为我财力不够啊，不能好好供养师父。”

“师父，看来我的发心要改一改了。”木梭说。

“怎么改？”师父问。

“我来世最好做个大富人，有钱，把你的吃住全包了，服侍得师父好好的。”

不料师父生气了：“你这样发心，不是我的弟子！我希望你修行成佛，解救众生，你却辜负我的期望。”

木梭不敢答话，闷头开车，心中一阵难过：这是我一片好心啊。木梭反思自己，应该如何纠正发心。师徒二人闷声不响开出十公里后，木梭终于想通：“师父，我改一下自己的发心吧，我希望来世在山上修行，即身成佛，普度众生。”

师父点点头：“这才对嘛，这才是我的弟子。”

皈依后的木梭每天早晚两三个小时诵经学佛，几乎与世隔绝，甚至连唱歌、听音乐都戒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修行上一帆风顺。他的佛学知识学了不少，但渐有傲慢之心，看低别人。从此他认为世俗是苦的，看谁都不顺眼，认为所有人都是肮脏的，包括家人和同事。他以为这才是看破红尘的心态，从此更为极端、孤僻和固执，“你们这班人，俗！”他总这样想。

木梭在家里易发脾气，不停与太太吵架，对儿女也不尽心，认为自己反正要出家，走上解脱轮回之路。直到2001年，木梭有一个转折。

他与第三个师父旺秋活佛在寺庙里学了一个月，师父的学问深不可测，但谦虚平和。第一次接触旺秋师父，也是先有一场试探性的对话。

木梭说：“请问，咱们地球上的人类，算不算有智慧的众生？”

“是的。”

“那东方人、西方人、藏人、汉人，哪一种人有更大的智慧？”

“都差不多吧。”

木梭问：“师父认为，什么宗教最好？”

“佛教最好。”活佛不假思索。

木梭说：“世界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信仰佛教的人最少。如果大家都有同样的智慧，为什么不选择你认为最好的佛教呢？难道信别的宗教的人，智商比我们差吗？”

说完，木梭眼瞅旺秋师父，看他如何作答。

旺秋师父一句话，即让木梭折服：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就像认为自己的母亲是最好的，我也一样。但是，”他话锋一转，“只有佛教让众生成佛，而其他的宗教只让人成为神的奴仆，所以，只有佛教才能让众人得到解脱。”

木梭随后向旺秋师父请教了菩提道论中一些问题，旺秋师父对菩提道论见解极精，让木梭折服，深为自己的无知自大而羞愧。

他立即休假一月跟旺秋师父学习，一个月中，有两件事让他的人生态度彻底改变：一是系统学习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终于发现佛法是一面镜子，照着自己，而不是照别人，但他过去老拿佛法看别人，觉得镜子里的别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其实他错了，他应该照自己。

第二，木梭真正懂得了什么是轮回。以前他“看破轮回”，是看破了那些俗人，“我讨厌轮回，讨厌你们这些轮回！”他总这样想。

某一日旺秋师父说：“轮回就在你的心里，你的身上，所有众生是你解脱轮回的良师益友。你从众生身上看到的痛苦，就是你自己的痛苦，他们帮助你看到自己的痛苦，你修行，也是帮助他们增加功德。离开众生世俗，就没有解脱。”

此言如头顶惊雷，让木梭思考良久，终于明白，佛教跟世俗怎分得开？一离开世俗，就没有佛教。成佛为什么要普度众生？没有众生，哪有佛？

仁青久乃活佛一次在山上闭关，木梭为师父护关。木梭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切全凭妻子伺候，哪会做什么饭菜？可这时不得不为师父做饭，饭菜做得很难吃，木梭自己都难以下咽。师父不说什么，只是说：“好，没关系。”实在吃不下去时，就平静地放下饭碗说：“我喝点水吧。”

闭关结束后木梭讨教：“师父这次闭关有什么心得，能否开示一下？”

师父说：“有啊，我发现自己还是有傲慢之心。你给我做饭，我有时还会觉得难吃。你的饭实际是在训练我啊，我应该感谢你。”

木梭无地自容。

师父每天早上从经书里挑出两句话详加解释，让他观想。这一天师父讲经说，菩萨善行，总能让所有人满意。所以不管做什么事，都能让别人高兴，那就是菩萨善行。如果让别人生气，那就不对了。说到此处，师父说：“从此以后，你每天回家，先给妻子磕三个头。”

木梭大惊，问师父何出此命。师父说：“你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尊重，怎么能尊重众生？怎么才能有菩萨善行？”

木梭并没向师父隐瞒，他在家对妻子不好，谈不上什么感情，动辄训斥，妻子虽贤惠，但像大部分藏族女人，对丈夫逆来顺受。

木梭再三请求：“我从此对她好，但求求师父，千万不要让我向她磕头。”

木梭无法想像，天天在家作威作福的他，怎么可能向妻子磕下头去？妻子见平时神一样的丈夫突然向自己磕头，那种惊骇，恐怕无法言表。

师父见他诚惶诚恐，微笑着收回成命：“但你一定要对妻子好啊。”

木梭磕头答应，从此变了个人，对妻儿和声细语，处处照顾。妻子受宠若惊，加倍对丈夫好，每天除了在经堂中磕头，做家务，就是尽心尽力伺候老公。

木梭从小性格孤僻内向，他印象中最美好的事，不是与别人交往，而是一个人在贡卡湖边听阵阵松涛，看潋滟水波，手伸进水里拨弄那弯来弯去的水草。天晚了，农夫回家，他也哼着曲子回家，看自己的影子越变越长。

他冲动率性，结婚后仍如此。1995年10月15日，全家盖新房，他开拖拉机拉沙子，拖拉机坏了，他下车维修，一转脸，看山上秋叶火红，于是站起身来，拍拍手对家人说：“不干了，我去玩了！”跳上车往后一倒，“咣当”一声，将一车沙子全倒路面上。

“你疯了！”妈妈说。

“房子什么时候都可以盖，这秋天的美色说没就没了。”木梭说罢，开拖拉机“突突突”跑了，余下妈妈和妻子面面相觑。

木梭背着铁锅粮食上了山，一住几天，昼赏红叶，晚望秋月，夜里就睡在枯叶上，一直到粮食吃完，这才尽兴下山，重新盖房。

皈依佛教后，木梭的人生之路发生巨大转折，甚至性格也变暴躁为平和，很难见到这样大违常理的怪异举动。“佛教给了我通往四方的广阔大道，我几辈子也受用不完！”木梭说。

二十七 用母语写你的名字

木梭在德钦街头接到我，把我领到德新客栈斜对面的县图书馆二楼，卡瓦格博文化社就在那里办公。一个瘦小的男子迎出来，黑黑的肤色，看起来有些病弱，眼睛小小，下巴尖尖，有几根枯弱的山羊胡子，身子稍稍有些佝偻，很珍惜地将不多的头发扎了一条马尾，留在脑后。他就是卡瓦格博文化社现任社长斯郎伦布，官方身份是德钦县图书馆馆长，这间文化社的办公室是他利用职务之便所安排。卡瓦格博文化社是他们几个同道成立的民间组织，旨在抢救和传播藏族文化。

斯郎伦布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学习画画。在大学时，令他最难堪的是同学问他：“斯郎伦布，你的名字用藏文怎么写？”

斯郎伦布从没学过藏文。20世纪60年代初，德钦的学校停止了藏文教育，只有极少的人懂藏文，很多人甚至连藏语也不会说了。据当地人说，1985年十世班禅大师到迪庆州考察，州领导用汉语向他介绍情况，班禅大师说藏语，许多人听不懂，班禅大师伤心地流泪了。

“我不会用母语写自己的名字。”这像一根刺，深深刺入斯郎伦布的心里。

1997年，斯郎伦布患肺结核，大病一场。他住在医院里，天天对着天花板琢磨：到这个世上活了二十五年，什么事情也没干，真有点可惜呢。可能一会儿就断气了，可仍然没弄明白我到底是谁。我是汉人吗？不是。我是藏人吗？我连藏文都不会，祖先给我的，我全找不到了。迪庆族自治州的这一代藏人不会藏文，我是不是应该办个藏文培训班？起码自己能学几个字母。

斯郎伦布病好后开始筹备藏文培训班：租教室，请老师，借课本。开学那一日他特意穿上藏装，喜气洋洋迎接学员。招生横幅上写着：“你可以用母语写自己的名字。”五十来位学员挤满了教室，大都是青年公务员。在报名表“你为什么学藏文”一栏里，许多人填写：“想写自己的名字。”

红红火火搞了几个月，斯郎伦布被政府派下乡，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奔子栏乡搞基层组织建设，培训班没了头儿，树倒猢猻散。

半年后回县城的长途车上，邻座恰好是朋友肖马。肖马的藏名为次里尼玛，德钦人，云南大学哲学系毕业，现在中甸做生意。两个人谈起藏文班，肖马说：“我们一起搞？”

两人一拍即合。

1999年10月，肖马约斯郎伦布到中甸，商量成立民间组织。两人想到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斯郎伦布说：“卡瓦格博是我们藏族人的护佑神，我们就用这个名字！”

他们在中甸注册了一个公司，在肖马姐姐央宗的支持下，租了大房子，又花一千多元做个大牌子挂在楼外，看起来很气派。第一件事是办藏文班，尽管免费，可没多少人来学，硬撑了两个月，垮掉了事。

卡瓦格博文化社的人至今对中甸耿耿于怀，这个已改名为“香格里拉”的地方，受外来冲击比德钦更甚，不但藏族传统消失得更多，有些人连恢复自己传统的兴趣也没了。

可有人对卡瓦格博文化社感兴趣，工商局三天两头来收管理费，税务局也来了，这本是公益事业，不赢利，怎么还要交钱？“肯定哪个地方搞错了，可我们不知道。”斯郎伦布笑道。

几年以后，他们才把卡瓦格博文化社变更为非赢利组织，在民政局注册。

2000年春节，斯郎伦布和肖马到农村采风，看看农村还有些什么文化传统。晚上在供水村一户人家借宿时，聊起他们这些年轻人想做的事：自己民族的文化在消亡，他们想努力一把，看能抢救多少。

此言立即传遍全村，当晚几十位老人挤来，一个个脸膛红红，兴高采烈。他们决定：“说干就干，明天搞个婚礼。”

藏族婚礼极为繁复华丽，特别是“马赞”。送迎新娘的马队遇水唱水，遇山唱山，送亲的唱，迎新的和，送亲歌深沉压抑，迎亲歌欢快诙谐。若是迎亲的对不上歌，送亲的队伍便止步不前，直到迎亲的显示了才学。到了新郎门口还要唱“下马调”，送亲的不下马，摆足了派头，炫耀自己的坐骑和学问：问对方，天地之初时，马是第几位诞生的？马耳朵什么形状？马蹄尖如何？马的肠有几道弯？格萨尔王的马怎样雄壮？我的马有什么来历？我这神马，你们用什么作下马凳？

送亲者处处刁难，是怕自己孩子嫁过去受欺负，因此一定要显示才华与派头，让你对方晓得，我家孩子可是有身份的人！

如果对方答不上来，送亲者决不下马，若误了吉时，那是娶亲人的责任。因此有时持续时间很长，甚至把马骑垮。送亲的显示了威风，却令新娘子心焦不已，心里直埋怨叔舅伯兄们忒多事！

婚礼是藏族文化在世俗生活中的集中展现，除了仪规、衣饰，仅对歌就展现许多藏族历史与传说，很多藏族文化通过婚礼传承下来，会唱“马赞”的人会被许多人家请作婚礼的主唱，为自己儿女争光。

第二天供水村热闹非凡，虽然没有新郎新娘，但大家扮作迎亲与送亲两支队伍，相互唱和。年轻人早已不见这些仪式，大开眼界，老年人重温旧梦，又兴奋，又感慨。当日村中有一人家开婚宴，很不幸，吃婚宴的人跑掉去看“马赞”，后来那家主人遇到斯郎伦布，仍然恨恨不已：“你们弄得我家婚宴冷冷清清！”

初试成功，斯郎伦布与肖马大受鼓舞，于是走乡串户，到处发动，所到之处，藏民心中传统文化的火星，“忽忽”地烧起来。

他们物色志同道合者，好在德钦是个小地方，谁是同道人，倒也不难找，他们找了中华，他开了一家德新客栈，另外又找了诗人扎西尼玛。

中华的藏名为曲美都吉，这个小个子藏族人剃着光头，温和，但精神抖擞，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他原来是昆明监狱的狱警，就像许多读书的藏族人一样，一直认为自己是汉人——上汉人学校，说汉语，有汉人朋友，在汉人的单位上班……直到1998年的那个夜晚，结束他的“汉人”生涯。

中华坐夜班车从昆明回家探亲，许多乘客说着藏语。这辆客车突然将他从一个汉人社会扔到一个藏族圈子里。“我到底是汉人还是藏人？”他一路想着，在此之前，这个问题从未如此折磨他。

汽车在黑夜里爬上白马雪山，一位藏民突然引吭高歌，那高亢的弦子歌声像一道闪电，刹那间撕裂黑沉沉的夜。中华的脑袋“嗡”一声响，血管里潜藏的藏人的血，就像一堆沉寂已久的干柴突然被点燃，熊熊烧起来。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到哪里去？”

随后的一个月里，中华回想自己的一生，恨不得有个思想内窥镜，在心里细细寻找。

这一天，中华来到木梭家。中华与木梭的弟弟关系不错，听说木梭在修行，而且学问大，就找上门来借书。

木梭在经堂里正襟危坐，正与客人谈论佛学。中华掏出香烟点上，静静听他

讲经。木梭这次讲的是宗喀巴《道次第》中关于《本生论》的章节。《本生论》讲的是生命的产生过程，中华听得入了迷。

听毕，中华恭敬地问：“能否借你一本佛经看看？”

“当然可以，但我看你抽烟抽得凶，抽着烟看佛经是亵渎。”木梭说。

“等我抽完这包就戒烟，再来向你借。”中华说。

第二天，中华又来找木梭：“我戒烟了，能借佛经了吗？”

木梭借给他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陪伴他度过那段难熬的戒烟时光。等他再不觉得抽烟有什么诱惑时，佛教的种子已在心里发芽。

假期结束，中华不想回昆明，不想回到那个听不到藏歌和念经声的地方。家里人希望他回去，那毕竟是国家公务员，一个念了许多年汉字后得到的饭碗。中华找到木梭说：“我想出家当和尚。”

“一个人的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什么事。”木梭说。

中华不再坚持当和尚，“也许我本来就没有慧根。”他说。但他也不再离开家乡，父亲同意了，把家里的小旅馆交给他经营。他没向单位辞职，在昆明那个监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档案里写上“失踪”二字。

入夜了，我与卡瓦格博文化社的人们去吃火锅喝啤酒。初夏的德钦还有些凉意，吃着火锅，喝着酒的男人们慢慢热闹起来。

斯郎伦布说：“以前以为藏族文化的传统在寺院，后来发现并不如此，其实很多僧人的知识掌握很片面，把书拿给僧人，他们都能念出来，而且念得特别动听，但问他什么意思，不懂。不仅仅是德钦，很多藏区的寺院都这样，形势危急。”

木梭说：“那是藏族传统藏文教育出了问题。藏文是拼音文字，只要认识字母就能念出来。以前的喇嘛告诉徒弟，只要念经，功德就大，弟子们误解了，认为只要念经就好了，意思不懂没关系。宗教教育忽略了对经文的解释，结果僧人们‘哗哗哗’地念，念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念的什么。”

2000年，木梭问一位红坡寺的喇嘛：“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三宝’是什么？”

那和尚张口结舌，说不上来。

“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问题，‘佛、法、僧’三宝啊，你连这个也不懂，当什么喇嘛？”木梭说。

那喇嘛脸红了，因此事大受刺激，竟出走印度学习佛法，数年后回来见到木梭，向他双手合什道：“是你令我发奋学习，得知佛法奥义。非常感谢你！”现在他是红坡寺喇嘛的导师。

这位出家人知耻而后勇，且胸怀如此宽广，也令木梭动容。

是夜刚好有一场弦子舞会，吃罢饭我们一起去街头。这是卡瓦格博文化社组织的舞会，每月有几次，在德钦街头的一个三叉路口。

路灯下，有些女人男人已经穿戴起来，女人们相互帮忙系衣扣，男人们抱着弦子跃跃欲试，时不时拉出几个音符来。细看那弦子，有些像二胡，比二胡更简单，粗听声音，单调，干涩，不如二胡的声调圆润细腻，但更有乡野味道。木梭架好音箱，先与几个男人边拉边唱起来，旋律婉转低回，如一阵轻风吹入心底。

舞会开始，男子弹起弦子，女子舞起衣袖，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步伐，男子动作夸张奔放，女子舞步细碎工整。第一首歌唱道：

“世上第一座城是拉萨，

拉萨建在大海上。
山羊背土填平大海，
建起大昭寺迎来佛祖；
第二座城是昌都，
昌都建在两水间，
江水奔腾流远方；
第三座城是德格，
德格建在大鹏背上，
大鹏展翅除灾难；
第四座是中甸城，
中甸建在奶子河边，
奶子河边牛羊成群。
第五座城是德钦，
德钦建在卡瓦格博下，
四面八方的人们来朝圣。

这样的唱词包含了藏族的历史、地理和宗教知识。各地藏人唱这支歌，除了“第一座城”一定是拉萨，其余可自由填词，一般要把家乡唱进去。德钦的人们除了唱拉萨、康区第一重镇昌都和藏区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德格，还要唱与自己毗邻的中甸县城。

藏区的锅庄舞和弦子舞姿态优美，但最重要的还是唱词，唱词语句固定，有点像汉人的词牌，现编现唱，但语句必须工整凝练，并非大白话。

卡瓦格博文化社想恢复弦子舞和锅庄舞，以带动文化的振兴。锅庄在德钦已断根，他们先从恢复弦子舞开始。弦子舞属自娱性群众舞蹈，是一种流畅、优美、抒情的歌舞，多位男子拉马尾弦子，边拉边唱边跳，女子以舞彩袖为特征。

小雨淅淅沥沥滴下来，丝毫不影响大家的兴致。在三叉路口上方扯着一个灯泡，细看那灯罩，却是一个反扣的塑料脸盆，聚光，防雨，便宜，拆装方便，着实有趣。人们在昏黄的灯光下跳得正欢，男人有的如木梭一般身穿藏袍，有的如斯郎伦布一样西装革履；但女人全着藏装，长袖摆起来飘逸如仙。男队中，木梭

手拉弦子，边跳边领唱；女队中，木梭的妻子与她一个要好的姐妹领首。木梭十五岁的女儿长得极美，双眸灵动，娴静优雅，也在母亲队中学唱；七岁的儿子长得精神，如父亲一般戴一顶牛仔帽，却穿一件“休斯顿火箭队”T恤，在舞场中来回奔跳，自得其乐。

在这种世俗之乐中，一点也看不出木梭是修行者，他的不安只表现在深藏的心灵煎熬中。

“唱唱跳跳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高高兴兴跳了一生，生命就这么虚度了。从佛教上讲，民族文化也是虚的，只有思想的修行才是真的。”他对我说。

但最终，他还是投入这个以佛教看来没多少意义的事业中。

木梭一直是脱离社会的人，只在内心中寻找真理。他托关系在检察院找了份开车的工作，这令他满足：在俗世中就这样吧，不求闻达，只要安静地修行。他也有机会做个办公室的头儿，但故意避过，领导骂他：“人家把你往上扶，你自己偏偏往后退！”

木梭喜欢跟检察官外出办案，人家办案，他有几天的空闲时间，买几箱方便面躲到山上修行。这一天早上同事们办案去了，木梭坐车内等着，读着佛经，朝阳照在书页上，驾驶室里温暖如春。似乎只过了一会儿，木梭抬头，忽然发现太阳在西山顶上。怎么回事？早上的太阳应该在东方啊，一看手表，已是下午6点钟。一天过去了，他以为只有几分钟。他神游佛经之中，仿佛灵魂出窍，天上一日，等于地上一百零四年，地上一日，天上只有一刻了。

卡瓦格博文化社成立后多次拉木梭入伙，但被木梭拒绝。2002年11月，肖马出马了，他到德钦寺的山上找到木梭，两人并肩而坐，远眺层层山峦。

这位哲学系毕业生说：“你躲在山上修行，是为你一个人；如果出来做事，是为了大家。”

木梭心里微微一动。肖马继续说：“德钦的民族文化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要为我们的民族文化负责任。”

大道理说服了修行者，木梭下山了。

二十八 弦子

木梭写过不少歌曲，在藏区有些名气，大家便要他负责弦子舞的恢复。

木梭买了 50 把弦子分发给有兴趣的人，大家慢慢拉出些味道。后来将学习班搬到大街上，加入者日多，场面热闹非凡，但大家都是糊里糊涂拉，糊里糊涂唱，唱腔汉化严重，像唱流行歌曲。

“应该找到正宗弦子歌者，录一盘磁带推广。”木梭想，他听说西藏、四川、云南三省交界之地叫“岩拉”的地方，弦子正宗，便想去取经。

我们沏上一壶茶，木梭给我讲起他取经的故事：

我不知道岩拉在哪里，到处打听。那一年国庆节县里组织弦子比赛，各乡村来了很多人，我找了一圈又一圈，终于听到一个男人在唱，他的嗓子嘶哑，但味道足，一听就是正宗弦子。我问：“你是哪里的？”

“岩拉的。”

就是他们！我对他们一伙人说：“我去给你们录音好吗？”

你知道，我们藏族人爱出风头，他们先是装模作样哼唧半天，最后才高兴地答应，说他们村子叫萨荣。我没听说过，问了路，说干就干，“我后天就去！”

到了那一天，我带上钱和录音机，挤上长途车，哎呀，那个挤啊，人上爬人，搂肩抱背，什么破车！上了车后，我忽然忘记“萨荣”那个名字了，哎呀，什么地方了？我只记得过了新村再往里走，就问车上人：“过了新村在哪里？”人家说“思路”。思路？好像有点像啊。走一天到了思路，爬到山上，那里荒山野岭，好不容易摸到一户人家，问：“前天去县城唱弦子的人在哪？”

那家的小伙子说：“没这样的人啊，你走错路了吧？是不是萨荣？”

对啊，就是萨荣！他说：“你多走了三十多公里。”

啊呀，还有三十多公里山路，这可怎么办？天都黑了。他很好心，借我一头骡子骑，说：“你到了后，把骡子放了，它自己能找回家。”

那骡子个头小，我骑上去，两条腿还耷拉在地上。它很不听话，让它往东，它偏往西。走了好几个小时，要是我自己步行，不赶骡子，早就到了。它一会儿去山坡啃草，一会儿河边喝水，怎么拉也拉不动，还差点把我摔下来。走着走着，它又到路边人家去串门，一个老太太出门来，原来他们两个认识，抱着亲热了一阵子，老太太盯着我看，怀疑我是偷骡子的，解释了半天才放我走，那骡子却不情愿，我拿石头打它的屁股这才听话。已经是夜里了，好在骡子眼睛好，夜里能看路。到了新村，已经半夜 12 点半，到一户人家敲门，那主人出来，他也认识骡子，先和骡子寒暄，才跟我打招呼。看来这骡子人际关系很不错。

我说：“那好得很，你明天帮我把骡子送回去吧。”

他却说：“不用，我先用两天。”

那里的人特别热情，第二天全村人出了两匹好马，轰轰烈烈把我送往萨荣，走了四个小时，远远就听到山歌声，是女高音，唱得特棒！我开心啊，终于找到了！近了一看，是一个小姑娘，用背篓背着肥料叶子。我请她再唱一首，她放下背篓唱了一支，啊，好的不得了！她才 16 岁，我问她：“你愿意让我录音吗？”她说好啊，录！她就领我走，没走两步，又听到弦子声，是一个放羊的男人在山坡上拉弦子，我站住细听，真是好啊，我都要听醉了。

我对他说：“你拉得好啊，比弦子王还厉害！我要给你录音。”

他一笑说：“你算找对人了。”

到了村里，大家给我建议说，有个叫央宗的女人唱得最好，我就去找她，她正在山上割草，二十七八岁，长得漂亮。这个地方还有一妻多夫制，她有两个丈夫。据说她比较风流。

我说要录她唱弦子，她很高兴，问我：“你结婚了没？”

我说结了，她一听连说：“没意思，没意思！”看来她对我有点意思。

我问她，去她家里录音怎么样？她不答应，怕她老公们说她把野男人领进门，不正经。

我在萨荣呆了几天，选出唱得最棒的六个人，三男三女，请他们每天唱，我每人每天出二十块钱。我从他们唱的四十多首里选了十来首。因为这里条件不好，没法录音，我请他们 11 月 4 号到德钦县城去录音。

我告别他们下山，他们在山上看着我走，我走着走着，他们的歌声突然飘过来：

“这山下，大江大河不停流，
山顶上，湖水不流停下来。
去年冬天不相遇，
愿明年夏天你我随流水来相会。”

那歌声太好听了，我呆在那里，停又停不下，走又舍不得，但太阳要下山了，心一硬，迈步就走了。

回到县城与大家一起准备，从昆明请了专业录音师，需要一万块钱，我们一分钱也没有，全是肖马出的。

11 月 4 日那些唱弦子的山民来了，可只来了五个，那个唱的最好的央宗没来，原来是两个丈夫不放心，不让她来。这可怎么办？缺了她感觉就差多了，没办法，我们去找她！

肖马从昆明请录音师，我们买了液化灶和粮食，又去萨荣，天冷啊，我们冻

了三天，可还是没等来录音师，那里没有手机信号，我们开车出去 80 公里打电话，肖马说：“正往那里赶呢。”我那破车没有刹车，也没了离合，好在我是专业驾驶员，这山路开惯了，用一档打火，慢慢地往上开，远远的白马雪山顶上看见肖马的车来了，我赶紧停下车，跑下车去搬石头塞住车轮。

肖马在路上丢了钱，耽搁了时间。录音用的一万块钱忽然找不到了，想来想去，可能是在路边上厕所时丢了，于是掉头回去找，那一万块果然在，被不停下的雪埋起来了。

那录音师几乎说不出话来，面无人色，看来是吓坏了。他从来没走过这样的山路，山路转来转去，底下是万丈深渊，到了夜里，灯光打到远处，黑乎乎的全是深渊，什么也看不到。他用力抓着副驾驶座前的手柄，嘴里不断嘟囔着：“这鬼地方这鬼地方这鬼地方。”到了新村我们才发现，手柄被他抓断了，他的手好久松不开，拿不下来。

新村人成群结队来迎接，第二天送我们去萨荣，一起唱：

“雪山上成群梅花鹿，
强壮大鹿翻山远行，
瘦弱小鹿留在草原，
小鹿小鹿，你不要伤心，
满山遍野的山花为你开放。”

萨荣村的人也牵马来接，这边要送，那边要接，还争执起来。到了萨荣，村民们习惯凡事慢慢来，还要开联欢会欢迎录音师。录音师要立即录，萨荣有个小

型电站，结果一条蛇钻进发电机里睡觉，一发动，把发电机烧坏了。

我们借了个小型水力发电机，在一户人家里录，没凳子，大家全坐地下。这里当然没有话筒架，只好拿牛皮绳子把录音话筒绑柱子上，录音师心疼啊，直叫：“我的德国话筒啊，一万多块啊！我的德国话筒啊！”

开始录音，刚唱两句，门外的大公鸡“勾勾”叫了，只好从头再来。录着录着，猪又“哼哼”叫了，前功尽弃。最后把闲人都赶出去，其他人不许出声。这户人家的老奶奶想看热闹，央求说：“我看看行不行？”老人家嘛，不好请出去，只好让她坐在灶台边听着，人家唱到精彩地方，老奶奶忍不住咳嗽一声，又全完了。真是热闹！

家里没桌子，录音师的电脑放地板上，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蹲也不是。电流也不稳，小河的水流大了，电流就大，水流忽然小了，电流就小。这可把录音师气坏了，他的设备很敏感，生怕烧坏了机器。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线路上加了三个灯泡，斯郎伦布紧盯着，电流一大，他立即拧上灯泡，分流电量，电小了，他马上拧下灯泡。后来录出来后，你能听到，有的曲子中间“沙沙”响，那就是不稳定的电流造成的。

斯郎伦布下载了这次录音的 MP3 给我，我将这些曲子放在电脑里，时时拿来听，在写这本书时，更是无日不听，那富有穿透力的弦子和歌声，会立即将我带到梦幻般的卡瓦格博峰下。

我尤其喜欢下面这首唱词：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就像白岩石上歇落一只白鹰；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就像核桃树上歇落绿鹦鹉；

我喜欢红色上面再加一点红，就像檀香木上歇落红凤凰。

卡瓦格博文化社制作了 8000 盘录音带，正版带没卖出多少，盗版盘却大量上市，卡瓦格博文化社没挣到钱，反赔了本。这也没关系，斯郎伦布对我说：“这正好，盗版流传得更广，传播了文化。”

之后在各省藏区，到处能听到他们录制的弦子声。2003 年是水羊年，藏民认为在水羊年转卡瓦格博功德殊胜，因此超过十万人来转卡瓦格博神山。在长达十天的转山路上，到处是萨荣弦子的声音。

在附近藏区，藏族民间歌手大多唱流行歌曲，萨荣弦子流行后，许多歌手开始唱民族歌曲。斯郎伦布说，在藏区受欢迎的歌手央金拉姆的第三个专辑，大部分是卡瓦格博文化社收集的弦子歌。

在萨荣录音完毕，文化社的同仁们回到德钦县城，大家激动不已，一起来到卡瓦格博下。

卡瓦格博海拔 6740 米，是藏传佛教中胜乐金刚佛圣地，与西藏的冈仁波且(岗底斯山)、杂日神山齐名。藏族人民朝拜卡瓦格博已有上千年历史，公元 1260 年，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人物噶玛巴希大师在禅定中发现，卡瓦格博就是莲花生大师曾预言过的胜乐金刚的圣地，他向世人指示了这圣地，开创了藏传佛教徒朝拜卡瓦格博的历史，并使之成为藏传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

从此，很多地方的藏传佛教信徒，一生至少要朝拜卡瓦格博一次，甚至在有的地方，女孩要没朝拜过卡瓦格博就嫁不出去。

这是晨星刚逝的早上，他们围白塔绕了三圈。当太阳刚刚升起时，第一缕阳光将卡瓦格博峰照得金光闪耀。斯郎伦布烧起桑烟，大家对着卡瓦格博跪拜。木梭领着大家发誓：

“巍然屹立的卡瓦格博啊，我们是你的子民，世世代代受你的呵护，我们借你之名，并非为个人名利，而是想藉你之加持，为我们的民族文化事业尽力而为。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之间都不相互违背和伤害，一如兄弟，同心协力，振兴民族文化！”

几位藏族男人口颂誓词，热泪涌出，模糊了金字塔般的卡瓦格博。

二十九 红尘

卡瓦格博文化社趁热打铁，在天气暖和的4月到10月底，每星期三个晚上在街上组织弦子舞。以前弦子琴已不见踪影，从此后又有手艺人在街上卖弦子，价格越来越高，原来三、五十元一把，现在能卖到二百元。

几十年前，弦子舞不在隆重的正式场合演唱，因为是男女对唱，涉及情爱，被认为“伤风败俗”，上不了台面。但在乡间很流行，如果村里来了客人，主客间便唱跳起弦子歌舞，客人先对主人致意，赞美这里风光美丽，主人热情。主人再唱欢迎歌，之后进入对歌。年纪大的唱父母恩情，德高望重的唱宗教，一般也会唱历史地理、猜谜语、唱自然。如果都是年轻人，就唱爱情，试探对方反应。要是对方不反对，那可热闹了，像一辆好车上了高速公路，高速飞奔，一直唱到天亮。但唱词不许重复，如果一方词穷，只好认输结束。最后一首歌要感谢对方的盛情，赞美对方的家，从房顶、梁柱，一直赞颂到灶头、水缸和地板。

然而我刚到德钦的这个夜晚，跳舞的人们没达到这般情致，反而扫兴而归，起因是一位男人唱出了爱情歌：

“大海的对岸一朵金花盛开，

我想把她折下来，

但大海宽阔无边，

我不知能否渡过。”

这唱词在明明白白送秋波，对面的女人们应该猜想，这个男人是在试探哪位女子？女人们保持沉默。

男子继续唱道：

“一个大花母鸡，下了一个大花蛋，

大花蛋啊，要么你就白到底，

要么你就黑到底，

为什么不黑不白不清不楚。”

男子在问，对面的女人啊，快快说话，是否接受我的情意？

这惹恼了对面的女人们。弦子舞唱到爱情时，最讲究“门当户对”，不能差了辈分，若是不同辈分的人对唱，极为不雅，这也是弦子以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原因。这边有老年妇女，有中年妇女，也有少女，对面的年轻男子唱起情歌，这边

的女人们很尴尬，有个中年女人恼道：“从来没听过这么难听的歌！”然后假装生气，甩手走了，其他女人也跟着跑了，男人们只好讪讪散掉。

木梭苦笑着摇头，收拾起弦子。细雨继续下着，浸湿了这个安静的山城之夜。

第二天早上6点钟，德钦街头静悄悄的，太阳还藏在山后，德钦罩在清辉之中，有些寒意。木梭开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带我驰出德钦县城，盘旋上山。一会儿，那小小的县城便成了大山深处的盆景。

半小时后我们到了飞来寺，那是观看梅里雪山的最佳点，卡瓦格博傲然屹立，伟岸高大，满身的白雪冰川被朝阳染成金黄，无比庄严，连他身前身后的云也火烧般灿烂。

今天木梭穿着牛仔裤，棕色皮上衣，一顶宽檐牛仔帽。许多当地人与他打招呼，一位在煨桑炉旁卖松枝的妇女向他招呼：“根本梭！”

“根”是“老师”的意思，这是德钦人对木梭的尊称。整个德钦县将近六万人，没几个获得这个尊称。大家不觉得他是地位不高的司机，而是令人尊敬的修行者。

木梭对我说：“你买五块钱松枝，我帮你念经。”

我从那妇女手里买了一把松枝，不好意思地说：“我不会这些。”

木梭说：“有位小路尊者，是十六罗汉之一，他想学佛，但很笨，什么也不会，佛问他：‘你会扫地吗？’于是小路就去扫地，专注于一句‘除尘去障’，扫了一生，也扫除了他身上的业障，果然成就了。”

木梭说，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针对众生的八万四千种烦恼，众生有什么烦恼，佛就用什么法门来消除。小路是痴障多，佛就让他专攻清除痴障。

木梭把那把松枝放入煨桑炉中，松枝立即“辟辟啪啪”燃烧起来，这就算是对神山的供养了。他嘴里念念有词，为我祈福。念完，他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人很贪婪，老是向别人索取，从来不给予别人，一天到晚一开口就是“我要！”也从来不供养佛。一天有人给佛祖供奉一个宝物，他立即跑过来大喊大叫：“我喜欢，我要！”

佛的弟子们生气了：佛祖的东西你也敢要！

佛祖说：“没关系，我给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给你后，你要诚心诚意再送给我一次，我就真的把它给你。”

那人瞪着眼睛考虑好久，最后想明白了，最终那还是我的嘛，划得来！于是说：“行！你说话可要算数。”

佛祖微笑着把东西给他，他接过去，用两手捧着，真心实意再供给佛祖。佛祖很高兴，果然又把东西送给他。

人们很奇怪，佛祖不是多此一举吗？让他做一个虚伪的供养有什么意义？

佛祖微笑道：“这个人许多世以来从没供养过，以后肯定堕入饿鬼道。今天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做一次供养，有个大功德，以后他就有机会转世为人，甚至成佛。”

煨松枝是对佛的供养形式之一，卡瓦格博的香柏树闻名全藏，点燃时异香扑鼻，但现在用的只是一般松枝，真正的香柏树已被木梭和同事们保护起来。

澜沧江流经卡瓦格博，香柏树分布在其沿线海拔3000米处，是这一地区唯一的特色植物，也是这一地区最濒危的植物之一。卡瓦格博香柏被藏人视为神树，生长期十分缓慢，枝叶是传统香料配方中最重要和稀有的原料之一，朝拜卡瓦格

博圣地的信徒喜欢用其枝叶作为焚香敬神之物。香柏树被当地人大加推销，随着游客的增加，消耗量巨增。2003 年是卡瓦格博的本命年，来转山的藏民有十多万人，飞来寺一个烧香台一天烧掉一卡车香柏枝叶。如果加上其它几个村的敬香台，每天两大卡车的香柏树枝叶被伐卖，如此下去，香柏树很快会绝迹。

2003 年初，“保护国际”云南项目负责人李波来到德钦，认识了卡瓦格博文化社的年轻人，决定向他们提供资助，保护香柏树。

2003 年 12 月 12 日，木梭从西藏请来了师父仁青久乃活佛，请他在村民中传法。活佛对村民说：“焚烧卡瓦格博身上最好的装饰品，来敬卡瓦格博，这样怎么会有功德呢？”香柏树林在这一年的焚香热潮中幸免于难。

木梭又用汉语和藏文写了宣传单，张贴在大街小巷，传单中说：

“尊敬的父老乡亲们，如此下去，不用三年，卡瓦格博香柏树将在我们这一代成为濒危植物，在我们的儿女这一代消失。用其它香料敬香有同样的功德，我们不要再焚烧卡瓦格博身上最美的衣料了。”

2004 年 2 月 9 日，他们向德钦县委递交报告，县委书记王从文支持他们，要求政府对香柏树进行保护。经过一年努力，各个敬香点改成以松枝、蒿草、栎树枝代替香柏树，村民们收入不减反增。

太阳完全出来了，霸道的光辉灿若流金，卡瓦格博如披金甲，熠熠生辉。我们身前的八座佛塔在阳光照耀之下，映着卡瓦格博，纯白圣洁。

我们转完佛塔，云霞散去，天空渐渐转为淡蓝，像水洗过一般，纯净澄澈。卡瓦格博素净恬淡，法相庄严地俯视苍生。

我们沿小路走，木梭为我唱起一首他写的歌《朝圣》：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美丽的香巴拉是梦中的天堂。

祖辈们留下风中的经幡，

携起手我们踏上朝圣的路。

哦 卡瓦格博，宁钦卡瓦格博，

千峰雪莲，万佛宫殿。

芸芸众生，魂牵梦绕。

走向您，走向您，

感悟我心中不变的灵魂。”

几年前他写《红尘飞歌》，叹息“到哪里才能找到我最初最终的灵魂？”现

在，他找到了灵魂所在。卡瓦格博所代表的佛教，是他最终的归宿。

我们回到他家，院子里叽叽喳喳，一群妇女围着一个面板七手八脚做糕点。木梭的妻子穿一件灰色汉式外套，头发在脑后挽一个髻，个子较高，脸膛红红，显得健康大方。院子南边是两台大烤箱，木梭妻子平时在家做个小生意，人家过节日寿诞，拿来面粉和糖，她指导那家的女人们做糕点、烘烤，收取一点费用。

我们坐在一楼的厨房，厨房干净明亮，可见女主人是个勤快人。矮桌上放着一个电炉取暖，我们围着电炉等候早饭。我问：“这里电多少钱一度？”

木梭笑笑说：“我不知道啊，她管家。”

木梭妻子尽管还在忙着生意，可一会儿就将早饭端上来：面饼、蛋炒米饭、酥油茶，还有奶渣。我起身感谢，女人朴实地笑笑。木梭坐着岿然不动，他用的是一个专用的木碗，家中仅此一只，似乎是身份的象征。

我们吃完到木梭二楼经堂里，满墙是唐卡佛像和木梭师父们的照片，前面供着各色水果和点心。窗前有一台电脑，电脑前是红色地毯，上面铺着一张羊皮，木梭盘腿坐下，打开电脑，屏幕上是一尊法相庄严的佛像，在其下方有偈云：

诸恶莫作，

众善率行，

自净其意，

是诸佛教。

这房间是他精神生活的佛堂，也是他俗世生活的书房。他打开邮箱，给他的上司、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项目官员写信。

墙上的佛们和师父们注视着他，看他处理这些俗务。他很认真地工作着，但令人烦恼的念头老来打扰他：“做这些事，值得吗？”

木梭内心面临一个大难题。2005年，他在卡瓦格博峰下的雨崩村帮大自然保护协会做项目，为每家每户修自来水管。他扑上去卖命地干，几个佛教界朋友来看他，发生一场争论：有人说这样做有功德，但功德并不大，没多大意义，对成佛没什么帮助，还不如做一次闭关修行；而一位活佛说：“这就是修行，这就是菩萨心，如果这样的善行都不做，只躲在深山有什么用？”

因为他是活佛，大家都不敢反驳。对木梭来说，第一种说法对他更有说服力，因为他在修行密宗，“只要我认认真真按师父教我的方法修行，我这一世就可成佛。”

“你确定？”我问他。

“确定。”

“成佛”对我来说，就像有人告诉我，我明天醒来拍拍翅膀就飞了。我心中震惊，疑惑，无法理喻。这样的文化冲突我在藏区不是第一次遇到，嘎玛也对我说过，他戴着香曲多杰家族活佛们加持过的天珠，刀枪不入。

我尽量不露表情地看着木梭，但眼睛还是不由自主地躲闪了一下。木梭看着我，他是个细致的观察者，知道我在想什么，但他显然不想再对我进行佛教基础启蒙，就像我不会费尽心思，去让一个无知而自大的人相信地球长得不像一张大

饼。木梭只是补充说，他相信他今世能成佛，但这是密宗里的法门，连法门的名字他也不便透露。

尽管犹豫不定，但他仍继续做着俗务。晚上，“香港社区伙伴”的玛吉来了，“社区伙伴”是香港的 NGO 组织，致力于对贫困社区的帮助。

文化社的几员大将——斯郎伦布、木梭和中华，与玛吉坐在中华家的客厅里。这是典型的藏式客厅，墙上挂满了藏饰、藏画，周围是一圈卡垫。略有点改新的是，中间摆着两个棕色的皮沙发。木梭身穿藏式白色衬衣，下身穿着牛仔裤，棕色皮鞋，坐在沙发里一晚没有起身，可他的两腿在沙发下盘着，仍是念经的姿势。中华和斯郎伦布盘腿坐在他左侧的卡垫上。斯郎伦布长长的小辫子垂在脑后，与他那灰色西装相映成趣；中华身穿一件黑色户外抓绒衣，手捧一只熊头骨，那熊头时而被他顶到头上，时而端在手上，摩挲了一夜。

三个藏族男人的对面，是那戴一副黑框眼镜、身着灰色衬衣蓝色牛仔裤的玛吉，她胖胖的，30 来岁。“社区伙伴”在这里的扶贫教育项目，由卡瓦格博文化社负责实施。

木梭希望在一个村里做实验，将佛学与世俗结合起来，通过娱乐活动增加村民之间的和谐，再通过活佛进行道德教育。

这需要培养村子里的“精英”，比如江坡村里有位思那尼玛是当地极少懂藏文的人，“我希望他带动那个村的藏文化恢复，所以应该付他工资，让他生活有保障。”木梭说。

这个话题成为他与玛吉间的第一次交火。

“我们不能付工资。”玛吉静静而坚定地说。

木梭摇头说：“一定要付！”

玛吉说：“这是原则问题。我们搞社区建设，不是用钱来吸引人。三年后项目结束，我们走了，没钱了，谁来教？村民自己能付钱吗？”

她想的是社区文化保护的长远问题，希望找到一种“钱”之外的自愿模式，能使村民的保护行为持续下去。

木梭说：“他家里有老母亲，有三岁的孩子，作为当家的男人，如果不给工资，他能一直义务教下去吗？”

玛吉说：“如果我们离开后，就再办不成了，那不是我们期望的。”

木梭沉默一下，换了个话题：“这个村要求配五台电脑。”

玛吉一下子笑出来：“五台电脑？为什么？”

“村子里有一帮热血青年想把藏文化与现代结合，有了电脑，他们就可以搜集文化资料，编教材，甚至上网。以后他们可以撇开我们，直接跟你们申请项目了，我们就有更多的精力帮助其他的村子。”

玛吉说：“编教材和用电脑有什么关系？”

“你们要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木梭说。

玛吉说：“他们又要电脑，又要图书室，要学弦子，又要学藏文，他们不要弄得那么累啊。”

木梭说：“有朋友问我，你又写音乐，又学佛，又做社区活动，累不累啊？我回答说，你也很忙啊，你每天都睡觉，吃三顿饭，还要大便，但我看你也没那么忙啊。”

我心中暗笑。我不知道是否真有朋友那样问他，也许他是用佛经中常用的寓言方式？

玛吉直直看着他，没有说话。

木梭继续说：“你去农村看看，很多青年在打麻将，他们有的是时间在浪费啊。”

玛吉说：“是否可以让他们少学一点，专精一种？”

争论越来越有火药味，那熊头被顶在中华的头上，两个大眼洞茫然地看着他们。斯郎伦布站出来打圆场：“我理解玛吉的意思，文化传承不仅是一种乐器，一种舞蹈，而是一种理念。但是呢，我们目前没环境没氛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通过载歌载舞，让大家都参加进来，先形成一种气氛。”

玛吉说：“我同意你对文化的理解，但我要首先知道村民的真实需要。”

“村民的需要？我告诉你真话！”木梭提高了声音，“他们想弄钱修公房，然后是太阳能热水器，再就是修公路。他们对文化根本没认识！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文化断代的可怕，所以才慢慢引导他们恢复文化。”

玛吉有些生气：“社区搞什么活动是大问题，老师工资更是大问题。要是再办成以前的样子，我们就没法合作了。”

“那是你单方面的理解！”木梭说，“不能因为村民用你们的钱换了房子上的瓦片，你们就不支持了。”

看来以前她给的资助，本来说是搞文化建设，却被村民拿来修了公房。公房是藏族村子比较大的公共建筑，村民聚会的场所。玛吉认为，不应该把有限的钱花到这样大而无当的地方。

斯郎伦布解释说，公房在藏族社区具有重要地位，可不像汉人村子里的村委会。除了过年，村民在每月初二、十三聚到公房里唱歌跳舞，开会游戏。“那是全村的中心，也是村子的灵魂所在。”他说。

玛吉说：“那再看吧。”

半夜了，木梭很疲惫地说：“难道村民们干得轰轰烈烈，中间突然断了支持？”

谁也无法说服谁，大家不再说话，我说：“休息一下吧，喝点茶。”

大家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木梭在这天的下午坐在同一个地方与我谈佛，“只要我认认真真按师父教我的方法修行，我这一世就可成佛。”那一刻我觉得他是世外高人，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虽然与我坐得很近，但我们之间似乎隔着十万八千里。而几个小时后我看到另一个世间的木梭，讨价还价，寸步不让，活脱脱一个红尘俗人。

“你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熊头？”我问中华。

他说了今晚第一句话：“它意味着无常。我一直把它挂在我的枕边，提醒我，我随时会死去，所以要把有限的生命用到有意义的事上。”

三十 乌鸦和孔雀

木梭仍然在佛界与俗世的夹缝中挣扎。

5月10日下午，我随木梭去卡瓦格博下的西当村。他们从2004年开始，每年在乡村举办一次村民弦子擂台赛。车在山路上转来转去，木梭好一阵子没有说话，忽然叹口气：“咱们这么转来转去，毫无意义。”

“为什么？”我问。

“我应该潜心学佛，而不是做这些俗事浪费时间。我好可惜啊，有那么好的师父，却没专心修行，如果能专心，我这一世就能成佛。”

我不能再忍，问：“你说你这一世成佛，到底有什么根据？”

他说：“一是高僧大德们按这个法门修行，成佛的很多，而且很快，他们的传记都有记载；二是佛祖说过这样一世就能成佛，我相信他。”

快到飞来寺时，我“啊”大叫一声，只见前面约80米处，一根如人粗细的大木从右侧山上滚下，跌到路面，“砰砰”摔成几条，可见摔下来的力道之巨。木梭急忙减速绕过，山上几个男子跌跌撞撞跑下来收拾残局。这几个人在山上抬木头，失手后木头滚下来，摔得粉碎。若是我们的车开快了五秒，木头砸到我们车上，左侧就是万丈深渊……我不由吸口冷气，原来生死之间只有几秒的距离。

我忽然想到少年时的嘎玛。他在山上辛辛苦苦砍的梁木就这样滚到山下，四分五裂。15岁的嘎玛看了看他的木头，擦擦汗，转身回到山上，继续挥动斧头……

我惊魂未定，却见木梭神色如常，像一秒钟之内就忘掉这件事，继续说：“中华是很好的修行者，他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与佛法相比，文化是短暂的，全身心投入文化保护意义不大，因为它反正要消亡，而且，文化会让人陷入贪、嗔、痴。’”

“你现在保护着文化，心里却怀疑它的价值，那你为什么不停下来呢？除了你曾在卡瓦格博前发过誓，有没有其他原因？”我问。

他答：“弥勒菩萨说过，‘外观比丘形，内修大菩提’，反正我活在俗世中，那就做些在世俗中有意义的事吧，比如保护文化。但心中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做文化不是为了文化，而是为了成佛。”

我知道，他理论上讲得明白，但修行还不够，修佛与世俗生活的矛盾仍令他苦恼。

“其实做世俗的事也能成佛，”他说，“真正的大菩萨能把烦恼利用起来，介入世俗里打滚，突破世俗，探求真理，把‘贪、嗔、痴’修成大菩提，最后证得佛果，普度众生。”

木梭的师父告诉他，乌鸦去吃毒草，势必丧命；而孔雀吃了毒草，羽毛更加美丽。所以有大智慧者介入世俗，反更易成佛。

“但我只是乌鸦，老乌鸦。”木梭笑道。

我们来到西当村，这个藏族村庄处于卡瓦格博脚下缓坡地带，自上往下看过去，碉楼错落有致，小麦一片油绿。这里海拔2600米，尚可以生长小麦。

我们住在村支书阿登的家里。因为旅游者越来越多，许多人家建客房招待旅客，虽然简陋，但干净整齐。

木梭与斯郎伦布带来几位老人做评委。他们都是弦子专家，一位专家人称“弦子王”，60多岁了，骑摩托车赶70公里山路而来。

晚饭后大家商量明天的比赛，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便回房间休息。夜里 11

点钟，我正迷迷糊糊睡去，忽然听到一阵踏脚声和弦子声，笑声接着在夜里弥漫开来。

我下木楼，进堂屋，哈，只见老人们跳起来了！三位老人手持弦子，其余的老人与他们围成一圈，左脚抬起，右脚用力踏木地板，边跳边唱，踏脚的声音“砰砰”合入歌中，动人心魄。

忽然门开了，一群妇女笑嘻嘻鱼贯而入，加入舞蹈。这都是邻居的当家女人，一听到歌声，五分钟之内就踩着黑夜的山路快快活活赶来了。

女人们一加入，像火炉上加了炭火，更加热闹起来。男人们的歌声像火塘里的火，热情温暖；女人们的歌声清越嘹亮，像那月光高高在上，照亮山谷。

“这就是藏族人！”木梭边跳边对我兴奋地大喊。

他们唱起一支节奏欢快的《酒歌》：

“金色太阳升起在山顶，

银色月亮升起在大海，

尊贵的客人啊，

来坐在宝座上。”

我可不想稳坐“宝座”，站起身来加入舞蹈，胡乱扭动。阿登支书 19 岁的女儿农布去楚看我舞技拙劣，哈哈大笑，笑得直不起腰来。

木梭手拉弦子边跳边领唱：

“翻过第一座山，经幡高高悬挂，

翻过两座山，桑火旺旺点燃。

我来到这里，西当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跳舞。

我们跳起来，

舞场里就开满鲜花。”

曲终休息，60 岁的阿登支书将外套脱了，里面居然是灰白色的警服衬衫，不知他从哪里搞来。他独自跳着，手舞足蹈，大叫大嚷批评女人们：“她们手不会摆动，没打开，来，打开，打开！”说着用力将手臂挥动。女人们发出快乐的哄笑。

一位老人自嘲说：“这些藏族人真是笨蛋啊，穿上钉子鞋，使劲地踩，将自家的木地板都踩烂了。”

另一位老人笑他道：“你不要说别人了，你是最笨的，”然后对大家揭露说，“当年县里比赛跳弦子舞，他跳得最投入，要飞起来一样，他挺胸抬头跳啊跳啊，跳到球场中间，那里有块地是陷下去的，他一下子掉进坑里，仍然跳啊跳啊，人们看不见他的身子，只看见他的胳膊和脑袋还在转啊转。”

人们狂笑。

木梭跳得热了，摘掉帽子，微笑着赞叹：“太好了，太好了！藏族人太好了！”

我看着他，有种无法言表的奇异感觉。他爱这热闹，他爱歌舞，他爱忘我的快乐，可当他静下来返归内心时，那快乐如针扎一样让他不安。我想起他白天对我说的话：

唱歌跳舞对修行是不好的。快乐也是一种贪欲，对一个真正修行的人来说，这是放纵，因为这快乐有强烈的诱惑力。佛教的目的是要你晓知轮回的痛苦，你要解脱它。唱歌跳舞就忽略了轮回中的生老病死，忽略了生活中的痛苦。

你瞧，人们做坏事的时候，那真是全身心投入，比如唱歌跳舞，多忘我啊，但守戒律时却不投入。

唱歌跳舞会增加人的虚荣心。我写歌时百分之九十的发心是恶的，是贪欲的，比如为了虚荣，或者想出名。真正为了别人的快乐而创作，我一首也没有。

所以说，世俗里的东西妨碍我的修行，我无法将世俗生活与修行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我只是乌鸦，不是孔雀。

人们又闹起来，他们现编现唱，没有固定的歌词，而且不能重复。一位老人拉起弦子，领着人们唱起来：

“在雪山之上啊，

狮子和白雪相遇。

狮子是雪山的宝贝，

白雪是雪山的饰品。

在岩石之上啊，

雄鹰和香柏相遇。

雄鹰是岩石的宝贝，

香柏是岩石的饰品。”

歌声和舞蹈一直持续到一点多，当我回到房间时，发现木梭早悄悄回来了，正盘腿打坐于床上，做他每天的功课。

我不敢打扰他，静悄悄上床。十来分钟后，他做完功课，睁开眼睛一笑，道：“藏传佛教有一种法门特奇妙，那就是禅定，让心专注于静。心识如流水，不断运动着，刷刷刷刷流走，好像被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贼偷走。一般人记忆力差，精神不佳，易疲劳，被烦恼所奴役，这叫‘身心不堪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将其身心变为‘堪能’。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是禅定。”

歌声甫歇，木梭立即从那个激情四射的歌舞者变为深山老僧，他切换角色的速度，令我眼花缭乱。

他说：“禅定修成，心会产生‘轻’和‘安’两个感觉。心的本质是快乐的，安静的，但由于烦恼和杂念太多，把安静的心弄乱了。禅定让心思集中，去除杂念，高度宁静，回到本来的快乐状态，令人不想从禅定中出来，也许一天两天，却只认为是一两分钟。米拉日巴尊者一生在山上修行，非常清苦，但他一直处于快乐之中，并最终成佛。”

木梭说，禅定是共法，并不是佛教的专利，佛教只是利用禅定来找到自我，找到智慧。而修无我之智慧，才是佛教的专法。

木梭在寻找他的大智慧，这智慧不仅要令他佛法修行得以精进，就像他第一位师父给他起的名字“罗桑尊追”（“智慧精进”之意），而且要填平修行与世俗之间的沟壑。虽然他是一个修行者，但也是红尘中人，有妻子儿女，热爱艺术，醉心于歌舞，在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秋致力于挽救传统，他就像一头大象，在一根两头悬空的树干上来回奔跑，努力保持平衡。他几乎成功了，树干左右摇晃着，却一直没有掉下来，但他自己被那不停的晃动搞得心烦意乱。

第二天，附近七个村的数百村民赶到西当村公房，那是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木梭与斯郎伦布站在二楼展开一张巨大的唐卡，那是一幅羊毛织成的布达拉宫，几乎将一层楼遮挡起来，在蓝天映衬下，红白二色的布达拉雄伟灿烂。

公房的土墙上有一些褪色的汉文标语——“努力提高农村人的法律素质”、“要生孩子，最好医生在身边。”今天，村民们将一些红红的新标语贴在墙上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尊严”、“自由保护传承”，同样是汉文写成。

木梭穿着藏式白色丝织衬衣，外层是金、红镶边的黑色藏袍，这是妻子的姐姐为他做的，精美大方。他头戴那顶棕色牛仔帽，一串木质念珠挂在颈上。他是这场擂台赛的主持人。

比赛开始，双方是男女两队。村民们占据了房顶和墙头，就像一串串燕子排在电线上。木梭站在比赛队伍中充任翻译，因为歌词古雅，需要他翻译成藏语白话，要不观众听不懂。在三天内，这位修行者将像一只云雀一样，随七支参赛队伍又唱又跳。

对唱比赛中，一支女队提问的口气有点霸道：

“你知道布达拉宫柱子有几根？

你知道大昭寺释迦牟尼像从哪里来？

你知道大理洱海的河有几条？

你知道中国人口有多少？

你知道中国民族有多少？”

另一组的男人们拉起弦子跳起舞，回答得很不客气：

“我去布达拉朝圣，怀着虔诚的心，

我数那柱子做什么？

我去大昭寺拜佛，也不会问佛从哪里来；

大理洱海听说有河一百八，我懒得一条条去数；

中国多少人口不要紧，只要大家都善良；

中国多少民族也没关系，只要各民族团结一心。”

如果双方如此针尖对麦芒唱下去，肯定不欢而散，木梭一看不妙，立即结束这轮对唱。女方不服气，一群女人跑过来围住木梭质问：“为什么停了？我们还有话要问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回答中国人口有多少吗？因为他自己就超生，都有四个孩子了！”

比赛持续到晚上，观众越来越多，许多旅游者也赶来凑热闹。忽然村民们停止了比赛，往院外那黑黑的山间探头探脑。

等了好久，一个小伙子从外面跑进来喊：“来了！来了！”

十几个人立即手捧白色哈达在门边站成两排，恭候来宾，比赛者和观众几百双眼睛盯着门口。

一队人马进来，领头一人，却是那可可西里的英雄扎西多杰。扎多抱拳向村民们团团致意。我与木梭上前欢迎他，我有四五个月没见他了，只见他长发披散，身穿黑色抓绒衣，黑黑矮矮，粗粗壮壮，如一头黑牦牛，颈上挂一串念珠，见到我们，咧开大嘴笑着拱手道：“好久不见！”

第六章 出走

一百头犏牛上山吃草，只有一头阿郭掉头下山

——藏族谚语

三十一 出走的少年

扎多对这里并不陌生，2003 年他带妻子博雷和女儿来转卡瓦格博，就住在西当村。他与木梭早就相识，两人还共有一位上师。

扎多现在既是“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副秘书长，也是“保护国际”在藏区进行生态保护的顾问专家，与他一起来的是“保护国际”（后来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几位工作人员：李晟之和藏族小伙子尼玛。他们从丽江出发，经中甸到德钦，然后将一路考察生态，沿滇藏线直去拉萨。

村民们热烈邀请来宾表演节目，扎多唱了一首祝酒歌后，尼玛拿起话筒。他 28 岁，是“保护国际”的第一个藏族雇员，体形跟木梭有些相似，高高瘦瘦。但木梭稳重，步履坚实；尼玛则大步流星，走起路来一窜一窜，好像脚底踩着火箭。他用沙哑的声音唱起一首藏语悲歌：

“南瞻部红日落西山，西斜月白云遮玉兔，

茫茫天星斗落如雨，三兄弟未逢心忧愁。

下康区大地一明点，至尊师教导声犹荡，

再难闻恩师妙法音，未拜见恩师心忧愁。

具深恩严父与慈母，满头发霜雪将辞别，

我年幼尚未报大恩，每回思伤感心忧愁。”

大家安静下来，悲伤的歌声如细雨洒在他们心上。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地区，只要唱起这首歌，相同的悲情，会立即抹平各自的差异。

尼玛唱完，人们为之欢呼，十多人捧着哈达冲上去，弄得尼玛应接不暇，身上挂满了白色哈达。我拍拍他的肩膀以示赞赏。他这沙哑的歌声我太熟悉了，就在上个月，我俩相伴几乎走遍了四川甘孜藏区。

尼玛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人，木雅人是指四川最高峰贡嘎山区一带的康巴族群，操一种独特的木雅语言。有学者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人后裔——蒙古族崛起之后，游牧于河套一带的西夏党项人被迫南迁，进入四川康定藏区；但也有学者认为，木雅人自古居住于此，是古代名为“弥药”的部族。

尼玛是康定县人，康定城是甘孜州首府，在成都以西约 400 公里，古称“打箭炉”，元、明时即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商品集散地。康定气候温和，农耕放牧皆宜，是富庶之地，而且地理位置重要，是汉藏之间的门户，历来为各派势力所争夺。

以康定为首府的甘孜州是四川康巴藏人居住地，与西藏昌都康地隔金沙江相望，西南方与云南德钦康地接壤，西北方向和青海玉树康地毗连。香曲多杰出生于甘孜新龙县，七世达赖喇嘛出生于甘孜理塘，相传格萨尔王出生于甘孜德格阿须草原。

康定附近也是重要的佛教传播地，莲花生大师曾派弟子碧如扎拉到大渡河一带传法。碧如扎拉看跑马山秀美，写了一部《拉姆则》赞颂拉姆曲吉山神，“拉姆则”意为“仙女峰”。西藏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射杀灭佛的达玛后，藏身于康定，并在跑马山上修建了拉姆寺（仙女寺），就是今天康定最早的南无寺。《康定情歌》中“跑马溜溜的山”，就是指这座山。

2006年4月13日上午，我和尼玛从康定西行，我要到他的家乡看看。车攀爬在折多山上，一路浓雾迷漫，白霜覆盖山林，让人不知身在何地。司机说：“别看半山上雾这么浓，其实山顶上太阳很大。”

我心中怀疑，天如此阴沉，怎么可能上下两重天？

当车爬行至海拔3700米时，阳光突然照射山林，阳光、雾气和闪亮的白霜相互交织，如入仙境。再上行一两百米，阳光普照，蓝天下雪山耸立，雄奇神妙。山间雾气与天上白云相连，将3700米以下的尘世遮盖得干干净净，只呈现一个无比瑰丽奇幻的神话世界。

越过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口，我们折而向南，顺力邱河而行，颠簸了四个半小时后再向左拐，走12公里乱石路就是尼玛的家乡六巴村。六巴村是原来六巴乡政府所在地，当地为了发展旅游，前几年将六巴乡改名为贡嘎山乡。2006年，因为《中国国家地理》将贡嘎山评为中国第二名山，贡嘎山更加有名。

六巴村被南北对立的高山夹在中间，一条西流的木居河“哗哗”响在村边。这个村有300多口人，不通电话，要打电话须到几十公里外的沙德镇。

到他家不久，尼玛用摩托车带我去附近山上的寺院。顺着一条难以想像的尖石嶙峋的烂路上山，多亏了摩托车无比坚强的轮胎，当然，还有驾驶员无比的胆气，因为旁边就是万丈悬崖。山顶上是两座寺院，大的是萨迦派的康寺扎寺，小的是噶举派的贡嘎新寺。

我们刚迈进康寺扎寺，就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声：“你来啦！”

从大殿里走出一位年轻的比丘尼，一身上黄下白的僧衣，头上戴一顶红色棒球帽，脸颊白里透红，显然是在这里晒出的高原红。她个子不高，眼睛明亮，一说话，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

“她是汉人，也是北京人哪。”尼玛对我说。

她叫果清，北京门头沟人，几年前在广东茂名宝莲庵出家，现来此地参学半年。我问：“在这里学到了什么？你懂藏话？”

她笑道：“不懂，我自己学经。我们在汉地寺院做很多佛事活动，没有多少时间清修，这里有时间；再说，这里是神山，加持力高嘛。”

我们在一间脏乱的屋子里喝清茶，“怎么看不到这里的出家人？”我问。

果清说，这里有30多个喇嘛，现在是挖虫草季节，寺院放假。“内地有些出家人收入高，但藏地出家人全凭自己，寺院不管。这个寺院很穷，连上山的那条路都修不起。寺院只好在虫草季节放假，出家人就凭这一个月挖虫草的收入，维持全年的生活。”

“举办大法会，应该有些收入啊。”尼玛说。

果清说：“一年也只有一次。不过这里人福报很大，人死了要做49天法事，整个寺院念三天经。”

“那出家人岂不是很忙？”我说。

“怎么会很忙？”果清大笑起来，“难道天天……”，她不忍说出那两个字，想一想，又笑，笑得用手捂住嘴巴，“你怎么说会很忙呢……”她哈哈笑着，小女孩神态毕现。

我问她：“出家后，觉得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太不一样了。在家要工作，赚钱养家；出家什么也不用做，清净。”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然是参透生死，成佛。”

我们走到寺院外，刚才还阳光灿烂，这会儿就落下了雨丝。“这里的天气就像他们的电灯，一会儿明一会儿暗。”果清说。因为是小水电站，这里电流很不正常。

我和尼玛大笑，这比喻果然精彩。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问。

果清说，第一次见尼玛，是大年初一他来寺院朝圣。

“你每天见那么多人，为什么记住了他？”我问。

“他特别嘛。”果清笑道。

“他有什么特别？”

“寺院里的堪布老谈他嘛。”

“谈他什么呢？”

果清嘿嘿笑起来，不说。

我和尼玛都劝她：“没问题没问题，尽管照直说好了。”劝了好几遍，她才笑道：“堪布说他在这里很有名，特别能打架。”

再问别的，她坚决不说了。尼玛在当地是名人，从小闯出的江湖名声并不怎么好听，出家人不想多说。

尼玛小时，父亲因病去世，妈妈拉扯着七个儿女。尼玛学习不错，在那个山村小学里非常风光——大队长，班长，学习委员，什么“官”都是他的，这一点很像他后来的朋友扎多。但他与扎多不同的是，他更桀骜不驯。他把藏文课本撕掉叠飞机玩，最后课本只剩三页。有一天不想上课了，他晚上将一头猪悄悄赶进教室，第二天一看，愤怒的猪将桌椅掀得底朝天，地下全拱了起来，教室变成了猪圈，理所当然不上课了。

放学时背过唐诗才能走，尼玛总是第一个背出。有一个同学颠三倒四背不出，给尼玛一块钱说：“你去办公室背诗的时候，把这一块钱给老师，让他放我走。”

尼玛紧紧攥着一块钱去办公室：“老师，能不能不背诗就放我们走？”

“那怎么可能？”

“你放我们走，我给你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尼玛伸出手，露出那张皱巴巴的纸币。

老师鼻子气歪了，将尼玛扯过来，巴掌“叭叭”地打到他屁股上，边揍边叫：“我让你们背诗，是为了一块钱吗？！”

尼玛原以为老师肯定会收下的，一块钱多大啊！

1993年，尼玛离家到60公里外的新都桥藏文中学念初中，那是川藏公路上一个小小的村镇，没想到这个小镇让尼玛陷入无休止的街头战争。很多时候，这里几乎是一个战场，而不是学校。

老生欺负新生，农区和牧区的学生之间也战火不息。牧区的学生喊尼玛这些孩子为“绒巴”，就是“农区的人”，含有“愚昧”之意。尼玛喊他们“卓巴”，“牧区的人”，有“野蛮”之意。“绒巴”和“卓巴”常常打架，牧区人多，欺负尼玛他们，冬天夜里让他们不穿棉衣在外面跑步，不跑就打，尼玛总是反抗，但老也打不过。有个人与他打了三架，尼玛输了三架，第四次那小伙子当面一拳，尼玛鼻血长流，他回到宿舍将自己洗干净了，弄一块玻璃放在枕头下，枕戈待旦，敌人一回来，尼玛“叭”一声关上门，手持玻璃明晃晃冲过去，在他脸上划了一道。尼玛的鼻子肿得像土豆，敌人脸上挂花，两人都羞得不敢出门，只好关在宿舍里逃课，竟很快成了好友。

他盼着每周六到新都桥镇看录像，但没有钱，便与一个同学穿上女人裤子，脸上抹得红红绿绿，打着一把花伞扭到女生宿舍，念着经伸手要钱。女生笑翻之余，便打发点零钱。

他的生活中原本只有满山的石头、作业和怎么打也打不完的架，但录像厅点燃了他花花世界的欲望。他 16 岁时看了许多打打杀杀的香港电影，和同学们讨论说，听说在香港偷一个馒头要关三年——简直太荒唐了！他们常常到新都桥镇上骗吃骗喝——但杀掉一个人没关系，你看，电影上随便杀掉一个人，没看到公安出现啊。

他们得出结论：要做大事，就去香港。

一个晚上，中学生们又在宿舍里热烈谈论着香港，一个叫小山的孩子猛地一拍桌子：“谁跟我去香港？”

“我去！”尼玛挺身而出。

“明天去，你敢不敢？”

“有什么不敢！”

“你有钱吗？”小山问。

“没有。”

“那咱想办法。”

尼玛值钱的家当只有一床藏毯，他拿到街上卖了 40 块。40 块钱可能到不了香港，他们想。小山建议两人回家偷钱，尼玛坚决不干：“要去就这样去，我绝不偷家里东西。”

这是五月，樱桃刚要熟了，天气还有些凉，出门时尼玛豪情满怀地对同学们喊：“哎——我们去香港了，到了香港给你们写信！”

两人坐着去康定的公共汽车过了折多山，尼玛又迷茫，又兴奋，不知道自己这是去哪。忽然有些害怕，眼泪流了出来，但怕小山笑话，偷偷抹掉，心里给自己打气：现在去做大事！

从康定再到泸定，钱很快花光了，车票买不起，饭也没的吃，两人硬着头皮沿公路走，一直走向二郎山，到了一个岔路口，从这里往东就过二郎山，往南去石棉县。尼玛问路人：“到成都怎么走？”

人家奇怪地看着他们：“你们走路去成都？”像是看到了外星人。

两个少年先往石棉县走，那样可以绕过二郎山再去成都。走了三天，一餐饭也没吃到，看路边一种像草莓一样的果子，长在带刺的树上，木雅话中这果子叫“潘日”，两人往山上爬着摘果子吃，夜里便睡在山林里。

半夜里，雨劈里叭啦打下来，将他们惊醒。尼玛迷迷糊糊站起来，找到一棵芭蕉树，从树上采下几个巨大的叶子，用叶子将全身盖住。现在雨打不到身上了，但打在芭蕉叶上却“叭叭叭”直响，让人心惊，两个少年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早上起来，半山腰雾气蒙蒙，尼玛忽然想到家，在家的時候，早上起来放牛，半山腰上也是这样白雾弥漫。一想到家，就像闻到家里香香的糌粑，尼玛又想哭了。

走到第四天，除了野果子，他们什么也没吃到。快到石棉县时，尼玛不再觉得饿，只想一觉睡下去，他说：“我们先睡一觉吧。”

“绝对不能睡，睡下就起不来了。”小山说。

终于到了石棉县，鞋子走破了，他们偷了两只鞋子，结果全是左脚。卖又卖不出去，丢了又可惜，尼玛只好穿上，右脚挤得要命，穿一阵再扔掉。

他们偷了一条裤子，那裤子不错，能值一百多块，想卖给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只出五块。他们太饿了，只好妥协。

五块钱全买了馒头，看着那 30 个馒头，两人乐呵呵的，搓着手不停欣赏，尼玛想：我要吃 20 个！他拿起一个来，只吃了半个就哽住了。

过了半个小时才恢复饥饿的感觉，两人狼吞虎咽将 30 个馒头吃完，开始在石棉流浪，夜里就住菜市场。一天早上，肚子咕咕叫着把尼玛饿醒，包子铺里腾腾的热气像妖魅一样诱惑着他贴过去，等老板一转身，他冲上去端起七八层蒸屉包子，转身就逃。老板从铺子里冲出来，“你敢偷我包子！”大呼小叫，穷追不舍。尼玛跑了几步感到手火辣辣地痛，蒸屉太烫了，但他舍不得那些包子，端着高高的蒸屉晃来晃去狂奔，如同玩杂技，但终于烫得受不了，两手一撒，“咣当”几声，回头一看，白白的包子在街上滚来滚去。

“你不会偷东西，真没种！”小山抱怨尼玛。

“你会偷，因为你早就偷东西，也许在家里偷，也许是学校偷，偷顺手了，我从小可没偷过。”尼玛说。

小山发怒了：“你什么意思，说我是小偷？”

尼玛不说话。

“你有没有种抢东西？”小山说。

“抢就抢，杀人我也敢！”

两个孩子忽然觉得杀个有钱人也不错，这业务倒比偷东西容易，香港电影上早教了几百遍。

两人密谋，一个在公共厕所藏着，从藏装上取下腰带，再放一块石头在脚边，另一个人将有钱人骗进厕所，先勒脖子，再砸脑袋。

小山藏在公共厕所，尼玛坐在路边看来往的人，右手一直放怀里。他们的计划是，尼玛拦住一个人，悄悄说：“我这里有古董，你要不要？”如果那人有兴趣，尼玛就说：“这里不方便，到厕所里看。”然后把人骗过去交给小山。

尼玛在外呆坐了半小时，心里害怕，一个人也没问，走回厕所说：“我找不到人。你去找，我来杀。”

小山将腰带交给他，要走出厕所时，回头叮嘱：“人一来，勒住杀了！”

“用不着你指挥！只要你把人带回来，我解决！”尼玛说。

一小时后小山也两手空空回来了，尼玛如释重负。小山对尼玛说：“你偷东西不行，杀人也不行，咱们这样会饿死的，还是回家吧。”

尼玛很想回家，可他坚决不能同意：他到香港做大事业的事，肯定在家乡传开了，这样回去多丢脸！

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同时找车，谁先找到听谁的。小山先找到一辆回泸定的车，两人搭车回到康定。这次他们的条件大为改观，平均两天就能吃上一餐饭，晚上也能享受到不错的住宿——他们发现了一堆锯末！他们躺下，用锯末把

自己埋起来，最后只剩一只右手留在外面，无法被锯末埋起。睡着睡着冷极了，再抽出左手，用锯末把右手埋起，两只手轮流值班，也能熬过这高原寒夜。

有一天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烂棚子，有个十来岁的流浪少年住在里面。两人很关心那个孩子，晚上睡觉时，两人让小男孩睡中间，三个人像三明治一样粘在一起，方向一致，就像三根香蕉并排，生怕冻坏了小男孩。最后面那人的背冷得受不住了，大家就翻过身来，换个方向。

这一天正是释迦牟尼生日，康定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小山偷了一套白色西装，径直穿在身上，没有再卖掉换吃的。“看来小山想回家了，打扮得像样一点给家里人看。”尼玛想。他也想家了，可他不好意思就这样回去。

尼玛正在街上游荡，突然发现了大哥，他又惊又喜又窘，知道大哥是来康定找他，他不敢见大哥，但又希望让大哥带他回家，于是在大哥旁边晃来晃去，希望大哥发现他。但大哥并没看到他，走了。

尼玛好失望，过一会儿他又发现了堂哥，堂哥是来康定卖虫草的，这次尼玛不再错失良机，及时让堂哥发现了他。“你哪儿去了？你妈妈都要疯了！”堂哥说。堂哥将他带回家，尼玛在门口蹭来蹭去，最终还是低着头，臊红着脸进了门。妈妈一见儿子回家，哭了起来。

尼玛不敢看妈妈的脸，上楼站到窗前，用手捂住半边脸看着外面——那是雾霭重重的山峦，山峦外就是贡嘎山。在尼玛以前看来，穿过那些不高的山，就是热闹非凡的成都以至香港。而如今在尼玛眼里，山外有山，重重叠叠，不知何处是尽头。

跟上来的妈妈哭着问：“你又看什么呢？又想往另外一个地方跑吗？”

尼玛不吱声。

妈妈骂儿子：“人家的孩子往拉萨跑，你去香港做什么？香港有佛吗？”

尼玛仍然不说话。妈妈说：“你不想读书就算了，明天上山捡虫草吧。”

尼玛第二天上山，住到哥哥嫂嫂搭的帐篷里，很多小孩子尖叫着钻进帐篷，“尼玛回来了，尼玛回来了！”嘻嘻哈哈地看着尼玛，似乎他是个怪物。尼玛将头埋到两腿间。

大哥冲他们喊：“没见过尼玛吗？走开走开！”将孩子们全赶出去。

几天后，大哥把尼玛叫到跟前：“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想不想上学？”

“想！”以为自己的远大理想要葬身于此的尼玛非常激动，他不知道还有第二次机会。

“那你还逃不逃了？”

“不逃了！”

于是尼玛回到学校，家里给他买上一身新衣服，怀里揣上700块钱。学校不允许他和小山打招呼，两个人互不理睬，小石穿着那身白西装，尼玛也焕然一新，连袜子也是新的，简直摇身一变，重新做人了。

尼玛从此成了藏文中学的传奇，是敢作敢为的大人物，他很自豪地对学生们讲自己的江湖生涯，“尼玛真厉害！他跑得很远啊！”学弟们赞叹着。

但尼玛偶尔会告诫那些小学弟：“以后千万别跑，外面太烂了，我去过很多地方——康定、泸定、石棉，没什么地方比我们家乡漂亮！”

在老师和乡人眼里，尼玛彻头彻尾成了坏小子的典型——逃跑也选不对地方，不去拉萨拜佛，偏偏去香港！

三十二 街头小霸王

我跟尼玛到了他家，这是一栋石木结构的碉楼，高大雄伟，窗棂雕画得色彩绚烂。

进了碉楼，底层是畜栏，我们踩一条窄而陡峭的木梯上了二楼。尼玛的妈妈挨窗户坐在靠近火炉的旧沙发上。大家围着火炉坐下，立时全身暖暖的。正说着话，楼梯“噔噔”地响，大哥上来了，他刚种地回来，这两天正是种青稞的时候。

大哥曾经是家里的顶梁柱，爸爸40岁去世后，十几岁的大哥种地、做矿工、照顾六个弟弟妹妹。他坐在火炉前，憨憨地对我笑笑，不说一句话。

楼梯“噔噔”响，大嫂上来了，她浓眉大眼，端正好看。她也种地回来，见有客人，一笑，走到窗台边，拿起一块破得不成样子的镜子一照，笑道：“太吓人了！”赶紧打水洗脸。一会儿容光焕发地出来，头上一条夹缠着红绳的辫子，在右颊边系着一块圆形象牙，这是木雅藏人妇女特有的装饰。

大嫂开始抹擦锅子。火炉背后的墙上搁着上下两排木板，上层放着四个铜罐，两把普通水壶，一把细腰水壶。下面一层放着四个叠在一起的笼屉、两个大铝锅和三把暖瓶。墙上还并排挂着五把铝制水瓢。所有的器具干干净净，闪着亮光。这位勤快的女人不停地做饭，打扫屋子，间或看着客人，礼貌地一笑。

楼梯“噔噔”响，“应该是我们家的喇嘛回来了。”尼玛笑道。进来的果然是他喇嘛二哥，穿一件跟僧衣同色的红色俗装。12年前二哥到拉萨游历三个月，回来后出了家。现在寺院放假，他有一个月的时间上山挖虫草，筹集一年的生活费。

楼梯“噔噔噔噔”一阵乱响，跑上来两个小丫头，一个11岁，一个9岁，是大姐的两个女儿放学了。两个女孩儿放下书包，挨到舅舅们身边说了几句话，从房里拿出几件衣服，放到水盆里抱着下楼，临走还问喇嘛舅舅：“你有衣服要洗吗？”喇嘛舅舅笑着说没有，两个丫头嘻嘻笑着，“噔噔噔”地下楼去了。

楼梯“噔噔噔噔噔噔”乱响，像一阵急鼓。“我们家的帅哥回来了。”尼玛说。上来的果然是一个小帅哥，大哥的大儿子扎西旺秋，虽然只有12岁，眉目间已有一股英气。

扎西旺秋穿着牛仔裤和牛仔夹克。他调皮时将右裤腿撕了个口子，自己用胶水粘了起来。牛仔夹克的左袖口剪得一条条的，尼玛笑骂道：“为什么剪掉？”

小伙子胸一挺，用右手在左肩上一比画说：“我们同学连袖子都剪掉呢。”

大家笑起来。

一家人围炉夜话，尼玛是话题的中心。他小时候是全家人的麻烦，现在大学毕业了，成为全家人的骄傲。十多年过去，贡嘎山下的少年们仍在盼着走出大山，尼玛成了他们“走出去”的榜样。扎西旺秋忽然问我：

“叔叔，康定到成都，骑车走多久？”

“不用骑车，像你尼玛叔叔步行就可以。”我笑道。

一家人大笑。“为什么想去成都？”我问他。

“人家说成都的老师好，我们的老师打人。”

“打你吗？怎么打？”

“打我，用棒棒打屁股。”

“经常打吗？”

“嗯。”

“平均一天打几次？”

大家笑了。扎西旺秋说：“一天最多打两次。”

又一阵哄堂大笑。

“为什么打你？”

“我调皮，用粉笔扔同学。”

“想去成都，就是怕老师打吗？”

“对的，”他很肯定地用力点头，“叔叔，你坐过飞机吗？”

“坐过啊。”

“唉，我没坐过。”他叹口气。

“你以后会有机会的，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像尼玛叔叔一样工作，到处去，不像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你好好念书，上大学，学好藏文、汉语和英文，也能像尼玛叔叔一样。”

“对，我就想好好念书。叔叔，你觉得我们村子里好耍吗？”

“好耍啊。”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好耍，这里人太少了，我想去城市，那里人多，热闹。”

我和扎西旺秋到楼下玩，猛见一轮圆月挂在东山上，天地间亮如白昼，山岭如在眼前，天上白云清晰可见。再仔细一看，那月居然亮得刺眼，不可思议。

“叔叔，城市里有这么亮的月亮吗？”

“没有。城市里很脏，月亮很暗，也很少看到星星。”

扎西旺秋不再说话，静静地上楼梯。我问：“但你仍然想去城市？”

“对。”他回答。

“你去过城市吗？”

“我去过新都桥镇，我喜欢那个大城市。”

新都桥镇，这个川藏线上著名的、成为扎西旺秋梦想的“大城市”，只是一条肮脏的街道。街道两端分别是两个高墙大院，一边是藏文中学，就是尼玛在此呆了六年、并闯出江湖名号的地方。在它的墙外，一分钟之内，我看见三个男人对着它撒尿。而在墙内，学生们用各种方式，如打架、梦想逃跑或俯首帖耳，来实现他们走出去的梦想。街道另一端的高墙大院是甘孜州监狱，里面的犯人同样以打架、梦想逃跑或俯首帖耳，来实现他们走出去的梦想。

这两个大院是新都桥人最强大的邻居，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是：在当地人看来，有时候藏文中学学生比监狱犯人更可怕。

十年前的一天晚上，尼玛的班主任检查女生宿舍，发现少了两个女生，他急忙到新都桥镇上找，手电筒照到了几个镇干部，镇干部喝多了，不问青红皂白痛打一顿，他伤重住院。

这下子惹恼了藏文中学，第二天早上，数百学生倾巢出动包围镇政府，镇干部见势不妙，关上大门，逃的逃，躲的躲。男生们翻过大门，将门打开，一涌而入。尼玛和男生们到处抓捕干部，没逃走的倒了霉，被拳打脚踢。女生们也不含糊，一个女生人小志气大，搬着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呼喊口号：“还我老师！”费力举起石头，“砰”一声，将一个镇干部家里的锅砸破。尼玛的女同学白玛旺姆——后来成为画家耿登女友的白玛旺姆——和其他女生站在院子里扔小石块，“哗啦哗啦哗啦”，将镇政府门窗上的几十块玻璃打个稀烂。

学生们声势浩大，最后校方强力弹压下去，老师警告调皮学生：“你再打架，就会搬到对面那个大院去。”

幸好，尼玛虽然有数十次几乎站到对面那大院的门口，好像立即要跌进去，

但他运气好，走了另一条路——他念了大学，住到那个他少年时没走到的成都，成为国际组织的雇员，令人尊敬的环境保护者。现在的尼玛再回到新都桥，不是那个打架、赌博的街头霸王了，他穿着值3000元的冲锋衣，在大街上与各色熟人文质彬彬地打招呼，那些过去的仇家见到他可能会吃一惊：尼玛又回来了！其实不必担心，他背包里装的不是刀子，而是IBM电脑。尼玛是回来了，但不会在此停留，这里的生活早成为过去，他现在有更广阔的天地。他花200元租一辆面包车，驶离此地，留下街面上的许多人，对他的背影指指点点：这就是那个人，那个曾经威震新都桥的人。

2006年4月，我与尼玛一起旅行20天，从成都到康定，然后翻过折多山。在川藏公路修通之前，人们向西越过折多山就算出关了，过了关往北，经道孚、炉霍、甘孜，过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山口到德格后，过金沙江去西藏，是入藏北路；而过新都桥一直西行，翻高尔寺山，经雅江、理塘、巴塘，再渡金沙江入西藏，称为南路。

我与尼玛沿北路而行。清康熙年间，因为泸定桥的建成，川藏线成为出入西藏的主要通道。雍正时年羹尧、岳钟琪出兵青藏，乾隆时征讨侵藏的廓尔喀人（现尼泊尔），两次平定大小金川，以及后来的驻藏大臣进藏，多选择这条贡嘎山东北角的打箭炉（康定）“西出炉关”。1950年十八军官兵进藏准备昌都战役时，也从这里经过。这里虽然山路难行，但紧邻天府之国四川盆地，有可靠的后勤保障。

这里不仅是出入西藏之要地，而且还有南去云南、北达甘青的古道。元初忽必烈远征大理即经此而去。

我与尼玛到德格后，再顺金沙江南下，见到宗萨寺著名的洛热彭措，他是这里有名的藏医，也是宗教恢复后这家重要寺院的重修者，现在他做着恢复藏族传统与文化的事情。采访完毕，4月25日，我与尼玛离开德格回成都。这一次我们运气不怎么样，碰到一个糟糕的司机。

未接触过或初次接触藏人的汉人，可能对藏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即使不像香曲多杰那样有大慈悲心和大智慧，也应该像嘎玛、仁青、扎多及木梭一样诚实、守信、耿直。这位司机帮助他们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

这位司机40来岁，小个子，满脸胡须，皮上衣，戴一顶黑皮牛仔帽。前一天晚上尼玛与他谈好第二天650元到炉霍，但司机要求早上六点出发，并要尼玛给他100块押金，“你们明天不坐我车了怎么办？”他说。

尼玛说：“那你也交，明天你不来怎么办？我们都交给宾馆老板。”

司机不干，于是押金一事告吹。他说明天六点到宾馆门口接我们。

我有一点担心：六点钟天还未亮，我们根本没必要那么早出发。这司机可能想当天赶回德格，300公里的山路当天赶回，势必开车极猛，这样急匆匆爬过川藏公路第一险雀儿山，安全吗？

我们出门吃晚饭，司机在门外游荡，凑上来对我们说：“明天六点钟！”

这让我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我去打公用电话，他居然又跟上来说：“明天六点！”

我终于忍不住了：“你为什么那么早？我们平时都是八点多出发。你是不是想当天赶回来？”

“不是不是，你们到炉霍，早到嘛。”

我们早到不早到，关你何事？他不敢直承其事，让我有一丝不良的预感。我还没见过藏人如此撒谎。

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第二天上路后，他在险道上把车开得飞快，我和尼玛坐在后排，头砰砰地撞到车顶，行李翻来滚去。尼玛多次温言相劝：“师傅，请开慢点。”他充耳不闻，车越开越快，几乎在雀儿山的每一处弯道，他都要把我们从窗户甩下山涧。我再一次请他开慢点，没想到他倒发起脾气：“你们毛病怎么这么多！”

“你怎么不讲道理！”尼玛提高了声音，“早知这样，我们绝不会用你的车。”

“你们有本事下车！”司机越发张狂，他当然知道我们不可能在雪山上下车，我们是他的人质，他有恃无恐。

尼玛低声说：“师傅，我们好好说话。你这样开车，我们根本坐不住，而且太危险。”

司机仍然大叫：“我就快，怎么样？有本事下车啊！”

我看到司机左手伸向车门，抓住别在车门上的一把藏刀。

我跟尼玛都不说话。那司机以为我们害怕了，继续开车过雪山，到了马尼干戈，将我们倒给另一个司机，拿到钱得意洋洋回转德格。我忽然很怜悯他，心里发出一声叹息。他很幸运，如果尼玛还是以前那个尼玛，他可要倒大霉了。尼玛不怕那藏刀，只是学会了容忍。

尼玛上高中时，他的战火从学校蔓延到校外的新都桥。他一天在街上逛着，看见一个喇嘛和一个老太太吵架，尼玛上去打听，原来老太太的孙子偷了家里的手表，20块钱卖给喇嘛，老太太要给喇嘛20元换回来，喇嘛不干。

尼玛很不平，说：“你喇嘛应该做善事，怎么欺负一个老太婆？”

喇嘛不服气，但围观的人都批评他，他只得还了手表。

尼玛高高兴兴走了，等回来的时候，那喇嘛用食指勾着，招呼尼玛过去。尼玛看那喇嘛腰上挂着一把刀，心知不善，跟同学借了一把刀放在背后，慢慢走过去问：“什么事？”

“刚才管你屁事？”喇嘛说。

尼玛的怒火“腾”一下烧起来，“你再说一遍？”

喇嘛手去抓刀：“管你屁事！你想找麻烦……”

不等他说完，尼玛一刀砍过去，正中喇嘛额头，喇嘛前仆跌倒，同时手里的尖刀挺上来，直刺尼玛小腹，尼玛急闪，衣服前襟“哧”一声被挑破。

尼玛转身便跑，喇嘛光头上流着血，持刀“啊啊”叫着追赶，尼玛捡起一个酒瓶，躲在路边一辆汽车后面，待喇嘛追过来，一瓶正中脑袋，喇嘛又倒下去。

尼玛跑回学校，却见公安追来，他跳墙逃出学校，跑到那老太太家里。老太太见是尼玛，大为高兴，要将手表送给他。尼玛不要，待公安走了，又偷偷跑回学校。

第二天全校早操，教导主任对全校师生愤怒地喊：“我们的学生太不像话了，连喇嘛都打！你们还是不是藏族啊？！”

尼玛自己也从未听说有人打喇嘛，他在当地开了历史先河。那喇嘛在校外等着他，寻机报仇，尼玛不敢出去，三天后，那喇嘛方悻悻离去。

尼玛的小霸王名声可不是一两次战争就确立的，他的好战近乎疯狂，不可理喻。

新都桥有两家酒吧，尼玛的表哥请他和一个朋友去一家酒吧喝酒。表哥无事生非，招惹另外一拨客人中的女士。尼玛正想劝阻表哥，一位叫扎西的小伙子已揪住表哥吼起来：“你为什么欺负女人！”

尼玛一看势头不对，立即站到中间对扎西说：“哥们儿，给我个面子，别打架。”

扎西冲尼玛叫：“你算老几？你有什么面子？”

尼玛说：“好，那你打吧。”对旁边的客人喊：“走吧走吧，这里要打架了！”若无其事回到自己桌前，抓起一瓶啤酒走回去，喊一声：“扎西！”

扎西瞪他一眼：“什么事！”

“你他妈的！”尼玛手一抡，啤酒瓶砸到扎西头上，“哐”一声炸开，血立即合着啤酒从头上流下来。

女人们发出尖叫，酒吧里乱成一团，表哥两人跑掉，尼玛站立不动，扎西摇摇晃晃倒下。

尼玛走出去，摆足了架子慢慢走在街上。表哥已坐到另一家酒吧里喝酒，把他叫进去。尼玛觉得他俩太不仗义，但也没说什么，坐下喝酒。忽然酒吧的门打开，露出满脸是血的扎西，向尼玛招招手。

尼玛慢条斯理走过去，脚刚踏出屋子，立时被一群持刀的人包围。扎西用一把菜刀“叭叭”拍着尼玛的脸，将脸凑到尼玛鼻尖说：“小伙子，你刚才不是野吗？为了一句话就打我，现在你再打打看！”

尼玛说：“咱们别打了。”右手悄悄往屁股后摸，接近自己那把长刀，眼睛余光寻着退路。酒吧是不能退回去的，那里死路一条，侧边有条小巷，而且是包围圈的一个空隙。扎西用力推搡他，他借势退往小巷方向，手终于悄悄摸到长刀，一下子站定，大叫：“扎西，你够了没！”

扎西说：“哟！你还很牛啊？我没够，怎样？”他自以为有许多帮手，稳操胜券。

“这样！”尼玛一刀砍过去，扎西头上受伤，扑通倒下去。

尼玛撒腿就跑，后面人们大喊：“那人杀了扎西！杀了他！”随后舞刀追来。

地上湿软，尼玛穿着大头皮鞋跑不快，边跑边往后看，只见刀光闪烁在人们头顶，越来越近。尼玛见逃不掉，转身向一处墓碑跑去，一屁股坐下，背倚墓碑，刀放膝上。来人以扇形围着他，各持钢刀。

尼玛大声喊：“你们来吧，来一个，我杀一个。今天杀不了我，我杀你们！今天杀不完，明天杀！”

那些人面面相觑。尼玛心怦怦跳着，全身发凉。本来背靠墓碑是想有个依靠，不被敌人包抄，可这时前有强敌，兀自担心，背后却忽然生出一股恐惧，生怕墓里的鬼也来害他。一阵凉风吹到脖子上，他一哆嗦，以为鬼在向他脖颈中吹气。

惨白的月光下，只见对面的七八个人僵立不动，过了一会儿聚拢一起，商量什么，尼玛凝神细听，只听到隐隐约约说：“我过去，一下抓住。”“你去砍他”之类，但商量来商量去，终是不敢动手，最后一起退去。

尼玛怕鬼，急忙站起回到酒吧，表哥两个人仍然醉着，一见尼玛回来，表哥醉眼惺忪地说：“你怎么走了？不够朋友！”他根本不知道尼玛又有一番死斗。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位先生头缠白布、血流满面地进来，尼玛定睛一看，又是扎西！尼玛好生奇怪地说：“你他妈的怎么又来了！”

窗外警灯一闪，警察来了！一闪念间，一群警察已冲进来，一警察拿起凳子，一下砸到表哥头上。尼玛冲出门外，撒腿就跑，后面警车尖叫着追过来。尼玛见无处躲藏，“哧溜”一声爬到一棵大杨树上，正拼命手脚并用，周围树叶子突然被照得白光闪闪，低头一看，几支冲锋枪指着自已屁股，眼睛立时被手电照得睁不开。

尼玛大叫：“我投降，我投降！”乖乖滑下来，还没站稳，一根电棍戳到背上，大叫一声，摔倒在地。一会儿站起，一警察手戴拳击手套，正雄赳赳站在面前，一个摆拳，正中下巴，又一勾拳，右颊上痛彻骨髓。尼玛强自撑住，没有倒下。那拳击手尚未尽兴，另一警察早不耐烦，飞起一脚将尼玛踢进警车。

三个人被押到公安局，局长黑着脸问：“人是谁砍的？”

扎西一指尼玛：“他！”

局长将刀连鞘扔尼玛头上，大骂：“狗日的！这么年轻就砍人！”

尼玛挺胸道：“你放了他们两个，人是我砍的，跟他们没关系！”

表哥两人被放，尼玛在监室呆了一夜。天亮了，尼玛同学伸伸懒腰，以为该回学校念书了，没想到警察不放他，要他在公安局扫地。尼玛将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位炊事班长站在门口吃瓜子，将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喝道：“扫干净！”

尼玛再扫一遍，刚扫净，炊事班长又吐一地，尼玛边扫边想：“妈的，等哪天有机会，老子收拾你！”

两天后尼玛被放出去，刚出公安局大门，就见表哥两人恭候在门口，弯腰走上前来，将一条哈达献于他手上。

尼玛之“义”“狠”声名，从此播于新都桥江湖。

三十三 失意的成都

贡嘎山下的木雅老人们今天还在念叨：全乡一百年，也出不了一个像尼玛那样调皮的。

“你调皮的方式很罕见，”康寺扎寺一个喇嘛对尼玛说，“你身上肯定附着一个鬼怪。”

青春期的尼玛把打架当家常便饭——实际上比吃饭还多，一天只吃三餐饭，可他在每餐饭之间都要打两次，就像双份饭后点心。打架不是因为深仇大恨，只是一种习惯，就像手边有一杯茶，自然地拿起喝一口，并非出于口渴。甚至于在厕所里小便，如果别的人尿到他的槽里，系上裤带就打一架，都等不及走出厕所。

尼玛长大了，不如人的感觉令他越来越敏感：他没有父亲，他没有钱，他觉得自己是个“烂人”。

他故意让自己更“烂”：把鞋挂脖子上，一副小流氓的样子走进教室；他跟老师对抗，逃课；他玩世不恭，喝酒赌博。“没错，我穷，但你要欺负我，你绝没好下场！”他用打架维护自尊。其实他每次打架都很恐惧，有时打过之后会偷偷哭一阵，觉得对不起被自己痛打的人。可半个小时后，他又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棍子，用暴力驱赶恐惧。

在他看来，女生尤其瞧不起他，所以也跟女同学打架。这一天上数学课，白玛旺姆不喜欢数学，躲到最后一排，她前面就是尼玛。她百无聊赖，见尼玛在看小说，知道他还有别的小说，用手碰碰尼玛的后背，小声说：“尼玛，给我本小说看。”

尼玛不理她，她用食指挠挠他的后背，“尼玛，给我本书嘛。”

尼玛烦了，仍然不理她。白玛旺姆一遍遍用手指上下挠他，“给一本嘛，别那么小气。”

尼玛忍了好久，下课了，尼玛突然站起来，红着脸对白玛旺姆叫：“你欺负我！”

白玛旺姆很惊讶地站起来说：“我哪有？我只是借你的书嘛。”

尼玛两手一推白玛旺姆的双肩，白玛旺姆一下跌倒在地，又羞又恼。

尼玛几乎打过全班所有的女生，除了他喜欢的女同学洛珠。她常常细声细语地劝他：“你脑子好，应该好好学习啊，怎么荒废了自己？”

尼玛害怕洛珠，当别人说他的劣迹时，他生怕洛珠听到。某一天他决定做一件大事，写了一封情书：“我知道你不会答应我，要是喜欢了像我这样的烂人，你肯定没面子。我只是想对你坦白，我喜欢你。”

将情书夹进洛珠书里，尼玛再也不敢见她，缩在宿舍里称病不出，心里很希望洛珠来看他。下了第一节课，洛珠没来，尼玛想：“她生气了？”越想越心慌，“我烂泥一堆的人，居然想要那么好的姑娘！”

第二节课下了，宿舍门“吱呀”一声开了，洛珠笑着进来，笑得尼玛全身发抖，用手遮住半边脸。洛珠问：“你怎么了？”

“我肚子痛。”

“我知道你没病，下午去上课吧。”

尼玛紧张得没吃午饭，一直想洛珠会怎样决定他的命运。下午他悄悄回到教室，似乎全班人都盯着他。有人对他笑，尼玛想，这家伙肯定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洛珠让朋友递给他一封信，尼玛不敢打开，拔脚就跑，逃到农牧局院子里，在洗衣台上坐下，过了好久才两手颤抖着打开信，读了两遍没看懂，“什么意思？她到底答不答应？”

他急忙招呼一个同学过来：“你千万别说出去，这是洛珠的信，我看不懂，你看看是什么意思。”

那同学看了一遍说：“恭喜你啊！”

“什么啊？”

“她答应你了。”

“哪里答应了？”尼玛急忙看信，没看到那一句。

“你看最后一句，‘星期六你把衣服拿来，我给你洗。’要是不答应，怎么会给你洗衣服？”

狂喜的尼玛跑到山上，趴在那里看新都桥街上人来人往，他嘴里叨根草，幸福地想：“哎呀，下面那么多人里面，有一个属于我啊。”然后有声有色地幻想下面发生洪灾，浪涛汹涌，大英雄尼玛飞奔下山救出心爱的姑娘。

过了几天，他进教室，突然发现洛珠坐在他的桌子边，与他同桌。这时候两个还是秘密恋爱呢。

洛珠伏在桌子上，朝他得意地笑。

“你疯了！”尼玛悄悄说。

“我找了班主任，让他把我的位子调到你这里，因为你数学好，可以帮我。”

从此尼玛身边多了个哨兵，他只要上课睡觉，洛珠就悄悄掐他的腿。尼玛也不敢再上课捣乱，因为那样会让洛珠难堪。

高三的一天，外来的警察与藏文中学老师打篮球，发生冲突，见自己老师被欺负，尼玛冲入球场，但洛珠抱住他死不放手。尼玛怒极，挣脱不开，低头咬洛珠的手，咬出血来，洛珠哭着说：“你打死我，我也不让你打架。”

尼玛终于忍了下来。

洛珠要尼玛早上四点起床，跑到她家门外，两个人一起在路灯下学习。她不怕人家说闲话，她要尼玛考上大学。

中学严禁学生恋爱，校长有一天把尼玛叫来，尼玛以为校长要训他，校长说：“学校不许谈恋爱，但你例外，因为有人管住你了，你尽管谈！”尼玛又惊又喜，校长鼓励中学生谈恋爱，恐怕破了其教育生涯的记录。

尼玛的心是酥油做的，寒风越吹，越冷漠冰硬，但只要给他一点温暖，就迅速融化了。从来没人关心过尼玛，爱他的洛珠扭转了他的人生，他的手里拿的不再是刀子，而是课本。

尼玛要考大学了，要考就考西南民院，去大城市，去成都！成都是他流浪时梦想的城市，到了成都，几乎就到了香港。

高考结束，尼玛坐拖拉机回家，洛珠追上来，尼玛跳下拖拉机，洛珠抱住他大哭起来：“不管考不考上大学，我们都在一起。”

一个月后，尼玛拿到了通知书，他连信封都没打开，就去打听洛珠的消息，洛珠也考上了！

1999年8月，尼玛终于和洛珠到了成都，那个贡嘎山外的世界。他在学校里迷路了，一号楼，二号楼……七号楼，他分不清东西南北，但很兴奋，饭卡在食堂里一插，饭就打出来了，哈，太新鲜了！旁边的人说着普通话，尼玛竖着耳朵听，心说：我一定要学会这种话！

但体检过后老师告诉他：“尼玛，你有肝炎，必须休学，养好了病明年再来。”

兴奋得似乎着火的尼玛被一下扔进冰湖。同学们要参加军训，晚上兴高采烈试穿军装，尼玛讪讪地凑上去，借了一套穿在身上，自己上下打量，然后脱掉，坐着发呆。不让上大学了，这一年到哪里躲着呢？三年级的老乡多吉陪着他，尼玛对多吉说：“我不能回家，妈妈会伤心的，我要去拉萨拜佛！”

就像所有的藏族人，失意时，他把希望寄托给拉萨、布达拉宫和释迦牟尼。

尼玛一直没有见洛珠的机会，军训纪律严格，她不能离开宿舍。第二天早上，尼玛到操场与同学们道别，看他们直直地坐在操场上，眼睛都不许动一下。

尼玛想哭，他冲着操场大声喊：“新都桥的同学们，我是尼玛，我走啦！我去拉萨了！我会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喊给洛珠听的。

他想起了五年前他对同学们喊：“哎——我们去香港了，到了香港给你们写信！”那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可现在，他这一声喊得多么悲伤。

洛珠不敢回头，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尼玛要去拉萨了，与少年时心里的香港不一样，拉萨更为遥远，似乎是另一个世界，这辈子也到不了的地方。妈妈当年骂他出走，总是拿拉萨与香港成都相比：“人家往拉萨跑，到拉萨拜佛回来有福报，你往成都香港跑能有什么？”

成都曾是他的梦想，可现在让他心伤，他告诉多吉：“你放寒假回家乡时，一定要把话捎给我妈妈，我是拜佛去了，不是逃跑。”

成都火车站的检票口把两个年轻人分开，多吉向尼玛挥手，尼玛也向多吉挥手，他忽然想到电影场面，很多电影就是这样的，伤心人在车站分手，可没有他的姑娘送行。人流将尼玛裹挟着，他似乎只是一根木头被河水冲走，离开他刚刚获得的城市，离开他的姑娘，离开他的梦想。他回身跳着挥手，但终于被淹没在人流中，看不见多吉了，尼玛回转身，眼泪终于一串串掉下来。

他到了西宁，再买火车票去格尔木。出西宁向西第一站是湟源县，火车在湟源峡谷中穿行。湟源县自古有“海藏咽喉”之称，是青藏高原农业区与牧业区的接壤地、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线和藏汉文化的交汇处。如果从湟源县往西南，便直去日月山，踏上到玉树的唐蕃古道。因此一百年前的拉江贡活佛才在湟源县买树苗运往玉树，如果过了湟源的日月山，进入高原后就买不到树苗了。

火车从湟源县径往西北，经青海湖北缘直去格尔木，从那里可去拉萨。到青海湖了！尼玛看到一湖碧蓝的湖水与天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湖。火车里放着一曲歌，歌手德乾旺姆沙哑忧伤地唱着《青海湖》：

“你从这里流淌，流淌，

鸳鸯喜开眉颜，青海湖，

你被寒风封冻，封冻，

鸳鸯黯然伤神，青海湖。

.....

你被寒风封冻，封冻，

鱼儿钻进湖底，青海湖，

你被暖风解冻，解冻，

羊儿到你身边，青海湖。”

尼玛盯着湖边的山，那山都是白的，羊群铺满了山坡，远远看去像是家乡的雪山，他又掉下眼泪。

他在一个半夜到了拉萨，熬到天亮，尼玛没了主意，该做什么呢？他晃到八廓街，看人家在磕头，他也磕了几个。转着转着，突然看到了布达拉宫，尼玛几乎不相信，不停地念叨：“啊，尼玛，你到拉萨了，尼玛，你到拉萨了！”

尼玛从小盼望走出家乡的大山，他凭着两脚流浪，梦想离开藏区到那外面的世界。当他现在终于跨过小时候没有翻过的二郎山，到了城市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乘坐现代交通工具，绕一个大圈子，回到藏区，到达拉萨。

他傻傻地站在广场前，心怦怦跳着：啊，这真是布达拉啊，跟画上的一样啊！尼玛一直看着它，回忆画上的布达拉：对，没错，这就是布达拉，“尼玛尼玛尼玛，你真的到拉萨了！”尼玛像是中了彩票，又像是梦游，虽然站在布达拉前，却恍惚不知身在何处。

尼玛不舍得花钱住旅馆，他见有人在大昭寺旁的煨桑炉边睡觉，也挤过去睡，那里热乎乎的，但第二天早上满头满脸的灰尘。

手里还有100块钱，他给洛珠打通电话：“洛珠，我到拉萨了！”洛珠在电话中哭，尼玛谈着自己的行程，洛珠一直哭着，尼玛说：“别哭，一年以后我们又见面了。”电话打完，他手里只有70块了。

尼玛找了一个工作，在酒店门前笔挺地站着，像电线杆一样。这个工作赚钱不多，但足够他给洛珠打长途电话。尽管很想洛珠，但尼玛说：“你不用管我了，我是个病人，你在大学里会有更好的男人。”尼玛想，让这么好的女孩子等一个病人，很不公平。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要等你。”洛珠说。

但尼玛不断打这样的电话，终于让洛珠起了疑心：难道尼玛变心了？为什么老这样说？

尼玛想像同学们的样子：他们变化很大，穿得干净了，皮肤变白了，挺时髦的样子。“如果我没病的话，也是这样。”他感到自己成了怪物。但他将自己藏着，不表现出软弱和伤心。

几个月后，尼玛回到新都桥中学学英语，那里刚刚开英语课。他每周收到洛珠的信和寄来的蜂蜜，直到2000年1月放寒假。洛珠这个寒假没有回来。

尼玛回到家乡六巴村，半年里再没有收到洛珠的信，也没给洛珠写信。六巴村不通邮，更不通电话。多吉暑假回家给尼玛捎回洛珠的一封信，信里问尼玛为什么没有音讯，“我多想收到你哪怕一个字。”读着信，尼玛像个孩子一样哭起来。

但多吉吞吞吐吐地说：“我怀疑她和一个同学谈恋爱了。”

尼玛大骂多吉：“你狗日的！不给我好好照顾，反而冤枉她。”

2000年8月底，尼玛的病治好了，与多吉启程去成都。到了沙德镇，尼玛给洛珠打电话，她已到成都。尼玛说：“洛珠，我明天就到成都了。”

“要不要接你？”洛珠问。语气平静。

尼玛的心沉下来，开始相信多吉的话，“不用了。谢谢。”他说。

尼玛第二天到了大学西门，打电话给洛珠，洛珠过来，表情复杂地看着尼玛。尼玛说：“能不能把以前的信还我？”

洛珠哭起来。

在其后的许多天里，洛珠每天晚上给尼玛打电话，但尼玛拒绝交谈。他似乎比休学时更伤心：天下人都瞧不起他，连洛珠也抛弃他。

尼玛在拉萨要与她分手的电话，一直让洛珠担心，而他回康定的大半年里，一个电话一封信都没有来过，洛珠流了许多泪，以为尼玛不要她了。她与另一个男生之间的交往还不深，只是刚刚开始。但尼玛不听解释，他把伤心、失意和自怜自艾做成一床被子把自己包裹起来，缩在墙角。

尼玛又上了大学，因为没钱，经常饿肚子。他与多吉将钱全部打入饭卡，一起吃饭，卡上没钱了——这样的事每月都会发生——就各自解决，看谁的本事大。每当多吉找到饭了，就打个电话来炫耀：“我吃饱了，你呢？”

尼玛吃不上午饭时蒙头大睡，同学问：“你怎么不去吃饭？”

“我肚子痛，不吃了。”

有个同学特别讨厌，他到食堂把饭买来，在寝室里吃得滋滋有声。尼玛在被窝里恨：“你狗日的，不去食堂吃饭，在这里折磨我！”

当大学的新鲜感过去后，尼玛重新过上颓废的日子：喝酒，打架，睡觉。直到有一天，他又碰到一个姑娘。

尼玛在校外的地摊上喝酒，旁边有个女生打公用电话，尼玛斜眼看去，是一个汉族女孩子，个子中等，皮肤白晰，面容秀丽，让人看着会不由自主生出怜爱。尼玛脱口问：“你给谁打电话？”

“家里。”女孩子想走。

“你是哪个系？”

“动科系。”

“我叫尼玛，藏文系，2000级一班的，班长。”

女孩子叫赵佳。尼玛说：“我们摆摆龙门阵吧。”不由分说与她并肩而行，赵佳跟他在足球场转了一圈。

“你记下我的电话。”尼玛说。

“我记不住，我记不住。”赵佳摇着头，走了。

尼玛回去继续喝酒。

一个星期后，一个女孩子打来电话：“我是赵佳。”她去问藏文系的朋友：“那个叫尼玛的班长怎么样？”朋友说了尼玛许多好话。赵佳喜欢跳藏舞，喜欢藏族人，听说藏文系宿舍要搬走，生怕找不到藏族朋友了，赶紧打电话来。

尼玛与赵佳跳锅庄舞，很快发展成一起去图书馆。尼玛第一次知道图书馆在哪里，他装作特别认真的样子，其实书是看不下去的，但他有极大的耐心装模作样。过了几个月，尼玛感觉自己真要爱上赵佳了，“我们分手吧，”尼玛说，“因为我会认真起来。我们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毕业要回家乡，你是成都的，不会跟我走；再说你家里会反对，我家里也不会同意。”

赵佳才不管，继续爱着尼玛。大二暑假，尼玛从家乡拉松茸回成都卖，他给赵佳打电话说到武侯祠见面，但她听错了，在另一个十字路口等了两小时，哭了两小时。两人都想，是不是去学校看看？走到民院东门，赵佳看见尼玛过来，大哭起来：“你骗我！我再不想和你分开了！我要跟你回康定。”

两人的爱情之火终于燃烧起来，尼玛带赵佳回老家，赵佳的身份是“松茸老板的女儿”。

尼玛又变了，他珍视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前害怕打架，每次打架都想早点结束战斗，放倒对方，因此想的是“往哪儿打最有效？”后来打架只想吓唬对方，考虑“哪儿打不得？”——头危险，不能打。眼睛危险，不能打。“这个烂人，居然有人爱你！”尼玛想。他需要珍惜生活了。

民院里彝族学生与藏族学生发生冲突，一场群殴似乎难免，一天晚上，尼玛抱着一箱啤酒，带刀闯入彝族学生领头人的宿舍，“叭”一声打开啤酒，塞给对方一瓶，自己“咕嘟嘟”喝起来。对方警惕地看着他。

一气喝完一瓶，抹抹嘴，尼玛说：“我们打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我们就像狗！我们打架时，围观的人怎么说？人家喊‘打，打！’，给我们加油，就像看动物园演出。彝族人骂藏人，哪个藏族年轻人不激动？你们敢污辱我们的民族！其实这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跟民族无关。我们以后都教育好自己的人，不要再打架了。”

对方与他握手言欢。一个暴力人物来要求和平，自然求之不得。

要毕业了，有朋友建议尼玛回康定考公务员，尼玛说：“我不回去，我没关系没钱，没法在官场上混。再说回去后如果倒了霉，也会传回家乡，让家里人难过。我在外面混好了，再远也可以回家看妈妈。”

尼玛知道自己口碑不佳，回到甘孜州重树好形象来不及了，他要完全离开家乡，斩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

西藏昌都招聘教师，很多同学觉得那里太远，尼玛想也不想，立即签了协议。

“我也去。”赵佳说。

尼玛说：“藏区很苦，你从小在城市长大，不适应。你要好好与家里商量，如果你一定要来，我尼玛有什么吃的，就有你什么吃的。”

“没什么好想的，我跟着你。”赵佳说。

毕业前，赵佳又跟尼玛回了家乡，她没敢告诉父母。几天后赵佳的爸爸开车追到康定，很生气地问尼玛：“你知不知道我就这一个女儿？你们去西藏工作这么大的决定，你问过我意见没有？”

尼玛一下子哭出来。他羡慕赵佳，人家父亲那么远赶来保护女儿，可他那么孤单，没有父亲，没人替他说话。

“跟我回家，马上走！”父亲命令女儿。

“不，我要陪尼玛。”女儿说。

“我并不是要拆散你们，”父亲温和地说，“你们做事要与我们商量一下啊，昌都那么远，万一出点事谁照应你们？你先回家，我们慢慢商量。”

赵佳抱着尼玛哭了，说：“我不回去！我要跟尼玛在一起，我要跟他去昌都！”

在尼玛的劝说下，赵佳跟父亲走了。两天后尼玛回到成都，他放弃了昌都的工作。“我只有一个女儿。”他想起赵佳父亲的话。自己为什么要抢去他的女儿？赵佳为什么一定要去山区受苦？

他放弃一切，回到成都。

“你怎么搞的？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工作。”朋友骂他。

“赵佳可以为我放弃一切，我为什么不能为她放弃一切？”尼玛说。

2004年8月初，尼玛终于找到一个试用的工作机会，“保护国际”在藏区做项目，保护神山圣湖，正缺一个藏族工作人员。成都办公室负责人李晟之说：“你跟我去德格吧，进行社区调查。”

尼玛不知道什么是“社区调查”，他坐长途车到德格，在宗萨寺，一个满脸胡须的、粗粗的小个子与藏医洛热彭措用藏语摆龙门阵。尼玛觉得这小个子太厉

害了，有那么多话说，与人家聊得津津有味。

李晟之将这位“厉害人物”介绍给尼玛：“这是扎多老师，以前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你要跟他好好学。”

三十四 我的护身符呢？

藏人有谚语说“一百头犏牛上山吃草，只有一头阿郭掉头下山。”妈妈常说尼玛：“你就是那头‘阿郭’。”

犏牛是最好的牛，力大，奶多，而阿郭是母犏牛与公牦牛杂交所生，种劣，难养，产不了多少奶。

从少年到成年，尼玛一直很像那头顽劣的“阿郭”，往往偏离轨道，令人匪夷所思：他的顽劣百年不遇，让人以为有鬼附体；他一天打架六次，创了藏文中学记录；他成了第一个被校长鼓励谈恋爱的学生；他打喇嘛；他还比当地所有喇嘛都有名气。而且，他逃跑了——这一点毫不稀奇，许多藏族孩子渴望出逃——但他没有踩着先辈的脚印跑向拉萨，而是逃向另一个花花世界，那个跟佛的天国完全相反的方向——那地方很像地狱，有些藏人认为。

更糟糕的是，尽管他有那么多劣迹，他还上了大学！他会木雅藏语，在藏文中学学会了藏文和康巴藏语，他的汉语好于其他藏族同学，大学毕业时，他居然还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念完了大学，又石破天惊地娶一个汉族女人；这还不够，他还要留在藏区外的大城市。

2006年10月1日，在成都武侯祠附近一个藏餐厅里，尼玛与我盘腿坐在卡垫上，吃牛肉锅盔，喝奶茶，讲他的故事。武侯祠附近是成都的藏族人居住的区域，是尼玛最熟悉的地方。

我与扎多一起在宗萨寺调查，每天就是说说说，我也不知道扎多哪有那么多话，他能与当地人很快打成一片。我什么也不懂，就是听从扎多安排，记录，我也不知道记录了做什么用。

等我回到成都，李晟之已给我买了一台电脑，说：“你坐这里。”

我对着电脑发呆，不知道做什么。我看李晟之每天在电脑上写东西，不知道人家在写什么。我想看一下，又不好意思。

我就在办公室里晃，不知道做什么。同事们说笑话，我融不进去，我晚上看笑话书，第二天努力讲给他们听，但我说出来时，他们并不笑。

我不知道邮件是什么，人家演讲用PPT，我不懂。IBM笔记本中间有个红点，那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摸来摸去？我电脑老坏，但我不问同事，我不想表现得比他们差，我关机，等他们下班了，我打电话请朋友来，或花钱请电脑城的人来修，

结果全是小毛病。我连 QQ 也不敢上，其实办公室里气氛宽松，没人管我，但我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没人理解我那时候的压力。扎多在青海曾有一个助手志加，他对扎多说他压力很大，干不下去了。我对扎多说，我能体会志加那种压力。我们太不如别人了，我工作中的同伴全是北大的博士啊，博士是什么概念？我们系里的老师也只有一个博士。你一下子就与许多北大博士一起下乡，天下的知识，好像他们全懂，而我什么都不懂。

吃饭的时候，我面前是什么菜，我就一直吃那个，从来不会伸手去远处夹菜。我也特别忌讳在大馆子里吃饭，餐巾怎么放，用热毛巾擦脸之类，我什么也不懂。别人不信，你一个大学生，怎么会不知道？

我无聊到数办公室里有多少彩笔，做这些我感觉不错，毕竟数出来了。最有成就的时候，就是要开会了，大家商量买多少笔，我大声说：“哎，彩笔不用买了，红色的有 12 支，蓝色的还有 8 支。”说得清清楚楚，哈，扬眉吐气。

我一直郁闷着，在我的经历中这是空前的，那种痛苦无法形容，慢慢地，我感觉自己神经有问题，一到下午心情特别不好，拼命地回忆，是不是做错事了？不是同事给了我什么重任务，完全是因为自责，自我封闭。我晚上会突然惊醒，害怕早上迟到，三四点钟起来看表。

我快撑不住了，我观察自己，回忆，跟几个月前相比是不是有进步？如果看到一点进步，我就打气说，那再干两三个月吧。我从来不敢想成为正式员工。

李晟之有时叫我发传真，那是我最头痛的事，不知道怎么发。我们办公室有传真机，但我不问别人，我跑很远到武侯祠，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到小店里花钱请人发传真。我还不认识路，李晟之要我明天到哪里开会，结果我找不到。

我在成都上四年大学，哪儿也没去，就是在武侯区的藏人圈子里。

李晟之对我说：“尼玛，你要脱离武侯祠那个圈子。”

我特别想念以前的圈子，那里有许多朋友，在里面我说了算，我是大哥，可到了这里，我好像成了孤儿，好可怜。

我在赵佳家也不自在。她一定要我住到她家去，好照顾我，我就去了。他们家对我很好，但我自己谨慎，就像在单位一样。我不吃鱼和海鲜，他们就不做这些，但我感觉我是外人，人家越小心对我，我越这样。我与赵佳不免发生争执，因为我很敏感，老是觉得住到别人家里。赵佳说我小心眼，不像男子汉，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她特别激动，摇我：“你说话啊，你打我也可以啊。”她最怕我闷着不说话。

我要垮了，我腿上的肌肉发抖，头晕，经常被惊吓，连关门的声音都会把我吓一跳。我在办公室里压抑，在家里又得不到放松。

赵佳给了我很多力量，帮助我，关心我。她一年没找到好工作，也很难过，但她能帮我开解，在她面前我可以放松。

办公室的同事对我帮助很大，在那一年里，任何人都可以打击我，嘲笑我，但他们没有，他们给了我自由的空间。领导与我之间也不像是上下级，而是朋友，很平等。我慢慢地融入同事们，原来我是太神化了他们，所以对自己提的要求也过高。大家熟悉了，也就容易克服我的心理问题。

我再以同样的心态面对赵佳家人时，也缓解过来了。赵佳父母对我好，在他们眼里，我人品不错。在家乡，我也没受到预料中的压力，我原来认为他们不喜欢一个汉族媳妇，结果老乡们说：“你为民族大团结做了贡献，你是我们木雅人的第一个松赞干布，迎来了文成公主。”我们家乡五个乡，大约四五千人口，除了赵佳，

至今没一个汉族女人。

我在单位坚持下来了，如果我顶不住缩回去，我就没有成长，没有突破。一年以后单位在峨嵋山开会，北京办公室的领导吕植教授宣布说：“尼玛是正式员工了。”

这一刻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一直觉得自己太差了！大家欢迎我加入，我忽然觉得，哎，原来大家承认我啊，“保护国际”有那么多海归，那么多博士，那么多强人，要我干嘛？他们真需要一个数彩笔的人吗？是不是我也并不很差？是不是也有优秀的地方，自己却没有发现？

也许我最大的好处，是和每个人都合得来。我是单位里最好使唤的人，专家们愿意由我陪着出差。我每次出去，自己背上包，还要帮别人拿包，能拿多少拿多少。

我与其他同学相比也有很多优势：很多藏族同学不会普通话，我会；很多汉族同学不会藏语，我会；就是写报告吧，我在单位是最差的，但比起藏族同学们来，我算好的；我能跟所有的人打交道：汉族学者、藏人、老外。也许有些时候我不可替代。

大学毕业后的一年里，我整个视野和知识结构全是新的，就像洗过脑子一样。而且我很老实，当同事见我的时候，我正在变化：老老实实，埋头做事。他们不了解我过去的烂生活，不知道我过去是一匹劣马——前面就是悬崖我也飞跑过去，从不抬头。

我变化是因为长大了，还因为与赵佳的结合。她爱我，我就要珍惜，我有对她的责任。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毕业后我的好朋友们各奔前程：他们去了日喀则、乡城、阿里、中印边界，我们一起闹的生活，结束了。

他们走了我才知道，以前的生活错了。现在我不是大哥了，没人在旁边吹我了，我进入了正常的生活轨迹，生活环境变了。

这实际上是回归，物极必反。以前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藏族，他们走了，新来的全是汉族，包括同事、女朋友和她家人。这变化太大了，现在我唯一的藏族生活，是吃这样的藏餐。

“保护国际”改变了我，我要感谢它，它打开了我生命的新篇章，让我突破原来的壳，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突破之后，我的人生需要有个定位，要有个目标。我以前学任何东西都没有目标，包括学英语，只是刹那间的热情，而且拖拖拉拉。李晟之长期在藏区工作，他说：“你们两个藏族人，扎多和你，有同样的毛病，有事绝不立即去做，总要拖到明天。”

我和扎多分析，我们藏族人要是和日本人打持久战的话，肯定不行。如果我是团长，我手下全是藏兵，我一给他们打气，他们感情冲动，冲过去就拼了，但这一仗打败的话，藏族人接下来就是恐惧、失望、灰心，放弃战斗，不会像汉族人那样抗日战争打上八年。我们身边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特点。

但现在我要有计划地做些什么事了，有了新的人生目标，我有从心底迸发出的热情。

美国一个专家研究猫科动物，他到藏区来做田野调查，我当翻译和向导。离开办公室，不再看邮件，不再填表格，不再写报告，不再开会，我真是太舒服了！我可以帮专家做任何藏族农民、牧民打交道，我也跟他学了很多知识：各种猫科动物习性、栖息地环境、高原地貌、高山花卉、鸟类。他回美国后给同事们发一封信，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尼玛这样的人。“让尼玛坐在办公室里是一个悲

剧，给他松绑，给他一个野外项目以发挥他的才能。”

吕植老师说：“哎呀尼玛，你了不起啊，我们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专家。”

我在藏区的野外，感觉收获太大了，我又有了自信。我的工作还让我认识了很多了不起的人，比如扎多、嘎玛和仁青。

去年我和扎多，还有写天珠书的耿登去嘎玛家里，见到他一串天珠，其中最贵的一个值 190 万。他太太珍嘎有三串，可能值上千万。他们谈在藏区保护野生动物的事，我把嘎玛的天珠戴到脖子上，让人给我拍照：“一定拍下来，这是我人生的顶峰，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珍贵的东西！”

我的生活变化了，但不能说由一个坏人变成了好人。我现在不打架了，我学到了很多，我开阔了视野，我认识了很多了不起的人，这是好的；但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新的东西淹没了旧的东西，包括自己的信仰。

我工作的第一年没时间考虑我的信仰，只有无知感和恐惧感，后来心情放松了，我开始思考。

我在大学时与老外交朋友，跟他们学英语，参加他们的活动，比如扮演天主教里的人物。他们很热衷给我们讲天主教故事，一天一个藏族同学对我说：“太可怕了！我梦见了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觉得可怕是因为没梦到佛祖，却梦到了基督。

一个韩国老师喜欢传教，他甚至对我们说，如果哪个藏族人改信他的基督教，他给 15 万。

我对梦见基督的同学说：“那你去信啊，15 万呢。”

“你开玩笑！”他不高兴地说。

后来我突然明白，有些老外名义上教我们英语，实际是想动摇我们的信仰。

后来我很少去参加活动了，不能拒绝就敷衍一下。以前狂热学英语，见到老外很崇敬，包括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当我感到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后，就与他们保持距离。

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信仰不是那么坚不可摧了。我以前从没害怕信仰会动摇，在家乡时经常有宗教活动，我时常念经，唱六世达赖喇嘛的歌，我二哥是喇嘛，我就生长在佛教中——虽然我老是打架。可我现在害怕信仰会动摇，说明它已动摇了。

以前每天起床先要念经，现在做不到了，隔几天才念一次。我曾特意挂上一个护身符，我以前挂这个从来没丢过，可前几天在宾馆洗澡，摘下来就丢了。我以前为什么不丢？可见我的信仰有点失去平衡，有点变了。信仰已不是我内心深处的东西，我老是把它忘记。它好像在慢慢失去，可它跑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

幸好我喜欢这份工作。我现在有点得意的是，我在做对藏区有益的事，我虽然住在城市，身边全是汉人和外国人，但我没有离开藏族人，我在保护藏区的环境和文化，我在为我的民族做事。我为藏族人争取权益，我可以担当藏族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我经常到藏区出差，做神山圣湖保护，可以天天朝拜神山，可以天天朝拜寺庙。谁有我这样的机会？我的工作和信仰，紧密相连，我可以抓住我的信仰。

三十五 告别可可西里

尼玛就像炒锅里的一粒黄豆，成千上万粒黄豆慢慢变热时，他独自蹦起来，划出一个弧线跳出炒锅，跳出那个藏族社会。也许炒锅外并不像想像中美好，他甚至想跳回去，但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他望着外面的大千世界，兴奋，惶惑，还有一点悲伤。不管怎样，这个年轻藏人从古老的平稳轨道上跳出来，在创造历史。他也许只是跳出去的最初几颗“豆子”之一，但历史的炒锅在加热，越来越多的“豆子”将跳起来，虽然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2006年5月12日，在卡瓦格博下的西当村，我与跳着弦子舞的木梭告别，加入尼玛和扎多的队伍，直去拉萨。

我们乘坐的丰田越野随山路跳跃，如同身后村民们的舞步。扎多放了一盘音乐，《感动》忧伤的旋律一路伴随我们走到拉萨：

下康区大地一明点，至尊师教导声犹荡，

再难闻恩师妙法音，未拜见恩师心忧愁。

这是一首藏语歌，最近几年在藏区很流行，很多汉人也会唱，但没多少汉人知道歌词的含义，所以我请木梭翻译成汉语。木梭告诉我，他一听这首歌就会想到他和扎多共同的上师秋吉活佛，师父已经圆寂，歌声响起时，“再难闻恩师妙法音”，他心中充满哀伤。

青海的秋吉活佛对宗教界的不法行为批评激烈，特别对一些大活佛不留情面，认为有些活佛本该利益众生，却一个个热衷名利，作威作福。他持戒甚严，威望素著，不管是大活佛还是信众，对其十分敬畏。

木梭初次拜见秋吉活佛时，心中惴惴，知道喇嘛们都怕这位大活佛。秋吉活佛请他进去单独见面，木梭入得门来，还没跪拜，却见秋吉活佛对他将头低下，两手献上，十分恭敬地行礼。木梭吓得毛发直竖，“扑通”跪倒。后来才知，秋吉活佛虽对那些尊贵的大喇嘛铁面无情，对普通信众却慈悲有加，恭敬异常。

秋吉活佛生前对信众和非信徒一视同仁，他曾有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同一个真正的比丘。”1994年2月初，索南达杰的遗体从可可西里运回玉树后，县政府先将其恭送到寺院，后又进行只有圆寂高僧才有资格的火葬。索南达杰身上覆盖党旗，两位武警战士伫立两侧为他守灵，上千盏酥油灯点燃。秋吉活佛主持葬礼，400位喇嘛诵经三天三夜，超度烈士亡灵。索加乡许多牧民赶来为索书记送行。

当秋吉活佛为这位共产党员超度时，扎多正凄苦地站在可可西里边缘。是他领着公安重回可可西里找到索南达杰的遗体，那已是索南达杰遇难十天以后，他依然匍匐在地，紧握手枪，怒目圆睁。

县委书记被杀，公安部成立专案组，公安部长陶驷驹任组长。索南达杰牺牲时，同事靳炎祖和韩伟林被盗猎者绑在吉普车里，后来伺机解开束缚逃走了。青海省公安厅审讯所有涉案人员，扎多和靳炎祖属于西部工委干部，待遇稍好，虽然失去自由，但可以住招待所。而韩伟林等西部工委雇的向导、司机被关进看守

所，境况悲惨。

扎多被排除怀疑后又赴五道梁，仍握着索南达杰送他的77式手枪。公安人员在那里设了卡子检查来往车辆，但凶手无影无踪。公安并非一无所获，过往行人如没有身份证就罚款50元，还有人把索南达杰缴获的藏羚羊皮私分。

虽然被排除了怀疑，扎多仍感到人们不信任的目光，他悲伤、绝望而愤怒。他不知道，这时妻子博雷比他更糟，几乎要疯了。

因为没有电话，县里起初以为西部工委的人都死了。扎多两个女儿在街上玩耍，一个老太太走过，叹着气说：“唉，可怜的孩子！这么小就没父亲了。”

女儿告诉了妈妈，博雷大骇，哭着去问县政府，政府人员说“没事没事”，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知道。

后来县上的领导来家里慰问，捧着哈达，提着茶叶。博雷以为这是来慰问死者家属，害怕得发抖。政府的人讲：“只是索书记没了。”博雷不信，直到秋吉活佛来说：“没事，扎多在呢。”博雷才知道丈夫没死。可他既没死，为什么不回家？她不知道丈夫去了哪里。

没人愿跟博雷说话，“你那个丈夫，不是好人。”甚至有人这样说。去可可西里的只有索南达杰和扎多两个藏族人，为什么一个牺牲了，一个却好端端地活着？

有人用粉笔在电影院厕所墙上写：“扎多是治多人的叛徒！”博雷见了，又气又伤心，掉头就走。

扎多一下子从受人尊敬的“扎老师”、“扎秘书”变成了治多人的耻辱，甚至有人当众捏造他的谣言，一个去接索南达杰遗体的人回到治多，扎多的朋友文扎问：“扎多呢？”

“他被抓走了，”此人道，“我还说‘别拉走，别拉走，’但公安不听，还是铐上拉走了。”

自从文扎和扎多离开中学，扎多进了可可西里，文扎运气不错，进了县委组织部。他和在农业银行的朋友亚卓托人给扎多捎去一瓶白酒，扎多收到酒，知道朋友惦念他，心中才得到些许安慰。

博雷在惊恐忧虑中等着丈夫回来，一天夜里3点钟，她听到房外汽车响，急忙打开门，那一幕她永远忘不了：她的丈夫穿着黄大衣站在门外，没有帽子，光着头，满脸胡子，眼神呆滞，似乎是傻了，又像是害怕，好可怜的扎多！博雷一下将丈夫抱住，痛哭起来。

将丈夫拉进屋子，博雷一边哭一边给丈夫打奶茶。扎多两个脸颊通红，不停咳嗽，那是急性肺炎的征兆。博雷哭着抱他，扎多蔫蔫的，不怎么说话，似乎没了感觉。她不知道，丈夫的心思还停留在可可西里，想着索南达杰。

随后数月，博雷仍惊魂不定，夜里听到汽车声就翻身而起，时刻迎接丈夫回来，等清醒过来，才想起丈夫就睡在身边。

很快过藏历新年了，因为索南达杰的去世，许多人家连年都不过了，治多县一片哀伤。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来找扎多，希望再进一次可可西里，找寻索南达杰的遗物。扎巴多杰原是治多公安局长和检察长，时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县政府支持成立了车队，扎多带路，他们到五道梁时正是藏历新年。

那些守金矿的人还在，只是除了扎多一个笔记本的皮子，其他资料全被他们毁掉。索南达杰原来戴着太太的手表，后来遗体上没有发现。在索南达杰牺牲的地方，扎多找到了自己的毛巾。他们曾带着两瓶白酒，在山梁上喝了一瓶，这里找到了另一瓶的碎片。西部工委的吉普车上有好几个枪眼，但车上的录音机被拆

掉了，后来发现装在一个盗猎者的车上。所有人都趁机捞一把。

扎多回到治多没多久就患了急性肺炎，博雷照顾两个女儿，他一人去医院打针，医生护士对他爱搭不理，他给火炉加上牛粪，点滴还没打完，牛粪就灭了，如同他那颗黯然的心，慢慢变成灰烬。他骑自行车回家，身体虚弱得一公里都骑不下来，中途必须到亚卓家喝碗茶，才能鼓起劲回到家里。厕所的墙上仍然写着“扎多是治多人的叛徒”，很多人认为，他和索书记一起去可可西里，却没有保护好索书记，不管以什么理由活着都不可原谅。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1月18日夜里发生了什么，扎多到底在哪里。

县长问扎多：“还没入党吗？”

“没有。”

“唉呀，你不是党员，”县长叹口气说，“如果你是党员，可以顶替索书记的位子——准备任命你为可可西里经济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扎多去问秋吉活佛，活佛说：“不要再去了。”

“我不去了，再也不去了。”扎多对县长说，“让我当书记我也不去了，功过是非你们看吧。”

可可西里把扎多的魂魄都已吓掉，他在那里失去了老师，回到治多，他又成为最卑贱的人，无论如何，他绝不再去那悲惨之地，秋吉活佛的话坚定了他的决心。

扎巴多杰成立了“野牦牛队”，许多热血沸腾的志愿者加入，他们都是索南达杰的追随者。扎巴多杰希望扎多加盟，扎多拒绝了。

几年后，“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艰苦卓绝的故事震惊了中国人，但1998年底，扎巴多杰在家中中弹身亡，原因不详，后“野牦牛队”解散。嘎玛当时听说了“野牦牛队”的故事，十分崇敬，与朋友在北京将“野牦牛队”注册成商标保护起来，后终于等到“野牦牛队”重建时，又将商标还回去。但“野牦牛队”队员最终星流云散。

病好后，扎多与文扎去索加乡整理索南达杰的事迹，亚卓所在的银行出了3000元钱，扎多与文扎又各家各户募捐，终于凑了一笔钱，到西宁印刷一本索南达杰事迹的小册子《巍巍忠魂》。

青海省这期间轰轰烈烈学习索南达杰事迹，县委书记找扎多说：“你自己挑个单位。”

“宣传部，”扎多说，“我要宣传索书记的事迹。”索南达杰之死确定了扎多一生的方向。

1995年春天，扎多与亚卓到西宁印刷《巍巍忠魂》，忽有一天一位名为郭碧川的演员找上门来，他曾演过《红牡丹》的男主角。他在北京的麦当劳看《南方周末》，读到文章《县委书记血洒可可西里》，起初还以为一个县委书记死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呢，看完报道，大感兴趣，想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扎多像是遇到了真神。他背着两捆索南达杰写的报告和文章来到西宁，曾交到一些记者手里，但很少人感兴趣。他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索南达杰，但毫无门路，忽然有个拍电影的机会，他要抓住！扎多没完没了地给郭碧川讲索南达杰的故事，郭碧川与他一样激动，听得来神，整夜不睡，二人开始编剧本，并确定郭演索南达杰，扎多演自己。

玉树州委宣传部为拍电影出了20万，治多县的娃娃们走到六公里外的山口，唱歌跳舞地把摄制组迎进来。

博雷已有七个月的身孕，但身体不好，扎多在可可西里时，她忧劳成疾，一直没养好。1995年8月4日，她肚痛得厉害，快到半夜，扎多才摇摇晃晃回家，倒头便睡。他太累了，既是演员，又是编剧，还负责摄制组的行政事务，向牧民借一件藏装，都需要他出面。

第二天早上，扎多将博雷送到县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双胞胎，两个男孩儿。”

夫妻二人又惊又喜，但医生警告说可能要早产，需住院保胎。

扎多忙于拍电影，无法照顾妻子：“博雷，我照顾不了你，为了索书记，我今年只能拼上了。”他每天半夜回到医院，躺在陪护床上便呼呼睡去，梦中见到的不是儿子，而是那部名为《杰桑·索南达杰》的电影。

博雷身体越来越糟，有人建议她去西宁医院，否则母子有危险。但整个摄制组在等着扎多，他不能离开。没有丈夫陪伴，博雷不想孤零零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扎多也不愿博雷一人离开。他想到母亲离开他时的情景：她被两头犏牛驮着，慢慢离去，母亲抬起身向儿子招手，远远地看不见了……扎多从此再没有母亲了。

9月2日深夜，第一个儿子生下来，哭声响亮，扎多喜笑颜开，小心抱在怀里，两个小时后弟弟又出世了。几个小时后，突然发现两个孩子气息微弱，医生急忙抢救。

但在这个海拔4200米的高原小镇，医疗条件落后内地城市几十年。两天后，两个男孩儿还没看清父母的脸，就在父亲怀里一个接一个没了呼吸。

博雷哭得气息奄奄，从此不敢见到黑夜。县城没有电，她把手电筒挂在床顶上，像月亮一样一直照着她，等电耗尽了，她一个人静悄悄地出门，顺尼洽河一直往上游走，她想走到那远远的高山上，远离黑暗，看到太阳升起。

扎多木然把两个儿子送到天葬台，博雷的哭声像针，一针针扎在他心上：“如果不是你这样的父亲，孩子不会死！”

三十六 索加“胡子帮”

索加有个“胡子帮”，帮众有三人：扎多、扎西与文扎。此三人或出生于索加，或在索加为官。索南达杰去世后，三人发誓实现索南达杰遗愿，振兴这蛮荒之地。他们自以为有鸿鹄之志，处处以索南达杰为榜样，桀骜不驯，几乎令索加乡回到索南达杰时代，人称“索加人民共和国”。此三人是亲密无间的好友，都留满脸大胡子，人送外号“胡子帮”。三人觉得这个词不坏，咧嘴抚须，洋洋自得。

三人在县民族中学改革失败，扎多、文扎愤而出走。扎多投奔了索南达杰，文扎想当官，因与组织部长是熟人，文才又好，便进了组织部。扎西无法保护两位好友，一怒辞去副校长职务以示抗议，包了一个班埋头教书，三年后校长调走，教育局任命他为校长。

文扎运气不错，被新旧两任组织部长赏识，老想提拔他，可他连党员也不是，真是无从拔起。索南达杰牺牲后，文扎与扎多搜集索南达杰的事迹，时时被感动得哭泣，决心加入索南达杰那个党。

果然是“进了组织部，年年有进步”，文扎1994年入党，1995年提拔为副科，他要求去索加，跟着索南达杰的脚步走，于是当年11月被派往索加乡任党委书记，一直到1998年。他要学索南达杰那样为家乡做事，于是在治多县城办了汽修厂，那是治多县第一个乡镇企业。他又办了扶贫股份合作社，让那些贫穷老乡入股。老乡的一只羊就是一股，然后从政府申请扶贫基金，发展种羊场。

索加依然交通不便，有年夏天，他开着一辆破吉普从县城赶往索加，汽车随时陷入泥潭，他随陷随挖，一直走了28天。恶劣的条件没有浇灭他的热情，当他把索加乡交给下一任扎多时，索加乡政府资产已由一千元变为一百万——当然没有现金，是牛羊和工厂。

“胡子帮”中，扎西老成持重，文扎热情冲动，扎多居于中间。文扎因为执掌索加大权，少年得志，愈加飞扬跳脱。全县开会，六乡书记轮流汇报，其他书记顶多初中毕业，稿子几乎念不成句，而文扎的报告文采斐然，甚至加上诗词歌赋，赢得县委书记表扬，大出风头。

文扎越发得意，根本不在乎同僚冷冷的眼光，扎西和扎多比他冷静，在一旁提醒：“注意，注意……”可他像一头胜利的野牦牛，要他藏起两只骄傲的犄角，绝无可能。

扎多此时已是县委党校副校长，第一次当了“官”。党校有一排房，几个干部家属天天坐那里晒太阳——房顶有个窟窿，太阳很暖和地照进来。如果某天下雨，党校便成了水帘洞。

扎校长装模作样上了几天班，便脱产去西宁上省委党校，那是扎多一直梦寐以求的大学。现在，扎校长在心里说：“可可西里，拜拜了！我要学历，我要当官，我要奔前程了！”

扎多读经济管理专业，两年可拿本科学历。到了党校他才发现，原来学员的主要任务是喝酒，混入各种官员圈子。他像索南达杰一样不习惯这种生活，还是傻傻地去图书馆。他找到一本薄薄的《生态经济学》，把这本书读得稀烂。书里提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波尔丁提出“生态经济”概念，以宇宙飞船比喻地球经济的发展，他认为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而生存，最终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唯一能使飞船延长

寿命的方法，是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尽量少排出废物。

扎多读这本书时，心里总想着他的家乡，那个他在母亲注视下骄傲地放牛的索加草原，养活他这个孤儿的一项项帐篷，高高耸立的白色神山嘎瓦拉孜，夕阳下闪着万道金光的通天河……想着疾病抢去母亲，雪灾毁坏一切。索南达杰常读的两本书一直跳在他眼前：先是《工业矿产手册》，后是《濒危动物名录》。为什么索书记的思维跳跃那么大，他在想什么？

他忽然想到，他要把家乡建成一个从未有过的地方：生态没有破坏，经济得到发展——一个环长江源生态经济综合示范区。扎多还梦想搞生态旅游：他要做一只船，载乘客从长江源头沱沱河漂下来，船上的医生沿路给村民看病，船的名字叫“波尔多”——那个提出生态经济概念的外国人。

他被自己的梦想吓了一跳，那不是当官，不是走“正道”，那就是索书记的梦想，那又是踩着索南达杰的步子走，只不过，他要比索南达杰走得更远。

扎多告诫自己说：“不能这样，我要走正道了，我毕业后要弄个官当当，忘掉可可西里。”

晚上他做了一个梦：索南达杰回来了，身体很虚弱，好像魂魄不在身上。他向扎多轻轻招手：“走，跟我回可可西里。”扎多不想去，可不敢不答应，怕伤了索书记的心。他想对大哥一样对索南达杰说：“我们都别去那鬼地方了吧……”但噤着说不出口，焦灼间猛得惊醒，一身冷汗。

1998年，扎多要毕业了，他的毕业论文就是论证那个“生态经济示范区”。他把成立一个组织的主意告诉了文扎和扎西，文扎激动得跳起来，立即风风火火地张罗。

1998年5月26日，“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成立，成员除了“胡子帮”三人，还有索南达杰的弟弟和妹妹。扎多没想到，这是藏族人在青藏高原上创立的第一个非政府环境组织。历史开了个小玩笑：第一个非政府环境组织，由三个政府公务员创立。

扎多毕业回到治多，要挽起袖子大干一场。正逢青海南部地区救灾汇报会召开，文扎要做报告，扎多建议文扎讲环境保护。其他的乡党委书记还是老样子的报告，让人昏昏欲睡，文扎一开言，全场震动，连州长都认识他了，称他“那个索加的大胡子。”很快风传他要给州长做秘书，实际上连秘书培训班都参加了，但再无下文。他只知道出风头、做实事，哪有什么“政治智慧”。

“胡子帮”的三个人都是孤儿，没有父亲，没有叔叔，从来没人管束，即使成了县里的大人物——乡党委书记、党校校长和中学校长，仍鼻孔朝天，我行我素。除了本性如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索南达杰就是这样的人。政府开会时，他们从来不会奉承说“报告科学地总结了什么什么”，他们总是找问题，最后找来找去，给自己找来麻烦。

文扎在索加干满三年换届，他与扎多商量，让扎多也来索加，扎多做书记也好，做乡长也好，两人搭档做出一番大事业。扎多刚党校毕业，以前表现也不错，肯定是要提拔的，他怕把自己派到别的乡去，便去找组织部长和县委书记，书记很认可他办促进会和示范区的想法。

但文扎得罪人太多，以至于有谣传说，文扎威胁组织部，如果扎多不去索加，他就撂挑子不干了。随后的县委常委会议上，有人说扎多与文扎是亲戚，不适合一起工作。两人的确是远亲，但远得像长江的首尾两端。不管怎样，文扎被调回县委办公室当副主任，专门编县志，从炙手可热的人物变成坐冷板凳的。他从此埋头研究学术，读了青海民院的在职研究生，毕业论文是《长江源头民间文学探

幽》，并整理出版了两本有关格萨尔的书，其中一本是《嘉洛婚礼》，讲述格萨尔与珠牡在治多的婚礼。他还与扎西合写了一本玉树史书。

扎多则雄心万丈，挺进索加。

在西宁时，他认识了加拿大人马克，马克是一位生物学博士，成立了民间组织“起步高原”，为高原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扎多作为书记第一次进入索加，便带着马克介绍的几位荷兰和英国医生。扎多知道，牧人最缺的是医疗，他的母亲当年便因此去世。20多年后，索加的医疗服务没有多大进步。

扎多虽有心理准备，但牧民的身体状况还是令他震惊：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病人。牧民们骑马而来，排队在医生面前，直到半夜。乡亲的病痛让扎多确定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他通过一家荷兰机构申请了一套医疗设备，给索加的孩子种疫苗。在此之前，这些孩子只是凭运气抵抗着索加恶劣的环境与病毒。扎多又带人挖了一个地下室，这样药品不会冻坏——索加的冬天温度可达摄氏零下40度。产床也有了，只是需要培训医生。在索加，人们对新生命来临甚至和对死亡一样恐惧——许多产妇和婴儿死于分娩。

扎多召开了上任后第一个大会。他坐在台上，背后是一个国徽，国徽左右各有五面红旗。扎书记没穿西装，他着一身红色的野外服。牧民领袖们齐齐坐在台下，他们来自这个乡的四个村：莫曲、牙曲、当曲和君曲，这是通天河南源的四大河流，四个村子驻于河边，在文革中，这四个村子分别改名为“八一”、“反帝”、“向阳”和“永红”。文革结束后，人们不再“反帝”，重新尊敬起自己的土地与河流。

“扎书记好！”一位老人客气地向他招呼。

扎多心里“咯登”一下。那是他的莫曲三队老队长，他孤儿时曾得到他的照顾。莫曲一位乡人也向他恭敬地寒暄：“扎书记！”扎多心里又一酸。那是他小时候的玩伴，他经常到玩伴家里蹭饭。他扎多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虽然没有家，可一直把整个索加当成家，他今天回家了，人们却对他敬而远之，他似乎再难进入那些恩人的帐篷和心灵。

扎多问：“我们索加怎么办？谁是索加的主要依靠力量？”

那位老书记说：“乡党委！”

“你们不把我当自己人了。”扎多心想。

“是吗？”他问，“以我这个乡党委书记来说吧，什么是我的第一目标？我想的是，我来干上两年就提拔了，当个副县长什么的。解决你们的发展，不是我的第一目标。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依靠的力量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别人都要走，你们却一直生活在这里！”

“扎多，”牧人们说，“我们索加到底怎么办？”他们不再称“扎书记”。

扎多重新有了索加儿子的感觉。

玉树是青海省最偏远贫穷的一个州，治多是玉树州最偏远贫穷的县，尽管如此，与西部索加乡相比，贫穷的治多东部人仍有优越感，他们蔑称索加是“旱獭和野驴之地”，意指不是人住的地方。这里没有医疗，没有公路，当然更没有电。索加被莫曲、牙曲、当曲、君曲四大河流隔成网状，每年有一半时间被水流阻隔，与外界失去联系。新闻上经常出现的“玉树雪灾”，其实不是整个玉树，只是包括索加在内的几个乡。

“我们这个鬼地方，没办法了。”一个书记说。

“野驴和旱獭就是我们的特色，”扎多说，“我们没有矿产，没有虫草，畜产品运不出去，所以我们索加——包括可可西里，唯一的特色是野生动物。”

索加野生动物很多，藏羚羊、雪豹、藏野驴、黑颈鹤等别处难得一见的珍稀野生动物，这里毫不稀罕。扎多说：“索加人可以像非洲一样成立野生动物园。国家不关注我们人，却可能关注野生动物，等要管动物的时候，就顺便管我们了。我们把索加保护好了，将来国家成立自然保护区，会投资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再说，索书记就是为保护藏羚羊牺牲的，我们要接着做他的事。”

乡人信任扎多，更崇敬索南达杰，于是全体通过，成立“索加生态保护委员会”，四个村便是四个自然保护区，十六个生产队队长是生态监护员。

2000年8月，国家级“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直到今天，索加的老乡还以为这个巨大的保护区是扎多搞起来的，他们不知道，扎多只是走在前头而已。

扎多的下一个目标是教育。包产到户后各村取消了帐篷小学，大多数孩子无学可上。扎多当书记后，全乡三四百个孩子，能克服恶劣环境到乡小学读书的只有18个。各村的帐篷小学曾培养了一代人，包括索南达杰、扎多、扎西和文扎，可更年轻的一代大多是文盲。牙曲老支书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上学，到县城连厕所都找不到。“我有罪啊，”这位老支书说，“我们应该办学校，可我们穷得连帐篷也没有。”

“管他呢，”扎多说，“先办起来，我来借帐篷。”

其实他没有什么办法，跟领导套套近乎，拿点上级政府的钱，他没这个本事，他只有想到他的“胡子帮”朋友——扎西和文扎。他们通过县教育局联系到国外一家儿童基金会，买了帐篷，老乡们送来锅碗瓢盆。牙曲的80多个孩子尖叫着奔向学校。在20年之后，索加人的帐篷里重新响起读书声。

扎多带几个外国人去考察学校，希望他们以后能支持这些孩子，但大雪将他们困在了索加。扎多给县委书记打电话求援：“书记，我在索加，这里雪灾了。”

“胡说！”书记说，“你在索加，怎么能打通电话？”他有理由不信，索加那鬼地方如果有电话，就像UFO停在他头上一样不可信。

“这是老外的卫星电话，我带他们来帮助孩子上学，可遇到雪灾出不去了。”

“老外要是有三长两短，你负完全责任！”书记说。

没有人来救助，两天后一个副县长有事来索加——可不是来救扎多——告诉扎多：“县里开会点了你的名，说你无组织无纪律，犯了严重错误。”

扎多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咬紧了牙。他想起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的两年里，无人救助他，直至孤独地死去。

他忽然明白，在这个体制内，他做不到他所希望的，他更寄望于那个体制外的“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

“促进会”比扎多的政府更有效率。扎西以权谋私，在民族中学为促进会提供一间破旧的办公室，挂上一个更易让人理解的牌子：“杰桑·索南达杰环境教育中心”，并在民族中学加入环境教育课。这在青藏高原也是第一次。

“胡子帮”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是在环境组织“自然之友”和“起步高原”的帮助下，培训青藏高原中小学教师。在青海贵德县的一个小招待所里，30个藏族老师团团围坐，等着开课。扎多走上讲台，好长时间说不出话，他心里火烫烫的，翻来滚去对一个人喃喃说道：“你看，我们分手后，我没有当逃兵，我跟着你的脚步走，现在我办成了！这是星星之火，我在影响整个青藏高原，你看到了吗？”

人们怔怔地看着他，他说：“大家好……”话未说完，两行眼泪忽地涌出，哽咽起来。

只有文扎和扎西明白，他的眼泪为谁而流。

三十七 我的草原我的家

2006年6月16日，我与扎多从成都出发，我们要穿过四川阿坝藏区，再经甘肃甘南藏区，到达西宁，然后再赴玉树高原，抵可可西里边缘的索加，去扎多家乡。

穿过川北广阔平坦的草原，第二天翻过一座山后进入甘肃贡巴村，公路将村子一分为二。这里海拔约3400米，虽然头上太阳毒辣，风却冷嗖嗖的。川北和甘南的草原连在一起，但一进入甘肃，文化氛围大为不同，许多藏族小伙子身着藏袍，围着穆斯林式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骑着摩托车在短得像围巾一样的小街上，“轰轰”声中，倏忽来去。

他们本是赛马好手，现在将骑马的本领移植到摩托车上，故意在大街上晃来晃去，不时做出摩托车比赛的拐弯动作，“吱——”尖厉的刹车声令小村充满狂躁气息。

一位小伙子骑着马走在街上，迎面碰到一位骑摩托车的朋友，两人停下，他不下马，对方也不下车，车头对马头谈了一会儿，各自扬长而去。

在远处山脚的草原上，几个藏族男孩儿纵马而过，他们“啊啊”叫着，挥着马鞭，将一根根电线杆扔在身后。不知道他们还能在马背上飞驰多久，他们的家乡已被一条宽阔的公路一撕两半，传统的生活方式，已被这条“主流道路”抛在一边。

很快进入青海，傍晚行至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吾屯下寺。这里有一座华美庄严的佛塔，上面的佛像画得非常精美。附近区域古称“热贡”，其唐卡艺术在藏区最有名气，因此称为“热贡艺术之乡”，我们那位还俗的画家朋友耿登就是在这里长大。

扎多将车停在吾屯下寺门口，下车围着佛塔转经。几位喇嘛围上来看他那辆车，车身上用藏语写着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标语：“每个生命都希望鲜活地活着。”这是释迦牟尼的话。

一位60来岁的老喇嘛问扎多：“你是玉树的还是果洛的？”

“玉树的。”

“那你知道杰桑·索南达杰吗？他是保护野生动物的。”

“我是他的秘书。”

老喇嘛微笑了，轻轻点头。彼此心领神会，不必多说一句话。

告别喇嘛们，我们继续顺黄河前行，很快到达化隆县群科镇。杀害索南达杰的盗猎者就是这个镇上的人，12年后，有些人仍未抓获。

“当年我走到这里很害怕，我不认识他们，可他们可能认识我。”扎多说。

扎多说，这里汉藏回杂聚区，安多藏民宗教观念很重，而玉树的很多藏民没那么虔诚。玉树一位老民兵队长曾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送他一支枪。他积极宣传政策，不信佛教，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藏民们不接受，在他们看来，一对夫妻生多少孩子是天定：“如果我能生八个，你却只让我生两个，岂不是害了六条性命？”

但这位老党员有他的办法：“你们多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一生要吃多少牛羊，杀死多少生命？你们少生一个，就可以救许多生命。”

藏民们一听，的确有些道理。发生大雪灾时，他领着政府来救济，这时更有

话可说了：“瞧，你们没吃的了，谁来了？是我们政府，你们的活佛怎么不来？等天暖和了，草青了，牛羊肥了，你们的活佛们才来呢。”

藏民们也无话可说。

我们谈谈笑笑间到了西宁，在此休整几日，6月22日从西宁出发赴玉树。一位十八岁的小活佛依希诺尔布搭我们的车。这小子面庞饱满，丹凤眼，高鼻梁，长得极为俊朗。他在果洛州达日县的年毛寺出家，家是玉树州的曲麻莱县，曾读到初三，所以会说汉语，但并不流利。扎多去给博雷的父母买药，我和小活佛站在西宁的街上等他。

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过来，向我伸出右手说：“我是山东菏泽来打工的，没找到亲戚，请行行好给点钱，让我和爱人买点吃的吧。”

他的确是山东口音，但“爱人”这个词，显然我那些山东农村老乡说不出口。我犹豫一下，掏出十块钱给他。

小活佛满面笑容，向我两手合什道：“谢谢你。”

“其实我怀疑他是骗子，但万一不是骗子，真的急需帮助呢？”我说。

小活佛说：“万事总有因果的，你做好事就有好报。”

我问：“你的寺院生活怎么样？”

“我不喜欢这样的城市，回到寺院我感觉特别好。我还在学习，学好了就可以帮助别人——我想对你讲一讲经。”他说。

“好，好！”我连忙答应。

他闭目垂首，想了大约十秒钟，抬起头来说：“佛教说，生命总是轮回，凡事都有因果。如果做了好事，就能得到好报。”

他还讲了一些，但我没有听清，他的汉语不足以表达如此复杂的问题，他不好意思地对我一笑。

他给我留下地址，还有QQ号，“有时候我会上网。”他说。他的QQ名字是“雪山使者”。

我们驱车十几个小时，翻过巴颜喀拉山顶，便从果洛州到了玉树州。这里平均海拔约4000米，但见满山草地青翠，却没有一棵树。快到结古镇，山路一路往下，海拔渐渐降低，公路边和河边出现了细细的杨树。过了通天河大桥，就见一条清澈的河向东注入浑浊的通天河。顺小河逆流而上30多公里，就是结古镇。河边青青杨树在明朗阳光的照射下，让山谷生机勃勃。整整一百年前，珍嘎的爷爷、十三世拉江贡活佛在这里种下第一棵白杨。

接近结古镇时，先看到结古寺耸立在高高的山崖。进入市区，但见尘土飞扬，街道肮脏。建筑既非汉式，也非藏式，不伦不类。我们进入一个藏医孤儿学校，这个学校由英国的阿贡活佛所办，当地校长是三江源协会的副会长，为协会提供了一个大教室作为办公室，目前扎多是这个环保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当然，他还兼着“胡子帮”那个协会的会长。

两个美国来的志愿者等着扎多，这母女二人是嘎玛的朋友，她们对藏区的环境保护感兴趣，就在嘎玛的安排下来这里志愿服务。

扎多寒暄两句，向她们介绍他所做的事：

“我们倡导什么？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世上有三极：南极、北极和第三极青藏高原，是环境最恶劣的地方，但南北极没人，土著藏族人能世代生活在第三极，说明我们的文化与自然是和谐的，否则我们藏族人早就不存在了。

“现在中国的自然保护是从国外学回来的，比如建自然保护区，把居民赶出

去。但我们藏族不是这样，我们有人居住的地方，环境保护得好：没藏人的地方，比如可可西里，藏羚羊就不断被杀。

“我们要用藏族文化来保护自然，但并不排斥现代的保护方式，也用法律，也依靠政府，但藏族文化是基础。但尴尬的是，有些官员不这样想，科学家也不这样想，我原来有一个朋友马克是加拿大人，生物学博士，他就不喜欢我们的保护方式，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说‘你们这是宗教，不是保护。’我们就无法合作了。

“政府的保护方式是建机构，派警察，将老百姓迁出来。但我们想在藏人生活圈中建立保护区，让藏人而不是警察来保护环境。”

门开了，一个穿红上衣的年轻女人进来，这便是嘎玛的妻子珍嘎。珍嘎坐到我身边，一笑，牙齿亮闪闪的，原来戴着牙套。

扎多介绍完工作已是晚上9点，珍嘎请我们去吃干锅鱼。我问她：“你跟嘎玛刚见面的时候，他买你家的天珠，被你拦了下来，后来那颗天珠怎么样了？”

“嘎玛买了其他天珠，价钱给的不错，我们亲戚都说‘这个买卖，你们家赢了’。其实最后是他赢了！他把这家人的姑娘娶过去，天珠自然就陪嫁了嘛。”珍嘎大笑道。

在治多县城扎多家里住过两天之后，我们一早出发去索加，同行的还有扎多妻子博雷和女儿尕松卓玛。16岁的尕松卓玛与14岁的妹妹德庆卓玛在北京读华夏女子中学。不管是车里还是车外，博雷仍习惯性地戴着白口罩，尕松卓玛也受妈妈影响，戴着花格口罩。

我们行驶在广阔无际的草原，那里高高低低开出来一条路，没有水泥，没有柏油，只是土和泥，在晨雾下茫茫地伸向远方。巨大的彩虹悬挂在前，似乎伸手可及。晨雾慢慢散去，广阔的天地间只有三种颜色：青色的草、红色的土与山和蓝蓝的天空。草绿得辽阔，土与山红得雄浑，天蓝得深邃，这三色将索加草原渲染得瑰丽神奇。

翻过一座座山，七个小时后我们听到藏獒“汪汪”的吠声，见路边高高的山坡上有一顶孤零零的白帐篷。扎多一家人爬上山坡，面前四只戴红项圈的藏獒拴在木桩子上，其中两只洋洋不睬，另两只明知咬不到，却装腔作势奋勇前扑。扎多瞪了它们一眼，做个鬼脸。

一个50多岁的女人迎出帐篷，与扎多一家行碰头礼，那是扎多的表姐。不一会儿，两匹马从远处奋蹄赶来，是扎多的表哥父子到了。

这便是当年莫曲二队收留孤儿扎多的那家人，在这家老太太帮助下，扎多上了索加小学。老太太已去世，她的女儿和儿子便是今天的表姐表哥。后来扎多才知老太太当年为什么收留他，妈妈被犏牛驮着去玉树医院，经过此地时，请求老太太说：“这孩子没父亲，我要是回不来了，请你照顾这个可怜的孩子。”

我们喝着一杯杯不断添满的奶茶，坐在帐篷外晒太阳聊天。扎多的表哥一直在此放牧，但现在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一是草场沙化日益严重，二是狼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狂，大白天就冲入羊群。眼看着狼往羊群里冲，牧人也冲过去，人不怕狼，狼也不怕人，谁先冲到羊群谁就赢了。

但赢得多的往往是狼，因为牧民枪支被收缴，没有对付狼的手段，2006年上半年，狼咬死扎多表哥二十多只羊、两匹马，还有六只牛犊。就在我们到的前一天，表姐还看见河边有三只狼在游荡，它们的目标是这里的羊群。

扎多表哥除了经营自家的牧场，还为莫曲小学看护牧场，那是学校孩子们的生活来源。

我们继续往大山深处开拔，一个有几间砖瓦房的院落出现在遥远的山脚。前面是沼泽路，汽车怕陷进去，开走去转远路，我们下车在沼泽地里步行。沼泽地的水被一簇簇草皮分割，整个沼泽地像一张硕大无比的棋盘，我们从一处草皮跳到另一处草皮，就像几颗棋子跳个不停，经过一处天葬台后，到达学校。

我听一个女孩子清脆的歌声响在山间：

“雪域高原是藏族人的家园，

山下牛羊成群，

那是我们的牧场。”

唱歌的是11岁的才仁永藏，她个子小小，身穿一件绿外套，一个穿牛仔装的12岁小姑娘为她弹着吉他。40多个孩子在草地上围成一圈，和着她的歌声，踏脚拍手，尽情舞蹈。现在是假期，大部分孩子回家了，这些孩子还在等着父亲来接。

我从未见过如此广阔的舞台：在海拔4800米的草原上，除了四周耸立的高山，天地间空旷无物，似乎专为孩子们的歌声和舞蹈而设。

这个小学名为“香青达杰”，“香青”是指此处地名，“达杰”指索南达杰，此地便是索南达杰的家乡。“胡子帮”2000年创建这个小学时，文扎为学校命名。

一面五星红旗在操场中央飘扬，下面一个木架上挂着上百斤牛肉，用一块白布挡住阳光，那样既能风干，又不会晒热，可以吃上十天半月。牛肉架旁边，两个孩子对踢练习射门，一只矿泉水瓶子被他俩踢来踢去，“噼啪”作响。一辆破吉普车停在院子里，四个女孩子在上面爬上爬下，校长孟德冲出门向她们一声吼叫，女孩子们嘻嘻哈哈跳下来，一溜烟跑掉了。

那辆二手车是孟德的心爱之物，以9000元买来，但这里没汽油，只好趴在那里当学生的玩具，也给孟德增加了每日例行公事：隔一会儿就冲吉普车吼一声，将学生们赶下来。

孟德是博雷的弟弟，高中毕业后来此担任校长——他的下属只有一名月工资230元的女教师，孟德的月工资在几次上涨之后，达到了400元。在两名老师教导下，这个帐篷小学的成绩在索加乡第一。

2004年之后，“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获得上海公益组织“热爱家园”的资助，建设了砖瓦房，孩子们再也不害怕雪灾。

这里的孩子从七岁到十几岁不等，每个人一年回家一至两次。香青处于四个生产队的中间地带，对每个生产队的牧民来说都不算太远——但这是草原的“远近”概念，实际上最近的有50公里，最远的200公里。孩子们每次回家都要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河，而且有生命危险——几十户人居于被大河和沼泽包围的岛上，夏季水大，为了送孩子上学，大人都要驮着孩子泅水而过。

吃了牛肉和糌粑，我们在孟德的家里住下——那其实是一间集校长办公室、住房与教工食堂于一体的屋子。他安排我睡最好的卡垫，那里紧挨着牛粪炉。扎多一家人依次睡在卡垫上，头接着脚，脚挨着头，我们像一串念珠串在一起。孟德与太太和两个小娃娃挤在一个破旧书柜后面的地板上。我的头挨着窗户，高原的冷风钻进缝隙，像我小时候在冬天玩的冰锥一样扎我的头顶，我只好老老实实

把脑袋钻进睡袋。早上我被孩子们的歌声唤醒，起床一看，小孩子们端着脸盆往学校远处的大山脚下走去，那大山高大雄伟矗立眼前，简直就像世界尽头的一堵巨墙。山下有泉水，孩子们要跑几百米到那里洗脸刷牙，一个个脸冻得通红，像是红苹果，但都咧着小嘴呵呵乐着，牙齿白白，纯洁快活。

我们吃了糌粑喝了奶茶，继续进发，孩子们在车后奔跑着欢送。我们在扎多小时候流浪的广阔草原上走走停停，到下午近两点钟时，扎多心情愉快，放了一首歌《卓玛》，歌手亚东唱道：“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我们忽觉身下一沉，越野车陷入泥中，动弹不得。

四周杳无人迹，除了草原与远山，便是黑云压顶，好像要下雨了。我们慢腾腾挖着泥坑，将结实的草皮铲起，一块块垫入车轮下。这里含氧量是平原的一半，稍一动作就气喘心慌，何况搬起几十斤的大草皮行走几十米，只能像慢镜头一样缓缓却不停息地干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轮下垫好了，车轰然发动，一下窜出泥坑，大家纵声欢呼“啊——”，可欢呼被拦腰斩断，汽车抽搐着在一米外又陷下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文扎在这条路上，200公里路程走了28天，有时一天只走100米；为什么扎多在可可西里时，车边陷边走，走了一天，连睡觉的帐篷都不必拆。

大家从头再来，到处找石头，但草原上哪有什么大石头？除了草就是泥，正巧旁边有条小河，河床上有些碎卵石，我们用衣襟一点点收来垫在车轮下。

忽然大雨劈头盖脸打下来，我们无处可藏。如果坐进车里，车轮更加下陷，会彻底没了指望。只好戴上帽子，扣紧衣服，不加理睬。一会儿又听到“叭叭”的声音，原来大雨改作冰雹，一片白珠子打在身上。我们不惊反喜：这比下雨要好，因为雨水源源不断流入车轮下，令我们前功尽弃。

天黑在即，我们越战越勇，越野车终于冲出泥潭，“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亚东憋了三个半小时后，终于唱完这首歌。

我们冲上一个山坡，但见云散日出，远处通天河波光闪闪，通天河北面山峦起伏，在褚红色的舒缓山体之后，更有远山闪耀着白雪寂静的光芒。不知雪山之后，山峦还有几千万重，真是高山峨峨，河水泱泱。孤儿扎多当年就是从这里踩冰过通天河，到了山背后的措池村，在那里生活两年后重回莫曲。

我们沿莫曲河前行，河水湛蓝，河对面山坡上有几处帐篷，数百只白羊如同小小的白花一般，密密绽放在山坡上。

扎多一家下车在河边张望对岸，“胡子帮”扎西的兄弟们就住那边。忽然一个小伙子从对面山坡上冲下来，在河对岸冲扎多兴奋地大叫，然后跳进水里，涉水而过，紧紧握住扎多的手，他是扎西的弟弟青梅公保。

他返身跳入河中，回到对面，河水深处没了他的腰。这是莫曲最浅的时候，要是到了8月，没人敢这样过河。一会他骑马回来，手里还牵着一匹，我们骑马渡河，他在旁边护持。

男人们放牛去了，一群女人将我们迎进帐篷，奶茶献上，几个女人立即忙活起来。扎西20岁的侄女德钦永措双手各持一刀，“砰砰砰”在板子上剁着羊肉。扎多各个帐篷里钻，与主人们说着话。小时候，这些人家的帐篷曾养育过他。

我走出帐篷，一只小白羊抬头看着我。它两只角上缠着一条长长的红布，红布拴在帐篷绳上，青梅公保七岁的女儿扎西永珠正弯着腰和它玩。小羊出生时妈妈死了，扎西永珠把它抱出羊群，单独喂养。

远处的山坡上，一个红衣喇嘛赶着一群白羊下山。这位远方的喇嘛夏天来此化缘，牧民没钱，便赠送几只羊，喇嘛凑够一大群羊后赶回寺院。一只牧羊犬可

能对财产损失不大高兴，从喇嘛身后扑向羊群。羊儿乱成一团，拥挤着朝前奔去，喇嘛回身作势打狗，那狗远远逃走，待喇嘛回身，又伺机扑去，乐此不疲。那喇嘛来回奔走，忙于应付。

忽然似有隐隐的雷声传来，但见远处尘土飞扬，几百只牦牛黑漆漆从天边压将过来，一会儿群牛如黑色岩浆漫过山坡，几辆摩托车在牛群中“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指挥群牛直冲向帐篷。扎西永珠尖叫着迎上去，被一个大人抱到摩托车上，风驰电掣般驶过来，她兴奋地冲我挥动小手，尖声欢叫。

德钦永措冲上去，刚才还在做饭的手现在持着抛石器，在头顶转个圈花，“叭”得一声脆响，将小石子甩出去，群牛慌张分开，分成一个个小组，站立不动。德钦永措身穿黑色藏装，右肩右臂露出红格子衬衣，头戴一顶黑色有沿帽，却又围着一大红格围巾，颈上挂着七八串项链，尽是绿松石、贝壳、珍珠和红珊瑚。她眼睛明亮，鼻子直挺，唇红齿白，看起来是个害羞的小姑娘，可冲入牛群中，随着她不断挥动抛石器，小石子“叭叭叭”射出去，冲撞不息的牦牛们乖乖听命，她一下子又变成“花木兰”，洒脱干练，浑身洋溢着勃勃英气。

等拴好牛，天幕四合，一片漆黑。男人们在帐篷里喝奶茶聊天，女人们继续做饭，烧茶，伺候着男人们。等凌晨3点钟，她们又要钻出帐篷在冷风中挤牛奶，直到天亮。

在很多藏族地区，女人不但做苦活重活，还任劳任怨地伺候男人，在扎多家、嘎玛家、木梭家，无不如此。我对扎多开玩笑道：“藏族女人什么活都做了，什么苦都受了，要你们男人有什么用？”

扎多假装严肃地说：“我们男人来念经，拯救她们的灵魂。”

男人们在帐篷里促膝夜话，说来说去离不开那条莫曲河。这里40多户人家，四面环水：北面通天河，东边莫曲，西边当曲，南面巴子河。每年12月到4月结冰，人们可以出去以羊皮换粮食，其余八个月困守在这个巨大的岛上，若有人生病，也只有念着佛硬抗。

但“胡子帮”建成莫曲小学后，牧民们要让孩子上学，必须过莫曲河。像如今的6月水还不深，孩子们可以放假返家，等9月开学，水涨到数人深，人们只好将充气轮胎绑在一起，上面放上摩托车，让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几个人相互帮着泅水而过。水流若大些便有生命危险，去年临村有两个小伙子淹死，其中一个博雷的表弟。两年前青梅公保也差点淹死，多亏大哥扎西当时在家，将他救了上来，青梅公保还记得自己一共喝了九口水。现在他七岁的女儿扎西永珠要上学了，他不得不用轮胎将孩子送过河。他不敢想像9月15日开学那一天，他怎么让女儿不受罪。那时水大，天也冷了，往往雨夹雪，孩子即使安全过河，衣服全湿，也会冻坏。在这高原上，连夏天都需要穿皮袄，可以想像浸在冰川化成的河水里是什么滋味。

“以后再这样，绝对会出人命，必须有座桥。”扎多说。可他到哪里弄一座桥呢？去年曾有一个基金会捐了钱，莫曲人又各凑40元建了一座桥，但夏季大水一来，冲得无影无踪。要建一座质量好一点的桥需要50万，扎多知道求政府没用，当地政府很穷，再说官员讲的是“规模”和“效益”，如果投资50万建一座桥，却只为区区200个牧民，而且没有资源运出来，无法为官员的统计数据带来贡献，这是划不来的买卖。

“桥，桥，桥。”扎多嘟囔着。这里是他的草原，他的家乡。他想做的事，都与家乡急切的需求有关：治病，上学，桥。他想建成这座桥，可他毫无门路。当他还是这里的父母官时，乡亲们遇到大灾，他就放弃了从体制内获得帮助的尝

试。

七年前的1999年10月初，扎多任索加书记一年时，雪灾来了。

天上阴云密布，扎多盯着天空，忧心恐惧。他带着一部电台在高原上四处奔走，告诫牧人：“雪要来了，做好准备！”

但没有任何准备可以抵挡那种可怕的雪：小雨夹着雪花落下来，地下湿湿的，冷风一吹结成薄冰，严严实实盖住草地，大雪随之来袭，压上厚厚一层，人一脚踩上去，膝盖都看不到。

天地间一片白，灾难开始了——冰雪覆盖草场，牛羊找不到吃的；牛粪晒不干，无法燃烧，人们无法承受零下30度至40度的酷寒；下雪前河水还没封冻，牛羊没运出，上一年的粮食吃光了，新粮没运进来，人们断粮了。

牛羊找不到吃的，到处疯跑，君曲村一个牧民出门追牛羊，妻子独自在家分娩，大雪封山，牧民们相距极远，谁也不知道，母子死于难产。

扎多召开干部大会，动员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把家里的牛粪贡献一点给最困难的人家。他又每天用电台向上报告灾情，但他知道没用，乡报到县，县报到州，州到报省，等救灾物资姗姗而来，已是明年三四月，春暖花开了。

他用电台联系文扎和扎西：“我们自己搞吧！”上一年，他曾带几个基金会的人来索加，他们亲眼看到了大雪封山的情景。文扎与扎西紧急与香港联络。

扎多与附近受灾的乡政府联系，想与他们共同申请救灾物资，但没人理他。他曾在全县干部会议上被点名批评，擅自带外国人进牧区，似乎有点“里通外国”，没人敢再和他接触。“好吧，”扎多告诉“胡子帮”，“我们自己搞吧。”

香港建华基金会派美国人罗伯特带16万人民币来索加。扎多带车沿索南达杰开出来的那条路，先西行到沱沱河，再沿青藏公路到格尔木买粮食，再急行两天两夜回到索加，天极冷，人几乎冻僵，好在一路平安，索加乡人均35斤粮食拉回来。他来不及喘息，又返回格尔木拉煤。他到处巡视，看救灾物资是否被村干部截留。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又把文扎和扎西召来。他们的官方工作与索加乡没有任何关系，是以“促进会”的名义来救灾。

终于县长要来考察了。那个罗伯特一直在索加，监督扎多如何花钱救灾，扎多不想担“里通外国”罪名，因为县里不知道他已搞到救灾物资，他更不想让上级知道他拿了香港的钱，因此要把老外藏起来，“文扎，你把罗伯特送到格尔木吧。”文扎领命而去。

县长来了，因为感冒，整夜在乡政府卫生所打针。一个司机悄悄把扎多叫出门外。

“又出了什么事？”扎多问。

“文扎他们翻了车，老外的胳膊断了。”

扎多脑袋“嗡”一声，全身冰凉。完蛋了。

扎多再把副书记派出去，要他带另一辆车护送罗伯特到西宁医院。

县长第二天打道回府，临走郑重留下给全乡人民的慰问金1000元整。

翻了的车在格尔木修好，开了两天回到索加乡政府门口，司机也许太累了，汽车“砰”一头撞到大门上，两个轮子各奔前程。真是倒霉到家了，这下又要送回格尔木维修。

这头的葫芦还没摁下，那边的瓢又浮起来，一个老乡杀了羊去格尔木卖，车刚走几公里就陷进泥里。扎多气急败坏组织救援，挖了几天都救不出来，真是焦头烂额，一塌糊涂。

扎多紧急成立两个屠宰场，把眼看活不过当年的牛羊杀了，让格尔木的商人进来收购，为牧民挽回一点损失。

上级仍无动静。扎多伤心失意之下，破罐子破摔，不再向上汇报，带着干部和牧民自救。

1999年12月31日夜里，忙了三个月的乡政府干部们聚在一起，想看看21世纪的第一轮红日。索加头上自然是没有太阳的，因为天还阴着脸。他们搞来一台电视，要从电视里看看别人家的新世纪太阳，又把一台手扶拖拉机拉来充当发电机，可忙活了一夜也发不出电。如此败兴，实在忍无可忍！县长留下的一千块钱，大部分已买了冰糖之类发给五保户，扎多拿出一百块来买几瓶白酒，大家闷闷喝光。扎多心情不佳，喝多了，醉眼朦胧中迎来了新世纪的黎明。

待人们再无性命之忧，扎多回到治多县城。他到县里机关转了一圈，各个办公室空空落落，人们早放假过年了。

扎多浑身冰凉、气喘心虚地回到家里，再也站不住。博雷给他做最爱的羊肉汤，他也无法下咽。医生诊断是“高原心脏病”，无药可治，只能回低海拔地区养病。

扎多心灰意冷，要求调回县城，县委很快任命他为宣传部长。但他打不起精神坐那个办公室，在那个体制里，没有一个人赞赏他，如同索南达杰当年在可可西里。即使他救了许多牧民，但那是他犯了“没有绷紧政治弦”的错误，而不是政绩。他一头扎进“促进会”，“胡子帮”越做越热闹，他也越来越清楚：他只有离开那个体制，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宣传部长的办公桌上，灰尘渐厚。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他在心里问索南达杰。

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打来电话：“扎多老师吗？我叫嘎玛桑珠，我想和你聊一聊。”

第七章 回归

东方吉祥的白云

若能变成细羊毛

我愿分给天下人

都织一件新衣裳

——门巴族民歌²⁵

²⁵ 门巴族约有一万人，大部分居住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墨脱县，其信仰、生活习俗与藏人相同，说藏文，因此很多藏人认为门巴是藏族的一支。六世达赖是门巴人，他的诗歌有门巴族民歌的特色。

三十八 康巴汉子

1989年藏历四月十五上午，嘎玛将腰上一长一短两把藏刀取下，放到桌上，走出西宁火车站招待所。他平日刀不离身，但今天是释迦牟尼出生、成佛及圆寂纪念日，带刀不祥。

随身带刀并不是康巴汉子唯一的特征，他们往往高大剽悍，威风凛凛，用一条红或黑丝穗将长辫狠狠缠在头上，人称“英雄结”；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恩必酬，有仇必报，浪迹江湖，豪放不羁。有一首《强盗歌》这样描述康人：

我骑在马上无忧无虑，
宝座上的头人可曾享受？
我漂泊无定浪迹天涯，
蓝天下大地便是我家。

我虽不是喇嘛和头人，
谁的宝座都想去坐坐；
我虽不是高飞的大鹏鸟，
哪有高山就想歇歇脚。

我侠义从不找靠山，
双杆长枪为我壮了胆；
我侠义从来没帮手，
快马快刀是我伙伴。

因为多信守义，吃苦耐劳，而且精明强干，在藏区的大商人中，康人独占鳌头。而在康区商人中，贡觉县人更是成功的典范。

21岁的嘎玛似乎具有康巴人的一切特征：豪爽，快活，义气，坚韧，视失败若无物，宽厚，善良，但血管中流的似乎是烧酒，一遇火气就“腾”一声烧起来，受不得别人欺负。也许这是康人随身带刀的原因之一。

在藏北做完第一笔羊绒生意后，嘎玛带着 3000 张羊皮来西宁经商。西宁的商业机会并不比拉萨多，但这个年轻人固执地认为，越远的地方越能实现他的梦想，他总是不断往外走，进入自己从未进入的疆域。

今天为纪念佛诞，他与一个朋友来到黄河边，将糌粑撒入河里喂鱼儿，然后回到西宁火车站广场。他就住在车站招待所二楼。

广场上有五十多个水果摊位，他停在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摊位前，弯下腰选拣桃子，一只桃子软沓沓的，嘎玛手指一动，桃子皮脱了下来。

“你弄坏了，你得买！”摊主叫起来。

“明明是你的桃子坏了，却来讹诈。”嘎玛心想。但他汉话不灵便，不愿多费口舌，便说：“我买你两斤嘛，但不要这个，这个是坏的。”

“不行！不买你别想走！”那人很横。

“你怎么不讲理！”嘎玛说。

“不讲理又怎么样！”那人从地下拿起一把斧头，“砰”一声砸摊子上。

此人是当地一霸，一贯强买强卖，手边总放一斧头，动辄作势砍人。火车站广场有他许多同伙，被他缠上的人若想理论，便遭围攻。

朋友怕惹事端，一拉嘎玛袖子，两人转身便走，不料摊主冲上来，一把抓住嘎玛朋友手腕，将他的手表抢了去。

嘎玛大怒，随手抄起摊位上一个脸盆，兜头砸下去，他个大力沉，又怒气勃发，那人如何承受得住？一下仆倒在地，手表掉在地下。

朋友刚要捡手表，忽觉不妙，回头一看，旁边许多摊主手持明晃晃钢刀杀了上来，嘎玛伸手在腰上一摸，摸了个空，这才想起刀不在身上。转眼一看，一条长板凳就在眼前，于是抄在手中。

被砸倒的摊主爬起身来，捡起手表就跑。嘎玛手持板凳随后追来，侧脸一看，同伴已被十几人打倒在地，身后又有十几人持刀追来。嘎玛更加愤怒，奋力将板凳掷出，正中那人左臂，手表又掉地下，那人却没命地逃了。

追杀已到，嘎玛来不及捡手表，先抄起板凳，回身一板，后面一人举刀正冲过来，哪来得及躲闪，匍然倒地。又一人冲上来，嘎玛劈头盖脸又一板，将其砸倒，刀“叮叮咣咣”扔出好远。

二十余人将嘎玛团团围住，前仆后继举刀杀上，嘎玛杀红了眼，一条板凳抡将起来，如同少年时在大雪中飞舞着镰刀，十几个家伙人人中板，如同青草一般，纷纷被嘎玛放倒。

嘎玛从小胆怯，不敢与孩子们打架，可一旦被欺负就像红了眼的小牛犊，连命都不要了。他以为朋友被打死了，心中又痛又恨，康巴人不畏死的精神激发起来，只想拼了性命为他报仇。

“杀了他，杀了他！”喊声中，一群群又冲上来，一把刀刺到眼前，嘎玛用板凳一挡，刀扎在右手拇指上，鲜血直流。剧斗中，他长辫松开，披头散发，力渐不支。

他看到两个交警远远地站着，但不敢过来，他们也怕这些小贩。

“我若是有刀！”嘎玛恨恨地想。他大喝一声，向身后扔出板凳，打倒一人，冲出包围圈跑向招待所。

众人以为他要逃了，呐喊一声紧紧追来，却不敢追进招待所，生怕中了埋伏，只是堵在门口，不住叫嚷“抓出来！抓出来！”。嘎玛冲进房门，见另一同伴还在睡觉，他放轻脚步，悄悄去桌上取了长刀，再轻轻退出合上房门。朋友被打死了，他嘎玛不能独活，但如果惊醒了同伴，他也会冲上去一起死，多死一人又有何益？

还是让他活着吧。

他抽出长刀，冲下楼梯，头发散乱遮住了眼睛，来不及系成辫子，他抓住一缕长发一刀割断，扔之于地，冲出招待所。

众人以为他逃了，没想到凶神恶煞一样又杀将回来，而且持一把长刀，胆子都要吓破，“啊啊”地喊着，各自逃命。嘎玛持刀追上去，众人跑得比兔子还快，一眨眼没了人影，只余 56 个空空的摊位。

猛见同伴就在眼前，原来他没有被打死，只是挨了一阵拳打脚踢。嘎玛又喜又恼，便冲到那些水果摊上，乱踢乱打，砍破了几十个西瓜，砸烂了十几个筐子，一时桃子地下滚，香蕉天上飞，几百斤水果横遭浩劫，好不热闹。

过了好久，一个女人走上来递给嘎玛那只手表说：“他们知道错了，请你别再报仇了。”

旁边小公园里的两个藏族老人对嘎玛说：“别再打了，你赢了就快跑吧，警察要来的。”

“警察刚才怎么不来！”嘎玛气愤愤地说。

他怒气未消，不再计较那些打架的人，却无法原谅敲诈他的摊主。当天晚上，他腰插长刀到广场巡视，如同阅兵，摊主们人人变色，嘎玛不作理会，专去找那肇事者，不料摊位上空空如也，料是那人听得风声，不敢露面。

第二天晚上嘎玛又去寻他晦气，仍然不遇。他忙于生意，怒火渐息，过了几天再去火车站广场时，听到消息：那人已被砍死。

原来那人见嘎玛不再找麻烦，便回到市场，当天故伎重演，以斧头胁迫一人买他的水果，不料那人比他更悍，夺过斧头当头一击便要了他性命。此人随即被捕。

在西宁，打架只是小插曲，嘎玛有更大的麻烦要操心：夺回他的 3000 张羊皮。

他原在那曲以平均每张 17 元的价钱收购了 3000 张羊皮，在西藏自治区交上税款一万多元，然后满载羊皮，沿青藏公路直取西宁。

一路尚有许多关卡，在这些卡子上，嘎玛的完税证明根本没用，只要查到商人带货物就判为违法，重则没收，轻则罚款。嘎玛趁吃午饭的时候带车冲过通天河和唐古拉山之间的雁石坪关卡，这个卡子曾将过路商人打死，嘎玛通过后的那一年，卡子上的违法者被公安逮捕。

一路无话，到了格尔木之前十公里一个关卡，已是凌晨时分，关卡上的人好不勤勉，十几个人生一堆火，喝着酒，拦在当路。

嘎玛把交税证明拿给他们，一个当官的醉眼朦胧说：“你上税的是 3000 张皮子，你车上肯定比这多，我看有 4000，不，5000，你卸下来，查查。”

“我决不撒谎，的确是 3000 张，要是卸下来查，那要耽误一天工夫啊。”嘎玛求道。但没人理他。

又有两辆车开来，在关卡前放慢速度，忽然加速窜了出去，关卡的人手忙脚乱开车追下去，余下的人不再兜圈子，让司机翻译给嘎玛听：“罗嗦什么，交 3000 块走人。”

嘎玛连 2000 块也没有，讨价还价后减为 1500，对方将钱装口袋里，连白条也不打。嘎玛身上只有 400 块了，付不起车费，好在司机是熟人，说下次再付。

到了西宁，嘎玛每天付费 15 块将羊皮放进友谊饭店仓库，自己住到 5 元一夜的车站招待所。

羊皮价格每日下跌，两个月后跌到16块，一张羊皮也没卖出去。嘎玛四处探听消息，并忙里偷闲在车站广场与小贩们打了那一架，差点闹出人命。

天气热起来，他怕皮子发霉，经常翻检晾晒。这一日他回到仓库，一下呆若木鸡：里面空无一物，羊皮不见了！宾馆的人说税务局撬门拉走了。

嘎玛请了一个司机做翻译，两人来到税务局找到管事的人，嘎玛说：“我还以为你们是小偷呢。你们应该走正常手续，不能下手就抢。”

税务局的人大发雷霆：“你是哪里的？拿出身份证！”

一看势头不对，嘎玛去找两个老乡，一位是派出所的民警，一位是省政协工作人员，都是女士。嘎玛与她们在税务局谈了半天，一位副局长翘着二郎腿，用手指“砰砰”敲着桌子说：“不行就是不行！你是西藏人，这里是青海，你到这里就该向我们申报，不申报就违法。”

“真奇怪啊，我在西藏上税的时候，告诉他们我要运内地，他们说‘没问题’啊，西藏和青海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吗？”嘎玛说。

“也许是，也许不是啊。”那副局长说。

这下把两个女人吓坏了，她们扯着嘎玛就走：“不谈了，他给我们戴帽子，简直不把我们当中国人了。”

嘎玛愤愤不平，自己明明没违法，却遭如此对待。两位女士把嘎玛领到省民委，一位汉族干部看完交税证明，一掌拍到桌子上，破口大骂：“他妈的，他们懂不懂法律？居然说西藏不是中国的。狗日的，你明天来，我帮你！”

得到支持，嘎玛心花怒放，一时间，似乎那羊皮要不要得回来都无所谓了。他不想连累两位老乡和这位干部，第二天独自到税务局。税务局算来算去，要交税8000块。

嘎玛不想再罗嗦，赶紧交钱了事。可他没有钱，一同住在车站招待所的那两位藏人来自昌都江达县，和嘎玛只是萍水相逢，一起在火车站打了那一架后，惺惺相惜，见嘎玛落难，便借给他8000元，两人只余4000元做生意。康巴人交友就是这样，即便刚刚认识，也能雪中送炭。

嘎玛交上8000块，税务局兴高采烈，当场抽出一沓钱来，买来四只羊杀掉，然后呼朋唤友，准备大吃大喝，当着嘎玛的面也不遮掩。“太残忍，太坏了！”嘎玛心下悲怒，又为那四只羊感到难过，它们因他嘎玛而死！他愤愤地往车上装着羊皮，装到最后发现只有2600张，少了400张！

嘎玛大叫：“我是按3000张上的税啊，怎么成了2600张？你们是小偷，我要到北京打官司！”嘎玛听说过北京，但怎么打官司他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但这官司他打定了！

嘎玛跳到车上，将羊皮扔下来，看都不看，扬长而去。

税务局觉得不妙，当晚买了许多礼物找到政协那位女士，请她帮忙安抚嘎玛。他们开出条件：不再给那400张失踪的皮子上税，这部分税款1000块退还给他。

当时一张羊皮的平均市场价格是15元，但税务局为了多罚款，按每张22块计算，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按这个价格算，他们偷了400张羊皮，便是偷了嘎玛8800元，比那税款还高。而且，他们确实是按3000张皮子算的税款，逃脱不掉。现在那堆羊皮堆在税务局，臭烘烘的，反成了一个大麻烦。

嘎玛对那位女士说：“谢谢你帮忙，但他们太欺负人，我不打官司我不是人，我就是死也要争这口气！”

康巴人发了誓，就像大厦倒塌，冰山融化，一切无可挽回了。

嘎玛到大十字邮电局花200块请人写个诉状，民委的人帮他把诉状送到报社、

人大、法院和检察院。嘎玛带记者跑到税务局，一张张地数羊皮，记者“咔嚓咔嚓”拍照，嘎玛边数边叫：“快来看啊，这里有小偷啊。”税务局的人纷纷躲闪，如避瘟神。

税务局一直不处理，转眼七个月过去，嘎玛吃饭、住店、请律师，损失越来越大，却见他一直没有偃旗息鼓的苗头。一日又一日，他的索赔越来越多，因为市场复苏，羊皮价格越来越高，平均价格涨到22.5元，最好的公羊皮卖到了70元一张，于是嘎玛的索赔额翻着跟斗，从8800跳到八万。

对方知道越拖越糟，不如尽早解决。嘎玛见好就收，要求按市场价赔偿那400张羊皮，其他八个月的律师费、食宿费不再要求。税务局最后赔给他一万多元，还退税1000块。这样算来，嘎玛损失不算太大，但八个月拖下来，一分钱没赚。

但嘎玛很高兴，他赢了！很多羊皮商人吃过这个税务局的亏，一位芒康商人损失了22万，但从没人打败过税务局。现在他们碰到了这位倔强、坚韧的小伙子嘎玛桑珠。

从此嘎玛在西宁做生意，羊皮、虫草、鹿茸，有什么做什么。几个藏人合在一起做，赔了一起赔，赚了一起分，就像一家人，不分彼此，但生意一直没什么起色。某一天，他发现两个同伴兴高采烈，原来他们用7000元买了一个绿度母佛像和金字经书，很快以四万多卖出。嘎玛大吃一惊，在他心里，做佛像买卖如同吃佛的肉，不能容忍。“咱们分手吧，我绝不做这种生意。”他说。

两人很高兴，因为佛像赚了三万多，嘎玛退出，他们就多得很多钱。

嘎玛与表哥这几年生意连做连亏，已欠债12万，多登愁得睡不着觉，嘎玛却浑若无事，“我们绝对能赚回来！”他说。

1987年，国家成立援藏基金会，嘎玛一直想为家乡建学校，便与援藏基金会建立联系。1990年，恰嘎玛在西宁赔个精光的时候，援藏基金会问嘎玛能不能捐点钱。拉萨甘丹寺的很多喇嘛从劳教所出来后，其中二十多个老喇嘛没有亲人，无法谋生。援藏基金会要买一个林卡（公园），让老僧人们经营，也算有立足之地。买那个林卡需两万多，嘎玛二话不说，要西宁的朋友小马捐出五千块，他自己赞助一万。他一分钱没有，以每年百分之四十五的利息借私人贷款，一年之后，他要还14500。那些老僧人们余生有了着落，对嘎玛无以为报，以后每逢过年，便给嘎玛送来一大桶酸奶。

一贫如洗的嘎玛天天梦想发大财。高利借贷一万元的几天以后，这个22岁的康巴人卷土重来，带着500块钱回到西宁。

三十九 佛像

回西宁不久，嘎玛做了个一生中最重要的梦。他后来相信，这个梦预示着他一生的转折，给他指出幸福的方向。

在梦里他回到家乡，带着几头牦牛上山割草，草绿油油的随风起伏。他欢天喜地挥舞镰刀，几头牦牛背满了草慢慢下山。

嘎玛心爱的白色小牦牛走在最后，它出生时体弱，差点死掉，奶奶悄悄请了喇嘛念经，一直用牛奶喂它，终于养大。嘎玛在它耳上系一条红布，表明这头牦牛是放生的，不能杀。这样的放生牛连小偷都客气，不会偷走。嘎玛与它一起长大，对它很有感情，每天回家总要摸摸它的脖子，和它玩一会儿。

小牦牛生怕被石头绊倒，驮着草小心走着。它很通人性，不会擅自回头吃背上的草，直到回家喂它才吃。嘎玛背着草与小牦牛并肩而行，高高兴兴下山。

一觉醒来，嘎玛大为兴奋：“哎呀，这个梦好得很，我今天绝对发大财！”

他离开西宁往塔尔寺而去。塔尔寺距西宁25公里，在湟中县的莲花山中，与拉萨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和甘肃拉卜楞寺并称格鲁派六大寺院。

嘎玛围着塔尔寺转经，东南西北地烧香磕头。塔尔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降生地，宗喀巴本名洛桑扎巴，湟中古称“宗喀”，“宗喀巴”意即“宗喀地方的人”。藏语称塔尔寺为“究本贤巴林”，意为“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相传宗喀巴诞生后，从剪脐带滴血处长出一棵菩提树。青年宗喀巴在卫藏学佛，母亲寄他一绺白发，表达对儿子的思念。宗喀巴给母亲和姐姐寄去用鼻血绘成的自画像两幅、狮子吼佛像一轴，并在信中说：“若在我出生之地以十万尊狮子吼佛像及菩提树为胎藏建一佛塔，则如同亲晤儿面。”在信徒资助下，母亲次年将菩提树用绸缎包裹，与印成的十万尊狮子吼像作胎藏，周围砌石加固，建成一座莲聚宝塔，即今天大金瓦殿内大灵塔的前身。后人以此为中心慢慢建成现今巨大的寺院。因为先有塔又有寺，所以汉语译作“塔尔寺”（一曰“塔而寺”）。

嘎玛在塔尔寺转了一天，既没收到天珠，也没收到珊瑚，装了满肚子气。在塔尔寺的一个朋友问他：“你今天发财了没？”

“没有，那个梦白做了！”嘎玛气鼓鼓地说。

一直呆到下午6点，他花一块钱坐最后一班车回到西宁，心里愤愤不平：多好的一个梦啊，居然没预示点什么！

他没精打采走到一个古董门市部，看里面有一圈人围着看什么，走近一看，中间是两个汉人守着个大麻袋。见他过来，门市部的人问他：“你要不要娃娃？”这些人常跟藏族打交道，学会了藏语，把佛像称为“娃娃”。

麻袋里全是佛像，两个汉人说他们是山西大同的，佛像是从农村收购来的。

哪个值钱，哪个不值钱，嘎玛一窍不通，但他喜欢佛像，而且一看就知道哪个精美。他挑出两个，正谈着价钱，旁边几个人忽然将佛像抢了过去。

“干嘛？”嘎玛问，“那是我挑出来的。”

“我们早就选好了。”那些人说。

嘎玛这才明白，原来中了他们设好的局，门市部的人不知道什么佛像好，便骗他来挑，等他挑好了，他们再仗着人多抢过去。

嘎玛“哐当”一声将门关上，背靠门握紧刀把说：“一个也不许走！”

对方有七个人。嘎玛发怒时，不管对方是七个还是七十个。

“你们太欺负人了，今天不把佛像还我，谁也别想出门！”嘎玛说。

慑于他的气势，七人只好把佛像给他，嘎玛以2175块买到手，高高兴兴将佛像请走。后来才知，一个是元代早期财神佛，一个是明代释迦牟尼像。

嘎玛捧着佛像，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嘿嘿”傻乐，兴奋得一夜睡不着。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做了那个美梦：多好的佛像啊，他请来了！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收购佛像，并从此开始了收藏藏族古董的生涯。

他写下“我买了非常漂亮的佛像！”，请人译成汉语，跑到邮电局给表哥多登发过去。

“啊，表哥肯定要乐坏了！”他想。但表哥在回电中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们欠债，你还买佛像！难道你要做买卖佛像的生意吗？”

这可气坏了嘎玛：“哼，我请来这么好的佛像，你应该表扬我一下，不表扬的话，也不要骂我嘛，你再骂我，我干脆献给寺庙！”

嘎玛把佛像存到塔尔寺一位回族朋友的店里，几天后店里来了两位藏人，他们专门收购佛像，看到了那两个佛像，先是磨磨蹭蹭东张西望，然后似乎不经意地问：“这两个佛像看着还可以，多少钱？”

“这是一个朋友的，不卖。”回族朋友说。

两位商人找到嘎玛，请他吃饭，打麻将，交朋友，几天以后才通过回族朋友问嘎玛：七万元卖不卖？

“我就是穷得要饭，也不会卖佛像。”嘎玛说。

其实嘎玛穷得跟要饭差不多了，债台越建越高，可他依旧浑若无事，身着藏装，长辫以黑丝穗盘在头顶，快快乐乐奔波在西宁和塔尔寺之间。某一天经过西宁火车站广场，见20多位藏族老人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上前一问，原来是从日喀则来拜塔尔寺，出得火车站，不知东西南北。他们要是被人偷了钱，怎么回西藏？嘎玛急忙花72块钱租了一辆22座面包车，将老人们送到塔尔寺。一个老太太扯着嘎玛的手说：“小伙子，我们要为你念经啊，你人这么好，会长寿的。”

就在这个时期，在西宁“大十字”街，嘎玛从两个汉人手里以25000元高价买了那颗三眼天珠，并从此专业收购天珠。直到收到30多颗天珠，借了十多万元后，表哥从拉萨来西宁，把天珠带回拉萨。很快有人出价七万买那颗三眼天珠。

“卖不卖？”表哥问。

“不卖。”嘎玛说。他对那颗天珠充满信心。

几天后，有人出价九万，嘎玛仍不卖。

其他的天珠一共卖了十几万，债务全部还清，嘎玛理直气壮地保留着那两尊佛像。

1993年夏天，嘎玛去西藏日喀则和边境城市亚东收购天珠。他先在日喀则买了几个，然后到亚东。那里有境外走私来的牛仔大衣，他买了一件，里面穿藏袍，外面罩牛仔大衣，穿得不伦不类，怪里怪气，许多人拿他当外国人。他花80块买了个旧照相机，兴致勃勃拍那山山水水，他哪晓得那是边境，是敏感地区，他拿着照相机在边境山里出没，像是电影上的间谍。

嘎玛晚上住在亚东的宾馆，光着膀子倚床上读六世达赖的诗歌。他随身带着很多书，包括更敦群培的著作、六世达赖喇嘛的诗、香曲多杰的经书和米拉日巴的传记。离开家乡前，他虽然学会了藏文，但读书不多，做生意后才随身带书，日日学习。

嘎玛大声唱着仓央嘉措的诗：

“在那东山顶上，

升起皎洁的月亮。

玛吉阿米的脸庞，

浮现在我心上。”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但嘎玛有自己的解释，他觉得“玛吉阿米”代表的是母亲，而不是什么情人。他一面唱着，一面在纸上写下感想。

“砰”一声，门被踢开，“不许动！”随喊声冲进来七个人，七支枪口对准他。嘎玛不惊反恼，大喇喇坐着不动。

“起来！”军人大喊。

“你们说不许动嘛。”嘎玛说。

两个士兵将他扯起，他一下挣脱，忽觉有个凉凉的东西顶在颈上，却不知是什么。那是一支电警棍。那军人见他无反应，奇道：“没电了吗？”下意识用电棍在自己左手上一触，“啊”一声痛得大叫。

两个军人看住嘎玛，另外五人将房间查了个底朝天：床垫割开，地板掀起，连他的鞋底都割开，啥也没有，只有几万块现金和几个天珠。

“你到这里干什么？”

“买天珠。”

“胡说，这里哪有天珠！”

“你手里明明拿着我的天珠，怎么说没有？”

几个军人审查他在纸上写的诗句，一个汉族军人问：“这是什么？”

一个藏族军人说：“六世达赖喇嘛的诗。”

“啊！达赖！”汉族军人对嘎玛大叫，“对，抓的就是你！”

藏族军人急忙低声向他解释：“那是几百年前的达赖喇嘛，不是现在这一个。”

军人们不再理会诗歌，问嘎玛：“你去年去尼泊尔做什么了？”

“尼泊尔？”嘎玛这才明白，他们搞错人了。他这几年全在西藏和青海，哪去过什么尼泊尔。

“你们弄错了，”嘎玛说，“我没去过尼泊尔，我发誓。”

那些军人看他穿牛仔衣，以为是从尼泊尔越境来的人，

军人要他15天后到日喀则听候处理，“你不要跑掉！”他们说。

“我干嘛要跑？钱和天珠全在你们手里，我一跑，你们不发财了？”嘎玛说。

其中一位藏族军人来自边防总队，他回到日喀则，妈妈问他做什么去了，他说去抓了一个从西宁来的康巴人。

妈妈说：“有一个在西宁的康巴小伙子真是好人哪，我们去塔尔寺拜佛，他可怜我们这些老人，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他长得什么样？”儿子问。

“高高大大，二十五六岁，留着长辫子，用黑绳子缠在头上，还带着长刀子。那可真是个好小伙子啊。”

嘎玛几天后找到日喀则边防总队，又见到这位军人，这位军人很客气，说看了嘎玛在山里拍的照片，全是花草草，没什么问题，的确抓错了。他把东西还给嘎玛后问：“你以前是不是在塔尔寺附近做生意？”

“是啊。”

“请到我家喝茶吧。”军人说。

嘎玛虽觉奇怪，也不推辞，一进门，军人妈妈吃了一惊：“哎哟，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嘎玛认出来，那就是他在西宁帮助过的老人，真是又惊又喜。

老太太欢天喜地拉着嘎玛的手问：“你和我儿子这么有缘分啊，你们怎么见到的？”

两个小伙子嗯嗯啊啊，闪烁其词。老太太立即将喜讯告诉另外的老人们，于是一群群的老人来了，告诉嘎玛：“你在西宁帮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你要敲诈呢，坐在车上提心吊胆的，后来才知道你是好人。”

这些老人一家家地请嘎玛喝茶吃饭，各家各户转下来，足足花了一个星期。嘎玛一下成了日喀则的明星。

他以日喀则为基地收购天珠，有时收不到，几十个老人帮他，这家卖他一颗，那家卖他一颗，让他生意好生红火。

他开始在日喀则收集藏族古董和旧家具，这些东西极为便宜，或五十，或一百，太过贵重的东西，嘎玛没钱，不去沾手。他收购最多的是古代青铜器，那多属于象雄文化时代。在以前的藏区，精美的佛教用品和古董主要存于寺院和大户人家，文革期间有些被砸烂，许多被没收，扔进库房的什么角落，许多年后或是扔掉，或三五块钱处理，这些珍贵物品又流落民间。

20世纪90年代初，民间市场还没繁荣起来，有些藏民将手里的物品三五十块钱出手，嘎玛出价往往是别人的几倍，所以日喀则的市场都知道嘎玛桑珠——这小伙子一来，大家就有钱赚。

嘎玛的收藏越来越多。他对藏族古董的收藏不是缘于买卖，而是出于喜爱，就像第一次买那两个佛像，他知道自己一生也不会卖出那佛像，那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收入。

他收藏得越多越感到震惊，原来藏族有那么多精美的古董，民间也有珍贵的日常用器，闪烁着藏族文化灿烂的历史。但市场上许多美仑美奂的古董廉价得吓人，如同汉人市场上的白菜大葱。许多佛像甚至被当作破铜烂铁处理，更多的以极低价格被境外收购。

嘎玛尽量拣选那最珍贵又易被忽略的物品。天珠是传统的珍宝，虽然也在往境外流失，但不至于消亡，而许多传统工艺制作的用品，甚至是日用品，如锅碗瓢盆，却日渐稀少，很可能多年之后再难寻踪迹。嘎玛用买卖天珠的赢利收藏这些物品。他经常想起爷爷——他在夜里用白马驮着经书，偷偷为娘拉寺保留火种。爷爷也许会感到欣慰：自己的孙子在做同样的事。

嘎玛多年在外做生意，每逢见到老乡，总要问两件事：“我奶奶好吗？我的小马‘弟弟’好吗？”

1995年年底的一天上午10点，嘎玛在成都接到舅舅家二表哥的电话：“奶奶病重。”

嘎玛惊慌失措，一时借不到车，情急之下，当即用15万买了辆二手丰田越野，请了一位朋友开车，直奔西藏。

他有不祥的预感。

一年多以前他已听到一个坏消息：小马“弟弟”死了。前一年夏天下暴雨，两只发情的公马追“弟弟”，“弟弟”吓得乱跑，从山上摔下去，腿摔断了。马不

像牦牛，断了腿很难恢复。

因为这是嘎玛最喜欢的小马，奶奶在家里给“弟弟”腾出一个房间，把它养在里面，冬天找最好的草给它吃，像照顾孩子一样尽心。但小马还是没养过来，在第二年春天死了。

人们将它天葬。在昌都，马和狗像人一样被天葬。

嘎玛到拉萨后许多年没回家，一直想着自己的“弟弟”，就像是最好的朋友。小马驹死了，嘎玛像失去亲人一样悲伤。

现在奶奶的坏消息又来了。他当夜到二郎山，因为夜里危险，管理人员不让上山，嘎玛请求多时才放行，疯狂过山，开一夜到新都桥，司机停车睡了两小时，继续沿川藏北路蹒行。因为在山路上狂奔，汽车的前盖被颠坏，翻起来挡住视线，便到汽修厂焊接，不想那些工人笨手笨脚地将车盖焊坏了，耽误两小时，嘎玛气疯了，脚踢着汽车，嘴里咆哮着。

“莲花生大师，绿度母，嘎旺法王，请保佑奶奶好起来，保佑我赶到她面前。”他不停地念着佛。

前一年奶奶刚刚生过病，嘎玛买了爷爷生前盼望的转经筒回家，在奶奶榻前服侍了七个月。奶奶很高兴，她的嘎央终于回来了，她每晚给孙子讲年轻时到拉萨，讲这一生的故事。嘎玛每天为奶奶念经，祖孙其乐融融，七个月后，奶奶身体好起来。

嘎玛盼望奶奶这次还能好起来，他还要让奶奶过上最幸福的日子。他现在有钱了，能做让奶奶高兴的事：在他陪奶奶的七个月里，他为孜荣部落的十一个村捐钱，每个村建了一座桥，村民们可以自由到热曲河对面；他建了一个寺庙学校，让孩子们读书，结束了孜荣部落没有学校的历史；娘拉寺下的德吉村（幸福村）有80多户孤寡老人，他全部赡养起来。他还要做更多的善事让奶奶高兴。

嘎玛用狂奔的车轮把白天压成黑夜，赶到雀儿山。丰田吼叫着冲上去，雀儿山险峻异常，在海拔4000米以上，夏天都满目积雪，更别说隆冬。丰田冲到海拔近5000米时，突然陷进厚厚的雪堆，如同陷到泥潭，再也动弹不得。

嘎玛冲入路边积雪，挖出石头搬到陷车处，因为车轮绝望地飞转，积雪已成泥水，冰冻的水没到膝盖。他把石头垫到车轮下，因为石头冰冷，手粘到石头上，一层皮剥了下来，鲜血直流。但他又累又急，觉得身体越来越热，一点冷意也没有。只是两人鼻血越流越多，出现藏族人极少见的高山反应。

终于盼来一辆东风卡车，嘎玛将其拦住，用卡车把丰田拉出来。两人翻过雀儿山到德格，汽油耗尽，但夜里加油站关门，他们焦躁地等着太阳升起，加满油，向西冲过金沙江。

到江达县时，突见一只老鹰一个俯冲，将一只小鸟抓住甩到路上。嘎玛心中大惊：“坏了，奶奶不好了！”

心急火燎开到热曲河边，碰到一位老乡，嘎玛急急问：“我奶奶怎样？”

那人犹豫了一下，怪怪地说：“还那样。”

“什么？你什么意思？”嘎玛问。

“去世了。”他这才说。

嘎玛后来见到此人就很生气，是他给嘎玛带来坏消息。嘎玛知道自己心态不对，但无法克制。

仁青到桥下接他，什么话也不说。嘎玛没有哭，心里一直迷迷糊糊地叫：“阿奶，阿奶，我为什么见不到你？为什么我们这么没缘分？”

他颓然坐到家里，妈妈、仁青桑珠和弟弟晋美朗加红着眼睛，谁都不敢对他

提起阿奶。

“阿奶，阿奶”，嘎玛木然想着奶奶——

奶奶搂着他，骑着白马去找阿达拉姆，她弯下腰对阿达拉姆说：“阿依，这孩子眼睛疼，请你帮个忙吧。”

奶奶给他讲去拉萨的故事，那故事催发了嘎玛的梦想；

嘎玛要去拉萨了，奶奶牵着他的手，将他送过桥头，叮嘱道：“嘎央，财富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佛祖。”

奶奶为他照顾小马驹，就像小时候照顾自己一样……

嘎玛喜欢喝酒，一次喝20瓶啤酒不在话下。他去年回家看奶奶时，亲戚朋友来送酒，他天天畅饮。妈妈劝他不要喝酒，并要他到喇嘛面前发誓，奶奶心疼孙子，说：“他喜欢喝，就让他喝一点嘛。”嘎玛有一天夜里在舅舅家痛饮，一人喝了六瓶白酒，回到家里，醉醺醺纵声高叫，奶奶担心了。嘎玛要离家时，奶奶拉着他的手说：“嘎央，你在家可以喝酒，但出门在外就不要喝了。”

“阿奶，为什么我见不到你？为什么我们没缘分？”嘎玛喃喃说着，跪到安眠的奶奶身前：“阿奶，你对我的教育，我一定遵守，我发誓！”

四十 “楼兰大盗”

1998年3月18日夜，数十名便衣警察蹲守在乌鲁木齐机场，等着擒拿“建国以来新疆最大的文物贩子”，那人“似荒原野狼，行踪不定，诡秘异常”。

此人便是嘎玛桑珠。

几天前，珍嘎来到西宁的青海邮电学校——就是扎多在那里混了四年的学校进修，与嘎玛见面。有天夜里嘎玛做了个梦，看见一只狗冲他汪汪乱叫，忽然变成个人，对他呲着牙，狰狞可怕。嘎玛像被施了咒语，动弹不得，“莲花佛，嘎旺法王！”他大声呼喊。

“嘎玛嘎玛你怎么了？”惊慌的珍嘎叫醒他。

嘎玛大汗淋漓，不知此梦之所指。

他告别珍嘎去成都，先处理自己的皮衣业务，然后带一个皮箱，里面装着人民币和美元，一共约合40多万人民币，登上飞机去乌鲁木齐。

在过去的三年中，嘎玛大起大落，大落大起。奶奶去世后，嘎玛花了几十万元，请许多大喇嘛为奶奶念经超度，请人将一本400页的佛经刻成玛尼石，足足刻了两年。在康区，恐怕难有普通人像奶奶一样享受如此隆重的葬礼。为了让奶奶转世为人，嘎玛不在乎花掉所有的钱。

他从日喀则回到西宁，听说生产机场跑道材料很赚钱，便与朋友一起投资建厂。整整两年，他被这个工厂拖进泥潭：当地银行贷款下不来，市场价格下降，工厂污染极大。两年后嘎玛不得不扔掉工厂，这下不但把买卖天珠的赢利全赔光，还欠债200多万。

更糟糕的是，贡觉老家的很多人跟他借钱做生意，嘎玛一万两万地借出，当他的钱全投入工厂时，自己没钱借给别人，便为老乡做担保人借贷，几年下来，老乡们还不起钱，债主来找嘎玛，连本带利，嘎玛还上一百多万。他不敢跟老乡们讨债，那会把他们逼上绝路，只好把帐免掉。老乡们为他念经祈福。

雪上加霜，嘎玛彻底穷大了。

嘎玛到处打家劫舍，经常问在塔尔寺开店的那位朋友：“今天你卖了多少钱？”人家或卖了300，或卖了500，他便说：“那我借了。”于是又能吃几天饱饭。

虽然欠债三百万，嘎玛仍然不忧不愁，佛教给他的乐观品性，让他每天都喜笑颜开。“我一定会发大财！”这信念从没动摇过，只是需要时间来等那命定的缘分。

一日，他在兰州花六万块买了一个汉玉——他知道自己不懂，就是冒险试试。他拿给几个人看，没人懂行，一个月后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到了潘家园古玩市场，一家古玩店老板以28万买走。

嘎玛兴趣大增，在潘家园里转来转去，看中一个翡翠鼻烟壶，以三万成交，带回成都，成都没人识货，他只好再回潘家园，刚好一个香港人走过来，嘎玛将他拦住，以20万卖出。等嘎玛日后成为行家，他才意识到，那清代鼻烟壶若留到现在，在香港拍卖的话，能卖四五十万。

“唉呀，这个好玩，”嘎玛想，“这样挣钱太容易了！”他把一些天珠卖掉，腾出钱来买古董。办工厂赔个精光，似乎要从古董上翻身了。嘎玛兴冲冲到郑州，激情澎湃中掏出所有家底，买了70万元的古董。他带到北京，有人出15万美元，嘎玛胃口太大，没卖，找到几个内行人鉴定，“假的！”专家说。

这坚定了嘎玛的自我评价：“笨！我非常笨！任何人骗我，都很容易。”

他抱起那些假货扔进箱子里。他知道可以卖出去，买主们不知那是假的，但他不想坑人。

他前面买卖古董所得，被这些假货一笔勾销，债务仍是300万。他回到拉萨，亲戚奶奶见到他后哭起来：“你们如凯家做了那么多好事，你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

但嘎玛不觉得自己命不好，他坚信自己终将成为天下第一的大商人。1996年新疆边贸市场开放，嘎玛终于做成一个大买卖——他从杭州订做皮鞋和皮衣，通过新疆运往俄罗斯。从杭州订做一件皮衣只要1000块，如果货物进不了俄罗斯，他再运到成都和拉萨，以2500元卖给商家，商家在市场上以3700元出售。因为那皮衣质量上乘，很快在拉萨流行，十几年后，嘎玛发现还有人穿着他当年卖出的皮衣。

因为频繁往返于新疆和内地，嘎玛发现一个巨大秘密：新疆边贸大量使用美元交易，因此很多商人积有美金，急于换成人民币；而内地商家和银行急需美元，谁也不知道新疆有那么多美元闲置。这个秘密似乎只有嘎玛知道，他从新疆收购美金，装在牛皮手提箱里，坐飞机到成都，下了飞机便冲进中国银行。将美元卖给银行，一个美元可赚两毛七人民币。成都的银行从不知这个神秘的大辫子藏族人是什么来头。

嘎玛将人民币装满皮箱，转身飞到新疆收购美元，两天后再提着两个重重的皮箱返回成都。他心里兴奋，可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生怕被人看破秘密。他最多一次带回100万美金，一转眼工夫赚27万人民币。天底下恐怕再没有赢利如此迅速的生意，现金流动之快，就像高原上的马蹄。有时他一个星期做三次交易。那一年，他的各种生意——包括美金和皮衣，一共赚了600万，还清欠款。

几个月后，他听新闻说中央出了新政策，这样买卖美元违法，嘎玛立即收手，集中精力做皮衣生意，顺便收集古董。

嘎玛经常逛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古董店，有一天看到一块木简，长约20公分，宽四公分，上面写着一些字母，有些是藏文，嘎玛能读出来，但有的与藏文有些区别。嘎玛对有字的东西特别注意，这也许缘于藏族人的传统，因为藏文字纪录的主要是佛经，所以藏族人敬惜字纸，绝不乱丢有字的纸片。

“这块木头启发了我，改变了我的一生。”嘎玛告诉我。

他看着木简上那些字母，一下想到更敦群培的著作。更敦群培研究藏文的起源，解释藏文的30个字母是怎么创造的。嘎玛忽然想到，更敦群培所说的古藏文笔划，与这块木头上的字母一模一样，这木头所记载的字母，应是藏文的前身。

他1995年曾从一本藏文杂志上看到，新疆出土的木简上有类似藏文的字母，嘎玛认为那就是古代藏文。如果这块新疆出土的木简真是松赞干布之前的物品，嘎玛就可确信，在古代，包括青藏高原、克什米尔和新疆等广大区域，都受古代象雄文化影响。象雄文化是最古老的藏族文化，在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诞生之前，象雄文化的古老苯教是这些区域最原始的宗教，象雄文明是青藏高原、南亚和中亚文明之始祖。

店主说，这木片是在戈壁滩上发现的，与木片一起出土的还有一块毛织品，嘎玛花800块钱买下这两件东西，请人对丝织品做了碳十四鉴定，果然是汉代的物品。

这就是藏文的前身，这就是象雄文化！嘎玛高兴啊。人们一直认为，藏文是松赞干布时的大臣吞米桑木札创造，现在他有了证据，证明藏文的来源更早，而且就是来自藏族本土的象雄文化。有些史书上说吞米桑木札到印度学习之后，创

立了藏文，也有人争论说藏族以前就有文字，吞米桑木札只是创立了藏文语法，但这种说法并无实物证实，嘎玛手里的木简就是物证。

嘎玛喜欢到新疆，并不仅因为生意，还有文化对他的吸引：西域三十六国、佛教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文化、象雄文化，全汇集于此。嘎玛在那里留连忘返，觉得新疆文化的历史价值远没被挖掘出来，他甚至有个念头：等有了钱，在新疆办一个文化多样性博物馆，也许会对新疆有所贡献。他对新疆的感情连自己都纳闷：“我是不是从新疆转世来的？我与新疆有什么因果？”

但在警察眼里，嘎玛对新疆文化的热爱，却是他作为“大文物贩子”的佐证。1998年3月18日夜，他们埋伏在乌鲁木齐机场，等着抓获嘎玛，立那绝世之奇功。

2006年7月13日的成都，嘎玛递给我一份《青年与社会》(增刊)杂志，“这就是我。”嘎玛指着封面，哈哈大笑。照片上，他在乌鲁木齐机场被警方抓获，戴着手铐，两边由便衣警察架着，一张大圆脸被闪光灯照得煞白，眼睛闭着，黑黑的小胡子滑稽地凸显，说不出的狼狈，一看就不像好人。在内页上，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为：“楼兰大盗落入法网”。

这份杂志的封面文章《楼兰大盗》，叙述新疆公安机关抓获了在楼兰挖掘古墓、偷盗汉代彩棺的阿布力孜·克里木等人。文中把嘎玛桑珠写成“尕玛桑珠”。

审问阿布力孜楼兰古墓文物的去向时，他交待了已把六件文物以8.4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名叫尕玛桑珠的藏族文物贩子。尕玛财大气粗，下榻在乌鲁木齐的环球大酒店。但专案组刑警前去捉拿尕玛时，尕玛已在我警方于3月12日当天抓获阿布力孜的早些时间飞离乌鲁木齐。经查，尕玛买的是乌鲁木齐——成都——西宁的联程机票。

尕玛桑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现在虽然还不甚清楚，但民警们已感到这是一条“大鱼”，真是太有干头儿了！

国际机场：巧设诱捕计 大鱼来咬钩

3月14日，两个警官直飞青海西宁，“恭候”尕玛桑珠从成都飞抵西宁。

到了西宁，展开工作后，他们才认识到这个尚未谋面的藏族人是个极不寻常的人。在西宁警方配合下，他们了解到尕玛桑珠是青海湟中县人，使用的身份证

上却是一个汉族名字：李文帮。

青海省的湟中县因有一座塔尔寺而闻名中外。塔尔寺是中国喇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寺内古木参天，佛塔林立，寺中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艺术”被誉为塔尔寺的“三绝”，该寺院为海内外的佛教徒和众多的中外游客视为圣地和胜景。在通往塔尔寺的公路上，有一公里长的一段手工艺品一条街，街两侧一个挨一个全是向游客兜售手工艺品的小摊儿。这些小摊中有不少人在暗中捣腾文物。尕玛桑珠在这个市场中名气大得很，但近期内没人见他在这里出现。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这个人并非青海人，或者说他曾在青海居住几年后又迁回了西藏老家昌都地区的贡觉县东巴乡。

尕玛桑珠是个神秘人物，似荒原野狼，行踪不定，诡秘异常。他的手机是四川南充的，传呼机却是青海西宁的。在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发现西宁有人给他打了个传呼，他从成都回了机，是回给某宾馆306房间的，一查，住在此房的是一个藏族女人，后查明系尕玛的情妇。

根据掌握的情况，在西宁和成都抓尕玛都有所不便。若到昌都的贡觉去抓，因那里是尕玛的老巢，更为不易。那么，抓尕玛最理想之地只能是乌鲁木齐了。可是，如何叫他乖乖飞到乌鲁木齐呢？这就得跟他斗斗心眼了。钓什么鱼下什么饵，尕玛是个狡猾的文物贩子，以文物为饵钓他应是最佳选择。一个大胆的不无冒险性的计划在专家指挥员的几番琢磨下产生了。

于是，一位副支队长带四人与阿布力孜同吃同住，负责“下饵”，另一路到乌鲁木齐机场张网以待。

3月16日，“捕鲨”计划开始实施。

公安人员吃住在阿布力孜家里，叫阿布力孜给尕玛打传呼，谎称他要的“漂

亮棺材”和“完整干尸”都已到手，请他速来乌鲁木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否则将出手给×××（另一位文物贩子）云云。

尕玛果然回了机，却说出一番令人吃惊的话：“你别骗我了，你们已经被公安局抓住了。”是谁泄了密？不可能泄密呀！尕玛这话儿八成是诈术。好，咱就将计就计，公安人员叫阿布力孜这样回尕玛：“那全是×××想要这两件宝贝，才给你放的谣言，你要是这样信不过我，我可真要把宝贝给×××啦。”

尕玛急了，说：“既然如此，我过两天一定到乌鲁木齐去，你等着我。”

“究竟哪天来嘛！”

“就这两三天，我一准去。”

但是，16、17、18连着三天不见尕玛有什么动静。这三天真熬人呀！神经不敢有片刻的松弛，还时时担心夜长梦多，万一尕玛识破我方计谋，就此隐匿而去，这十来天的辛苦和这一“妙计”可就全泡汤了。更重要的是尕玛跑了，那些珍贵文物也将不知流向何处。而且，据查尕玛在云南、西藏的边境地区也有多处关系，在尼泊尔还有亲戚，万一将文物倒到境外，再追回来怕比登天还要难呀！

3月18日晚上，专案组从乌鲁木齐民航公安局获悉尕玛终于登上了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一位处长立即率领精兵强将在乌鲁木齐机场布下天罗地网，“恭候”尕玛桑珠的“光临”。

乌鲁木齐机场。飞机未能正点到达，使得指挥员们也心急如焚。立即与民航公安局联系，询问原因。民航公安局积极配合，很快查清了飞机在中途加油时因故不能正点飞抵乌鲁木齐，只好再耐着性子等吧！

时间在焦虑中一分一秒地逝去……

终于，久盼的那架波音飞机呼啸着从天而降，终于，久盼的那个尕玛桑珠拖

着那条引人注目的大独辫，手提密码箱，出现在视线里。在民航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全力配合下，数名身着便衣的刑警装作接人，从几个方向围了上去，刹那间如猛虎扑食，将尕玛压倒在地。时间是3月19日零点25分。

尕玛落网后，从他身上搜出了用于购买彩绘棺材和干尸的人民币、美金，还有手机等通讯工具及两件国家二级文物。

审讯室：喇嘛参与审案 创公安审讯之最

“3·10”案件除了是新疆解放后最大的文物案件外，还创了一个“新疆之最”，那就是审讯尕玛桑珠。

尕玛常年活动在成都、西宁、兰州、乌鲁木齐、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本说的一口流利汉语，但被抓以后，却装成既听不懂，更不会说汉话。审讯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新疆虽为多民族地区，但要找一个既会藏语，又会汉语，还要会审讯的“全材”式人物还是很难的，最后只能从和静县请来一个会说蒙语和藏语的喇嘛，再配合一个会说蒙语和汉语的蒙古族民警，与只会说汉语的汉族民警一起来审尕玛。审讯请喇嘛参与，这在我国公安工作上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了吧！

尕玛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又像西瓜掉进油桶里又圆又滑，不是避重就轻，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不就侃侃而谈他对家乡所做的所谓“善举”。问 he 到新疆几次，来干什么，他说，只是在二道桥集贸市场小摊上买了一块旧地毯，拿到成都又卖给了两个不认识的北京人，赚了几个小钱，这并没有犯什么法，你们抓我实在是误会呀。

为彻底攻破尕玛这道难关，民警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一次次审讯，提醒他不要

心存侥幸。一次提审他时，让他“无意”中看到在押的阿布力孜·克里木，他终于明白自己落网绝非误会。

经过二十多次审讯，尕玛终于彻底投降，不仅用流利的汉语交代了罪行，还表示要通过朋友把文物追回来，一件不少、不坏地交还新疆，将功折罪。

不久，他的朋友、四川著名的藏族民营企业家登巴大吉果然亲自飞赴乌鲁木齐，将六件珍贵文物交还。

那六件二千余年的文物经数千里流转，两次翻越六千多米高的雀儿山，两次跨越惊涛拍岸的金沙江，终于回到了它们的故乡新疆，头功当属我公安民警！

四十一 牢狱之灾

我饶有兴味地读着这篇文章。此文用大量篇幅讲述公安机关神勇地计诱、抓捕和审讯嘎玛，读者可能得出结论：嘎玛是此案主谋。文章用了许多贬义词来强化这一印象：“文物贩子”、“财大气粗”、“大鱼”、“神秘人物”、“捕鲨”、“似荒原野狼，行踪不定，诡秘异常”、“像西瓜掉进油桶里又圆又滑”。文章把嘎玛的恋人珍嘎称为“情妇”，把他的贡觉老家称为“老巢”，似乎那是个土匪窝，而不是一个普通藏族村庄。

更有问题的是如下句子：“尕玛落网后，从他身上搜出了用于购买彩绘棺材和干尸的人民币、美金，还有手机等通讯工具及两件国家二级文物。”不知道文章何以肯定那钱是来“购买彩绘棺材和干尸”的，而且，嘎玛的通讯工具也被“搜出”，似乎那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电话，而是手枪。

但文章无法否定，嘎玛既不是主谋，也没有鼓动盗墓，他实际与盗墓毫不相干。这条“大鱼”、“野狼”、“鲨鱼”到底犯了什么罪被羁押，不得而知。文章没提到嘎玛有合法收藏证，没提到那所谓的文物，是他从政府批准的文物商店里购买。那收回的六件物品，作者用惊叹的语气说：“实属文物珍宝！”也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珍宝”，其他的文物在文章中都有描述，而说到这六件能定嘎玛“罪恶行为”的物品，反倒遮遮掩掩起来。

文章也没提到，除了公安机关拿去嘎玛的40多万元，检察机关也没有起诉嘎玛。没有什么罪名可以起诉他。后来嘎玛被无罪释放。

2006年7月13日，我在成都看完这篇文章，与嘎玛和扎多去街上吃午饭，一路上嘎玛兴高采烈谈着他被人写成“野狼”和“鲨鱼”。我们进了一个家常菜餐馆，一位男服务员向我们推荐水煮鱼。

“鱼是活的吗？”嘎玛问。

“当然活的。”小伙子骄傲地说。

“那不吃。”嘎玛说。

小伙子呆了一下。我们点了几个青菜和一个牛肉，没要酒。奶奶生前劝她的嘎央在外少喝酒，自从奶奶去世，嘎玛滴酒不沾。我们吃完饭回到嘎玛家，刚刚坐定，一位先生兴冲冲进门，手里挥舞着一个拍子，像是羽毛球拍。这是台湾的陈先生，暂住到嘎玛家里。“嘎玛，我买了一个打蚊子的电拍子，今天就把蚊子杀光！”他高兴地说。成都蚊子多，他受够了罪。

嘎玛拿过拍子笑道：“哎呀陈先生，这杀生的东西不能拿到我家来啊。要不先打你身上试试，看你疼不疼？”

陈先生进房间换衣服，嘎玛把拍子藏进自己房间。“我的拍子呢？”陈先生出来，团团找他的武器。

“对不起啊，”嘎玛笑道，“我藏起来了。”

陈先生无奈地摊开双手。嘎玛得意地笑着，坐到沙发上，给我们讲他的新疆故事。

乌鲁木齐有个叫“二道桥”的地方，有很多古玩店和工艺品店，很像拉萨的八

廓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认识了那个店老板阿布力孜，买了他不少银元。过后知道大部分是假的，我骂了他。后来我又买了他一个地毯，他店里的东西太多了，装得满满的，现在想来，百分之九十五的东西是假的，但我买的地毯是真的，这个我懂行。

最后我选他一大堆东西，付了八万多块，包括木器、地毯、丝绸，大部分有古象雄文化特色，我很高兴。买的时候我问他：“我有收藏证，买东西不犯法。你可要注意啊，这些东西是合法来的吗？如果不合法，你要吃官司的。”

“没问题！”他说，“这都是戈壁滩上捡来的，那里有的是，随便捡，怎么会不合法？我在这儿都干了20年了，合法经营，你看我的营业执照。”我看他墙上果然挂着正式营业执照。

我最喜欢一张大地毯，上面有藏式图案，但地毯很破烂了，我选了手帕大小的一块残片、几片丝织品、毛织品和木头，一共六样，想拿到北京鉴定和研究。我把其他更值钱的那一堆暂放他那里，没想到后来他告诉我，那些东西堆在他车库，全被偷了。我怀疑他卖给了别人，但也没法追究。

公安把我抓起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盗墓的，一共五个人，阿布力孜等三人把盗墓得来的东西藏起来，诬陷另外两个人偷了。那两个人很生气，报了警。阿布力孜说我买过他的东西，公安这才要抓我。

我到了西宁见珍嘎时，五人中还没抓住的一个给我来电话：“你不要去新疆了，公安局正查那事。”

查就查嘛，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哈，当时我真傻。

后来阿布力孜给我打电话，其实那是警察让他引诱我，他说：“嘎玛，你立即来新疆，带上300万，这里好东西多啊，好几车呢。”

我心里嘀咕，觉得不对劲——哪有让我带上300万的道理？好像要骗我的钱一样。那天晚上我就做了那个不好的梦，一只狗朝我叫。

那篇文章说，他给我打电话，我要的“漂亮棺材”和“完整干尸”都已到手，请我速去乌鲁木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是胡说八道。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棺材和干尸。文章里还说我身份证上是汉人名字“李文帮”，更是胡扯。我长的这个样子，留着大辫子，穿着藏装，不大会说汉话，我说我是李什么文帮，你信吗？我身份证上一直就是“嘎玛桑珠”，跟现在身份证上的名字唯一不同的是，我当时没加上我们家的姓“如凯”。

我到成都时，一个朋友又来电话：“你千万不要去新疆！”我没有听他的话，因为我没犯法啊，我怕什么？再说，乌鲁木齐皮革厂有我的生意，对方在等着我。

我带着40多万坐飞机去乌鲁木齐，哪里想到，下面几十个警察和记者等着我这个“新疆最大案子”的主犯呢。那之后的10天，报纸上全是我的新闻，哈哈哈。

文章中说我带着“密码箱”，也不对，我只是提着一个小包，从机场出来，到处张望，看是不是真有人抓我。没什么啊，我没看到警察。其实他们全是便衣。一个女出租车司机过来，抢我的包，要我坐她的车。我跟着她走，还没上车，很多人冲上来，抓住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脚，我脚都挨不着地了，我以为是强盗，有三个人抓着我的右手，我一下子挣脱，准备回拳打过去时，他们掏出枪来，噢，那是公安。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对着我“啪啪啪”地照相，闪光灯一直不停，耀得我眼睛睁不开。杂志上的照片，就是那时候拍的。

他们把我扔到越野车后面，三个人压我的头，两个人压我的脚。我知道是公安，不是强盗，不会有生命危险，没那么害怕了。他们压着我，我一直大声地念

着：“度母，你要看到！度母，你保佑我！”

车开了很久，也许一小时以后，车停了，我听到外面“嗡嗡嗡”的声音，那是看守所的大门打开了，这个看守所关的都是重犯。

他们搜出我的钱，高兴死了，能不高兴吗？他们发财了。他们拍照片，拍电视，然后审问我，我说只是收购新疆的地毯，到成都北京卖。他们说：“你态度不错，明天再详细交代。”

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开始打我，天天打，打了18天。他们打人的方法多得很，有时候要我弯着腰站，稍微一直腰就打。有时要两条腿交叉着站，站不稳也打。有时候要脸贴着墙站，两只脚朝外分开，也贴在墙上，你试试，那样根本站不住嘛，站不住就打。人家真聪明啊，想出那么多整人的办法。

他们越打，我越生气，越不说话，如果不打的话，说不定我还说点什么。他们扯着我头发，拿剪刀放我头上：“你说不说？不说就剪掉。”这样威胁了我四次。这种时候我就反抗，我的头可以割下来，但不能剪头发。藏族人传统留长发，文革时统统剪掉了，我的头发是妈妈和奶奶要我留的，我从第一次离家到拉萨，除了那次在西宁打架用刀割了一绺，头发一直留着。

我说：“如果我有罪，你们何必剪头发，直接枪毙嘛。”

他们打到我第9天，我啥也不说，他们实在没办法，找阿布力孜来和我对证，他哭着求我：“求求你，把东西拿出来嘛。”

我骂他：“他妈的，我不认识你，我拿什么？”

我不交待也是为了他好。以我们康巴人性格，我俩就是有仇，到了关键时候也绝不出卖你。

公安说：“你犯法了，知道吗？”

“我没犯法啊。”

“你怎么没犯法？别人偷来的东西，你买，不是犯法吗？”

“我是从店里买的啊，如果他卖违法的东西，你们怎么还批准他开店呢？”

“你要不知道那是违法的东西，为什么给那么多钱？我给你一支烟，要八万，你给吗？”

“我要收藏啊，我和你干的不一樣吗？都是保护文物，我有收藏证。”

“那是国家的东西！”

“我也是中国人啊，难道中国人不能保护自己国家的東西吗？”

他头痛得很，说不过我，只好打了。

其实阿布力孜卖给我的东西，值钱的我没拿走，先拿走的六件破地毯和丝毛织品，什么钱也不值，我只是想研究，并不是文物。我捎信让朋友把东西送回来，公安好高兴，又准备拍照，又准备摄像，可一打开包，我看他们的表情，知道心凉了——什么大案，就这些东西？一个警察追问我：“就这些东西吗？”

我说：“是啊。”

我看到一个警察偷偷摇头。

他们叫阿布力孜来看，他承认这就是卖给我的东西。这下公安惨了，原来在媒体上吹得厉害，说我是重犯，手里有“国宝”，但我哪有什么“国宝”？根本没什么价值。从此警察态度软得很，天天问我：“嘎玛，洗不洗澡？”

朋友来看我，给我留下几千块钱，但掌握在警察手里，我拿不到。因为根本不是什么大案，警察没得到上级拨款，天天跟我要钱吃饭，三个警察不好意思一起要，审问完了，两个当官的先走，剩下一个小警察对我说：“嘎玛，我们没钱吃饭，不好意思，你签个字。”我签上“取500块。嘎玛”，他们从我帐户里取出500，

给我200，他们自己要300。他们经常这样和我做交易，最多一次要了600。

后来有一段时间，有两个人晚上分别偷偷提审我，好像怕其他人知道。都是一开始说东说西，我一直不明白，最后他们急了，干脆伸出手，拇指和食指搓着，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跟我要钱，要大笔的钱。一个人比画着胸前说：“你要不给钱，就在里面呆着吧，呆到胡子这么长。”

我当然不给，他们派另一个人来劝我：“你这个人真傻，人家给你出去的路，你都不走。”

我就是不走，我不干肮脏的事。

在乌鲁木齐的28天里，他们打了我18天。打完，我回到监室读汉文报纸，狱友里有个四川人，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报纸是狱友们搞来的，他们用绳子绑着报纸，从一个监室往另一个监室甩，有时要甩几十遍才成功。我读完了再传给别人，啊，那报纸好看的很啊，我可以学汉文，这是很宝贵的机会啊。

公安打我，我一点也不恨他们。他们觉得很奇怪啊，这人打得这么惨，乐呵呵地回去洗洗手，弄弄伤口，接着学汉语，他是不是有神经病啊？

那时候，我的汉语水平大大提高。

28天后，警察把我带出来：“你走了。”我很高兴，以为要放我，把剩下的钱全送给狱友。这下惨了，我后来差点饿死。他们又把我送到库尔勒看守所关了15天。那里的警察没打我，但犯人打犯人。很多监室里打人，如果有人说：“我想听收音机。”就会有人被打，发出惨叫声，如果犯人的头儿说：“我要看电视。”那就打得更厉害了。

警察把我关进一个监室，对老犯人说：“你们把这个人教育好。”

这里面七个人，全是小偷、诈骗犯和走私犯。我知道他们要欺负我，就挺着

胸膛走进去，来回晃着，伸胳膊蹬腿，好像很厉害一样，吓唬他们。我听到他们小声嘀咕：“这个人是部队出来的吗？”他们有点拿不准。

他们叫我扫地，洗马桶，为他们收拾睡觉的地方。他们在炕上睡满了，我只好睡在地下。那诈骗犯是领头的，让我把监狱规定背下来，“背不过就揍你！”

我老老实实站在墙边背，但我认识的汉字不多，他们又没有藏语，我背不下来，他们就对我不停地大喊，但他们说的全是黑话，我听不懂。那个诈骗犯说：“这个人不听话，你们做一下工作。”

“站直了！”一个小伙子喊着，冲过来一脚踢在我腰上。原来他们是真打我，我急了，挥起拳头打过去。他们五个人围过来，扯住我胳膊，他们人多，但力气小，我和他们乱打，边打边退，退到茅坑那里，捡起一块砖砸过去，砸在一个人身上，砖头断成两块，一块在我手里，一块掉在地下。那人被我砸得躺在地下，疼得哇哇叫。我怕他们捡起砖头打我，赶紧去抢起来，一手一块，追着他们一通乱打，他们怕我的砖头，吓得到处躲，但监室很小，他们跑不远，我拿着砖头站中间，他们就像旋涡一样绕着我跑。

我怕他们趁我睡觉时报复，一直不敢睡实，睡觉也握着两块砖头。其实也睡不着，因为肚子饿得咕咕叫。原来在乌鲁木齐看守所，虽然吃不好，但能吃饱，在库尔勒，稀饭稀得像水，一天只有一角馍馍，我的肚子一直响。有一天，我听到布谷鸟“咕咕”地叫，就想起去世的奶奶，想起妈妈，心想我的命为什么这样惨？但只是一会儿，其他的时间我一直念经。

后来看守把我分到另一个监室，这里的人和第一个监室完全不一样，里面有个小伙子，刚结婚，花600块买了个录像机，不知道那是小偷偷来的。警察说他窝藏罪，判了18个月。还有一个手脚弯曲的残疾人，只有16岁，去火车站送姐

姐，警察把一个包放他面前，他拿起来，其实那是个空包，警察抓起他来，在包里装上2000块钱照相，判了18个月。他还是个学生，从没偷过东西。这样警察完成抓小偷任务了。

我朋友和援藏基金会派来一个律师，律师看了我的资料，说警察完全违法，一定要打官司。后来里面有个队长，有文化，讲道理，他审了我两次就知道我没罪，对别人说：“没罪就是没罪，赶紧放了吧，已经超期羁押了。”

朋友为我交了四万块钱做担保，我出来了。看守所告诉我，我的问题将在六个月内处理，我要随叫随到。

他们再没有叫过我，反是我不停找他们，跟他们要那40多万，但他们就是不还我。我去了新疆11次，只追回了项链和天珠。“你再来要钱，就定你窝藏罪！”他们威胁我。

七个月后，西藏一位朋友陪我去新疆，他找公安的领导说：“你们全是违法的，如果不尽快处理好，我们要打官司。”

那领导紧张了，打电话给手下，要他们立即处理。

底下的警察急了，骗我说：“你认一个罪，就好解决了。你一点罪也没有，我们怎么处理啊？”

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罪，你们帮我定一个吧。”

11天后，我的朋友和公安继续谈，警察恼了，决定继续拘留我。他们谈话我没听懂，朋友用藏语对我说：“嘎玛，他们说话不太好听，你要做好准备。”我没听明白，也没在意。

我去卫生间时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在拉萨的老乡对我说：“嘎玛，登杜旺姆病得很严重，医院要2000块钱押金，她没钱，怎么办？”

登杜旺姆老妈妈是我们老家的，我在家乡资助了几十个老人，其中就有她。我很着急地说：“我明天就寄钱回去，让她住院。”

等回到办公室，我又被拘留了。这次是一个星期，天天提审，要我承认一个什么罪，气死我了。

他们说，要是不认罪，就给我劳教几年，“我们有权劳教，不用通过法院检察院。”他们说。

“那你们看着办嘛。”我说。

不过这回我有钱了，我带了7000块，衣服和日用品都是最好的，我就是做好了被关的准备。我天天请狱友吃手抓羊肉和大盘鸡。

一个星期后，他们要放我，让我写字据保证不打官司，我用藏文写：“你们公正解决的话，我就不打官司。”

他气坏了，撕掉字条要我重写。我写了不同的词，但意思还是一样：“有罪与无罪，公正处理，我不打官司。”他拿到纸条要我立即走，“你要发誓啊，对着喇嘛发誓，不打官司。”那喇嘛是他们请来当翻译的，警察也知道藏族人发誓管用。

我被无罪释放了，担保的四万元要了回来，但那四十多万再没要回来。

坐监狱对我是最好的教育，我这一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佛教，第二就是这次坐牢。

我在里面的时候，想到更敦群培，更敦群培要改革旧西藏，被旧西藏政府关进监狱，他写道：“尽管我在狱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想到真理的面孔，想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精神深处总是充满着喜悦。”他这样的大人物都经历过惨痛，而且那么乐观，我小人物受一点苦算得了什么？我这样一想，心里就不怎么难受了，一定要好好向他学习。

想想我小时候刻玛尼石的那个洞里，那个“毛主席喇嘛”，他命运那么惨，还是真心感谢毛主席。我连他修行的千分之一也达不到，但我们藏族人的教育和文化，让我们用佛教观点看事情：这是人世的因果，我坐监狱，是我今世或上世种下的因，怪不得别人，就像我爷爷经常说的：“你种下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就像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的影子总跟着你。”

监狱让我反思我的行为，我每天都想，我这一生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有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一开始我觉得很欣慰，因为我从来没有昧良心，一直按佛法的教导做事，不伤害别人，做生意总是你赚五十五，我赚四十五，绝不敢我赚五十一，你赚四十九。绝对不敢撒谎，否则我变成很脏的人，不管怎样念经拜佛都没用，这种道德要求比法律严格几百倍。

所以警察审问我：“你有没有违法？”我说“没有。”是啊，我没违反佛法，我无比正确。但在监狱里，我慢慢认识到，虽然没违反佛法，有些事也不该做，比如当时收藏钱币，国家一会儿说非法，一会儿说合法。比如一百年左右历史的地毯和家俱，那时候市场上公开流通，但有时候也成了非法，可我买卖了很多啊。我还买了很多佛像，有些是一公斤两块五买进来的。另外，买卖美金也不是什么正经生意。

就是以佛教的道德要求看自己，有些行为也是不妥的：也许因为康巴人的刚烈性格，我并没有好好交待，没有“供”出任何人。我说我从小出来做生意，从来是孤身一人，与任何人没有关系。他们骂我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当时我没有违法，但实际到了违法的边缘。如果不是看守所的经历，就那样走下去，说不定我会犯更大的错误，也许一辈子坐牢。

我不恨那些警察，反而有点感谢他们，后来我居然很想再看到那些警察，还

真的去看过他们。后来有的警察还请我帮忙，办孩子上学的事，我也帮了。

在里面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要趁这个机会学习啊，如果把我一直关在里面，我会一直修行下去，可惜没有喇嘛给我灌顶。我最大的收获是汉语，如果能呆半年的话，我的汉语应该是一流的。我为什么要学习？因为我刚知道文化有多么重要，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不懂法律。西藏人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但这个时候只有道德不够了，必须了解现代化的法律。

我在看守所的灾难，让我认识了什么是社会，我甚至觉得，要想成为伟大的人，必须有坐监狱的经历，否则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样子。我刚进看守所三天，那里就枪毙了三个人。有些犯人判了无期，有些20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坏人，还有被冤枉的年轻人，被坑害的残疾人。里面也有不同的公安人员。可你不在里面，你怎么知道这个社会什么样？你看电视上一个人被铐着，你没有感觉，可你与那些人一起生活，你就能体会那是什么感觉。你亲口咬了苹果，是甜还是酸，你自己知道了。

没到看守所的时候，我的思想还没有打开。到了那里面，我以前看过的佛经，一下子自动解释给我听了。以前我没经历过，你怎么解释我也不明白。现在我闻到了味道，看到了样子。

这里还是一杆秤，称出了人生的重量。藏族有句话：“这个人轻得很”，就是指人的分量不够。每个人进看守所里，都要重新考验自己的重量够不够。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佛教说这个社会很悲惨很肮脏，等我从那里出来，我才深深体会什么是悲惨肮脏，我看清了这个社会，其实它跟监狱一样肮脏悲惨。

我做生意时，不管怎样亏，从来不怕，相信能赚回来，我还要当藏区第一大商人，好像很了不起。可是在里面，我什么也不是了，我跟那些诈骗犯、杀人犯

和小偷一样，别人打我，骂我，我必须承受。这让我重新认识我是谁，我应该是谁，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这十年来，我老想做大生意，赚大钱，赚了十万不满足，还想赚二十万。我老想买部好车，修个好房子，欲望越来越高，但离佛教的要求越来越远。看到监狱里那么多受苦的人，才想到在外面平平安安地活着，原来是多么幸福，但我们贪欲太多，还是不满足。实际上我们只要拿出一点点爱心，就能很大地帮助那些悲惨的人，但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满足自己的贪欲上。看到真实的社会以后，我想，如果我平安地活着出去，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能帮别人做什么？

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回到拉萨，知道登杜旺姆老妈妈死了。当时我被拘留，没法给她寄钱，她去不成医院，很快就死了，才五十多岁。这是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这十来年，我经常痛苦地想像她临死的情景：她没人帮助，就那么孤零零地死了。如果别人能帮她，如果我当时不跟公安追钱，就有机会给她寄钱去，她也许现在还快乐地活着。

我对生意一下子没了兴趣，扣在公安局的钱不要了，值70万的皮衣压在我手里，我也不管了。我一下子变了，什么挣钱啊，生意啊，我没欲望了。我就想，还是按佛教的要求，为社会做点好事吧。如果一直做生意，不为社会做事，我这个“人”跟动物有什么区别？我的价值怎么体现？大部分藏族人接受的教育，就是要道德第一，我也不例外。从此我不想做什么世界第一了，我自己的事太小了，在看守所的经历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受苦，我来做点贡献吧。这个时候我才更理解，我第一次离家去拉萨时，奶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的话：“财富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佛祖。”

四十二 天珠王

1999年夏日的拉萨，嘎玛在家里与一些家乡人喝着甜茶。这处房子离大昭寺和布达拉宫都不远，他和表哥共住，高大的白色院墙内是南北两座二层房子，中间由过道相连，是典型的拉萨民居。房子底层出租给一些外地藏民。

嘎玛的部分收藏霸道地占据了三个房间，那些古老的佛像、酒具、茶壶、食具闪着青铜幽暗的光，将嘎玛和客人挤到墙角的卡垫上。

“那个台湾人又来拉萨了，悄悄收天珠呢。”一个老乡说。

“出价怎么样？是不是压得很低？”嘎玛问。

“很低。”老乡说。台湾人出价极低，但有些藏民不得不卖给他。想把家传天珠卖出去的人，大多急需钱用。

“太欺负人了！”嘎玛恨恨地说。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不少台湾商人来藏区收藏天珠，嘎玛与有些人有过接触，印象不佳。两年前，一位台商住进拉萨雪域招待所，请嘎玛为他做翻译，藏民们一个个恭恭敬敬把天珠给他看，请他出个好价钱。那商人把价压得几乎贴着地皮，而且态度强硬，动不动说：“你卖就卖，不卖拉倒。”当时天珠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嘎玛正在艰难地赚钱还债，手里的天珠只出不进，因此天珠市场成了外来商人的天下。

嘎玛劝他说：“有些品相好的，应该多给一千两千，这些人家庭很困难。”

商人不理会，嘎玛干脆反客为主，见有些人家需钱看病，就主动加上千儿八百，他似乎不再是商人的翻译，而成了藏民的说客。商人恼了：“你怎么这样！好像我在欺负你们。我要不买，你们西藏天珠没人要，这些人连饭都吃不上！”

嘎玛大怒：“你回去吧，别来我们西藏，我们不卖了！”转头对百姓们说，“不要卖了，太不值钱了！”

两人不欢而散。

而今天到拉萨来的这个台商，也令嘎玛有不愉快的记忆。几年前，债务像一堆烂泥让他拔不出脚来，有个40万的借款马上到期，他不得不将一串精美的天珠出手。这个台商感兴趣，在成都的四川宾馆与嘎玛谈，嘎玛说：“我这是十八万买来的，急着还账，你要喜欢，我们交个朋友，你在本钱上给我加一万五千块，一共十九万五千。”

嘎玛心里有数，若急于出手，这串天珠可以卖到三十万，但债务临头，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那商人微笑着，连连摇头。

嘎玛很失望，如果他要价三十万，那商人说不定以二十八万买走。为什么自己坦白交了底，而且要价不到二十万，他却不答应呢？

嘎玛说：“这样吧，我让一半，你只让我赚7500。”

商人还是摇头。

“我一句假话不说，本钱就是十八万，你不会让我赔本卖吧？”嘎玛说。

商人仍然不应。

嘎玛忽然明白，自己老实，把急于脱手的家底透露给人，人家便掐自己脖子。

“好，我不要7500了，我再让一多半，你只给我本钱加3600吧。”

商人不答。

“1800！”

商人终于说话：“我只能给你十五万。”

果然要让自己赔本，好狠！嘎玛越来越焦躁。藏人做生意有个习俗，如果一个天珠成交，交割时卖方往往多要求一点，或三百二百，或八百一千，就像讨个彩头一样，大家习以为常。嘎玛现在要的不是赢利，而是那个彩头，似乎坚守住那习俗，就可抵消他所受的屈辱。

“我不能赔本，十八万的本钱，就十八万给你，我另外也不要1800了，你给900吧。”

从中午谈到半夜，台湾商人纹丝不动。

“算了，”嘎玛说，“我再让一半，你给450吧。我连天珠线都给你。”

藏人习俗，卖马不会把马缰绳一起卖出，卖天珠也不会把串天珠的线一起卖。

“我一分钱也不能加。”商人说。

“我不卖了！”忍了一天的怒火终于撕开缝子，嘎玛一把抢过天珠，站起身来。

“可以啊，随便你。”那商人仍然好整以暇。

嘎玛出门便走。

身后追出一人，是那商人的藏族助手，他对嘎玛说：“450他不加的话，我来加嘛。”

嘎玛不理他，急步下楼，忽然“噔噔噔”快响，楼梯上飞奔下一个喇嘛，那是商人的朋友，鞋子都来不及穿，光脚跑了下来，拉住嘎玛，“别生气嘛，好好谈，你还是卖给他吧。”

“我发誓！”嘎玛说，“什么450，什么900，什么1800！看你的面子，他要买就加7500，我一分钱不让了！”

那商人最后以十八万七千五百买下天珠。

嘎玛暗下决心：“等有一天，西藏的天珠由我来控制！我们藏民的珍贵宝贝，不能让人家这样便宜夺了去。”但他的财力无法打败外来商人，挫败感一直持续着，直到1999年夏天。

从新疆看守所出来后，嘎玛更热心投入援藏基金会的事。援藏基金会只在有藏区的省份设办事处，嘎玛建议成立广东办事处，以便从海外筹资。援藏基金会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嘎玛为广东办事处主任。筹办办事处的所有花销和几年的员工工资40多万，都由嘎玛捐助。嘎玛将广东办事处筹得的善款用于藏区的教育、养老和医疗。他自己的生意陷于停顿，那颗做生意的心，像是睡着了。

但这位台商的“入侵”惊醒了他。

他让朋友们注视着台商的生意，有一天消息来了，表哥多登说：“有人有颗十二眼天珠，大小、颜色都很好，台湾人出价低，他没卖。”

那人是昌都老家的，来自经常与嘎玛的孜荣部落争夺草场的那个村庄，儿子赌博欠了20万，父亲只得来拉萨出售家传天珠还赌债。

“台湾人出多少钱？”嘎玛问。

“28万。”十二眼天珠很少见，极为珍贵。“那人家里很困难，我们是不是帮帮？”多登问。

“行啊。”嘎玛说。

“你要不要先看看天珠？”表哥问。

“不用了，你看过就行了，他要多少钱？”

“40万。”

“好嘛，就40万。”

“你疯了！”表哥吓一跳，“30 万他肯定卖！”

“天珠好，40 万不贵。”嘎玛说。

那位昌都人欢天喜地将天珠送来，“能不能再加 1000？”那人手持串天珠的麻线问。嘎玛又多给他 1000 元。

40 万一颗天珠！消息如连环响雷炸在藏人头顶，人们拿着天珠拥挤到嘎玛门前。台湾人出价一万的，他给两万，台湾人出价两万的，他给四万。

消息传得飞快，人们源源不断来到嘎玛家，排着队卖天珠给他，队伍排到院子里。“嘎玛，帮帮忙，收下我的天珠吧。”人们恭敬地对他说。价格由嘎玛定，大家知道，世上再没第二个人出价更高。他彻底搅了局，天珠再没什么市场价格，只有一个“嘎玛价格”。

嘎玛没钱了，紧急飞到成都和广州处理其他生意，换回现金，然后拎两个沉重的包回到拉萨，一只黑包，一只红包，两个包里塞满了钞票，一共 500 万。他刚进家门，立即又被包围。

也有那体面人家不好意思当众卖天珠，把嘎玛请出门外，悄悄拿出天珠给他看。那天珠是家族传下来的，他们怕别人知道了丢面子，变卖祖先的遗产不是那么光彩。

嘎玛的两个包又空了，他急于收手却欲罢不能，天刚亮门前就排了一队人，一个个脖子上挂着天珠，让他连早饭和午饭都没空吃。人们一个个到他面前，恳请他收下天珠，嘎玛无法拒绝，他不能厚此薄彼，收了这个人的天珠，却不收那个人的。

每一天，他的收购价都比前一天高出一点。一位藏人有颗很小的九眼天珠，曾对那台商出价30万，台商没要，这位藏人送到嘎玛这里，“可以。”嘎玛只说了两个字，以30万收下。有一天他又碰到一颗极好的九眼天珠，出价60万，再创记录。市场的巨大力量令他吃惊：天珠从尼泊尔和不丹迅速涌向拉萨。天珠在90年代初流向境外，但嘎玛举着大旗一收购，天珠立即回流。

嘎玛紧急高息借款，但不敷使用，只得与藏民商量：只付八成，余下二成日后再付。饶是如此，藏民仍踊跃而来，生怕嘎玛将大门关上。嘎玛用小白纸写下条子，上面写着成交价格，签下嘎玛桑珠的名字，几个月后卖主拿小条子来要余款。对藏族人来说，有没有收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的信任，但一次收几百颗天珠，嘎玛怕弄混了，便写下欠条。

又一个星期后，当嘎玛收购了总价1600万的天珠时，西藏、青海和四川的天珠原地翻倍，尼泊尔和不丹的天珠流水一样涌回西藏。

嘎玛说了几百遍“不好意思，我没钱了”，人们仍蜂拥而至，挤在他的房间和院子里。嘎玛见无法收场，坐上飞机一溜烟逃到成都，睡了一个舒服觉。第二天早上有敲门声，开门一看，几个人手拿礼帽，弯腰行礼：“嘎玛，帮帮忙，收下我们的天珠吧。”他们从拉萨追踪而来。

从此很少人卖天珠给台商，那台商找到嘎玛，尴尬地要求看看他收购的天珠。“没什么好看的啊，”嘎玛笑道，“大部分你早看过了，只是你没要。”

台商一直看好那颗小九眼天珠，请嘎玛转让给他。“可以，”嘎玛说，“45 万。”

“什么！”台商吓了一跳，“几天前我 30 万都没买！”

“我俩不一样嘛，”嘎玛笑道，“你认为 45 万不值，我认为 45 万太便宜。”

几个月后，嘎玛在厦门将这颗天珠卖给一位台湾女士，成交价 62 万。

嘎玛此番收购之后，天珠价格涨了一倍有余，并从此每年以百分之三十的幅度提高。嘎玛的目的达到了——提高天珠价格，让藏族的珍宝得到尊重，藏民的

利益得到保护。从此嘎玛桑珠有了另一个名字——“天珠王”。

几个月后，“天珠王”偶尔看到一份《青海日报》，上面有篇文章《扎多和他的江源生态经济圈构想》，讲一个叫扎多的青海藏人成立民间组织，建诊所，建帐篷小学，救灾，保护环境。“扎西多杰，”嘎玛念叨着，“这个人了不起啊，我也可以做这样的事。”

大哥仁青桑珠和三弟晋美朗加在家乡带乡民保护神山，嘎玛想得更远大，他要保护青藏高原，保护藏族文化。一切的美德和幸福，要从传统中寻找。

个人之力微乎其微，若把百姓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了。他想到援藏基金会，有一年玉树大雪灾，援藏基金会募集了1400多万善款。没有一个人能有那样的力量，他应该成立一个组织。

嘎玛到青海玉树注册“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他申请了两年之久，听到最多的疑问是：“你们保护环境？不是有政府吗？用不着你们。”

两年中，他两次去找扎多未果，甚至有一次站在扎多那个黄土墙的院子里，望着紧闭的房门，怅然而返。2001年底，他终于打通扎多的电话：“扎多老师吗？我叫嘎玛桑珠，我想和你聊一聊。”

接着电话，扎多眼前浮现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不知怎么回事，扎多早就闻名的“天珠王”，在他心里是个小老头的形象。“这个‘天珠王’说话挺客气。”扎多想。

两人在西宁见面。“天珠王”原来是个小伙子，拖一条粗大的辫子，身穿皮夹克，十分精神。

“我听过可可西里的故事，哪知道就是你们啊。”嘎玛说，“我找了你好长时间，想请你到‘三江源协会’帮忙。”

扎多也想去一个更大的平台，“胡子帮”一直窝在治多县单枪匹马，有点施展不开拳脚。

嘎玛说：“你的‘促进会’是有传承的，是索南达杰的继承人，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如果你到州里来，我绝不会要你放弃‘促进会’，你只不过有了更大的天空。我们‘三江源协会’有平台没经验，你来做吧。”

这句话让扎多极满意，他答应与嘎玛合作，但如果到200公里外的结古镇工作，就不能兼任公务员。“三江源协会”没有薪水，而博雷在鹿厂工作，每月只赚700块，如果失去政府那份工资，全家就喝西北风了。

嘎玛的岳父江格活佛时任州政协副主席，可以协调官方。县里告诉扎多，放心去工作，反正政府也要保护环境，他的宣传部领导职务取消，但薪水保留。

扎多离开那间宣传部长办公室，回头一看，桌上的灰积了一层。在这个位子上一年的，好像什么事也没做。“不好意思。”他心里对那张桌子说。

2002年3月，“三江源”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成立，嘎玛是法人和秘书长，扎多是常务副秘书长。会长是个荣誉职位，由江格活佛担任。

扎多以前做环保偷偷摸摸，现在光明正大了。4月份，扎多获得环境保护“地球奖”，他与嘎玛到北京领奖，同车的还有加拿大人马克。三人从玉树出发，向北过了果洛州，快到海南州的河卡山口，一路上山，险峻异常，扎多说：“这里弯太急，经常翻车，死过好多人。”

他们刚拐过一个大弯，猛见一辆油罐车由前面50米处俯冲下来，好像失控了，两秒钟后，油罐车突然飞起，头尾旋转着砸将下来，几乎贴着嘎玛和扎多的车飞过去，直甩向坡下，油洒出来，猛喷到嘎玛和扎多的车窗上。

“啊——”嘎玛和扎多失声大叫。如果他们的车再往前十米，就会被砸个稀烂。惊叫声中，只见两个人从油罐车驾驶室里飞出，甩在地上，巨大的油罐砸到一人身上，又“轰隆隆”滚出去。

他们急忙冲下山坡，看见一人死了，另一人重伤，还有一个司机被压在驾驶室里，痛苦地叫着，腿拧得像条麻绳。在他旁边，汽油不停从油罐里流出来。

嘎玛、扎多和马克拼命去拉司机，但驾驶室被挤扁，司机卡在里面。“来帮忙！”嘎玛冲路上几辆车喊，那些车飞驰而过。

“先救这一个！”扎多喊。

三人将那甩出来的伤员抬到路上，嘎玛站在路中间拦住一辆车，强行将伤员抬上，让司机送到河卡镇抢救。

三人又冲下山坡，那司机仍痛苦地呼喊。三人手拉、脚蹬、肩膀扛，仍无济于事。

一个小时后，许多藏族人骑摩托车驰来。“太好了！”嘎玛喊，“快来帮忙！”

那些人停下摩托车，手拎塑料桶跑向油罐车，将桶口对准流出的汽油。

三人目瞪口呆，也许魔鬼来了，也不会让他们如此震惊。这边一个人奄奄一息，那边人们兴奋地争抢汽油。“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嘎玛心里翻来覆去地说。

他冲过去大吼：“人都要死了，你们还要抢汽油，你们是不是藏族人？！你们是不是人？！”

四个小时后，他们眼睁睁看那个司机断了气。

他们继续赶路，嘎玛郁郁寡欢：如果是他们农村藏族人，全村都会跑来救人；而这些路边小镇上的人，更富裕，更接近“文明”，却成了钱的奴隶。

扎多所受到的心理冲击远没有嘎玛那么激烈，他见得比嘎玛更多。他一个朋友来玉树，凌晨四点乘出租车，被司机夫妇勒住脖子，他用力跳出奔驰的出租车，捡回一条性命。那司机夫妇是曲麻莱的藏族人，他们的凶器，是一条圣洁的白色哈达。

“人们还以为藏区是梦想中的和平之地，可如果没有佛教，藏民会变成食肉动物。”扎多愤愤地说。

四十三 神山圣湖

在德钦与木梭分手后，扎多、尼玛和我一路沿滇藏线到拉萨，2006年5月17日下午，快到拉萨了，扎多表情严肃，装上一张新唱碟，一声声“嗡嘛呢呗咪吽”流出来，唱得我心里一片宁静。

“布达拉！”扎多大叫。我急忙伸长脖子，但见一座高高的红白两色建筑从拐弯处一下扑到眼前，在刺眼的阳光下，有点模糊。

我激动起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激动。那是扎多的圣地、嘎玛的圣地、仁青的圣地、木梭的圣地、尼玛的圣地、耿登的圣地，唯独不是我的……我为什么激动？我问自己。

扎多挺直身板，拢拢头发，整理一下牛仔衬衣的领口，拿起颈上的木念珠，轻轻念着经。我们很快进入拉萨市区，但拉萨忽然不见了！我似乎到了郑州、昆明、兰州或任何一个内地城市。我们在一条宽阔的江苏路上行驶，丑陋的千篇一律的水泥建筑挡住了布达拉。

“真悲哀，”扎多说，“藏文明在消亡，这里只剩下一个布达拉，只剩下一个建筑了。”

住进酒店，扎多换上干净的抓绒上衣和白色裤子，郑重地往头上打着发胶。一只苍蝇飞过，他下意识地用手一抓，这样的动作，我从未见嘎玛、仁青、木梭、尼玛和耿登有过，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如果你不说藏语，就凭这个杀生的动作，没有人认为你是藏族。”

他笑道：“我在西宁上学时，有一个牦牛尾做的拂尘，专门用来打苍蝇，不知怎么回事，我好像忍受不了一只苍蝇。”

我们走到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经过我面前，我数了大约一百个行人，没有一人穿藏装。10分钟后，终于见一个穿藏装的男人开着摩托车过来，停在我们面前，摘下头盔，露出一张笑嘻嘻的脸，仁青桑珠！他17岁的大女儿躲在爸爸身后，羞涩地低着头。

仁青桑珠身穿黑色藏装，缠一条绿腰带，女儿穿一身运动衣。父女二人从包里拿出白色哈达，献于扎多、尼玛和我颈上。他与老友扎多拥抱，然后拉着我的手走着，温和地笑，一边用大拇指摩挲着我的手背。我有点不习惯与人如此亲热，但知道他很赤诚，还是任他拉着手，两人语言不通，努力“呀呀呀”地叫着，用手比画。

我和仁青上一次见面是在半年前的康定。本书中的大部分人物——扎多、仁青、木梭、尼玛和耿登，参加了那次康定的“神山圣湖”保护会议，也是那一次和仁青的见面，让我最终决定写这本书。

2005年11月28日，耿登给白玛旺姆送玫瑰花的第四天，我和他、扎多以及尼玛同坐一车去康定开会。耿登有些醉意，大部分时间在昏睡，心中时不时想着那个姑娘。

第二天在扎多的翻译下，我和仁青桑珠交谈，几天后在《南方周末》发表报道《神山圣湖守护者》：

“手机实况转播”

41岁的仁青桑珠，身穿藏袍，坐在会议室前排，紧盯着北大校长许智宏的脸。

这位来自西藏贡觉县大山里的农民，没上过一天学，听不懂普通话，但在11月29日，他坚忍地坐在会议室里，紧盯许智宏，希望从他的脸上猜出他所说的话。

他右耳上塞着手机的耳机，这不是追求时尚，而是在进行一场“实况转播”：电话的那一头连着西藏贡觉县，几十个农牧民聚到仁青桑珠的家里，打开电话的免提，屏住呼吸，想知道这位北京大学校长说些什么。

在他们心中，从来没有一个会议是如此遥远，也从来没有一个外面的会议是如此近——会议上讨论的“神山圣湖”保护，与他们息息相关。窗外，他们所保护的森格南宗(狮子)神山高高矗立着。他们想知道，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护神山，外面的人怎么看？

许智宏校长说，神山圣湖是藏族人民神圣的地方，很多圣湖也是重要的高原湿地，它们的稳定对于藏区、全中国乃至东南亚的生态安全和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西南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但又非常脆弱。这里的保护已引起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多的基层干部和社区百姓投入这项事业，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社会各界都应该支持。

仁青桑珠通过自己找来的业余翻译，弄明白了许智宏的话，立即兴奋地将这一信息转告给家中的老乡们，然后想关掉手机。

“仁青桑珠，你不要关手机，让我们听听会议上说些什么。”他村里的朋友索南求培说。

“可你们和我一样，听不懂汉语。”仁青桑珠说。

“没关系，你就开着吧。”乡民们说。他们将耳朵凑近电话机。这是他们极少的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每当听到会场爆发出笑声，乡民们急急问仁青桑珠：“他们

在笑什么？与我们有没有关系？”

仁青桑珠再请人将发言翻译给家乡人，他为了实现这次“实况转播”所充值的300元话费，像家乡热曲的水一样，很快哗哗地流走。

但豪爽的藏人是不在乎钱财的，他们在乎的是神山圣湖，他们热爱的家乡。

一个藏族村庄的环保实践

仁青桑珠的家乡有一座名为森格南宗的神山，庇佑着这里的世代藏民。“我爷爷那时候还有茂密的森林，有老虎、野人，可后来树全砍光了，像剃了光头。”仁青桑珠说。

保护神山的传统，令藏民极为珍视生态环境。他们开始种树，但因为不知道政府的政策，只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2003年初，青海三江源保护协会的扎西多杰来这里告诉村民们，种树可以光明正大，这是政府鼓励的事。“村民们心里一下子亮了。”仁青桑珠说。他们立即成立了“森格南宗生态保护协会”，1300名村民都是会员。这年春天他们开始种树，计划一万棵，可到哪里找这么多树苗呢？

2004年，从政府来的喜讯几乎将他们冲击得站不住脚。贡觉县这一年有80万棵沙棘种植任务，可找不到人种，正愁完不成呢，一听村民要树苗，林业局一下给了他们40万棵，还有其他树种4万棵。

“哇！这么多树啊！”村里人激动得睡不着觉，唱着歌跳着舞，满山遍野去种树。当山上的小树一点点多起来时，村民们要巡山了。在历史上，根据部落法律，每家每户要派人骑马巡视神山，防止偷猎。巡视之后他们才决定资源的利用：哪里的树可以砍，什么时候砍。

村民也讨论这样的问题：狼来吃羊怎么办？最后他们决定，谁要是打死一只狼，罚款50元。也就是说，当狼威胁到农牧民的生活基础时，可以打死狼；但通过罚款又告诉大家，这种杀生行为是不被鼓励的。

之所以要讨论狼的问题，是因为2002年之前狼多成灾，村民不少奶牛被咬死。但2004年到2005年，一只牛羊也没被吃掉，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灵！我们的环境只保护了一年！”仁青桑珠高兴地说。

村民们发现庄稼地里有动物来过的痕迹，像是岩羊，这提供了对这一奇迹的解释：村民们保护神山，种树种草，野生动物多起来了，狼有了食物就不再袭击牛羊。但野生动物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仁青桑珠说，好像山神给动物们打了个电话：“这村的人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了，你们都去吧，狼也不要吃他们的牛羊了。”

村民们更加相信人与自然是可以对话的。

村民们开始清理神山，2003年春天，50个村民在一座山上捡了三天，将所有垃圾捡出来，一片纸都不留。他们在地下挖了一个坑将垃圾埋起来，上面撒上草种。村民们细心地观察着，春天过去了，草没有长出来，夏天过去了，草还没有长出来。看来这个方法不行，造成了二次污染，他们将垃圾刨出来晒干，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可山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垃圾呢？

这里出产虫草，很多人上山挖虫草，将生活垃圾随手扔到山上。仁青桑珠知道，不能禁止挖虫草，因为大家太穷了。村民再次讨论之后，决定允许挖虫草，但必须将自己的垃圾背下山，挖虫草刨的坑也要填起来，将原来的草皮补上。村民们讨论的不仅是环境保护，还有生计问题：如果挖了坑不填起来，三年之后草场破坏严重，虫草就没有了。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这些制度。

仁青桑珠说：“这些道理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而是自己讨论后认识到的。这也是民主讨论的好处，它让村民们自觉行动。”

仁青桑珠自己办了一份藏文小册子，名为《自觉》。在这本小册子上，有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佛教有关生态保护的教义。里面还有一句话表明这个村庄环境保护的首要原则：“以国家的稳定、民族政策和法律为依据。”

可是复印一本需要十几元钱，仁青桑珠的小册子只印了50册发给村民。“我没钱了。”他笑着说。在康定的会议上，仁青桑珠拿着这本小册子给与会代表看时，“保护国际”的中国首席代表、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当场承诺，资助他们印刷更多的小册子，发给附近的村民，让大家都能来保护环境。

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山圣湖”

吕植教授说，西部山地生态保持良好的地方，大多因为有神山圣湖的存在。当地百姓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护自然环境，已经惠及东部，可发达地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国家在西部建立了大量保护区，但因为人员和资金的缺乏，有的保护区一个人要管理上万平方公里，要达到有效管理绝无可能，因此保护区的管理模式要改变，要与当地社区百姓的环保行为相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对类似于仁青桑珠和村民们所做的“社区保护”，应给予法律认可。

但会议出现一个小小的争论。四川省甘孜州档案局研究员得荣·泽仁邓珠解释“神山圣湖”的起因说，远古时候，藏民族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科学解释，因此产生了本能的敬畏大自然的心理，这是藏民族保护生态观的形成之始。

但云南卡瓦格博文化社的木梭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站起来说：“如果这样，是

否意味着“神山圣湖”是迷信落后的？”

仁青桑珠说，这不是迷信，是藏族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慢慢形成的环保文化。藏民族生活的青藏高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方，在人类发展中，藏族人比其他民族经历了更多的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在藏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中都有反映。

正在自费整理、保护藏文资料的仁青桑珠认为，藏民族对自然的感受最深，很多藏族文化就来源于对环境的体验。很多外来人说，藏民族文化中有一些朴素的环境保护因素。“其实它不是‘朴素’的。”仁青桑珠说。他认为，藏民族的环境保护文化，已上升到生命之间平等对待的高度，他们尊重自然，尊重生灵，因此在青藏高原上，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了好多好多年。

而在其他地方，环境保护是工业污染所带来的迫切要求，不是因为对其他生命的尊重。仁青桑珠说：“我们村民保护环境，是遵从传统文化，很快乐地去做，没有其他目的，而外面的人做保护环境——”他两手伸出，做了一个拧湿衣服的姿势，“是被法律和钱挤出来的。”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没有结论。与会的世界著名动物学家、作为外国人第一个获准进入西藏羌塘无人区进行研究的乔治·夏勒博士的话，令仁青桑珠印象深刻：“必须保护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我们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山圣湖’。”²⁶

²⁶ 原文发表于 2005 年 12 月 8 日《南方周末》，略有删节。

四十四 爷爷奶奶的转世

我的文章没有细讲扎多与仁青的见面。2003年春天，扎多随嘎玛去贡觉，见到仁青，两人相见恨晚，促膝谈了三夜。仁青说，村民们想保护当地的森林，但怕政府不同意。2002年，县公安局来打猎，仁青看见他们打死一只獐子，不敢当面说，要护林员去告诉公安局，当地村民不高兴他们打猎。公安局很生气，弄辆警车在村里响着警笛开来开去，村民们很害怕。

“你们不用怕，”扎多说，“你们属于长江源天然林保护区域，大胆做！你们的做法受国家保护。”

扎多建议他们成立协会，并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扎多临走时，仁青在热曲桥头给他献上哈达，并像送情书一样悄悄递给他一封信：“你所说的，就是我所想的。我找到了知己。”下面郑重盖着一个印章。那印章是嘎旺法王送给他的，平时作为护身符带在身上，上面印的不是名字，而是普巴金刚。

扎多成了仁青最敬佩的人，“他说话跟我吃肉一样，一块是一块，清清楚楚，逻辑分明，说到我心坎上去了。他说话就像我们部落头人。”仁青对我说。

在拉萨，仁青放下摩托车，带我们去转大昭寺。几十个藏族人在大昭寺门口不停磕着长头。大昭寺正门之上，两个像鹿一样的动物仰头望着中间一个镀金法轮，法轮常转，意指佛法常存。

“这不是鹿，是藏羚羊。”仁青说。他研究古象雄文化时，在古书里发现了这种图形。象雄古国在藏北，那里是藏羚羊的栖息地，也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发源地，仁青认为这种图案形成于苯教与佛教融合时期。

“为什么要用为藏羚羊图案？”我问。

“因为藏羚羊讲规则，何时迁徙，何时产仔，绝无变化，就像因果。”他说。

我们到了他在八廓街南边的家，那是一个白色院墙的小房子。刚刚坐定，尼玛走进门来。他代表吕植教授给仁青送来2000元钱，支持他印刷保护环境的小册子。我开玩笑道：“尼总，出手就是钱啊。”

他笑道：“是啊，这么大的事，我不出手，其他人办不了啊。”

仁青打开电脑。那是一个活佛捐赠的，他用来整理香曲多杰的经书。仁青得意地给我们看他输入的藏文字，他会写十几种文体，有些文体很多藏族人从不知晓。很多字体在软件中没有，是他自己在电脑中鼓捣出来的。扎多说：“他脑子里没有任何教条，没有做不成的事，就是不停地试。”

他曾在打字室里碰到一位藏族教授，那位教授说，肯定有什么法子在电脑中开发藏文软件。仁青听了觉得好笑：他已经做过了。“他们觉得电脑总是红头发蓝眼睛的人做的。”仁青说。

仁青又给我们看他在电脑上处理过的照片，一个大仁青桑珠将一个小仁青桑珠抱在怀里，他乐得哈哈大笑，对尼玛说：“你懂汉话，也懂英文，你要是做，肯定能创作出不少好东西。我们藏族人脑子很聪明，可惜很多时候不去用。”

嘎玛进门来，他与扎多见面就谈工作，一谈就争吵。嘎玛说：“在藏区保护环境时，应当强调民族和宗教文化，比如说‘如果动了我们的神山圣湖，我们就死定了’。要让国家认识到这种文化的敏感性。”

扎多说：“但国家早有相应的官方词汇，比如‘十一五’规划中已规定，哪些地方适宜开发，哪些地方有限开发，哪些地方绝对不许开发。我们不能光提‘神

山圣湖’，而要将保护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中。”

“光正统的官方说法没什么用，”嘎玛说，“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强调，比如说我们老家有个地方挖金矿，把神山挖得一塌糊涂，挖到了老百姓的房子前。我们跟上面说，这威胁到藏民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这样一说，立即管用了。”

“这只是临时的方法，不能长久起作用。”

“孔子的家乡有棵古树，高速公路修到那里，为了保护那棵古树，公路分岔过去。如果那棵树没有文化，怎么可能保住？”嘎玛说。

“那树之后肯定有相当的力量，有人为它说话。”扎多说。

“后面有多大的力量也没用——如果树没有文化，没有价值。”

“藏族无数的寺庙，都是有文化的，但保住了吗？我要解决的是总体问题，你说的是一个点上的策略。如果你强调我们的文化需要保护，神山圣湖需要保护，那么，你对谁说话？建设部？环保局？文物局？林业局？他们都不管神山圣湖，你无路可走嘛。”

“我们就是要讨论策略问题嘛，”嘎玛说，“要会用方法，如果我大声叫‘扎多！’，你不高兴，如果我轻声温柔地叫‘扎多’，你就高兴了。‘神山圣湖’这个词敏感，我们就不提了，但要强调文化历史背景，你们客人来了，要尊重我们的文化。”

“但还是没解决法律地位问题啊。”扎多说。

“但‘神山圣湖’这个词，无论如何进不了法律啊。”嘎玛说。

“这样一个点一个点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布达拉宫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都被破坏，没有法律地位的神山圣湖，命运能好到哪儿去？”

“你要打开脑子啊，”嘎玛急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比如‘保护传统文化’，这在法律中肯定有啊。”

谁也说服不了谁，嘎玛要用宗教和文化传统保护环境，扎多不拒绝这一点，但他认为用“主流话语”——比如法律和科学术语来游说，会更有效。在主流社会，人们认为“神山圣湖”是愚昧的迷信。

一个多月后，嘎玛又对我说起这个话题：“拜神山圣湖不是迷信啊，不是我拜你，求你让我发财，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我尊重你，让你平安，我们大家一起平安。”

他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去四川的路上。离开拉萨一个多月后，2006年7月初，我与扎多从玉树出发，行驶三天到昌都贡觉孜荣部落，见到嘎玛和仁青。两天后，扎多与仁青继续深谈，我与嘎玛及嘎玛的朋友、香港生意人马先生一起离昌都赴四川。7月5日夜里，我们刚驶离嘎玛家乡时，两辆警车闪着警灯迎面开来，开往孜荣。“是不是出大事了？”嘎玛自言自语。

孜荣部落与江达县的角雄部落相邻，两个部落为争草场几十年来冲突不断，最近几天又剑拔弩张，我们在嘎玛老家时，任村长的嘎玛三弟晋美朗加忙于处理争端。

嘎玛说，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就有证据证明那片草场是孜荣部落的，但人民公社时期，角雄村人强行将帐篷搬到这片草场，从此两个邻居反目成仇，几乎年年武斗。这几天双方又有摩擦，公安机关也在介入。嘎玛忧心忡忡，但我们所走的地区大多没有手机信号，他急也没用。

我们过金沙江后到德格，沿金沙江东岸南行到白玉县，到亚青寺拜见阿秋法王。当我们7月6日到达亚青寺时，正逢大法会。亚青寺是目前藏区比丘最多的寺院之一，有僧尼4000多人，但见大草地上红压压全是僧众，男僧与女尼分区

而坐，在绿绿的草原上围成一个巨大的红色四方形，静等阿秋法王传法。

嘎玛换上一身庄重的深色藏装，手捧哈达躬身走上一个临时搭建的红房子，将哈达献给法王。法王约 70 来岁，身穿黄色丝绸僧衣，安详端坐。房子很小，里面只可容两人坐下，马先生腿脚不方便，由昌都雇来的司机扎西背上台阶，俯在法王面前。嘎玛只得站在窗外，脚踩在窗台下的横木上，身体趴在窗台上，下身窗外，上身窗内，两手合十面对法王，静听传法。我一直担心他失足掉下去，那窗子离地两米高，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香曲多杰在世时，是宁玛派（红教）最受人尊敬的大喇嘛之一。宗教恢复之后，四川色达五明佛学院的晋美彭措法王和亚青寺的阿秋法王，是红教中的佼佼者，受万人景仰。

嘎玛想成立三江源协会时，许多亲戚朋友反对，“这是国家的事，不是私人能办的，你有钱还不如花到寺庙呢。”大家这样说。嘎玛向阿秋法王请教，“好！”阿秋法王说，左右手拇指一起伸出，那意味着好上加好，“大胆去做！”

嘎玛信心大增。

嘎玛的妹妹出家为尼，曾有幸被阿秋法王传法。10年前，嘎玛的弟弟晋美朗加病得严重，腰直不起来，不能走路，嘎玛带他到成都和拉萨看过很多医院都治不好，晋美朗加最后去请教阿秋法王：“佛爷，我的腰到底怎么了？我做错了什么事？”

法王说：“你家东边的山谷里有棵柏树，与你们家族很有关系，柏树的一根树枝断了，你去治好它，你的腰就好了。”

晋美朗加又问：“我阿奶去世了，请问要念什么经？”

“不用念了，”法王说，“你们念得太多，她早转世为人了。”

“请问我阿奶转世在哪里？”

“就在你们后面一户人家，你阿奶现在是那家人的女儿。”

“佛爷，你能不能说得仔细点？我们家后有十来户人家。”

“她刚刚生过一场大病，差点死了，你们知道吗？”法王说。

晋美朗加猛然明白了。奶奶去世一年后，后邻家生了个女儿，起名为德钦桑姆，她出生不久就病了，好不容易才活过来。

法王又说，她的父亲是入赘来的，她的爷爷很早去世，她爷爷辈还出过一个喇嘛。

晋美朗加不必再问了，一切明明白白，准确无误，法王所说，与德钦桑姆家无不相符。

“那我爷爷呢？”爷爷在文革末期去世，家里不敢做法事，只有嘎旺法王半夜偷偷来念经。

“你爷爷转世成了一匹白马，身上有黑斑点，就在你们南边的村子里。”

“佛爷，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

“他家有五口人，一个老人，两个小孩子，就在你们南面的村子里。你回去一问就知道，那匹马很特殊。”法王说。

晋美朗加回到家，先去南边舅舅家所在的聂拉村问，果然在那户人家里发现了那匹马，那白马身上布满黑点，看起来像一只豹子，非常罕见。如凯家说那是爷爷的转世，给了对方一匹马，又加上许多钱，把那匹马换了回来。

至于自己的病，晋美朗加想，法王所说的树在哪里呢？也许是哥哥嘎玛小时候砍树的地方？但不对啊，法王说应该在东方。

他请村人用担架抬着他，向东走进山谷，去看如凯家族的“拉信”，那是一

棵一千多年的大柏树，一直是如凯家族的“生命树”。当地人相信，一个家族是否兴旺与“拉信”有直接关系，如果这棵树受伤，家族就要发生不好的事。

晋美朗加走到那棵柏树旁，心中一惊：一根大树枝断裂开来。他急忙请来一个喇嘛，喇嘛将一种药抹到开裂的地方，再用哈达包起来，下面用一根木头撑起树枝，然后喇嘛在一边念经，晋美朗加磕着头。

突然树下水声隆隆，好像一股气喷出来，在场许多村民都听见。那喇嘛说：“给树治好了病，你的病也会好起来，对全村人也有好处。”

晋美朗加从此不看医生不吃药，居然很快站起身来，而且能转狮子神山，早上天不亮走，晚上回来，一天转一次，那一年步行转了59次。

如凯家对爷爷转世的那匹白马很好，不骑它，也不让它干活。与爷爷一起驮经书的那匹白马已过世，小马驹“弟弟”也不在了，这匹新来的“爷爷马”每日独自上山吃草，幸福地度过十年寒暑后，有几天没有回家。晋美朗加上山寻找，发现它已离世，安详地躺在草地上，如熟睡一般。

奶奶的转世德钦桑姆现在13岁，如凯家人及亲戚私下称呼她为“阿奶”。在得知她是奶奶的转世后，嘎玛回家去看她，看着这个快乐的小女孩儿，嘎玛眼前浮现出奶奶慈祥的面容，他胸口一痛，几乎掉下泪来。

嘎玛兄弟与“阿奶”家族商量，希望“阿奶”长大后出家为尼。她父母没有异议，大家都认为，出家才是她摆脱轮回、通往终极幸福之路。

四十五 什么是天堂

拜完阿秋法王，二十多个红衣尼姑将嘎玛簇拥进一个白帐篷。嘎玛家乡有40多位尼姑在亚青寺学习，法会期间，她们借这帐篷作临时住所。她们礼让嘎玛坐在一条小桌后面，上面摆满了水果、油炸面食和瓶装饮料，然后成弧形排开坐在嘎玛面前。她们老的七十多岁，年轻的二十来岁，最小一个只有十来岁，她们生活贫寒，除了一袭红袈裟，一无所有，但人人喜笑颜开。

“在你们心里，嘎玛是什么样的人？”我问五十来岁的比丘尼古汝卓玛。

“什么人？嘎玛是那种要帮助全世界的人。”她笑道。

尼姑们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嘎玛说：“我以前和你们一起砸石头、砍木头、背垃圾，穿得破破烂烂。现在我还是原来那个嘎玛桑珠，没什么了不起；你们现在学佛念经，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所有众生，你们才了不起。”

他从包里掏出一沓崭新的钱递给古汝卓玛说：“这是一万块，每人一百，剩下的大家买顶帐篷。”

按藏族习俗，共用的帐篷是家乡人的财产，等这一批尼姑离开，会留给新来的乡人使用。

“用不了这么多，我们只买一个帐篷就行了。”古汝卓玛将钱递回来。

嘎玛又将钱放到桌子上说：“你们生活艰苦，心里却装着众生，我不如你们，也帮不上别的忙，请收下我的心意。”

我们告别，尼姑们将白色哈达一条条挂在我们颈上，我与嘎玛几乎淹没在一大堆白云中。她们拥在车窗前向我们频频挥手告别，我心中热热的。

我们驱车去色达县五明佛学院，嘎玛从昌都租来的丰田吉普是部旧车，慢腾腾的，耗油很多，我们提心吊胆赶夜路，生怕它把我们扔到哪个山顶上。好在足够幸运，当它在半夜烧尽最后一滴油时，刚巧把我们送到甘孜县一个加油站。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大门外，佛学院海拔3700米，进了山门还需爬山几公里。

1980年，喇嘛晋美彭措到荒无人烟的喇荣沟，白手起家创建了有32名学员的小型学经点，十几年之后，这里成为世界最大的佛学院，常驻学员数千人，一说超过一万人，其中女尼占一多半，也有汉僧在此学经。晋美彭措法王于2004年1月圆寂。

两个年轻和尚和一个警察拦在路口，说山上修路，一切车辆须停山下，人们只能步行上山。

我们同行的马先生腿脚不便，平地尚借拐杖和轮椅行走，更别说数公里山路。我们眼见有些车辆从身边开过去，并非“一切车辆须停山下”。

嘎玛与两个和尚协商，但没有结果。我对一个和尚说：“你们不能照顾一下残疾人吗？他是来拜佛的。”

那和尚说：“如果放他上去，其他车都上山怎么办？”

我说：“其他车上也全是残疾人吗？”

他扭头走开，不再理我。

我们费了20分钟的口舌后，倒是那位警察比和尚善良，截住一辆运沙子的卡车，嘎玛将马先生背到驾驶室里，陪马先生坐车上去。我慢慢爬山，越想越生气，真想回来跟那和尚理论一番：“你来这里学佛，不是要学慈悲吗？为什么对残疾

人一点慈悲心也没有？你连残疾人也不帮，普度什么众生！”

爬着山，慢慢意识到自己发怒不对，学佛不是要克服“贪”、“嗔”、“痴”吗？于是自己化解：正因为他没有慈悲心，才需到佛学院学习，也许十年二十年后就学来慈悲心了。于是心里慢慢平静下来。

越往山上走，越感震撼。但见几面山坡上，成千座红红的木头小屋一个连一个，从山脚到山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将数面山坡覆盖成大片红色，蔚为壮观。

上万僧人在此学经，将原本荒凉寂静的山谷变成圣地，颂经声嗡嗡不绝。《感动》那首歌的第二段，便是歌作者思念晋美彭措法王。

但令人触目惊心的不仅是恢弘的佛学院——旁边的河谷里，我看见垃圾遍地。这是个巨大的社区，后勤服务与管理难以跟上。

我随嘎玛去见一位喇嘛，这是一位中年活佛，清瘦苍白，能讲汉话，书架上摆着许多有关生命科学的汉文书籍。

嘎玛介绍了自己做环境保护的事，然后说：“我们要处理好自己的垃圾啊，”他以往见活佛不敢这样说话，但今天不客气了，“我们佛学院有这么好的传统，这么好的法王，身边这些小事情也应该做好，保护环境。”

活佛说：“在佛学院成立环境组织很难，要慢慢来。”

嘎玛说：“环境保护并不难，我会介绍环境组织教你们。我大哥仁青桑珠那些村民自发保护环境，现在山上什么垃圾也没有。这里是佛学院，只要活佛说一句话，大家就能做到。”

司机扎西终于将吉普车开上来接我们，我们在夜色中下山，却不断被尼姑们拦在路上。她们不多说话，只是往车里扔哈达和酥油。这都是嘎玛帮助过的乡人。

走到半山腰，一个中年男人拦在当路，这是索那久美，热情地拉嘎玛去他的木头房子里坐坐。嘎玛第一次到拉萨时，在八廓街碰到的第一个乡人就是他，他带嘎玛找到了表哥多登。

他并不是出家人，只是与妻子和两个娃娃住在这里，以学佛为业。我喝着酥油茶，吃着人参果，看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有许多活佛的照片，嘎玛赫然在列。我问嘎玛：“你帮过他吗？”

“我忘了。我帮了村里一些人，不知道有没有他。”嘎玛说。

下雨了，我们一路泥泞往炉霍县前行。马先生突然开言：“嘎玛，你来这里觉得很有意义，可我觉得这里很可怜，看到环境这样，我心里难受。”马先生也是一位佛教徒。

“哪里不好了？”嘎玛问。

“脏乱啊。还有，很多小孩子被父母带来，小孩子有机会进佛门是他的造化，但他是不是自愿呢？他们到了这里，再没机会接受学校教育了。我现在有点迷失了，难道说一修佛，别的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吗？可能这里是天堂，但天堂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可怜。”

嘎玛答道：“什么是天堂？不是穿的好，吃的好，而是进入佛教的深处。他们不在乎穿破衣，吃冷饭，如果说他们的幸福重一百斤，我们的幸福只有二十斤。按米拉日巴的观点来看，我们才是神经病。打个比方说，修行人的幸福就像尝到了果汁的滋味，而我们看到的只是果汁的外包装，我们知道配方、原料，但并没尝到味道。尽管尝过果汁的人努力告诉我们这果汁怎么甜怎么酸，我们这些只看包装的人都无法想像那滋味到底是什么。就刚才这个男人来说，我的物质条件比他好，但他肯定比我快乐。”

我笑道：“你享受现代文明，各国周游，做很多大事，你说不如他快乐，你愿不愿意和他换一换，你过他的生活，他过你的生活？”

他笑了：“那我跟他换一年嘛。”

“为什么只是一年？既然你说他更快乐。”

嘎玛没有回答，却说：“昨天我对那些尼姑们说，我吃得好，穿得好，为穷人花钱，为喇嘛花钱，我很快乐，但我的贡献比不上你们——我是天天花钱，你们是天天念经。我花钱是为自己，你们念经是为众生。我就是花上100万，也不过花到几个村子，几十个老人，几座寺庙，与你们相比，这个贡献太小了。”

我说：“如果你在寺院里天天念经，能帮助那些僧人、老人和孩子吗？有些人可能生病死了，孩子没学上，环境破坏，文化不能保存。而你建养老院、建学校、修桥，帮助了很多，也保护了环境和文化，这是很大的功德。但这么多出家人让别人供养着，对社会到底有什么功德？和尚尼姑都是藏族的聪明才智之士，可这么多精英进了寺院，不从事创造和生产，藏族的经济社会怎么发展？如果只有少量的僧侣在寺院，其他人在社会上做善事，做创造性的工作，藏民族才能进步。都来当和尚，都想成佛，结果越想成佛越穷。”

在此之前，我对藏传佛教怀着美好的憧憬，后来到藏区次数多了，发现我憧憬的只是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如“大慈悲”与“大智慧”，而现实中的寺院体系与喇嘛阶层则让人感到些缺憾。但作为外来人，我小心谨慎，不敢口出不敬，生怕自己无知而狂妄。但亚青寺与色达佛学院之行令我有些压抑，才提出疑问。

有不同看法的并不只是我和马先生这样的外来人。我在拉萨碰到过洛嘎，他曾担任拉萨市长，在任时做过许多好事，是嘎玛敬佩的人，现在退休了，也在做发掘和保护藏族文化的事，他告诉我：“佛教的确阻碍了藏族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点不承认不行。”

画家和历史学家耿登虽因爱情还俗，但仍是虔诚的佛教徒，对佛教研究深入，他到亚青寺和色达五明佛学院时比我感觉更强烈：压抑、失望、痛苦。

他曾对嘎玛说：“你到这里很高兴，但我不喜欢，不满意！我反对藏族那么多人当喇嘛。”

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家乡的村子有2000多人，有自己的寺院，200多个男人当了和尚，就有200多个女人找不到丈夫。热贡地区有50多个寺院（就是现在的黄南藏族自治州，包括同仁、泽库两县），各村情况差不多，很多女人或独身，或嫁给外族人，改变信仰。

他说：“这问题很严重：一是违背了自然规律；二是一个民族的人口减少；三是信仰丢失。我对家乡的喇嘛朋友们说，你连自己族人的信仰都保不住，当什么喇嘛？问题的根子就是喇嘛太多了。我觉得很悲哀，所以劝有些喇嘛朋友还俗，我知道他们不合适出家，受不了戒律，但迫于社会压力不好意思还俗。我劝他们与家乡的女孩子结婚，这样后代照样是佛教徒，否则我们藏族人会慢慢减少。”

他说，藏族人瞧不起“扎落”（还俗者）是落后的想法。“只有喇嘛才能修行成佛”这种观念不正确，藏族历史上很多大修行者并不是喇嘛，如玛尔巴大师、米拉日巴大师、莲花生大师；阿底峡大师最重要的大弟子仲敦巴是噶当派创始人，有五个儿子，也没当过喇嘛。“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佛教徒不一定当喇嘛，所有人都可以修行。”

耿登了解佛教理论，发现佛教界的许多做法不符合佛教要求，这令他痛苦。

“有些地方的寺院修得非常好，有什么‘全世界最大的塔’啊，‘最大的佛像’啊，但寺院旁边就有很穷的人家。真正的佛教追求的不是华美的塔和佛像，而是

人心的善良。你寺院那么富，旁边的孩子却上不起学，吃不上饭，你把建塔的钱用来让他们吃饱饭、教育他们的思想不行吗？”

他认为，佛教是来解脱众生的，有大方便法门，什么办法方便就用什么，如果释迦牟尼在今天传法，肯定会改变办法，抛弃僵化的教条。

“佛教本质是好的，但必须改革，跟着社会一起进步。任何人都可以修行，都可以学习，未必一定进寺院，那么多人进寺院，对藏族人不好，”他说，“当然，我还俗是因为女人，不是因为从理论上看清了，但我还俗以后明白了这道理。”

我问嘎玛：“佛教是为众生更美好、更公平、更有智慧，这需要有出家人，也需要大量在家人做善事。我不明白的是，在寺庙里念念经，什么也不做，怎么就能成佛呢？”

嘎玛说：“不是只念念经，而是要通过学经让自己的心态变成佛，就像身上脏了，我们把自己洗干净。成佛是为了帮助别人，也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成佛，拯救所有众生。我在新疆看守所时，晚上念一个莲花佛的经文，突然想到，这里面好像只为雪域民族祈祷，不对啊，我想，为什么只是为雪域，而不是为全世界？嘎旺法王也教过我，念经不要只为自己，要为全社会。所以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不要老想什么藏民族啊，汉民族啊，也不要老想文革之类的旧账，佛教是为众生的。”

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在德格以北的四川石渠县，大修行者巴珠法王一直在山洞里闭关，他妈妈生了病，临死想见儿子一面。哥哥骑着牦牛找到弟弟说：“妈妈要去世了，想见你。”

巴珠法王说：“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如果父母死前我都要一个个看望，怎么看得过来？”

哥哥大怒：“这就是你学的佛吗？你的生命是母亲给的，母亲的痛苦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众生的痛苦？你怎么拯救众生？”

巴珠法王是位智者，在辩经中从无敌手，哥哥一句话却让他张口结舌。是啊，我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安慰，怎么能利益众生，怎么拯救全世界的母亲呢？他急忙去追哥哥，但哥哥已走远。他徒步越过湿地，却被扎曲拦住，他见母心切，涉水而过，险些被水冲走，最后见到妈妈。

“这故事和你刚才说的相似，批评只在寺院中念经的喇嘛，”嘎玛对我说，“我也批评过很多这样的喇嘛，但真正的好喇嘛并不这样。”

我们半夜到达炉霍，嘎玛嘟嘟囔囔说明天换个车回成都，这个车太慢了，而且太耗油。马先生不乐意换车，他喜欢这个司机扎西。

第二天早上，嘎玛在街上找了一辆桑塔娜，把我们的行李装进去，让扎西自己开车回昌都。马先生脸色难看，看来非常生气，但没有说什么。

我们启程后10分钟，沉默中的马先生突然爆发，“嘎玛，我瞧不起你！”他从副驾驶位上回头冲嘎玛大喊，脸涨得通红。

嘎玛怔住：“怎么了，马先生？”

“你为什么让扎西回去！”马先生吼叫。

“那辆车太耗油，一天要花500多块啊。”

“我给你出油钱！扎西辛辛苦苦陪了我们好几天，为了几百块钱，你就把他赶走！你让我瞧不起！”

嘎玛手足无措，语无伦次：“对不起啊马先生，我不知道让你这么生气，对不起对不起……”

马先生不再说话，嘎玛也不知道说什么，车里气氛紧张沉闷。一小时后马先生打破沉默，语气和缓地说：“扎西人不错，我们没必要为省几百块钱就不给他生意做。你嘎玛做那么大的生意，怎么能在乎这点钱？怎么能这样做人？”

嘎玛这才缓过神来：“我是为了他啊！从我们家乡到成都的车费，我都付给他了，平时加油，是他自己付钱，他不用到成都的话，从这里回昌都，就能省下两天时间和一千多块油钱。”

“啊？你怎么不早说啊？”马先生吃了一惊，“我还纳闷，这个嘎玛怎么变了？”

大家笑起来。“我为了他，还另租这辆车，多花800块钱。”嘎玛说。

车子过新都桥，越折多山，经康定一路向成都而去，路上嘎玛又谈起佛教：

有件事我一想起来就着急：人们越来越经不住钱的诱惑，再过20年，如果一个大喇嘛对人说：“我给你灌顶，传你法。”这个人也许会说：“哎哟，我忙着赚钱呢，没时间。”

人们要没有佛教的教导，就会败给金钱。我们昌都的老百姓现在学坏了，他们有点钱就跑到城里，那里好玩的东西全有：女人、赌博、喝酒，一两年就把财产玩光了。他们在城市里学会了享受，但怎么满足那需要？只有变成小偷和坏人。

对西藏文化威胁最大的不是文革，文革破坏的只是表面，实质上没多大冲击。现在冲击最大的是全球化，是商业化，是钱，是追求享受。你这一路也看到了，喇嘛和年轻人喝的是什麼？不是酥油茶，不是奶茶，是百事可乐。外来的商业文化冲击进来，藏族人根本无法抵抗。

所以，藏族人要幸福地生活，就要从佛教中寻找，用佛教调整对钱和欲望的态度。西藏佛教是讲慈悲的，但在我看来方法不对，在寺庙和佛像上花了太多的钱，如果花到其他方面会起更大的作用，比如在贫穷的村子里办教育，培养出一个人才，会有多大的功德？科学发达了，经济发达了，如果不跟着佛教的原则走，会出错。但你批评的有道理，把钱全投入寺庙，老百姓还怎么活？怎么可持续发展？经济不发展，佛教也无法发展。我自己后来减少了对寺庙的捐助，因为我认识到，光修寺庙和佛像，保护不了西藏文化。

我们回到成都，嘎玛家乡部落冲突的坏消息终于传来。当我们还在色达五明佛学院时，贡觉县长经过江达县角雄村，角雄人将他的车砸了，一块石头砸破车窗，弄伤了县长的脖子。“我们的县长被打了！”孜荣部落群情激愤，准备复仇，晋美朗加在努力压制。

7月10日晚上10点半，嘎玛接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长途电话。他为解决两村矛盾已努力多年，今夜角雄的人来电，请嘎玛安抚孜荣人，不再扩大矛盾。嘎玛说：“第一，你们打县长大错特错；第二，咱们两个部落为一块地争斗，也是大错特错。连狼都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关系，难道人不要吗？我们这两个村子，笨的像动物一样！”

在嘎玛看来，责任完全在对方，他们应该先让一步。但他自己是孜荣部落人，只好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嘎玛曾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将有争议的草场划为自然保护区，但未被接纳。双方将更多的热情付诸肉体搏斗，他们大量购置武器，角雄村配备了二百多支小口径步枪和土枪；孜荣村规模略小，也有约一百支，那碧绿的草地似乎要变成厮杀的战场。

更大的威胁从争斗双方的背后袭来：一个巨大的铜矿正在动工，挖掘机剖开神山的肚子，毁坏草场，污染水源。嘎玛寝食难安。

四十六 佛啊，给我力量

嘎玛刚放下电话，仁青桑珠的电话打进来，“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们爱打打杀杀，就让他们杀去。你费那么多时间和钱，还不如忙自己的博物馆。”

仁青不喜纷争，也不愿弟弟卷入这些俗事，他更喜欢读书、写字、念经。

两个月前，我在拉萨见到仁青桑珠的当天晚上，扎多和我们俩走在拉萨街头。路边一个旧书摊正在收市，仁青桑珠弯腰捡起几本藏文小册子，花十块钱买了八本：有《六青年的故事》和《青颈鸟的故事》，是感人的佛教故事；还有几本语法书，另有一本《扫盲课本》，一本《生物学汉藏词典》，大都是80年代初出版，最早一本出版于1974年。

“这些故事书我小时候看过，特别有意思，”仁青桑珠边走边说，“小时候看书听故事，为什么比现在看电视要有趣得多？可惜很多口传故事要失传了。”

扎多说：“对藏族文化的破坏，商业比文革更严重。文革的摧残，藏人可以用内心抵制。但在钱面前，大家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化。”

我给尼玛打通电话，里面嘈杂声一片，他在歌厅唱歌。“尼玛，明早去大昭寺拜佛去！”

“太好了！”他说，挂断电话，继续唱他的流行歌曲。

第二天早上6点，仁青桑珠、扎多、尼玛和我赶到大昭寺门口，许多藏人在晨曦中的大昭寺门口磕头。我们沿八廓街转大昭寺，莲花式街灯闪着黄黄的光，半个月亮远远钉在清冷的天上。三三两两的藏人围着大昭寺转经，有一男人衣衫褴褛，系一条牛皮围裙，手上绑着两块木板，不停仆倒，站起，迈上两步，站在额头磕地的地方，两手合什后举过头顶，再仆倒在地，用身体一点点缩短与佛祖的距离。不知这个人磕了几个月才到拉萨，额头上鼓起一个大包，那是数月来一步一磕头磨成的厚茧。

在八廓街上有白色的煨桑炉，尼玛将松枝扔入炉中，火光闪闪，浓烟升起，他双手合什，闭目祈祷。当年他失意中从成都来到拉萨，便是借着炉边的温暖，度过拉萨的冷夜。

转了一圈，扎多也对着大昭寺磕起头来。仁青桑珠笑嘻嘻地东张西望，一个汉人小伙子在大昭寺门边盘腿打坐，双目轻阖，两手轻放膝上，引得仁青吃吃而笑，“那人，像佛。”他用汉话对我说。他闭上眼睛学那人的样子，然后哈哈大笑，乐不可支。

他心中有佛，加之率真朴实，反而不在乎磕头拜佛之类的仪式。

磕完头，大昭寺还有一个小时才开门，我们又顺时针沿八廓街转起来。扎多面有忧色，我从未见他如此严肃。这些日子来他心情不好，特别是从云南到西藏一路走来，所见所闻，让他悲伤压抑。他一边转经，一边与我聊着。

这一趟走过来我特别绝望，那么美丽的大江大河、森林和雪山，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深深地爱着青藏高原，可外来人感觉她美，是想来玩，来消费，来盖宾馆、做生意赚钱。你想想我们一路吃的是什么？川菜；住的宾馆什么人开的？

外地人。外地人来赚大钱，藏族人只能为他们打工，赚点小钱。

青藏高原就像一幅名画，这张画宁静、和平，像是理想世界香巴拉，可是人们随便糟蹋她：旅游、开矿、炸神山、砍森林、修大坝。青藏高原衰败得似乎连喘气的力都没有了。

东部的人以赚钱为目的来到西部，眼里只有钱。谁来发现这张“名画”的价值？谁有能力和爱心来保护她？

我的工作就是告诉当地百姓，他们才是主体。但当地人缺乏知识和经验，投资商来了，他们有经验，投多少，赚多少，何时溜，心里非常清楚。但当地百姓没经验，外人来了，百姓还高高兴兴唱歌跳舞欢迎他，可人家把钱赚足了，撤了，留下一个烂摊子，那时当地人才知道上当。

文革时藏民没有权力，现在自己能做主了，但又出现了钱和权两种势力，钱和权高高站着，中间是矮小的藏民，只有藏民站得跟钱和权一样高时，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不是要当地人与外来人抗争，我喜欢和谐，不喜欢对抗。这么多年来，我们中国人终于能吃饱饭，不容易，所以不要对抗，对抗的结果都是悲剧。

可我看不到保护这张“名画”的力量在哪里。我扎在基层做环保，教仁青成立组织，在索加教村民保护野生动物，看起来很有成效，很令人激动，可看到这么广阔的青藏高原被破坏，我悲观失望：我埋头努力上几年，只是杯水车薪，到底能有多大作用？我这样做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我阻挡不了这张“名画”被糟蹋。

说到这里，扎多对仁青桑珠说：“我很绝望，不知道怎么办。”

“你要坚持。你要想想那些高僧大德，他们是怎么坚持的。”仁青桑珠说。

“当整个冰山都塌下来的时候，一个人坚持有什么用？”

仁青桑珠说：“有一口铁锅倒扣在路上，路人经过，你踢一脚，我踢一脚，踢得大家注意了，咦，这口锅怎么扣在这儿？说不定就有人掀起它。如果你也不理，我也不理，它就一直扣在那里。现在就需要你来踢这一脚。”

“我为什么没有你那么乐观？是我出了什么问题吗？是我佛性不够？我的信仰不够坚定？”

“这不是信仰，而是因果。你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做一点点善事，就会有果报。”

仁青这句话戳到扎多痛处——他仍没有相信因果。他继续对我说：

我和你这个汉人的教育背景差不多，都是上学读书，考虑问题用的是逻辑推理而不是信仰。但我目前的迷茫用逻辑推理解决不了。当官、弄钱、买房子，对我没有吸引力。我现在有点小名声，参加国际会议，但我不为这些小东西沾沾自喜，我超越了这个境界，但我仍没看到未来的路。如果我坚信因果，那么只要努力去做，种因就行了，不必管果。但我不像仁青和嘎玛，我做不到，我需要在逻辑推理上说服自己，我需要科学结论。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不迷信，可我真不迷信吗？

我有一个喇嘛朋友，他很无奈。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哲学思想，安慰别人的心灵，但老百姓不需要这些，老百姓希望他会算卦，知晓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不显灵，他还是喇嘛吗？普通百姓不需要哲学，只需要迷信。所以，他们病了时就请喇嘛算上一卦，看佛是怎么说的。

喇嘛知道自己不是医生，但如果不占卜，他在百姓心中就算不得喇嘛，他只好装模作样算一算，答案总是这样：“你必须上医院，要不很危险。”

百姓说：“唉呀，医院太远了，太贵了，你再好好算一卦，看能不能不去。”

他很为难，难道要装出先知先觉的样子来吗？

不只是普通藏民，其实人人都迷信，如果人人不迷信，都明白了，那就达到佛的境界了。我们的迷信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比如说我们相信一种牙膏能让牙变

白，因为中央台做广告了。这不是迷信吗？我们迷信得厉害，迷信唯物主义，迷信发展主义。我们掌握的知识太少，但往往凭着这些小知识来判断整个世界，狂妄无知。

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的物质富裕，我去过埃及、印度，与他们相比，中国物质足矣，但失去的是健康的情绪。我们喝果汁嫌没滋味，住宾馆嫌无法上网，以前步行几个月的距离，坐飞机一小时就到了，但我们嫌飞机晚点，嫌坐飞机太热、太挤、太累。我们没有幸福感，没有人之间的信任，没有社会的和谐。我做环保不仅追求环境美，更重要是追求人间的和谐，各阶层的和谐，各民族的和谐。很多人认为，你的和谐不是我的和谐，其实不是这样，没有小和谐不是存在于大和谐中。

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怎样做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利益，而是为了众生？这样的思想必须来自大智慧。我感到幸福的是，我正在接近佛教。虽然没人监督我，我也不撒谎，我想把修行做好，我不是指藏在深山里，而是修行到以纯粹的心态来做事。这几年我有了进步：我比以前更实在，而且感到这实在是多么重要，不撒谎不虚伪是多么难能可贵。

很多保护环境的人有情绪：“我做了好事，我多好啊，别人对我多么不公平啊。”这就是心态问题，没把“自”与“他”处理好。

我所说的修行就是这个。我有时晚上醒来，心里特别乱，乱得像山上大风中的经幡。我在做修行，想让自己静下来。

以佛教来看，我知道我的一切由因果而定：我出生在草原，我是孤儿，牧民们帮助我，我碰到索南达杰，我去可可西里，我做环保，这都是因缘。我过去的40年一晃而过，后面的三四十年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佛教是

不是可以给我一张地图，让我照着路标走？我怎样才能获得大智慧？

仁青桑珠有大智慧，人家都夸他：仁青真聪明啊，是大学者啊。但他不为所动，自自然然，从来没觉得自己了不起。很多人活在别人的眼里，不管多有学问多有钱，总是看别人的眼光，虚荣，摇摆不定，做世俗的奴隶。但仁青桑珠不是，他超乎潮流，他的自信来自对佛教的坚定信仰。

我和仁青、嘎玛最大的区别是信仰，我们的传统从1958年就断了，没有佛教，而他们的传统保存了下来。传统的不同决定了做事方式的不同，对他们来说，佛教是第一位的，他们用宗教看一切，我用现代知识看一切。

我们还有不同，嘎玛是乡里走出来的商人，仁青桑珠是喇嘛和农民的代表，而我上过学，是走出家乡的干部。我们这些上学的人有太多毛病，太小聪明，太自私，算计自己的事情多，防范心多，容易受挫折。嘎玛不，他是劳动人民的特点，对人真诚，心胸宽广，如果事情不成了，天要塌下来，他照样乐呵呵。他不是“百折不挠”那种艰苦的奋斗，而是很快乐地对待一切挫折。当了干部的藏族人就跟老百姓不一样，我们想的是目标、计划、执行、总结、组织架构、分工。嘎玛慢腾腾的，软和和的，好像没什么计划，散漫，结果他最有成绩。佛教让他相信：播下种子，就会收获果实。

我的困惑也对嘎玛说过，他对我说：“你越往前走，路越来越宽。”他原来做商业，很多是毫无把握往前探险，每一步回头看都很害怕。西宁、新疆、成都，每次他都是没做好准备，就稀里糊涂冲进去。没有那种探险，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就是坚韧不拔，就像马奔跑起来，他抓着马尾巴，打死也不放手，最后终于骑到马上。

每当想起他小时候割草的情景，我就很激动，如果我是画家，真想画下来：

大雪纷飞，一个小孩子割着草，一只小马驹陪着他。虽然很累，可小男孩很快乐。

我激动的是他良好的心态，我不如他，“我是环保英雄，索南达杰的秘书，成立藏族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我了不起！”这心态不好，如果没有观众，我还能做下去吗？比如现在我就怀疑自己，这几年我做了什么？有多少人听到？改变了什么政策？没有。我失望，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心里想跟老婆回老家，养上几头牛，什么也不干了。我希望自己也能有仁青和嘎玛那样坚定的信仰，让信仰给我力量。

大昭寺的大门打开了，我们从怀里掏出白色哈达，两手捧着，摩肩接踵随人流涌入，终于看到那金光闪闪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所有藏民心向拉萨，就为能将一条哈达献在他的脚下。我和扎多献上哈达，将额头触一下释迦牟尼的右膝，从释迦牟尼身后绕一周出来。

我和扎多远远站在佛的面前，双手合什。

我合上眼睛，感到佛慈悲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照着我的全身，我努力舒展呼吸，想让心思沉静下来与他对话，可我心中纷乱，“我要什么？”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来青藏高原？为什么要跟随这些人的脚步？为什么像他们一样站到你的面前？我知道我一直在寻找，可我忽然不知道我在找什么。

“请你给我大智慧，让我摆脱小我，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我喃喃地重复着，泪水流出眼角。

扎多站在佛前好久好久，他嘴角蠕动着，泪水含在眼里，深深地祈祷：

“佛啊，请你保护青藏高原上的生灵，让它们和谐共存。”

“佛啊，请你给我妻子和女儿智慧、健康和爱心。”

“佛啊，我小时候与妹妹分开，没能照顾她，她到处流浪，很可怜，请你用慈悲滋润她的心田。”

“佛啊，请给我对你坚定的信仰，给我力量走下去。”

回到拉萨

一

嘎玛和我冲到成都机场，手忙脚乱扑向行李柜台。去拉萨的飞机马上就要飞了。

我们从北京来，先到成都，从机场打一辆出租车冲进他家搬上打印机，不管满地的纸张回身往机场奔去。他在拉萨需要打印机。

这是2007年8月的一天，嘎玛在北京机场丢行李的整整一年后。嘎玛八岁和六岁的女儿平时在这里上学，两个小姑娘的汉语比藏语流利。现在她们和妈妈珍嘎在玉树度暑假，等珍嘎回到成都，看那一地狼籍，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贼，而不是丈夫。

嘎玛将打印机和箱子推到托运行李柜台，柜台后的小伙子说：“会超重的。”

“什么！你怎么知道超重！”嘎玛叫起来，情绪激动，让我吃了一惊。

“太奇怪了，你没称怎么就说超重！绝对不超重！”嘎玛喊着。

“好吧，称称就知道。”小伙子冷冷地说。

他麻利地将几个行李称完，不动声色地说：“超重，交罚款三百二。”

“你们太欺负人了！”嘎玛把右手举到头边，不停打下来，那是他愤怒时的动作，“你搬下来，一个个称！”

“可以，”那柜员道：“不过飞机马上起飞，你想试试吗？”

我对柜员说：“请你少算几公斤，不要罚那么多。”

“不行。”他已被嘎玛激怒。我去交了罚款。

“怎么这点行李就超重？你们太欺负我们藏族人了。上次在这里你们欺负我们，还叫来那么多警察，我知道，你们就是专门欺负藏族人。”嘎玛喊着。他脸涨得通红，语无伦次。上次他在机场丢行李时，似乎要损失上千万，仍气定神闲，为什么今天为区区小事大动肝火？

我拿了行李标签催嘎玛登机，嘎玛看到三张行李票，恍然大悟：“啊，你还有个箱子啊，我忘了，以为我们就两件行李呢。”

但他怒气未息：“上次他们在这里欺负我们十来个老乡，我们老乡什么也不懂啊，他们就叫来几十个警察。”

我不知那一次谁对谁错，但今天却是他的问题。他像一头野牦牛，对藏族人一点点不尊重的迹象，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假想，就会让他红起眼睛，亮出犄角。

但没等登机，他又嘻嘻呵呵，若无其事。飞机越过川西进入西藏上空，我看到下面土黄色的澜沧江，过了江就是他的家乡。他透过舷窗向我指点几个部落争夺的草场。

“看，看，就是那个地方。”嘎玛向我指着一处远山说，“唉，都斗了几十年了，我一定要解决一下！”

到了贡嘎机场，他的表弟接我们到拉萨，住进嘎玛的“西藏天珠之路文化研究中心”，这是我一年之中第二次来这里。这房子属于在英国的阿贡活佛，阿贡活佛在英国建立了西方第一个藏传佛教中心，并筹集大量善款，为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建医院和学校。下面两层是阿贡活佛的两个侄子居住，还有一些其他

租户，嘎玛租了第三层。

耿登正在一个宽大的房间里研究藏品，他目前是嘎玛“天珠之路”研究所主任。我们已有半年未见面了，他热情地欢迎我。

嘎玛给我看一个特别的收藏品，那是一面镶黄边的红色锦旗，旗上以黄线绣着毛泽东侧面头像和他的手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落款“毛泽东”。下面另有一行小字：“中央代表团赠”。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派出以陈毅为首的代表团，这锦旗便是中央代表团当时带去拉萨的。陈毅赴拉萨的途中赋诗曰：“明日拉萨会亲友，汉藏一家叙别情。”²⁷

嘎玛放下锦旗，让我看门边一个黑黝黝的铁筒，那是英军1904年江孜之战中的大炮。江孜一户农家将其作为牛栏的门闩，嘎玛去年以五万元购得。

江孜之战并不是藏人第一次反抗英人侵略，却是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当时噶厦政府积极抗战，各地藏人纷纷来援，据江孜堡垒以御英军。英军以大炮轰开堡垒，随即北进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内地。一味退让的清廷驻藏大臣有泰向朝廷参劾达赖：“查本年战争，该达赖实为罪魁。”昏慵的清政府不查实情，旋即革去十三世达赖名号，遭到西藏僧侣官民强烈反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外蒙古度过一年多流亡岁月，直到清廷迫于西藏民众的请求开复达赖名号。

十三世达赖圆寂于1933年，第十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1939年坐床。²⁸

江孜之战是重大历史事件，因为对待英国侵略态度不同，清廷与达赖喇嘛反目，对汉藏关系有不良影响。而且从此之后英国更多插手西藏事务，伺机侵占西藏地方，炮制出“麦克马洪线”，造成直至今日尚有争议的中印边境问题。

许多机构看中了锦旗和大炮，因为它们见证了西藏近、现代史最重大的事件。嘎玛对我说：“这些有政治意义的收藏，我在考虑是不是捐给国家，我的收藏最好只集中于民俗文化。”

他从架子上拿下一个黄绸子小包，微笑道：“这才是我最宝贵的，给多少钱都不卖。”他一层层打开黄绸子，露出一块折扇柄大小的木片，上面印着几个似乎是藏文的字母。这就是他在新疆买到的木简，“这块木头启发了我，改变了我的一生。”他曾这样告诉我。这块木片令他追索青藏高原上最古老的象雄文明。

他与一位小伙子搬起那尊他设计式样、从尼泊尔定做的斗篷佛像，放入车中，运到林廓东路新开张的福朋喜来登酒店，安置到大堂里。这是拉萨第一家国际酒店，装潢漂亮，老板郭先生是嘎玛力邀来拉萨的。因为嘎玛的坚持，酒店外观设计成藏式风格。为庆贺酒店开张，嘎玛将佛像送来，笑呵呵一边欣赏佛像，一边赞叹：“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他对我说：“藏族传统文化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汉族人，而是全球性的商业化。”生意人涌向拉萨，赚走金钱，破坏文化，嘎玛知道无法阻挡商业化，但他想把尊重藏文化的商人引进来，保障当地人的利益和传统文化，同时让当地人学习管理经验。

嘎玛还想把美国“凯悦”引进拉萨，那是著名的豪华酒店管理集团之一。他与主席汤姆士·贝思佳谈判时，要求酒店的设计尊重藏族传统，他甚至想将酒店设计成朝拜布达拉宫的样式。汤姆士·贝思佳讥讽道：“我的客人要住的是酒店，不是体现你们农奴制的布达拉宫。”

嘎玛反击道：“全世界的客人来拉萨，要看的是西藏传统，而不是你的现代

²⁷ 平措汪杰，《回忆扎喜旺徐同志》，手稿

²⁸ 丹奔昂珠，《西藏百年》，《民族团结》杂志 1998 年第 11 期

化酒店。”

现在汤姆士·贝思佳似乎已被嘎玛说服，正认真考虑这一建议。

嘎玛与我出了酒店去转大昭寺，边走边说：

在我一生中，保护文化最重要，不管汉族还是藏族的，不管象雄还是波斯的，我都想保护。每个人享受生活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赚几千万几个亿，我做生意的话不会输给他们，但最让我享受的是保护文化，每当收藏了一个好东西，哎呀，我心里太舒服了。

但我们的文化每天都在丢失，我要抢救。我以前买卖天珠，后来才想到，天珠是我们藏人的宝贝，卖掉就没有了，应该收藏下来。我为什么把博物馆叫“天珠之路”？就是要研究这一文化。四千多年前，天珠文化起源于象雄，并传播到整个藏区，以及克什米尔、阿富汗、两伊、波斯、新疆、尼泊尔、印度、缅甸和我们国家内地。

我希望我的博物馆不仅让人观光，还要开展学术性研究。西藏的寺庙有非常多的收藏，但我们学不到啊。就像佛教，看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学，但没有一个平台，只有喇嘛和尼姑才学得到。但佛教的本义不是这样，谁努力，谁有缘，谁就能学佛。但老百姓学不到佛，就会迷信，我们去亚青寺看到那么多人，有多少人明白道理？很多百姓只满足于被活佛摸一下顶。

我介绍西藏文化，不仅对藏族，对整个中国、亚洲和全世界都有好处。我并不是说藏族文化了不起啊，我要把它宣扬到全世界。这只是多样性文化的一种，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每个文化都有历史，看到历史，人就会明白道理。我们用考古手段来追溯象雄文化，也许会得罪很多喇嘛，因为在释迦牟尼之前象雄文化就有了，很多喇嘛不高兴，好像我不信佛。其实我信的是佛教的道理，但历史是另一回事。

弟子问释迦牟尼：“你是神吗？”

“我不是。”

“那你来做什么？”

“我只是来告诉你们一个道理，这道理不是我发明的，是早就有的。”

研究到深处，我们知道古老的象雄文化非常文明，佛教是生于高度文明之中——但佛教并不需要这背景，因为它就是有道理的。就像香曲多杰，他不需要说佛是他的根据，因为他讲的有道理，他并不是解释佛说的话，而是说出自己的思想。

我想通过展现历史文明，让人们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最高级的文明？什么是最好的文化？是经济发展吗？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等于一个空房子，房子越盖越大，里面越来越空。我们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不太平，到处发生战争和恐怖袭击。怎样才能和平？是原子弹吗？是强权吗？如果有佛教哲学在那大房子里，就绝不会有战争。

不管我经济怎样困难，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坚信，藏族文化对人类的未来会有好处。我要把博物馆做下去。

遗憾的是，爷爷和奶奶没有看到我做的这些事。他们对我的教育很重要，令我不犯错误。

我俩在八廓街上晃晃悠悠地转着。对藏人来说，真正的“拉萨”只是大昭寺周围，甚至不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八廓街是藏族历史的核心：大昭寺的兴建是佛教在西藏确立的标志之一；对藏人来说，大昭寺里的释迦牟尼像是佛教的象征；公元 823 年，吐蕃和唐朝将唐蕃会盟碑树立于大昭寺门前，此后唐朝与吐蕃间的纠纷基本结束；达玛灭佛时期，大昭寺被关，佛像被埋；达玛被佛僧所杀，也发生于大昭寺门前；在八廓街凌晨的雪地上，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脚印，弯弯曲曲通向一户人家，里面那位少女明月般的面庞，给佛教带来民间的气息。

对本书中的人们来说，这里也与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1988 年初，20 岁的

嘎玛桑珠在八廓街边转边哭，他终于到了他的圣地；不久以后他在这里看到一场骚乱，随后在八廓东街 25 号商铺买上商品，去藏北经商，开始人生的探险；他的未来仍然在这里——他梦想中的博物馆就要建在附近，他要在藏族文化的核心保护藏族传统。

再后来是仁青桑珠，他与妻子和孩子住在八廓街附近一个小房子里，日夜整理香曲多杰的经文；去年 5 月的一天，他和朋友扎多走在八廓街上，告诉他要相信因果。

八廓街也寄托着扎多的希望，在这里，他站在佛前，祈祷重新获得信心和力量。

二

我与嘎玛刚回到他的办公室，仁青桑珠骑摩托车进来，他仍是千年不变那身打扮：穿藏装，背书包，数码相机放在藏装前襟。他用力握我的手，露着大牙嘿嘿地乐。

嘎玛曾对一位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讲哥哥保护环境的故事，副主席答应给仁青经济支持。没过几天，仁青桑珠给副主席打电话：“你答应给我的钱，怎么还没来？”他要两万块钱，因为他那份环保小杂志《自觉》没钱出了。

副主席正出席一个会议，接到电话哭笑不得。仁青一点也不觉得可笑，他就是这样自自然然，童心烂漫。

就在不久前，有个外国基金会支持仁青桑珠做环境保护，赞助 5000 美元，要求他按项目书完成，仁青看完项目书吓坏了，“我完不成。”他说。

嘎玛骂他：“那是资助项目的惯例，但可以变通啊，你怕什么！”

“我不能按时间完成啊，怎么能骗人家？”仁青说。他想了一夜，第二天把钱退了回去。

仁青盼着整理完经书回到娘拉寺下的家，家门前树青草碧，流水潺潺，香曲多杰造的一个磨坊还能磨青稞。

十年前，贡觉有名的藏医日巴·达瓦次仁教仁青学医，这位藏医给穷苦百姓看病常不收钱。西药涨价，藏药成本也涨，但他不涨价，修了几个小房子，以房租补贴药品。

他对仁青说：“我在世的时候，你们可以看病吃药，但我死了怎么办？外面的医生是来做生意的，老百姓怎么看得起病？”仁青从此跟他学医，并请求嘎旺法王将香曲多杰的药方教给他，从 2002 年起开始给人看病。自从近一百年前香曲多杰来这个偏僻的部落弘扬佛法，当地就只有一个医生——先是香曲多杰，后是他外孙嘎旺法王，再就是嘎旺法王的弟子、也是香曲多杰的外孙女婿仁青。

有病人等着，行医一天也停不得，会耽误仁青做环保。他想培训当地人，选出环境保护的新领导人，“我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定要民主。”他说。

三

嘎玛与我聊着天，一个电话打进来，是在玉树的扎多，他与嘎玛商量协会注册的事。三江源协会原本注册在青海玉树，他俩决定在西宁重新注册，这样可扩大协会活动范围，做得更大。嘎玛放下电话说：“扎多做工作太扎实了，没人比

得上。但我对他说，他不能一头扎进乡村里不出来，必须跳出来，视野更宽，培养年轻人，影响整个西部。”

扎多刚刚经历一生最惊惧的事——他几乎失去女儿。几天前他与博雷带两个女儿加入一支队伍漂流通天河，十年前他就憧憬拥有一艘船，从通天河漂下来，一边宣传生态保护，一边为藏民治病。两个女儿与其他人一个小船，他与博雷一个小船，当漂流到安冲一带时，女儿的船被激流打翻。

两个女儿在北京读华夏女子中学，由扎多的朋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孙姗一家照顾。小女儿的理想是上北大，念哈佛；大女儿想在北京念完大学后，像爸爸一样保护藏区环境。

扎多希望老来在通天河边建个牧场，养上牛羊，那牛羊是放生的，无性命之忧，快快乐乐陪自己夫妇怡养天年。

“不过，你们女儿不会回玉树了，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不会到海拔那么高的地方。”我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女儿嫁个汉人？”博雷迟疑着说。

“不可能吗？说不定还是美国人、瑞典人呢。”

扎多和博雷怔怔的，说不出话。

“很可怕吗？”我问。

“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也没有。”扎多小声说。

“她们上大学后周围全是汉族青年，没有藏族人可以谈恋爱啊。”我说。

博雷悄悄地说：“可以和治多的同学写信嘛。”

他们一直为女儿能否保持文化传统担心，却从来没担心过生命本身。2007年8月10日下午，当扎多和博雷从通天河上岸扎营，突然不见了女儿——女儿落到了江中。

这天风大，通天河上有三级浪，浪高一到两米，下午5点钟，一个大浪“呼”地打来，小船应声而翻，两个女儿眼前一片漆黑。等冒出水面，16岁的姐姐尕松卓玛喘不动气。她从小温顺听话，妈妈要她戴着口罩，以防晒黑，她便口罩帽子全上阵，将小脸捂得严严实实。一落到水里，口罩堵住口鼻，雨衣带子系住脖子，让她无法呼吸，急忙双手乱扯。

14岁的妹妹德庆卓玛性格直率豁达，有点像男孩子，妈妈要她戴口罩，但一出妈妈视线， she 就把口罩扯掉，因此比姐姐幸运，从水里冒出脑袋，呼吸顺畅，一把抓住倒扣的船，随船冲了下去，过不多久被舵手拉到船上。

那舵手跳入水中去救尕松卓玛，但风大浪高，游不过去，他试了两次无功而返。尕松卓玛眼见那船越走越远，急忙扯下口罩和雨衣，“妈妈，爸爸！”她大喊，一口水冲入嘴中，漩涡将她缠住，她在漩涡中越陷越深，抬头看那水旋转成一个圆圈，在她头顶越来越高，圆圆的天空越来越小，她知道无能为力，心里急急地念经，把知道的经文全念一遍，眼前一黑，被漩涡带入水底。

“我要死了！”她想，眼前闪电般划过从小到大的一幕幕场景。以前她听人说，人将死时会迅速回顾自己的一生，现在她信了。那些场景像幻灯片一样闪过，迅速而清晰：爸爸用胡子扎她的脸——她在治多上学，老师经常打学生——两年前她到北京念中学，害怕一切，每次给爸妈打电话都泣不成声——北京北四环车水马龙，她不敢走过去，站在那里哭起来——每个周末回到孙姗阿姨家，那是她最放松的时候，可周日下午返校，她突然发现自己紧张地咬破了嘴唇——她和妹妹慢慢适应了北京，因为宽厚善良，颇受同学欢迎。两年以后，她们汉语说得比藏语更流利，还带北京口音，爸爸不断提醒她们：不要忘了藏语！

“我还年轻着呢，我不能死！”她想，“我要出去！”

她想喊“救命”，旁边岸上也许有藏民，可她怎么也想不起那句藏语，北京的两年几乎将她变成汉族孩子，等她终于再次冒出水面，那句藏语仍没想起来，只好用汉语大喊：“救命，救命！”

妹妹远远听到姐姐的呼喊，心中冒出一句话：“唉，你喊汉话，谁听得懂啊。”

妹妹终于看到岸边参加法会的藏民，她用藏语大喊：“我姐姐在水里，救她啊！”

漩涡将尕松卓玛带下去三次，第三次冒上水面时，急流将她带往一块礁石，她一把抓住石头攀上去，发着抖，看水面上漂着一个熟悉的水杯，那是自家的。她忘记那水杯原在自己船上，恍惚以为是在爸妈船上的，“这么说爸妈也翻了船？”她远望水面，只有汹涌的水流与大浪，“爸妈死了！”她绝望地大哭起来，忽然有股不想独活的冲动，可看着那凶猛的漩涡，却也不敢再跳下去。

一个藏民过来，直直地看着她问：“你还活着吗？”

她乖乖地说：“我活着。”

在营地，扎多与博雷几乎急疯，失去两个儿子的情景一次次袭击他们脆弱的神经。天要黑了，漂流的组织者骑摩托车将尕松卓玛接来。尕松卓玛扑到爸爸妈妈怀里，母女放声大哭。

四

我敲开耿登的门，他正在看书，“天珠之路”这种说法是他提出的，经过研究天珠从喜马拉雅地区流向南亚、中亚的路线，他认为亚洲文化的起源是喜马拉雅地区。

“现在还没人知道这一点，但我有很多物证。我告诉嘎玛，你要相信我，我确信发现了这个秘密！”他说。

他正雄心勃勃地制订研究计划，嘎玛将支持他。

这个 38 岁学者的历史研究受到许多压力，包括一些喇嘛活佛。他们指责他的研究挑战佛教的权威，而耿登认为，许多藏族人将宗教代替历史，历史研究方法不科学。他尊敬近代学者更敦群培，更敦群培也是喇嘛，伟大的历史学家，其历史研究摆脱了宗教的束缚。

耿登办公桌上摆着女儿索南瑟姆的照片，6 岁的小女孩儿非常漂亮。她出生于四川巴塘，巴塘弦子很有名，所以大人为她起汉名为“弦子”。“索南瑟姆”是夏日东仁波切起的名字。索南瑟姆现住成都，耿登想念女儿时就端详她的照片。

我看到耿登少年时的照片：他穿着绛红色僧衣，头发剃掉，与和尚们在寺庙里，平和快乐。另一张照片上则模样大变，他与四个女大学生亲密地坐在一起，长发披散，看起来飞扬跳脱，那是他在北京还俗之后。

嘎玛走进耿登的办公室，从我手里拿过照片细细端详，“这真的是你？”他问，“怎么是这种发型？”

耿登现在头发不长，只在脑后扎一个小辫。他笑道：“我这辈子发型总是变来变去，嘎玛永远一个大辫子，从来不变。”

他的书架上摆着一幅画，一个美丽的半裸女性盘膝而坐，黑发长长，略卷着披散在肩上，眼睛妩媚地斜视，左手置于膝上，右手在胸前做拈花状。

“这是谁？”我问。

“我画的乌摩，大自在天的妻子。”

印度教、苯都和耆那教都认为，创造世界的是“大自在天”，他的妻子乌摩是最美的女人，是代表欲望的神，所以又称“欲女”。她是象雄文化中的第一个美女，其道场在冈仁波切（冈底斯山）。她在佛教中是菩萨的化身，密宗修行要经由她的帮助才能成佛。

更敦群培曾写诗赞颂乌摩：

她美丽的面庞如满月般明亮

她微笑的牙齿如洁白的珍珠

她青春的乳房如浑圆的海螺

那是乌摩女神，我顶礼在她脚下

耿登说：“她是美，也是欲望。欲望才让人感到生活的快乐和悲伤，没有欲望如何觉悟？欲望是成佛的根。我画她有两个意义：第一，她是象雄的第一个美女，是我们文化的母亲；第二，我生活中的女人美丽伟大，我不能没有她们，我为自己创造一个神。”

仁青桑珠看到这幅画时，惊喜地问：“怎么画的？我也学学，是不是你的纸特别？”

那只是普通素描纸上的水彩画，仁青不信，从耿登的速写本上撕了一张拿回去试验。

“他画不出来的，”耿登笑道，“他要画，肯定给她穿上衣服。”

“在经书中，乌摩就是这个样子吗？”我问。

“不是，我画的是我心中的乌摩。”耿登说。他画的是他生命中的女人：令他还俗的那位姑娘的身材，前妻的脸，白玛旺姆的长发。

他与白玛旺姆分手后，无法排遣心中的痛苦和思念，便用铅笔画出那幅乌摩神女，将白玛旺姆的长发细细描画。他不知道，痛苦中的白玛旺姆，正想抛却这烦恼丝。她把耿登送她的玫瑰拍了照片，一直存在手机中，时不时流泪看那玫瑰。思念折磨着她，她忍着不去找那个负心人，那只是个花花公子，对自己并不认真。

她在博客中写道：

平时如行尸走肉,走在大街上,不听话的眼泪会掉下来,已经不知冷暖的身躯在32度的高温下穿着针织衫行走。同事问我:“你不热吗?”我回答:“不热。”是呀!真的没感觉到热,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温暖受伤的心吧!朋友不忍心看我憔悴的样子,建议我去换个发型。这个建议不错,一切从头开始,换个发型,换种心情!

发型师拆散我的头发问:“这么好的秀发你为什么要剪掉?你舍得吗?”

我答:“已经开始掉了,与其让它掉光,不如自己剪掉!”

发型师说：“我看你脸色不好，肯定是有啥心事……”这时不听话的眼泪又出来了，看着镜中的自己——呆板的眼神，蜡黄消瘦的脸庞，失去光泽的秀发……不禁怜悯自己：可怜的人儿，不能再这样折磨自己了。思念折磨人，但我不能折磨自己。有了佛陀的护佑，有了自己的信念，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

就在我这次去拉萨见到耿登后不久，白玛旺姆与妈妈也去拉萨朝圣。她们坐车去哲蚌寺，经过罗布林卡路，忽然看见了耿登！耿登低头踽踽而行，没有看见她。白玛旺姆差点惊呼出来，用手捂住剧跳的胸，想喊却不敢，眼睛追着他，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参拜完哲蚌寺，她特意步行下来，心里希望碰到他，但不见他的影子。她矜持着不打他的电话，只希望偷偷看看他，或者让他无意中突然发现自己。随后的几天她常常去转八廓街，知道他喜欢坐酒吧，于是几乎坐遍了拉萨的酒吧，妈妈不明白，为什么女儿老拉她这老太太逛酒吧。几天下来，也没有碰到他。

她灰心地回到成都，决定出家当尼姑，将烦恼像头发一样剪断。在与同学聚会时，她郑重宣布这一消息。同学们不信，说如果她出家，以后每人每月资助她一百元。

“你要真当尼姑，我每月两百！”尼玛笑道。新都桥藏文中学的同学，现在只有他和白玛旺姆在成都工作。

过了几天，尼玛又来电话，“你真要出家？不是说着玩？”

“是的，我决定了。”

耿登将一张藏族歌手德乾旺姆的唱碟和那张乌摩妃的照片送给我，我看着乌摩黑黑的长发，不由为他叹息。我不知道，半年之后事情会有转机。

2007年12月24日，两人分手一年半以后，耿登从拉萨回到成都，犹豫再三后拨通了白玛旺姆的电话：“我是耿登，今晚请你吃饭好吗？”

终于盼来他的电话！白玛旺姆强抑激动答应了，放下电话，她告诫自己：“白玛，要坚强，不能失态！”

两人在彩虹桥旁的银杏餐厅坐下，“近来好吗？”耿登问。

白玛旺姆的心颤抖起来，她“嗯”了一声。

“结婚后过得可好？”

“我没结婚。”

“什么！”耿登瞪大了眼睛。

“我从来没结婚。”

“什么！”

“我早和他分手了！”

“什么！！”耿登呆一呆，“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当尼姑。”

“你当尼姑，我怎么办？”

白玛旺姆低着头，不说话。

耿登说：“我把你弄丢了，今天总算找回来了。”

她低着头，眼泪流出来。

“在我们分开的日子里，我最后悔的是没有好好对你，没有给你值得开心的回忆。”耿登说。

“感谢佛祖再一次让我们重逢，我再也不要离开他！”白玛旺姆看着这个男人，心想。

喝完杯中的红葡萄酒，他们走出餐馆，小雨将冬天的成都打得湿湿的，他们坐上一辆三轮车来到锦里古街，锦里灯火闪烁，两人手牵手，满心喜悦。“我们再不能丢对方了。”耿登对她说。

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美的耶稣诞辰。慈悲的佛祖会微笑着原谅这一对信徒。

五

拉萨下雨了，我钻进房间，给一个评奖委员会写嘎玛和扎多的推荐意见。写着他们，我想着尼玛和木梭。许久未见他们了，尼玛半年后将在木雅老家迎娶赵佳。

木梭刚刚被聘为德钦县古城开发办成员，他在电话中对我说，要吸取丽江古城和香格里拉（中甸）古城的教训，既要发展旅游，让居民享受发展成果，又不能失去淳朴的民风 and 传统文化。

修行与事业之间的矛盾仍困扰着他，他在邮件中说：“通过现实和上师的开示，有一些明白，但最终的答案还是有些悲观。上师说，现在已进入五浊恶世之最浊阶段的众生浊，想清净地修行，难；能做到不做坏事洁身持戒已属难能，再能利众为民做些好事，学习佛法，更属可贵；要想清净专修，基本上是没戏了。现在许多学佛者人心漂浮，很容易在物欲横流里迷失了方向。

“好在任何善恶行为都成为来世之因，况今生现世稍修善法，佛说比在他方净土世界修行更强百倍，说明浊世也有浊世的好处。但修行者最根本的还是关乎发心，发心好了，什么都是好的，发心不好的，什么好事都可造成恶果。但我目前没有达到那个层次，所以时常有迷失感，得时常去找师父寻求安慰和方向。”

他在另一封邮件中说：

“最近一直跟着仁觉活佛和旺秋师父听法，一直沐浴在法雨甘露中，昨天回到家里有些无所适从，包括跟老婆共枕，都觉得乏味和无聊。今天跟一个领导共餐，他要调走了。大家在喝酒，我无言以对，茫茫然感觉大家都在一种昏迷虚境中——他们在举杯庆祝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们，芸芸众生所无法摆脱的轮回吧。

“你所看到的木梭还昏头昏脑在佛与世俗之间晃当着，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我跟老婆说：‘如果我们都能活得老一些，你跟我一起受剃度出家去吧，我不忍看到你浪费今生，误了来世。’”

第二天早上，我的推荐意见写完最后一句话：“扎多和嘎玛帮助藏民保护环境与文化，但我没有过多提扎多和嘎玛的贡献，也许他们的意义就在于此——他们不想自己成为主角，只是帮助自己的人民充当主角。”

我该走了，回到我的北京，我的家。这里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这里。我留恋地看着那一个个房间：门窗紧闭，嘎玛的数千件收藏品，包括数百个珍贵的天珠，静静地伏在那里，等待被世界发掘。它们代表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传统与价值。我想，对藏民族和全中国来说，我书中的这些藏族人，又何尝不是像天珠一样宝贵呢？

嘎玛早早起床给我烧拉萨甜茶，他把茶、牛奶和糖倒进茶壶，笑呵呵地说：

“夜里做了个很好的梦，几百只牦牛在家乡的山上把我围住了，三分之一是白牦牛，漂亮得很！山上有一大片绿草，我真高兴啊，想拿起镰刀割下来。我想这不是预示着发财，而是预示着我的博物馆会成功。”

我笑了笑，未加评论。我想起他以前的梦，他十几年前第一次收购佛像的前一天夜里，梦见一大片绿草，割了很多，欢欢喜喜赶着牦牛下山。他相信那梦定有什么启示，第二天买到两个佛像后，他的人生果然改变了方向——他从纯粹的商人变为民族文化的崇拜者和保护者。

“啊呀，这个梦太好了！”他兴高采烈回味着昨晚的梦，手持大壶给我倒茶，甜茶热气袅袅，奶香扑鼻而来。我端着茶碗微笑不语，不知道说什么。我希望他的博物馆成功，很高兴他充满信心，但我对他信心的来源感到陌生。我的信心来源于我自己的过去和对未来的梦想，但当我说出“梦想”这个词的时候，与做一个梦毫无关联，梦只是梦，是我的头脑在睡眠时开的小差，与“神启”无关。换句话说，我信心的来源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而他不同。

如果一个汉族朋友对我说昨晚做了一个美梦，预示着他要成功，我可能会笑他“瞎扯”。但对嘎玛的梦，我不敢贸然置评。他的精神世界是那样丰富，他的自信来源于对佛教的信心，而这自信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相信梦的启示和占卜这类外人看来迷信的行为。

如果我不了解他，也会像别人一样笑他，但我知道信仰令他的内心多么坚强，胸怀多么宽广。所以当他说“梦”时，我心情复杂，不仅难以置信，也感到惶惑羞愧。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很小，而他的世界很大：山峦可以挡住我的视线，却无法限定他的视野。

这是两种文化间的鸿沟，我是一个“加”，来到这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尽量既不自大，也不自卑，怀着一颗探索的心，跟随这些藏人的脚步，请他们给我打开一扇门，进入更大的世界。有一点我很确定：对于这个世界，我是一个无知者，尽管我自居在“文明”之地，但就像青藏高原的一只旱獭，看似雄距世界之巅，视野所见，不过是自己黑黑的洞穴和几棵草根。

我喝着甜茶站在三楼走廊上。雨住天晴，一个胖胖的年轻女人在楼下院子里扫地，她穿着红色黑条上衣，黑裙子，一条黑亮的大辫子被红绳缠起，一块大大的绿玉挂在胸前。她是这里的女主人，阿贡活佛的侄媳妇，大宝法王的妹妹。鲜艳的杜鹃花瓣被雨打落一地，她拿着扫帚将落红扫起。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在她后面呀呀叫着，转来转去。

喝完最后一口甜茶，我有些伤感地告别嘎玛、仁青和耿登，坐上去机场的大巴。大巴沿“北京中路”西行，高高的布达拉宫从我右侧闪过，慢慢淡出视线，就像慢慢沉没于历史中。

我临座一个藏族小伙子用手机听着摇滚歌曲，极为吵闹，我忍了几分钟后，逃到一个空位上，刚坐定，一股浓香差点让我窒息，原来旁边是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暴露的时装和劣质香水将藏族女孩朴实无华的美消灭得干干净净。

我无处可逃，侧脸看窗外，拉萨河在阳光下闪着波光，德乾旺姆的《青藏阳光》，轻轻唱在心上：

在青藏的海上

歌谣和诗篇涌来

青色的山岗上

摇动着山歌的响铃

五色的经幡在风中

在风中，在风中

吉祥带给世界

啊 啦 耶

谁说高原上没有阳光的海

谁说这里是贫瘠的大地

朝霞在雪山盛开

你看那阳光洒下来

洒下来，洒下来。

附录

本书人物采访时间地点

嘎玛——拉萨(2006.5),成都(2006.6), 西藏昌都(2006.7),四川德格-白玉-色达-炉霍-成都(2006.7), 北京(2006.8),拉萨(2007.2), 北京(2007.8),拉萨(2007.8),北京(2008.2), 北京(2009.3), 北京(2009.5)

扎多——青海玉树(2005.8),北京(2005.10),四川康定(2005.11),德钦-拉萨(2006.5),北京(2006.5), 成都(2006.6), 成都-西宁-玉树-治多-索加-西藏昌都(2006.6-7), 北京(2006.10),昆明(2007.1),北京(2008.2)

仁青——四川康定(2005.11), 拉萨(2006.5), 北京(2006.10), 昆明(2007.1), 拉萨(2007.8)

木梭——云南德钦(2006.5),北京(2007.1)

尼玛——成都(2006.1),成都-康定-雅江-道孚-炉霍-德格-丹巴-成都(2006.4), 德钦-拉萨(2006.5),成都(2006.9)

耿登——成都(2006.6),拉萨(2007.2), 拉萨(2007.8), 北京(2008.2),北京(2009.6)

文扎——青海治多(2006.6)

扎西——青海治多(2006.6)

博雷——青海治多(2006.6-7), 昆明(2007.1)

珍嘎——青海玉树(2006.6), 成都(2006.7), 拉萨(2007.2)

江格活佛(珍嘎父亲)——青海玉树(2006.6)

斯郎伦布——云南德钦(2006.5),昆明(2009.5)

中华——云南德钦(2006.5)

白玛旺姆——北京(2008.2)

多吉(尼玛的朋友)——四川炉霍(2006.4)

后 记

我把这篇后记献给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们。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如果不是他们，我所拥有的只是梦想，而他们让我梦想成真。

我把最诚挚的感谢送给吕植教授，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2005年12月3日，从康定回到北京的一次会议午餐上，我忐忑地对她说：“我想写一本书，写那些藏人的故事，他们在保护藏族传统，创造藏族的未来，他们是藏民族宝贵精神的体现者，你的组织能不能支持我写这本书？”我同时明白地告诉她：“这是一本公益书，有独立立场，你的组织不会从书中获益，我也不会为你们做广告。”

她说：“我们不要你为我们做什么，只需要你写一本好书，一本对青藏高原有功德的书。”

她几天以后告诉我，她和同事们愿意资助我到藏区采访的旅费，以完成这本书。当初同桌吃午餐的朋友听说此事，惊讶地说：“谈成了？那么简单？”

是的，就那么简单。当时我与吕植还不很熟悉，我们之间也没有经过繁琐的项目建议书、讨价还价、审批之类。她抛开那些文书程序，直接以开放的心灵感知我的心灵，她知道我要的不是名利，我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探索那陌生的世界。

后来我到她家做客，站在书架前，看上面摆满了西藏书籍，我更理解她为什么愿意支持我。她是一个科学家，但她的藏书包罗万象，包括文化、历史与宗教。她曾在藏区工作十几年，研究大熊猫，保护那里的生物多样性，也关注那里的文化多样性。她对我说，做自然保护不容易，总是逆水行舟，因为贫穷的地区要经济发展，而保护自然往往要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但她到藏区以后，眼睛一亮，发现“逆水行舟”一下变为“顺流而下”，她所讲的自然保护观念，藏族人很欢迎，他们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保护理念很合拍。她在四川德格遇到一位藏族副县长，这位副县长戒酒戒烟了，吕植见过许多干部，但戒酒戒烟的很少见，问他原因，他说：“我在喇嘛面前发誓了。”

吕植想：“既然这样，藏族人要做到不杀野生动物、不破坏生态，岂不是很容易？这个文化是有戒律的。”

吕植觉得自然保护事业在藏区找到了希望，并由此开始了解藏族文化，但越了解，越觉得教科书和媒体上的藏族文化是多么肤浅片面，藏族文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和价值，远没有被发现。如果不深入理解一个民族，民族之间总会有隔膜。“理解了，心里就敞亮了，民族之间的和谐也就实现了。”她说。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她理解我想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还要感谢来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保护国际”的朋友们，特别是孙姗、李晟之和黄文思，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不可能完成。他们帮助安排我的旅行，向我提供部分采访人选。他们的慷慨、耐心与友情，让我在艰苦的采访写作中无后顾之忧。书中人物与他们或是合作伙伴，或是朋友。我通过“山水”与“保护国际”，才有缘结识主人公们。

书中主人公们对我宽容友善、大度坦诚，他们没有一个人跟我讨论：你为什么要写我？对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你要占用我多少时间？你可不可以

隐瞒我不好的一面？没有。他们只是无私地满足我的要求，包括那些接受我的采访，最终却没能出现在书中的人，感谢你们。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们：中央党校靳薇教授向我提供很多资料；《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杨瑞春提出重要修改建议；我的同学、《南方周末》同事石岩耗费大量时间为我修改书稿；学者白玛旺杰先生提供重要资料。他们的点拨，时不时让我醍醐灌顶，我根据建议修改书稿后，往往感到焕然一新。现在他们的帮助，都体现在这本书中。

感谢孟宪明、闻进、周雍武、张彪、杜娟、吕中校、易水、田发伟、熊晓霞、吴敏、周青丰等朋友，他们为我联系出版事宜，给我雪中送炭。感谢西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边建强和他的同事欣然接纳此书。我还要特别感谢何广玲，她是位完美的出版经纪人——热爱书籍，一切为作者着想，热情、无私、高效。遇到她是我的幸运。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儿，在我采访、写作、出版的3年多里，他们承受了最大的压力，也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刘鉴强

2009年7月于北京

再后记

《天珠——藏人传奇》先由香港中华书局于 2009 年 7 月初出版，读者手里这个大陆版则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在 11 月出版。与港版相比，大陆版修改了部分标点符号、错别字，做了一些润色。

书中人物都是现实中人，《天珠》把他们的过去定格在书中，但他们的生活一直在丰富多彩地变化——人生有许多可能性，没有人可以被凝固在文字里。借大陆版出版之际，我把部分主人公的最新情况介绍给读者：

扎多和嘎玛的“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原注册于青海玉树州，现已重新注册于省府西宁，这样可扩大协会活动范围。几天前的 10 月 31 日，因为杰出的环境保护工作，他们的“三江源协会”获得李连杰壹基金的一百万元资助。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所获最大数额的资助。

嘎玛除了筹建自己的博物馆，目前在筹划建立一个藏区虫草市场，以规范目前混乱的市场秩序，保障基层藏民利益。妻子珍嘎陪女儿在成都，两个女儿都读小学。以前两个女儿特别喜欢妈妈穿漂亮的藏装，但“三一四”后，两个女儿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藏人，请妈妈出门时不要再穿藏装了。她们甚至希望离开成都，回到玉树。

仁青桑珠来往于拉萨和家乡贡觉两地，继续做经书整理和环境保护。因为当地藏民在环境保护、草场纠纷、退耕还林补偿方面与个别官员有不同意见，被认作当地人主心骨的如凯家族仁青、嘎玛、晋美朗加三兄弟面临着一场危机。

木梭仍在德钦“古城办公室”工作。在读完港版《天珠》后，木梭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从书中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那个彷徨中的木梭。现在他笃定多了，因为这几年的乡村教育实践证明，弘扬佛教与社会发展可和谐进行，他的修行与入世并不矛盾。他还说，以前接受我采访时有点担心，怕我把他写得太好，不真实。现在他放心了，他把书给几个朋友看，朋友告诉他：“没把你写好，也没把你写坏，而是把你写对了！”

尼玛已离开环境保护组织，回家乡四川康定考取了公务员。妻子赵佳辞去成都的工作，跟尼玛到了康定。

耿登与白玛旺姆终究无缘，还是分手了。耿登居住于北京、拉萨两地，继续研究天珠文化。“天珠之路”和“天珠鉴定中心”已开通网站<http://www.gziroad.org/>。

白玛旺姆独自在拉萨仙足岛生态园开了一家“白玛莲花”家庭客栈，她希望用客栈的赢利帮助四川色达一家藏族残疾孤儿学校的孩子们。“白玛莲花”初创，本小利薄，经营不易，她在努力中——用她自己的话说：“累并快乐着。”

刘鉴强

2009 年 11 月 2 日于美国加州伯克利